［苏］斯·阿利卢耶娃　著
黄柱宇 唐伯讷　译

遥远的乐声

中央编译出版社

Свит ана А и уева : Да ёкая Музыка

经美国 LIBERTY PUBLISHING HOUSE , Inc .授权,
本社拥有全球中文版独家出版发行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乐声/ (苏)阿利卢耶娃著;黄柱宇译 .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
ISBN 7 - 80109 - 289 - 9
Ⅰ 遥… Ⅱ .①阿… ②黄… Ⅲ .阿利卢耶娃 -
回忆录 Ⅳ .K835 .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783 号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 - 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 32
字　　数:182 千字
印　　张:8 .625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8000 册
定　　价:17 .00 元

本书于1983 年用英语写于英国，本来准备在英国出版。但是，原稿于1984 年8月在印度付梓，并且只为供应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图书市场。

俄文译本由笔者于1987 年在美国完成。神学教授格奥尔吉·弗洛罗夫斯基曾自行翻译他在英国出版的早期作品。诚如他所说：“把自己的作品译成母语，其艰难出人意料。”这话千真万确。用英文思考和写作，与用俄文思考和写作，压根儿是两码事。我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一点，并原谅我在文风上的差异。这不是一本用俄文写成的书，而是一本翻译作品，尽管是由作者本人翻译的。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目　录

错　　步

我总是听见另一种鼓点。

还在苏联上中小学，后来上莫斯科大学时，我就一直如此。我怎么也无法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孩子齐头并进，没有及时加入童年时代就应当加入的那些组织。我23岁上大学时被拉进党内，可党史考试却不及格，这使学校党组织大为尴尬。我总是合着自己个人主义的乐声，踏着另一种节拍前进……

这或许是我从浪漫的、具有理想主义的母亲，以及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

不过，这也可能是19世纪贵族创作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感化的结果，尽管我们这一代人与那些贵族没有丝毫关系。但无论如何，这种只有我才听见的我个人的

鼓声，把我从虔诚的共产党员们匀整的步调中解救出来。

这奇特而遥远的乐声并没有因年深月久而消逝，相反，它使我离克里姆林宫越来越远，离苏联的社会习俗越来越远，并且最终引领我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即使在我生活的这个自由世界里，它仍然发出声响——轻微而遥远的声响，不许我融入那些侨民和叛逃者中，一直悄悄地向我作着某种提示——无论是朋友还是广大公众都不曾从斯大林的女儿身上料到的提示。

我在生活中也习惯了这种旋律，爱上了我自己特有的节拍和速度，尽管这常常将我带入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和幻想家们独自徘徊的小巷。

不过，只有那些从不幻想的人，才喜欢在队列中杠着旗帜，大步走向我们这个残酷时代让他们注定惨遭的灭亡。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旗，迈开整齐的步伐，齐声唱着歌曲，绝对遵从命令，行动得像一个人一样。唯有孤军奋战的个人主义者，才能回转身来，逆着潮流游向彼岸——无论是在政治、宗教方面，还是在个人生活或任何一种艺术方面，莫不如此。但这并不轻松。

本书是我前两部自传作品的继续，尽管我从来无意写作这类自传。然而，这本书也不是谈论美国的。从政治或社会学的观点去分析和评价美国不是笔者的初衷。同前两本书一样，我的主要兴趣首先是针对人，针对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微小差别和细枝末节，针对使整个人类团结起来的一切问题，针对使我们大家亲密无间的所有因素。

这里记叙的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和各个城市，都在笔者生活发展轨迹中自然出现，但并不总是笔者根据自己的偏爱挑

选过的。这一切都按照笔者在美国15 年的生活顺序一一写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无力改变生活的潮流——那是自由自在而又五花八门的社会中一股强大的潮流,我曾面临在这一潮流中漂游。我在苏联接受的枯燥单一的"维多利亚式"的教育,对于接受这样的生活毫无准备。不过我高兴地接受了这样的变化,爱上了这样的变化,并顺应了各种事情的发展潮流——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这些事情。

这本书不是什么成就史,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目的。它也不是描写移民为获取功名荣誉、财富地位而拼搏的典型故事;倘若如此,则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未曾去努力争取会见美国的名流巨擘——生活在普通人之中从来就是我的愿望。这里描述的大多数人(我常常不用他们的真名实姓),都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我曾希望能在美国过上清静的个人生活,正如我在莫斯科所习惯的那样。远离政府及其代表机构而独立生活,这在苏联是完全办不到的。我曾希望像在俄国的整个大学时代那样,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而且一般地说,我想使生活过得不引人注目——我内向的性格要求如此。对于一个拥有充分新闻自由的开放社会来说,这可能是太大的奢求。不过,不管怎么说,在我生活中的各种时刻我都常常感觉到,在美国我是如愿以偿了;我感到我寻求到了这样的生活,却又仅仅是为了立即将它失去。

回顾过去的15 年,我认为这段时间同我以往的整个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同时,与我过去写的两本书中的内容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两本书一本是《致友人

的二十封信》(描写在苏联的童年和家庭),另一本是《仅仅一年》(描写我的思想产生根本变化,从苏联出逃,摆脱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以及同我自己的过去脱离干系的经过)。没有必要在本书中再重复我已经写过的事情。《遥远的乐声》写的是我的生活后来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历程。

对我前面两本书深有理解的出色的读者们,我希望也能将本书通读一遍。或许这能使他们回复到过去那些已经熟悉的篇章中去。希望他们把我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想象。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将难于发现这一整体性。但是,看待生活时不囿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或许恰好能在这儿找到他们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

毫无疑问,我未曾为了追随极端对立的政治势力而离开共产主义世界,尽管起初我就很乐于接受外来引诱,并曾大骂从小在红旗下接受的那些教育。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清楚地洞悉了两个世界大国——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和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惊人的相似性。而且,我从来就相信两大人民——俄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是如出一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倾向于温和的,比较稳重的那些政府和社会。它们一方面没有苏联那种极端的压制,另一方面又不为全面极端的自由所累。我想,某种第三条道路或许可能拯救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和平,这个星球已由两大巨人互相敌对而被搞得四分五裂。由政治节制而获得全球和平,我感到是未来唯一的希望。但是,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并不是我在美国度过了15 年,而是我近60 年全部生活的总结。在美国的最初几年,我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

对于自由世界，特别是对于广泛的美国民主，几乎所有移民作家，当然还有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逃亡者，都给予了过分的颂扬。我在《仅仅一年》这本书中对此也同样作了过高的评价。我被所到之处一张张友好热情的笑脸所迷惑。对于豪华和气派我却并不迷恋，因为我来到这些阔绰的美国市郊，压根儿就不是由于贫困。当你在美国人中生活了许多年，并悉心观察了美国的所有现象之后，你就会明白许多令你大为愤懑的事情。

你会开始痛恨所谓的公开性——这是一种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的现象：优秀的美国人对"自由报刊"大伤脑筋，认为它庸俗，浅陋，歪曲真象，对一切事情持反对态度。你会开始发现人们对于自己的"敌人"惊人地无知，犹如在苏联的情形一样——那里的人对于美国生活也毫无了解。在这一点上，将美国人同俄国人作比较的确恰当。敌对双方采取的宣传手段旗鼓相当，其作用只是传播自己的偏见——这些偏见远非社会优秀分子所执。在美国，军国主义的意向及宣传确实猖獗，而且充满了仇恨，与在苏联可以看到的情形一样。凶杀和犯罪充斥美国影视节目，其犯罪率与苏联不相上下，差别仅仅在于苏联的报刊和艺术作品对此讳莫如深。两个国家都在继续伪善地号召追求文明理想主义，但比之于理想主义，无知倒更能使两个政府满意。人类建造的核武库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武器，它不仅能使敌人一命呜呼，而且可以叫全球彻底毁灭。

我并不是一下子就看清这一切的，但它迫使我对最初将私有制无限美化的作法重新进行审视。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政府有能力毁灭世界，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红旗还是星条旗。在本世纪80 年代，仅仅在各大陆和小岛上同共产主义作

斗争还不够——必须使两大巨人的战争狂热冷却下来，学会在一起共同生存。

类似的结论我是逐渐地、而不是一下子得出的。1967年3月，美国大使馆告诉我说，我可以直飞美国。当时我又惊又喜。但是，经过在美国15年的亲身体验后，我现在怀着更大的好感看待这两个政府，它们比我熟知的那两个政府更少情绪色彩；两个大国更为冷静的首脑所持的克制态度更合我的心意——我对苏联和美国作同样的评价，我把我的希望同欧洲人、亚洲人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纯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我把这看做是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拯救世界，使之免遭彻底毁灭。

在苏联和美国生活了许多年，深知大国从大范围内思考问题的固有特殊习惯，我真害怕这两个大国太相似，太互相仇视。

这两个大国实在太相似了。它们有众多的民族，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都有融为一体的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传统。这些传统因求生存的历史必要而建立，又备受千百万人衣食需要的重压之苦。抽象的"俄国人"是不存在的，正如不存在抽象的"美国人"一样——这都是双方想象和宣传的结果。但是在这抽象的概念中，确又存在两大民族现实的人的大共性。

"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小国的生活才算得是幸福美好的！"有一次，一位美国政治家对我说。他对他的国家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又十分热爱他的国家。他的话不能不使人产生同感。确实，斯堪的纳维亚小国的生活，比起我那个从东到西横跨七个时区的祖国，要幸福多了……比如说，挪威就很容易管理。所谓为"防御外来侵略"而制造原子武器的构想，无论在瑞士、奥地利，还是在瑞典，怎么也不会产生。这样的狂想只会产生

于我深刻了解的两个大国。

这几天，我仿佛站在一片高原上，从自己生活体验的高度，比任何人都清晰地看见两个大国所具有的危险性——它们的人民（食不果腹的苏联人，营养过剩的美国人）生活在头脑简单的军国主义者政权之下。我看见，这两大对立阵营的政治，是建立在多半消极的情绪基础上的。为了使这两大阵营接近、和谐，绝对有必要由头脑冷静的调解人和中间人从中斡旋。

顺便提一下，我的观点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1967年，我在美国驻德里大使馆写的解释性声明中，已经很清楚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尽管那时我的英文很不流畅，词汇很少。我，一个来自克里姆林宫、从不过问政治的个人主义者，当时写道："……我坚信理智在世界各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我坚信无论哪里都可以安家。世界实在太小，而人类在宇宙中只是沧海一粟。人类不应当斗殴和不必要地去流血，而要为共同的进步同心协力地工作……对我来说，不存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人之分，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之分。地球上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生活，他们到处都是一样的。"

这怎么也说不上是一个叛逃者在从铁幕国家逃到自由世界之际，在类似情况下发表的典型声明。但我是在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说这番话的，因为这一刻必不可免，话要讲得十分简明。

在与外界隔离的苏联生活了40年的我，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些念头呢？毫无疑问，它们来自念书的年代里贪婪啃下的书本，来自艺术、诗歌和音乐，来自不久前我开始信奉的宗教，来自大学文科教材，当然，也来自莫斯科知识界的密友。亲爱

的读者，因为莫斯科并不像某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在美国和欧洲读者面前断言的那样，只有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莫斯科如同整个俄罗斯一样，不止一次地产生了并且还在继续产生深刻非凡的思想家，真正的精神领袖。这些人都具有深厚的博爱思想。造出氢弹的萨哈罗夫院士后来发表声明：所有核武库都应予销毁。奥本海默也在美国讲过同样的话。他俩出类拔萃的思维曾经是孤立的，而现在他俩在全世界受到千百万追随者的敬重。

今天我惊奇地发现，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孤独。尽管在苏联、在美国、或在我现在生活的英国，我都从未上街游行"拥护和平"，但我实质上属于一场包括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的广泛运动——一场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注意的争取和平的运动。这些政府虽然尚未认从于这场运动，但那只是迟早问题。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在美国产生多年的孤独和失望之后，我蓦地发现自己犹如岸边的一粒沙子，犹如沧海之一粟。我只是千百万与我相似的人中的一个，我的话只不过是在重复整个大合唱。这就是那遥远的乐声将我招引去的地方，而且看起来招引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另一位鼓手用他的鼓槌击出的节拍，它召唤我踏上征程，但并不是让我投入战争。他的进行曲就是这样一种内容。

* * *

所以，亲爱的读者，当我那份必不可免的声明交到美国驻印度大使手中，并按外交途径送达华盛顿的时候，我只字未提"去美国政治避难"——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合法措辞。稍

后,我到了美国,才认识了这一类术语。而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只是天真地认定,每个跨进外国大使馆的人都会被准许进入该国。或者——不然的话——就会被遣返回苏联。我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叫人害怕的可能性,一直忧心忡忡。直到最终被美利坚合众国所接纳(其间曾在瑞士逗留),我才算安下心来。

然而,由于充分想象到最坏的一类可能性(某种"交换"),并且熟知苏联政府的思维方式,我不能立即向我的新保护人提出任何选择,也不能有所坚持,有所要求。我自己无法评价发生的事情。

同时,在印度,我一直带在身边的手稿《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也被拿去审查。他们用我不知道的技术方法将书稿逐页直接传送到华盛顿的国务院。在那儿,书稿的6份复印件分送给了各种苏联问题专家,以鉴定此书的质量。

后来我很快被送出印度,因为印度政府完全有可能把我遣送回莫斯科。于是,当我真个地悬在半空中——坐在从德里到罗马的飞机上时,好几个政府都在以飞快的速度解决问题,研究如何摆脱窘境,既不使莫斯科过分难堪,又要保住自身的尊严,如何尽可能使这位奇怪的叛逃者不至带来危害。毫无疑问,那时候一定会有人怀疑:难道斯大林的女儿会像她父亲那样行动起来。她父亲在国际舞台上可是个善于取胜的人物!他会使出狡猾的、出人意料的手段,使他那些彬彬有礼、颇具教养的反对者目瞪口呆。回顾当时的日子,我完全理解使切斯特·鲍尔斯大使也深受折磨的恐惧。鲍尔斯是当时参与此事并确实营救出我的人中一位最富人情味的人。那些人全都可以作最坏的猜测。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延宕，国务院决定将我“扔在”小国瑞士（经其同意后）——那时美国舆论界已经大哗。报刊上登出抗议，不许我踏上“神圣的美国领土”的呼声此起彼伏。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总结官方的观点，标题是《斯韦特兰娜，下次再来吧！》。俄国侨民更是变得比谁都凶狠，要求将我“遣送回苏俄”。

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些事。我只是对情绪的变化多少有些奇怪，因为起初在我的苏联护照上已经办好了签证，这本苏联护照是在莫斯科时发给我到国外旅行用的。可是后来当我们在罗马达·芬奇机场着陆后，我却被告知，我们得“稍事等候”，因为华盛顿方面有一些变化。不久到了瑞士，国务院一位特使前来同我谈话，我突然又成了完全可以被美国接纳的人，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下次”的问题，而就在现在，两周之后！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晕了，一切都仿佛在大雾中漂浮。地面的景观在一个接一个地飞快变换：德里、罗马、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而我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不是在梦中，我竟没有被遣送回莫斯科……

当纽约麦迪逊大街尊敬的律师们来到瑞士，同我商讨我的书的出版问题时，当这一切突然变成现实时，我终于彻底震惊了。

人们用法律语言谈“基金”、“遗嘱”、“权利”、钱，谈向律师提供委托书以及其他类似事情，这一切使我感到简直如读天书！对这些东西，苏联公民是一无所知的。这些谈判即使有翻译在场，他也完全帮不上我什么忙。

我完全盲目地，无丝毫异议地签署了要我签署的一切文

件。那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怀疑，我因此而放弃了我那本书的版权，以及我作为该书作者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我因此而长久地放弃了对个人生活的一切控制；现在将由我的律师代我和为我接受一切决定——甚至在这场疯狂的"公开性"方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将由他们，而不是由我来决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得讲些什么。（声明也是早准备好的，为的是到美国时照念一遍。）而且我必须指出，律师们没花一分钟来向我解释这些法律协议和文件。

我得知，我不会被送返苏联，心情无限轻松愉快。苏联的生活教会我服从、沉默、不同长者争论。现在，我无条件地接受了美国人对我讲的一切话，对我提出的一切建议，以及向我作的一切指示。毫无疑问，我的"协作"使所有人大喜过望，于是，我只看见四周是一片微笑的面孔。我一点都不明白谁在向谁付钱，在全世界出卖我的书的版权时律师们能挣多少。我干脆就在随疯狂的"美国式欢迎"的浪头漂浮，而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一次又一次地答记者问，真诚地相信这或许是美国的习惯作法……

亲爱的读者，年复一年地过了许多时间，我才终于明白，即使在美国，这种事也绝非总是如此；我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

此外，我认为，我之所以到美国，是打算"在美国定居"。谁也不曾告诉我，发给我的只是为期6个月的旅游签证（后来延长期限了）。这样一来，我"背叛"苏联的政治事实，在公众眼目中却变成了一位女士的"国际旅游"，该女士是想在旅游印度之后"……在纽约出版一本自己的书"。至少，告诉美国公民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我当时那种带有感伤色彩的理想主义毛病，在《仅仅一年》中得到充分全面的反映。那是非同寻常的1967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我从苏联经印度到了美国，那一年是我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亲爱的读者，打开那本书，了解一下初到美国来的叛逃者有着怎样一种感受吧！这是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和激烈斗争的漩涡；一切都在迷雾之中，无法集中思想考虑问题，做出明智的决定，理解谁是什么人……

也没有任何人等我去作出决定，一切决定已经为我作好，是依照由我签署过的我的律师事务所的两份委托书办理的。那些日子为我工作的人们是幸运的，对这一点我并不懊恼；但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人一次也没有想过，他们给我在美国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不幸——他们把我变成一个"名人"，把我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拿出来公开亮相，找借口把出版我的著作获得的千百万巨款用于投机活动；如此一来，美国人一直无法得知这位在苏联牢笼里的学习和工作中教养出来的文静姑娘的真实历史。相反，他们听到的只是与宣传和偏见相适应的说法，说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公主"，仿佛"在父亲去世后结束了她在苏联的豪华生活，想要重新过上优裕日子"云云。毫不足奇，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苏联侨民，对我和我的书不再理睬。

是的，我最终得以了解到许多事情，其中包括在我逃亡后那些年代里令人清醒的有益的教训。我这一代人是不允许出国旅行的，便本能地将美国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应该用清醒的评价来取代。从今天的角度回首往事，看来我最终得感谢我在这儿受到的所有"教育"。这一次我的老师不是书本，不是大学讲义，而是生活。

……遥远的乐声还在继续响着, 虽微弱, 但绵绵不断。它要我这些年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它引导我从头些年的虚荣浮华走向正常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特具的生活方式, 甚至远在我父亲作国家元首的年代, 我就持这种生活方式。

遥远的乐声对我唱道, 应当相信好人。无论我在哪里生活, 好人不知为什么总是自己就出现了。我从一个“ 名人”的地位降为一个小城家庭妇女以后, 在这个环境里找到了不少善良的朋友。他们常常就是那条街上的邻居。我又完全出乎意料地成了一个离了婚的独身母亲。看来, 这是命中注定。由于较晚做上母亲, 便必须自身重新学习, 以便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培养自己的女儿。而且, 我这 教育”并不是从书本获得的, 而常常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经验。一般来说这也不算错, 只是稍微困难一些, 对我这年过50 的人来说也稍晚了一些。

但是, 这种母亲和家庭主妇的生活, 使我更深切地认识了美国, 而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很容易地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或许, 因为这是一种最轻松舒适的生活方式k k 美国的家庭妇女是世界上最为娇惯的, 她们的孩子同样也是很娇惯的。

美国的知识界和艺术界没有让我进入他们的圈子, 极少例外。或许, 是我在美国生活的最初一段时间, 我周围那一团庸俗气氛使他们厌恶。但这并不是我的决定: 名人地位不是我的选择。

在美国度过的所有岁月中, 我一直思念着我的朋友们——全是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认识的优秀演员和知识分子。我一直思念那些把我和我父亲分开来看待, 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加以理解的人们。我多么希望在美国也能身处同样学识渊博的人们之中啊k k 但我却没有机会去结识他们。我

如此需要有知识的朋友和熟人，大概还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好的家庭妇女。我只是到了美国的城郊之后，才当上家庭妇女的。我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变化。

或许这并不值得抱怨。我的房子和我的女儿都需要得到我的照料，不过，这也成了我内心的支持。在操持日常的家务琐事中，生活本身总是给我带来不少安慰。这是在日常事务和日常操劳中安宁而幸福的时刻。我非常喜爱自己那座小小的私宅和我的小花园。过去，这些东西我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这儿成天的劳作，我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满足，这是朴素的生活才能给予的，也是我过去未曾品尝过的。我带着我的小女儿坐汽车在全国旅行。我们真正地一块儿成长起来，我同她一起学习新的生活。

由于我内心里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憎恶，我从来不教女儿学习俄语，连一个词儿也不教；我希望她感到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女儿成长和教育的过程，终于让我感到美国确实是我们的家。经过10 年漫长的等待之后，归化问题与美国国籍问题对我来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那些年里，我从一名人为造就的名人悄然回归到了自我。我一直按自己的意愿独自生活并教养孩子。同一个圈子又是多么必不可免地重复了一遍！我内心里很少有什么变化，我依旧喜欢那一片沿海地带，喜欢室内乐，喜欢滚烫的壁炉，喜欢优秀的影片。我把美国看成是自己的国家，正如我过去看待印度一样。美国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并存。当然我并不是指政府，而是指那些很好的庶民百姓，那美好壮丽的大自然，那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一

切事物。

放眼今日的美国，我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罗丽塔》中所描写的——他写得如此准确和出色——“……那是一个美好、坦诚、充满幻想、广袤无边的国家。”

我爱上了这个国家，爱上了它坦诚、充满幻想、慷慨大度的人们，爱上了所有那些生着、爱着、养育着孩子而并不醉心于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的人们。我爱上了我小女儿的朋友们、同乡们。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983 年于英国剑桥

美好的与坦诚的

(1968—1970)

6 月中旬，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主要街道看上去阳光明媚、令人愉快。大学毕业生每年举行的毕业庆典在前一周就结束了，但城里到处仍然满是历届毕业生，从20 岁到80 岁全有，穿着与毕业那年相应的五花八门的服装。天气已是又热又闷，与这个季节通常的情况一样，但步行仍然是很惬意的事情。

一个年轻人，更像一个中学生，飞快地赶上我，径直在我跟前站住。“我认识您！”他不假思索地说，“您所有的照片简直吓人极了，您完全变了个样！”

我当时穿一条在当地商店买来的廉价裙子，赤足穿一双帆布胶底轻便鞋。他需要什么？他想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带深度角质眼镜的男孩很招人喜欢。

“如果您愿意坐一坐，我想给您拍一张挺漂亮的肖像照。您同意吗？我是摄影师，正正经经在搞摄影。我可以把全部作品带来给您看！”

“好吧，”我说，“毫无问题！我过去也搞过摄影，冲片、印相，全自己干。您到我那里去吧。要是您的照片拍得不错，我把它用在我新书的封面上。”

“真的？”他问。“那我得告诉我妈妈。”

他父母心情有些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并作了自我介绍。父亲是工程师，拥有许多专利发明。他马上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母亲则有点不放心。我向他们保证，我讲的话完全是当真的。

孩子的摄影作品满不错。一个18岁的少年，看上去只有15岁，却有着锐利的、颇富观察力的目光。他的黑白照片好极了。他父母意识到，他应当认真地从事摄影工作。他已经考上了罗切斯特工艺学院。我这位摄影师小小的个头，如果不是他那胸有成竹的、成熟的职业目光，他便完全像个孩子。我完全理解他母亲的不安心情。

我们一起坐在充满阳光的露台上，那是我在普林斯顿租的一幢房子，当时我在那儿写作关于逃出苏联的书《仅仅一年》。当我同他父母交谈时，克里斯托菲尔咔嚓咔嚓直按快门。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绝非正式的会见。我告诉他们，我确实需要一帧好照片，并对他们讲了一段趣事，讲我如何给纽约著名摄影师菲利普·哈里斯曼摆姿势。

在菲利普·哈里斯曼巨大的摄影室里为我拍照，简直是一次徒劳的尝试。事情竟然糟糕到如此地步：他连第一批样片也拿不出来。菲利普·哈里斯曼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您得讲

一些对您至关重要的事情，那时您的所有内在气质就可以表现出来并定格在照片上。但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一天我不想再谈话，再作那些采访式的问答——现在他的妻子向我提出一些烦人的问题……我既紧张又气愤，实在很不自在。

哈里斯曼的一位朋友拍照时在场。他也试图来帮助我“放松”一些，却把我给彻底弄僵了。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那古怪的模样和向我讲述的奇异故事，怎么也无法帮助我“自己放松”。哈里斯曼大失所望，后来写信给我说，是我“没有放松”。或许是这样吧。可我为什么要听命于他人，为他人去作这件事呢？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面。

现在我们则是在夏日的凉台上闲聊，自然也就详细地向这对夫妇问起他们的孩子，我也把在苏联的一对儿女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我们成了朋友，后来还通信多年。照片拍得相当出色，我拣了一张寄给哈珀-罗出版社。1969年秋，当《仅仅一年》开始发售的时候，封面上用的就是由克利斯托菲尔拍摄的照片。还有几家欧洲的出版社也用了这幅照片。克利斯托菲尔的母亲跑到出版社讨论儿子的稿酬问题，她说：“他在这些事情上一无所知。”克利斯托菲尔得到预约，为其他一些作者拍摄肖像。

那都是我在美国很幸福很美好的年代。

我倒是真的成了一名作家，颇富热情和灵感地写作新书。我的个人计划包括描写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年头——大转变的1967年。或许，我应当把书名叫做《大转变的一年》。不过我还是想说，仅仅一年之中发生了多少事啊，多少事都浓缩到

了仅仅一年之中。这本书要是照我的愿望顺利写成了，那是会更好一些的，因为书中就会少一些宣传，少一些政治空论，多一些关于人的内容。我在一年中见到了许多事情，都应当大书特书。哦，向我提建议作忠告的人也太多了，而且他们全是比我更老练的作家。他们的威望也远远超过我。不过，有关印度的一章是按我的想法写成的，因为没有人特别去担心印度，这一章就成了全书中写得最好的一章。

那时候我仍然用俄文写作，这是我唯一的语文，无论思考、做梦、数数，都使用它。那时候我只能使用俄语写书，通常是坐在凉台上我的瑞士赫尔墨斯钢琴面前的矮凳上，打一双赤脚，身穿短裤和背心。夏日的空气中弥漫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芬芳。我的女主人——她是音乐学家——到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语言的摇篮曲去了。她把她的房子和所有财产全交给我，同时还把一名黑人地板打蜡工、一名意大利花工也托付给了我。

那位黑人马上向我抱怨他的生活太苦，起初我还带些怜悯心听他讲，但当我知道他有三个孩子在上大学，而且拥有私人住房和汽车后，就再也不听他诉苦了——这一切在苏联都是医生和教师们还在梦寐以求的东西啊！让这位黑人到别的国家去尝尝生活的滋味吧！或许，那时候他就不会再抱怨了。

那位意大利花工同样对自己的生活诉苦。他说，他在意大利原是教师，但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为了撑持家庭，只好当了花工。“到我家去做客吧，我住得不远，”他说，“我的小特丽萨快行第一次圣餐礼了。”

我那时很好奇，于是便去了。他用极丰富的饭菜招待我，有通心粉、肉丸子，最后还上了兔肉。在基扬迪红酒佐餐之

下，我把这些东西全吃光了。特丽萨是个个子很小的女孩，长着一张忧郁的小脸，跟他父亲一样。她母亲是个大块头妇女，两个儿子通常都帮父亲修剪普林斯顿的草地。

不久，我开始考虑买一辆私人汽车。还在上中学时，我的哥哥们就教会我驾驶了。他们在城郊的森林公路上悄悄教我，因为怕我们的父亲得知他们拥有私人汽车，作为"多余的奢侈品"加以没收。当我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父亲又坚持要我买一辆汽车，并且要把驾驶证给他过目。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相信一个年轻妇女能够开车，而他自己却不会。后来证明这件事我完全能干，他便给了我买车的钱，并且说明，我必须"自己购买汽油，不要花国家的钱雇司机！"这是1952 年夏天的事情。

在美国这个地方，我选了一辆毫不引人注目的普通道奇车，以便维修容易些，必要的话，哪个店里都能修。我期望有朝一日乘这辆汽车漫游全国，完全一个人去，只带一只狗。在那些日子里，一辆汽车，一只狗，成了我所希望的全部财产。尽管我在纽约有以我的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存在大银行里的大笔存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买一件皮大衣，买几颗钻石，甚至买一件值钱的好衣服。在本地商店买的东西就完全令我心满意足了。同苏联的成衣相比，这已是非常不错的了！我的趣味也太守旧——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任何东西。

年轻摄影师克利斯托菲尔的父亲，提议帮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棱合恩大市场挑选一辆汽车，因为我自己无疑不会选择上乘发动机。我们在那儿逗留了差不多6 个小时，弄得疲惫不堪，把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汽车看了一遍，最后驻足在一辆深绿色四门小轿车前。我觉得空调是一个毫无必要的奇异设

计，就把它省掉了。我们乘这辆车回家，然后又久久地坐在车上，把它瞧了又瞧，爱不自禁。从外面看它是深绿色的，里面则是黑色的，倒更适合牧师使用。但我还不习惯于在生活中使用那种具有美国生活味儿的鲜艳色调。对我来说，这已是一辆蛮漂亮的汽车了。我用了10 年，一直用到换了另一种型号的道奇。

现在我需要取得驾驶执照。我开始练习使用自动换档。这占用了我一些时间。那位意大利花工的儿子愿意教我。他对此事十分认真，于是我们用他的汽车，在新泽西州的乡间土道上练习。过后，我在特伦顿通过考核，取得驾驶证后回家，真是喜不自胜：我现在可以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到处跑了！

“这一下您往哪儿去呢？”克利斯托菲尔的父亲问我。这段时间他帮我买了一台 ΠΞ 牌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同一牌子的小型黑白电视机。

“哦，我要开车走乡间公路，到森林和原野去，游玩一番，采摘野花……到哪儿去并没有定准。汽车给我带来了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驾车外出，听广播，听音乐。”“您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他这样下结论。或许，他说得对。

他妻子把作家庭主妇的奥妙教给我：如何少花钱，东西只在大甩卖时期买，到比较便宜的超级市场去买，要大宗地买，因为这比零零星星的小买更为便宜。但我并没有听从她这些善意的建议。我喜欢普林斯顿那些小店铺，每当需要什么，总往那里跑。那儿东西比较贵一点。但超级市场叫人讨厌，而这里，在这些当地小店铺里，可以停步向女售货员——通常都是女老板——随随便便说一声“哈罗”。在小店铺里人家会同您拉家常。

然后，我发现了一些巨大的广场，那儿有商店。还发现了整座整座"商业城"，其中巷道如织，喷泉涌涌，还有餐厅以供人们吃点东西继续购物……你花光所有的钱，承受着一大堆无用包装袋的重量走出"购物城"，费许多时间去寻找你那迷失在足球场般大小的停车场里的汽车。稍后，我自己便只到这种超级市场购物，因为我不得不作合理的节省。但是在美国的头几年，在经过一切大震荡大变化后，由于我还只习惯于过正常生活，曾经非常欣赏那些小店铺。

在伍尔肯太太的日用品商店里，能找到您日常需用的一切东西。伍尔肯太太个头不大、身材丰满，有一双漆黑的眼睛；由于长时间站立，一双足踝已经肿胀。她总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她铺子里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各种日用必需品。不过，铺子里的妙物仍是女老板本人。她在许多年时间内，认识城里的每一个家庭，似乎还能预测到人们会来买什么东西。顾客只要一开口，她就向货架或什么角落奔去，很快找出需要的东西。我看见过她是怎么接待每一位顾客的——无一例外，全是如此。城里几乎所有居民都到伍尔肯太太这里购物。只有那些大学生除外，他们在更便宜的"伍尔沃斯"店买东西。

伍尔肯太太亲切地接待了我，把给她帮店的儿子介绍给我，我立刻明白了今后会经常光顾这里。我第一次需要的是一根电视机用的长导线。她问我住在哪里，看见她不住地点头，我知道她认识我的女房东，也认识我的邻居。

伍尔肯太太不仅经营她的商店，还努力成为每个人的朋友，帮助所有人。在我结束东迁西移——到亚利桑那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每次总是回到普林斯顿，过不几天总要到她那儿去。我在那儿遇到的不是好奇的问这问那，而是她

希望帮助我。“啊呀，您眼下住哪儿呢？”她马上问我，眼里闪烁着幽默的光彩。不待我说出“嗨，伍尔肯太太，我得一切从头开始了，先买几只污水桶……”——她已经带我到货柜前去看我需要的东西了。“过来过来，我这就告诉您，我这儿有些什么。”

我在刚租下的房子里安置妥当，一位女邻居便走过来。她作了自我介绍，邀我和其他邻居一道去喝鸡尾酒。干嘛不去呢？我高兴地同意了。在那些日子，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因为在莫斯科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鸡尾酒。我去了，立即置身于一大群乐乐呵呵、和蔼可亲的人当中。只是在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学会从人的外貌来断定他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当时我并不了解，我跟前这些人乃是最富有的普林斯顿人。我只觉得他们的房屋漂亮非凡，园子里简直是花团锦簇。我还以为，或许全体美国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呢。

壁炉上高挂着两幅肖像：一位神情沉郁的大胡子老人，一位戴镶边包发帽的老太太。女主人说，这是她的祖父和祖母。两人都是公谊会教徒。对于威廉·佩恩和公谊会教徒我多少知道一点；可是在那一天，有谁能告诉我，我后来出生在美国的小女儿，会在英国的公谊会学校就读呢？……两位老人的肖像我一直难以忘却，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一直将他们作为一种象征常常回忆。他们显现了美国清教徒坚毅不拔的美德。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它有如此之多的思想、宗教、习俗和特色；对于这些，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都不甚了解，为此，我一直感到难为情。

在那些日子，人们总是邀请我出席宴会、鸡尾酒会。我在那儿常常见到各种派别的新教神甫，这于我是一件新鲜

事——我仅仅知道东正教教徒，对在瑞士遇到的一些天主教徒略有所知。这儿的牧师、主教和长老会教徒同他们文雅的妻子，全都兴高采烈地端着酒杯。他们完全不像留长发、穿长袍、必须由教民亲吻手背的传教士。他们都有家小，可以谈论任何世俗的话题。稍晚，我和普林斯顿两名主教派神甫的家庭建立了友谊。我和本城天主教徒的相遇要晚得多。

本地一位医生发现我有高血压，他顺便带我去看了这座城市和大学足球场。有一次，他将汽车停在森林中树木和草地间一幢漂亮的现代建筑物旁。这是圣心天主教学校，这医生有意把他女儿送到这里上学。他本人是当地犹太教会的热衷分子。我欣赏着这所学校，他们对于异教非同一般的容忍力也引起我的思考。过了4 年，当我同小女儿一起从亚利桑那回到普林斯顿后，我断然决定把她送到这所学校去。当时女校长告诉我，绝无任何因素可以妨碍这件事。

不久我见到了俄罗斯东正教著名神学家格奥尔吉·弗洛罗夫斯基神父和他那位娇小可爱、聪颖机灵的妻子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那几年，格奥尔吉神父在普林斯顿宗教学校任教。1962 年我在莫斯科受洗后加入了俄罗斯教会，神父把俄国教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告诉了我。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俄罗斯东正教由于政治而不是教义信仰的分歧，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样一来，国外的俄罗斯教会每天都祈祷在神圣的罗斯恢复罗曼诺夫君主政体，而比较现代的美国东正教教会则并不坚持恢复罗曼诺夫君主政体，甚至对莫斯科教会——受苏联政府监督的 苏联教会”，也持容忍态度。宗教上的政治分歧使全体俄国侨民发生分裂。所有人都想把贤明的弗洛罗夫斯基老神父拉到自己一边，因为他是一位有威望的

神学家;但他决不介入这些内部纷争。“我只听从大牧首阿菲纳戈尔!”他声明说,这在实质上便不会引起任何异议。大牧首阿菲纳戈尔是世界上所有14 个大东正教教会共同的神主。

原来,在普林斯顿并没有俄国教堂,但是在特伦顿有乌克兰和希腊教堂。格奥尔吉神父常常在学校一个专门辟出的小房间里为大学生作弥撒。那地方我也去过几次。但是,我生来不是东正“教徒”,我只是在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召唤”时,才到教堂去。任何派别的任何教堂我都去,自然,这是“异端邪教”的做法了。

令人特别怡然幸福的事,乃是应邀到格奥尔吉神父家去。神父太太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总是摆出丰盛的筵席招待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地地道道基督徒式的——真诚淳朴、充满爱心。我深信,我家那个擦地板的黑人,那个叫苦连天的人,比弗洛罗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好得多。二楼上有一间小小的客厅,客厅的书架上放满了形形色色的雕像、纪念品、他的崇拜者赠送的各种礼品。墙上挂着由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本人画的画(诚然,她远非拉菲尔),还杂乱地贴着一些明信片、东正教年历、粗糙和精美的圣像。墙角有一盏红玻璃长明灯。

弗洛罗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完全合乎基督徒式的爱心和道德规范;他们千方百计避免各种冲突和争吵,而这些事在俄国侨民的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在小小的居室内,分别放着两间小床,墙角点一盏长明灯,四周同样摆满了礼品和画儿——这都是不能扔掉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某人在某个时候赠送给他们的。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买什么“好”家具,没关心过自己衣服穿得怎样。对他们来说,同所有人交朋友重要得多。

弗洛罗夫斯基教授的私人藏书却是罕见的, 而且他已立下遗嘱, 将这些藏书捐赠给普林斯顿大学。他宽敞的书房里书架林立, 满装了书籍和旧杂志。人们在普林斯顿的大街上常常可以见到他身穿黑色长袍, 头戴一顶同他雪白的胡须形成鲜明对比的黑色小贝雷帽, 推着(或拉着) 一辆类似儿童车的小车, 车上满是书籍。他就这样在自己的家和大学校园图书馆之间往返不断。

弗洛罗夫斯基性格腼腆, 不多讲话, 把话让他太太去讲。他的太太是一位聪颖、颇富幽默感、甚至有些辛辣的妇女; 不过却同他一样善良。他们是很年轻的时候在俄国结婚的。那时, 他太太是学生物的大学生, 而他是学历史的。不久, 弗洛罗夫斯基行了按手礼, 然后成了俄罗斯东正教著名的神学家。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成为主教, 但他从不热衷于此。他本应投身教会政治, 支持一些人去反对另一些人, 以换取一些人的支持, 但他并不想这样做。由于弗洛罗夫斯基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他那些更年轻, 更具手腕的反对者轻而易举便将他从弗拉基米尔神父的东正教教会学校校长职位上赶下来。然而弗洛罗夫斯基依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只是他写的书渐渐从俄国境外出版的俄文书目中消失了。看来, 那是他年轻的弟子们逼迫的结果。

几年后, 弗洛罗夫斯基夫妇在普林斯顿庆祝了他们的金婚, 不久, 他们便相继去世。

克谢尼娅·伊万诺夫娜是位出色的厨师。她烧的饭菜令人永志不忘。她做的筵席不仅供人吃, 而且供人观赏。格奥尔吉神父吃饭时, 开始通常喝一小杯冰镇伏特加, 然后吃一小块鲱鱼片。神父太太则只抿几口清淡的德国白酒, 不过那是

在稍后吃饭时的事情。在俄罗斯，有教养的妇女是不应当喝伏特加的，伏特加只是男人的饮料。不过，现在显然时代不一样了。

把我介绍给弗洛罗夫斯基一家的是我的一位好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伯吉。他是具有爱尔兰和德国血统的天主教徒，俄语十分出色，是在军队服务期间因无所事事而开始学习的。后来，他对俄国文学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几年后，他又同样轻松地掌握了希腊语。理查德对我和蔼可亲、关怀备至，把我介绍给了普林斯顿和纽约许多很有意思的人。但无论他们怎样劝说我，我也从没想过去教俄语——所有侨民太太，无论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在干这件事，甚至还谋到了教授的职位。

为了显示 教自己的母语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伯吉教授把我带到他的班上去。然而我并不是教师，实际上我生来是当学生的料。凭着我莫斯科大学的毕业证书和俄国文学副博士学位，我许多年前就可以当教师。但我不想干这一行，我想从事写作。

现在，在美国，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后，已在写第二本书，我很幸福。这是一件我自己的事情，是我现在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道路。我在世界各地的读者寄来无数信件，鼓励我干下去；甚至对专业评论家、特别是历史学家写的充满质疑的评论，我也不太感到恼火。我的第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我读者的要求写的，是为了回答他们的许多问题。在我的第一本回忆家庭的书出版后，我现在在写一本更具政治内容的书，写我逃离苏联的经过，以向我的批评者表明，对于我童年时代发生在苏联的事情，我是完全熟知的，我了解我父亲残酷无情的制

度，我自己也从不在他的崇拜者之列。

此次，在我将第一章书稿交付审阅后，哈珀－罗出版社同我签订了一份真正的合乎要求的合同。我收到了预付稿酬，也同将来的译者取得了联系。仅仅一年前，我的第一本书及我本人曾遇到种种不正常情况，这些事情现在来回忆一下，倒恰好是个合适的时候。

*　　　*　　　*

正如我在“错步”中提到过的，“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事务所的律师通过国务院得到我第一部书的手稿，是在他们同我见面前很久的事，也远在我第一次听见他们事务所的名字以前。律师事务所当即将我的手稿交给了他们的主顾——纽约的哈珀－罗出版社出版。手稿的英文简介很快由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译好，她是一位年轻的“俄国事务”专家，但并不是专业翻译工作者。可是，无论律师还是出版商，不知为什么都已经选定由她来担当这一文学翻译的重任，而并不打算去寻找一位更有经验的专业翻译者。

律师希望尽快开始出卖版权，因为那时候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轰动事件。但这件事他们想由自己来干，不让我过问，也不需要我的代理人在场，而且还要在我尚未到达美国的时候。

事务所的律师及其工作人员只等作者法律认可、签署文件，然后便开始出卖版权。因此他们在1967年3月将我在瑞士截住——我在两周前被“扔”到那里——事务所的头头埃迪·格林鲍姆“将军”本人亲自会见了我。我立即发现他那种美

国口音——纽约商人那一套行话——比其他人都难懂。在他之前,我从不存在语言上的困难。

“将军”(大伙都这么叫他),尽管他并不是军人,不知怎的只说出一些单独的字眼,其余则叽哩咕噜含混不清。而且他的耳朵也不行。由于我绝对不能大声说话,我们之间便形成一种“互不理解”的格局:我无法懂得他的谈话和结论,他也听不清我的话,听不懂我那些惶惶不安的问题。

他直截了当地谈到钱的事情,谈到马上签署遗嘱的必要性,“以免钱落空”。我则一直想听到有关出版商、有关我同编辑和译者面临的纯粹文学方面工作的情况。怎么也不明白,我干嘛会在这里会见律师,而不是出版商。我的书由谁出版——这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签署过遗嘱(在苏联,谁也不会对这种事感兴趣);正好这会儿去考虑死的可能性,真叫我感到既奇怪又不舒服。我想问问他我那部手稿的事,问问他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同出版商见面,但他却一个劲不停地讲他那一套。最后,我不得不同意马上签署遗嘱,尽管这第一步对我毫无意义。

然后,他转入译者的问题,并作如下建议:

“我们有两个人可供选择:一位是令人愉快的姑娘,您这般年纪(我当时40岁,这律师是80岁,所以我在他面前实际上是个小姑娘),很可爱,很讨人喜欢;您去美国后可以住在她家。第二位是个英国人。他非常乐意翻译您的书,并为此到美国去。我们大家——出版商、乔治·凯南和我,都认为最好由那位姑娘同您合作。”

选择译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在莫斯科时曾经从事过英译俄的工作,对这种工作很了解。在这里,经验比一切都

重要。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两位译者的名字，关于候选者的专业经验我便一无所知，虽然他请我进行“选择”。他们完全没有告诉我，这位“小姑娘”到底翻译过哪些俄国作家的作品。

当时谁也没告诉我，那位“英国人”不是别人，正是牛津大学教授，俄国现代文学一位最优秀的翻译家麦克斯·赫华德。他曾翻译了Б.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毫无疑问，要是告诉了我讲的就是这个人，我会感到十分荣幸，很高兴同他一起完成我这第一本出版的书！

我感到大家已经选择了那位“小姑娘”，所以也就同意了。我那种本能的“决无异议”的苏联习惯起了作用，但在这里它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好处。不久，这位女翻译来到瑞士同我见面。她竟然不会讲俄语，这使我大为不快、惊诧莫名。我问她译过哪些俄国作家的作品，她却很巧妙地置而不答。

后来我才得知，她是哈佛大学的“俄国问题专家”，压根儿不是什么文学翻译家。麦克斯·赫华德则译了不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有散文和诗歌，是公认的权威，熟谙俄语。正如我在后来了解的，在选择译者的问题上，另一位“俄国问题专家”帕特丽夏·布莱克进行了干预。她到普林斯顿凯南处来，要求指定她的女友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代替赫华德作我的翻译。凯南赞同了她提出的候选人，于是我的命运（我那本书的命运）也就此预先决定了：它落入了一个门外汉之手。

“将军”格林鲍姆宁愿选择那个“小姑娘”也有自己的原因——那位“小姑娘”在各方面都赞同他的意见。麦克斯·赫华德教授曾想在英国另找出版商，总之他会帮我分析各种情况，而这恰恰是谁也不愿意的。律师们已经创建了一家自己的名

为"帕先齐亚"(意为"耐心")的代办所,专门出卖版权。他们不希望那位英国教授提出什么建议来干预此事,因为作者有可能会同意他的建议!必须尽快得到我在正式协议上的签字,并开始出卖版权。

我对那个聋耳的"将军"完全不感兴趣。说真话,我已经感到有些惶恐,因为同美国人接触以来,我第一次突然间不再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开始感觉到,有些事情的发展不大对劲,但我又不能反对。

第二天,我感到所有人都不大耐烦了,便签署了几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尽管瑞士外交官安东尼诺·扬讷尔建议我"什么文件也别签",在作决定之前同他商量一下。"您不明白,在西方世界,签署文件就是一切。您对这类事情还不在行!"

但是,在钱的问题上无休无止的谈判已使我精疲力尽,我希望尽快结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何况我又不大懂得这些事情。同扬讷尔磋商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那些人不断地催促我,不可能将这一切再推迟一天。

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有五名或更多律师在场(其中两名是瑞士律师),我签署了两份律师委托书,就此失去了我在出书问题上的任何过问权。随后,我签署了一份遗嘱,声明如果我死亡,我的钱款支配权将移交给我的律师。后来,我又签署了一份版权移交文件,这样一来,就把我自己这本书的全部版权让了出去,将它们卖给了列支敦士登一家叫做"科贝克斯"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代表,瑞士一家事务所的律师,此刻也正在座。

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所有这些文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那时候我绝对无法设想,作为作者,我曾拥有

许多与著作事实本身有关的权利；但是现在，出书以及与出书有关的一切问题，我连问一下的权利也没有了。

人们让我看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满了钞票，说这是我转让出版权的酬金。我问，“这是什么，是出版商的预付金吗？”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那位瑞士律师笑着说，“行，您可以把这些钱看做是预付金。”这并没使我有丝毫明白，因为按照我对文字生意的浅薄理解，只有出版商能付给我书酬。

两天的谈判令我大为沮丧，我完全不懂，为了出版一本书，干嘛必须有两个国家的五位律师介入其中？同出版商谈判文学方面的事情，变成了履行与律师之间的不愉快的手续。我真想一个人呆着，作一番思索。

然而现在我已落在他们手中久久不能摆脱，后来也是如此——出书、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在报刊上摘登书的部分章节……我的所有私人邮件都经过格林鲍姆律师事务所，它的工作人员回绝了许多希望会见我的人。人们甚至在律师的私人宅邸为我安排了房间，尽管我很想住在纽约的旅馆里，一个人独来独往地生活。

这一切搞得我疲惫不堪，我只想一人独处，安安静静地休息一阵。我有如被人装在了一个匣子里；没有他们同意，我甚至不能动一动指头。

不久，1967 年4 月我到达纽约之后，我的律师设立了两项基金：一项慈善基金，另一项是我个人的基金。但所有律师都自命为这两项基金的监护人。再也想不出使人毫无活动能力的更好方式了。甚至我购买私人物品的钱也得向他们伸手去要，因为连这种钱也是存在事务所的账上；在最初那些存款、合同和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我的名字。无怪乎人们把埃迪·

格林鲍姆叫做“多面手律师”。他早已不在人世，但我仍然无法收回我第一本最著名的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版权。

* * *

或许，这伙律师渐渐感到了一点良心的谴责。出版商也明白在出书过程中一次也没同我商量过，这实在作得太过分。现在我打算把我的第二本书交给哈考特·布雷斯·约瓦诺维奇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总经理威廉·约瓦诺维奇来到普林斯顿我的家里商谈此事。但是我不能作出任何改变，因为哈珀-罗出版社已从我的律师处得到“第二本书的版权”——这个情况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

律师们坚持要我把新书交付给哈珀-罗出版社，顺便说一句，也就是他们事务所的客户。他们要我相信，“现在一切都会按规矩办事”。我违心地同意了：反正一样，既然一切情况如此……不过这一次，最终让我自己同出版商签署合同。第一本书的合同是由律师事务所代我签署的，说得确切些，即由专门为此目的而创办的“帕先齐亚”代办所代我签署的，好像我是个残疾人或早已故去的作者。

“好啦，现在您是真正的作家了！”当我同哈珀-罗出版社的合同签好后，艾伦·施瓦茨赞叹道，以此认定一个可悲的事实k k 第一次人们并没有认为我是作家。

我仍然同哈珀-罗出版社打交道，但后来多次对此感到懊悔。我第二本书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写的，而广大读者几乎不知道。这本书差不多从未在书店露面，而且更奇怪的是，出版商甚至没有在纽约他私人的书店里销

售。无论我的第二本书还是第一本书都没有卖过。然而这两本书在"哈考特·布雷斯·约瓦诺维奇"书店却随时可以找到。出版商们的手法真是不可思议!

无论如何,我现在想同"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律师事务所脱钩。因为他们揽下了对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我对卖书的收入一无所知。我并不怀疑《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已不属于我,因为版权已经卖给了科贝克斯公司。后来,科贝克斯公司又将所有版权移交给了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而那些律师就是基金会的监护人,一切又得由他们决定。对于将版权卖到全世界去的其他代理商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他们把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不知为什么,人们竟认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作者不感兴趣"。可知这行当现在就是我的饭碗哪,并且我必须知道一切,直到鸡毛蒜皮的小事!

由于对出书进行毫无必要的保密,报刊便夸大和杜撰我的收入,人们认为我现在已经拥有数百万资财。实际上我住在普林斯顿,当时几乎所有的钱都记在纽约律师事务所的账上,只有一小笔转入了普林斯顿我的银行户头。

"您有'账户'吗?"有一次菲拉·本宁逊问我。这是一位很贤明的妇女,她想教会我在美国生活的实际经验。她自己在纽约有一间样品店。

"什么是'账户'呀?"我这么回答她。

"就是您的钱必须存放的地方。难道别人没给您讲过?"她问道,对于我的无知大为惊讶。

"没有,什么也没有给我讲。"(在我决定开立一个'账户'之前,我已经没有了金钱之虞。不过,这已是后来的事,后来很久的事了。)

现在，我必须给律师打个电话，要他们汇些钱来，因为我在冬天到来之前得买一件皮大衣。我由于生活在苏联时也同样如此经常要钱，似乎觉得现在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不无嘲讽地将这一感觉向乔治·凯南讲起——大家都认为他是我的靠山（一个被弄得非常苦恼的角色）。我向他指出，我在苏联时，整个生活都在严密监视之下，我非常希望在这儿不要也处于同样严密的监视之下，希望不向别人报告我的每个行动和我的私人开支情况。我坚持道，否则，我就看不出在这儿和在苏联有多大区别。但凯南大使是个老练的外交官，在欧洲所有首都任过职，所以他有一种技巧：讲起话来能使双方都感到愉快。“啊，我完全了解您！”他这么回答我，而第二天又把同样的话告诉我那事务所的律师。最后他对我说：“直说吧，我认为他们对您是十分关心的。”于是一切依然照旧。

我的纽约朋友菲拉·本宁逊，一位可敬的太太，已年近八旬，通过她在华盛顿和欧洲的众多关系，对凯南大使甚为了解。她专门来到普林斯顿与凯南谈判，希望他看清我无权的处境。她甚至建议她的律师关照我的事情，并且同律师谈过多次。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充满吵闹和屈辱，所以并不坚持现在就更换律师。我那屈从、不持异议和事情往好处想的老习惯起了作用……我还没有学会像出生于自由竞争世界里的所有人那样坚持自己的利益。过去在苏联的日子，有如沉重的巨石压在我的意识之中（也压在我的潜意识之中），你不能把它一下子抛掉。菲拉·本宁逊对此也深为理解：革命之后，她就立即离开了俄国。

我对由于我早在瑞士就盲目同意而造成的现实处境愈是

明白，我的邻居、朋友和无论如何也不拿我的书去投入“商业”活动的友人，便愈是向我讲解在美国生活中法律方面的情况，我也便愈感伤心。我不仅完全受我那律师事务所支配，而且已很清楚，我的出版商以及《纽约时报》也是这家事务所的客户！我的律师们怎能维护我的利益？他们是在牺牲我的利益去维护他们的客户。

毫无疑问，早在处于瑞士外交部及其代表安东尼诺·扬纳尔的友好监护下时，我就应当找到自己的文字事务代理人。那时候，我每天收到许多信件，全是通过瑞士外交部转给我的。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建议出版我的第一本书。而且可以附带一句，一些有名的出版商愿意出的价钱，比科贝克斯出版社接受转让全部版权而付给我的钱更多。我本来可以得到这种预付款，而且全部版权仍然留归我自己所有。但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真诚地相信麦迪逊大街的律师们跑来是为了帮助我——正如他们自己口口声声所说的那样。后来埃迪·格林鲍姆干脆把上述那些信件悉数揣入自己的腰包，他当然想知道这些信中说了些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纽约的马克·格罗·希尔出版社的老板们提出的报价。

在瑞士和纽约那时候，我不希望发生争吵，引起不愉快，还向别人提什么要求；因为在苏联生活的40 年中，我压根儿不习惯这些作法。认为自己对某些事情，对追求某些合法目标有某些权利，这种观念我生性没有。苏联公民没有培养起这类危险的观念。

因此，我并不想同我的翻译者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发生口角，尽管我已经知道，她不仅不懂得俄罗斯文学的语言，同时也不理解俄罗斯的形象性，而且对俄国文学史完全

无知。因此,我在书中引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时(我从中引用《人民沉默无言》),竟使她完全不知所措。周围的人都知道,我遇上这样的翻译太倒霉了。艾伦·施瓦茨甚至建议我把她一脚踢开。但我明白,这样做一定会引起争吵,她会诅咒我们大家,因为她签订了所有英文版的合同,条件优惠,收入颇丰。于是我决定维持现有的一切。

我一直没能弄明白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半瓶子醋给我作翻译,然而,帕特丽夏·布莱克却拉着手把她给带来了。

不过,普丽西拉很快便卡了壳,不得不把牛津的麦克斯·赫华德教授本人请来为她帮忙(暗中悄悄的)。教授被我的律师们巧妙地骗了来,现在已在为普丽西拉帮忙了。他为她修改译稿,并且发牢骚说应当干脆全部推倒重来,从头开始。但普丽西拉既不愿重译,也不愿合作,而且通过她的律师,要求在书的封面上只印她的名字。大家都被她弄得厌烦已极,伤透了心,以至于根本就不作抵制。约翰逊·麦克-米伦则不仅名利双收,而且获得了作为翻译接见记者的权利。

在这些记者招待会上——出书那天还在电视上播映了——她力求让大家相信,她是我最亲近的人;她一点也不羞于撒谎,说我们是在一起干;还不负责任地乱说一通。其实,我在到达纽约不几天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她。她到亚特兰大她丈夫那儿去了,并且就在那里工作。她的译稿在印出清样之前,没有让我见过。也没有让我作过任何校改;出版商埃文·托马斯说:“对这一点您尽可放心。”

我最终看到“清样”之后,真是难过极了。错误百出,译文拙劣,甚至连日期都搞错了!显然普丽西拉没有接受赫华德的所有修改。许多句子译得同原文大相径庭。只有埃德蒙·

威尔逊才在1967 年11 月号的《纽约人》杂志上，终于直言不讳地对译文作了评价，称之为一篇 粗劣的译文，把原作的全部风格庸俗化了”。而对于译者本人，他写道“ 她不仅不懂得俄语，而且也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英语。”

当时我给威尔逊写去一封感谢信，从那时起我们便有了书信往来。后来，威尔逊为我的第二本书推荐了一位译者，是他在贝尔福利特的邻居，叫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恰夫恰瓦泽。我当然同意了，并专程到科德角的贝尔福利特去会见他们。

恰夫恰瓦泽是一位格鲁吉亚公爵，彼得堡上层贵族的代表人物。妻子尼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罗曼诺娃是格奥尔吉·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一位格鲁吉亚地方长官的女儿，皇帝的侄女。我听取了埃德蒙·威尔逊的建议，现在却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会见如此显贵的要人。我飞抵机场后，觉得双腿乏力。彬彬有礼的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想帮我提皮箱。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这皮箱交给他(我说“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如他后来所说，这使他极感惶恐。(后来他写下了我们的初次相见。)

我知道这位大公，即尼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的父亲，是被布尔什维克枪毙了的。尼娜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当时她正在英国读书。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恰夫恰瓦泽公爵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旧贵族家庭，尽管他母亲的娘家姓罗坚科。他俩以真正贵族应有的气度迎接我——非常殷勤亲切，但又保持着毫不造作的自尊。他们诚恳好客的态度很快就把历史啦、革命啦、暴力啦、琐屑的情感啦，远远抛到了一边。这些人比种种卑微小人高雅得多。只有庸人才对荣辱、事件、历史人

物等更大范围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有着多么叫人惊奇的幽默感哪！他们俩笑得多么愉快啊，而他们却是如此高龄的人了！连他们那条老哈巴狗奥努夫里·帕夫努季奇，在事先东闻西嗅之后，也对我摇尾致意呢。

他们在森林里有一幢简朴的白色小屋。我们在小小的客厅里谈天、喝鸡尾酒。当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描述起格鲁吉亚贵族及他们讲的俄语时，我们禁不住笑出了眼泪……这儿还有一位女客人，是澳大利亚记者。她吃惊地时而望望主人，时而望望我，没有参与我们的谈笑。最后她承认，她无论如何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坐在一起喝酒谈笑……尼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笑盈盈地回答她说："这只有在美国才行，只有在美国才行！"这话说得不错。

埃德蒙·威尔逊完全是个病人，行动也很艰难，却也非常热情，事事都想帮助我。他认为我第一本书的出版过程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们从他家到恰夫恰瓦泽家，然后又回到他家。我在莫斯科从来不去寻访名人，在美国也没有这样做，但威尔逊和他娇美的妻子叶莲娜自己表示了会见我的愿望，结果我们大家都成了朋友。在美国最初几年的生活中，产生过许多形式上的、短暂的友情，但我和他们之间却是一种为数不多、至为重要的友情。几年后，恰夫恰瓦泽夫妇双双去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那乐观愉快的性格。这大概算是我在美国最有趣的一次会见，对于我的历史和人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 *

我希望在普林斯顿过一种平静的、隐居的生活，在这里工

作。现在，写作成了我的基本活动。我还喜欢摄影，年轻的时候，曾拍过一些很不错的照片，自行冲卷洗印。来到美国后，我希望认真地搞搞摄影，要学会拍影片。我的“目标”是大自然，是对大自然的洞察。有一次，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我的律师，结果却弄得一团糟。一个电影摄影师小组来到我家附近，讨论“合拍”的问题。他们的意思是要拉上我在美国旅行，以便他们拍摄自然风光（如尼亚加拉大瀑布），让我在这样的背景上念台词，描绘美国自然美景……这个计划使我大为惶恐，当然一口回绝了。可他们认为用这样的方法能帮助我“明白”如何拍摄美国的大自然。我明白，既然我已成了“名流”，最好还是呆在家里，不要到处去东奔西跑，因为这样不会得到任何应有的结果。我甚至没有再提我的另一个理想：继续认真学习外国语，特别是我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学习过的西班牙语。现在我有时干脆像旅游者那样拍照，然后把胶卷寄去冲印……

侨民圈子里有一位太太坚持要我马上到全国各地作旅游讲学。她甚至为我找到一名代理人，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计划。她认为我“必须‘出去亮亮相’。天晓得人们是怎样看待您的！那时就会看见，您同他们一样是个正常人”。现在回头看看她的想法，我认为看来她是对的。可我一向没有讲学的才能，我天生永远是当学生的料，喜欢学习……她不理解这一点。我只想赤脚坐在露台上打字。

格林鲍姆“将军”同妻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他的妻子是雕塑家。他们常常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同一些他们选择过的客人见面。我总知道那都是某位很重要的人物，可就是老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将军”时时给我一些忠告，例如：“您一定

要同街对面那些邻居混熟，他们同纽约摩根图书馆颇有关系！"我答应了，可过后就忘记了。我并没有兴趣去同重要的或"用得着"的人物打交道。

有一次，在我大量的邮件中有一封纽约名流俱乐部寄来的邀请信。这个奇怪的组织帮助"名流"们互相认识，并在纽约、洛杉矶人数众多的豪华宴会上见面。那些宴会被广为发行、甚为轰动的报刊详细披露——谁跟谁在一起，谁又是什么人。我觉得这些观念简直可笑，连复信也没有写。不过，很显然，按照美国的概念，我现在已完全是在接近此类通往上流社会的门径。啊，我还是不这样做好。我甚至拒绝了格林鲍姆夫妇向我推荐的黑人女仆。

"您今后要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啊！您必须这么做！"他们坚持说。他们有自己的道理：我作为名人，显然得设格调高雅的小型宴会或便宴招待某些人。但我表示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懂，感谢他们，并拒绝了用黑人女管家。

每天邮局送来各种社会团体的信件，我觉得这很有趣：真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啊！他们的表现是多么不同，他们的兴趣范围又有多么大的差异呀！但他们全都是我的读者。他们竭力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述他们在美国如何生活，美国是怎样一个国家。他们向我倾诉他们自己的心境和他们的体验，鼓励我在孤独中——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打起精神。他们从我的电视访谈或从我的书中了解了我。信件或寄到电视台，或寄给出版商，而常常是寄到律师事务所。

事情一下子便清楚了：妇女乃是我最好的读者。父母和孩子的故事、家庭的悲剧更合乎他们的人情趣味。妇女们很少谈自己的政治思想。实质上，她们如此深刻理解一个像我

这种极不平常的家庭的经历,理解我们的悲剧,以及如此不正常的各种相互关系,这简直令人惊异。然而他们全都理解。

“将军”派来的女秘书只是协助了我一个极短暂的时期。她是他的好朋友,一位又瘦又高的太太。她抽烟,讲话声音很低沉。她把那些吐露个人心迹的、我最感兴趣的信件干脆扔到一边。“全是些神经病,”她说,“神经病才总是给名人写信,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去吧!”她把那些我们“应当回复”的“重要信件”拣出来,然后又帮我打几行官样文章的复信;那些复信真恨得我刻骨铭心,因为我从不如此同任何人交谈或写信。尽管我们之间从无融洽,但为了不引起冲突,我仍然签署了这些信件。我感谢(用她那华丽的语言)读者的关注,或拒绝讲学——当时常常有人邀请我。我们继续把女秘书写好的这些毫无个性的信件寄出去,直至通信人发来大表愤慨的回复。他们要求:“……请用您自己的英语回信!不要您秘书写的公文式的信件!”

我继续亲自回复一些信件,用自己比较热情的“方式”来回复,同时也在女秘书短短的公文式的信函上签名,说明“讲学并不是我的 1 éχé(专长)”。无论我向她说明多少次,在我生长的时代和我生长的环境中,任何人再也不讲法语,她却认为,我现在差不多是“出身于俄国贵族”,所以,更适合于在讲话中插入法语词儿。在我的青年时代,在苏联讲法语已不再是时髦,法语只是现在才又时兴起来的①。我们当时学的是德语,后来又学英语。我明白我们的这些公文式的复信使人感到极不自然,但我那女秘书甚至不允许我按自己的意思写

① 我的外孙和他的同学们法语都满不错。

信。我认为还是不和她争吵好。

我一踏入美国便开始的广泛通信，使我得到了若干朋友和他们忠贞不渝的友情；这些友情持续了好些年代。现在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直至今日还从美国、欧洲给我写信。大家都从报刊上得知我成了“百万富翁”，于是请求资助的信常常寄来——这叫我极感痛心。我所有的钱都在两个基金会，由律师管理着，我自己甚至没有余钱寄给他们。我回答他们说，我把这些请求信转交给纽约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信转过去了，可那结果常常是不了了之。应该讨论每年寄出的资助费，但基金管理委员会多年来从没有开过会。律师同凯南和我在电话上把这些问题决定下来，所有实权都由出纳员莫里斯·格林鲍姆掌管（他与“将军”同姓），一切都由他考虑好了，决定好了，我只能毫无异议地赞同他们的意见。

我们慈善事业最主要的，或者最好说需求最大的对象，乃是印度的一家医院。那是基金会用自己的钱兴建的，而且年年都要向它拨款。用于其他方面的钱就已经很少了。因此，我们怎么也无法满足在法国的一名俄国工程师一万美元资助的要求，或者新泽西州俄国中心的求助。这个中心要求我为他们代“付”人身保险费，因为他们那里有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正责备他们。要求的数额超过10 万美元。一位代表俄国中心前来求助的太太认为，我只要打开钱包，就……这些请求真叫我老大不快。第一，我怎么也无法作出帮助（律师们已有很好的预见）；第二，我还记得当初这些俄国侨民是如何对我破口大骂的，他们还要求“把她遣送回苏联去”，现在他们的调子却变了；第三，我怎么也习惯不了，从我在苏联的过去生活中来到的这个世界，确实一切靠钱，因此人们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庸俗的物质主义",也令我讨厌。

1967 年4 月创办于纽约的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在开办的头几年给予了托尔斯泰基金会可观的"馈赠",对俄国儿童协会以及援助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俄国侨民的文学基金会也作了少量资助。我们还支援了《新俄国杂志》。不过,正如我已说过的,主要的资金却用在了在印度修建一所30 个床位的乡村医院上。我们大家都明白,因为隔着千山万水,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对遥远的印度北方卡拉康卡村的贫民将如何给予帮助。只是在17 年后我才明白,在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是不应当把大笔钱款寄过去的。

为了更有效,有人曾建议我们捐赠一座新的医院,由联合国医疗计划署监管。但那时候我无法拒绝苏列什·辛格(我已故于莫斯科的朋友布拉杰什的兄弟),他要我"只要寄钱来",答应其余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去办。我们是信任他的,我在他卡拉康卡的家里住过两个月;他的儿子阿硕克(曾住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也一再说,"家里更知道当地条件"。在17 年中,我们向印度寄去约50 万美元,由苏列什·辛格及其家庭个人负责掌管。但我们也经常收到当地医生及其他人的投诉信,他们说,并非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医院的需要上,一部分已挪作了家用;他们说,最好不再办这种私人事业,而将医院直接捐赠给印度卫生部,这样,任何人就无法将钱挪作他用。[①] 这件事对我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很好的教训——我没有罗

① 我们终于停止向印度方面寄钱了,因为这是防止盗用款项,迫使辛格一家把医院转交到保健人员手中的唯一现实可行的办法。

盘，却在大海上闯荡；在这个贪婪的世界上，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慈善家。布拉杰什·辛格曾经老对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卷入印度人的事情，因为你马上就会上当受骗！”真应当认真听取他的忠告。

现在，在这炎热潮湿的夏日，有条件的人都离开了普林斯顿，我却呆在这里，写作我的第二本书，处理我那些广泛的信件。本地区的邮递员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总是把我信上的所有邮票都送给他。信件的确来自全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集团国家和我的祖国除外。我未曾收到过亲戚朋友们一封信。这是纪律呗！在苏联，这是不可饶恕的。17年来也没收到过女儿一封信，儿子的两封信至少是1968年前收到的。如此而已。

那位邮递员常常呆下来同我闲聊，他有一个颇引以自豪的女儿，是个中学生。有一天天气特别炎热，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这种天气最好能在游泳池里泡上一会。我同意他的说法。他突然决定说，他能在这方面帮帮我。离此不远的一家房主到欧洲去了，留下一个大学生看房子和——花园里的游泳池。

第二天，我这位意外的帮忙者同大学生谈了一阵之后，带给我一张那大学生写的字条。小纸条上用铅笔写着，邀请我趁家里什么人也不在的时候，到他那边去坐坐，并使用游泳池。我马上到那幢房子去，认识了那位极为可爱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他正在洁净凉爽的游泳池边学习希伯莱语，游泳池在一片茵茵草地中间闪着淡蓝的波光。啊，得到这样的许可，真难以相信！

我随身带上了笔记本和校订稿。我们一起在水池边度过

了几个钟头，各自作着自己的事情。他从厨房送来午餐——三明治和凉茶。我们便闲聊起来。我了解到了普林斯顿现代宗教学校生活中的许多趣事，有新教学校的，有主要是长老会学校的。

那位大学生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到伊朗一家基督教学校去任教。在当时，那儿还算是一座"安定的岛屿"（这正如吉米·卡特所称的那样。他在几个月后便决定支持穆斯林极端分子的"革命"，并置那位正是由美国扶植上王位的国王于不顾……）。无论如何，1968 年伊朗还是一座"和平祥和的绿洲"，那位大学生长时期从那儿给我写来兴味十足、赞不绝口的信。照他的说法，那时候伊朗对异教是最为宽容的。遗憾的是，这位出色的美国青年后来的命运我竟一无所知。

在那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夏天，以及第二年的夏天，我经常乘公共汽车去纽约，同我的编辑迪克·帕斯莫一起作《仅仅一年》译稿的定稿工作。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恰夫恰瓦泽完成翻译并把清样带来之后，我们必须最后审读一遍。我还同俄文编辑一起审读了俄文原稿，那是供俄文版用的。

迪克·帕斯莫不停地吸烟，我则一口口喝着糖茶。我们坐在哈珀-罗出版社一间没有窗户，谢天谢地，却装有很好的通风设备和空调器的屋子里。因为整间屋子地板上都铺着红地毯，可能也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人们把这个地方戏称为"克里姆林宫"。于是，我们便呆在这座"克里姆林宫"里闭门不出，要按期交去清样，在这儿度过很长时间。我们逐页将英文本同俄文本对照阅读，有时发现更好的表达方式也作些修改。对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种极大的内心满足，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翻译（我过去在莫斯科也译过东西），而且，这是一件我生性

喜欢的文字工作。

“为什么我们没能像在这儿一样校订您的第一本书呢?”迪克·帕斯莫不止一次问我;他显然感到奇怪,作为作者,1967年那些日子里我怎么完全没有参与其事。

“这个问题您别问我。”我回答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我知道,这是很蠢的作法。”而且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插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任何一位作者应当亲自来完成的。

或许这是普丽西拉·约翰逊的意思,她不希望我干扰她的翻译工作,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她并非行家里手?或许,这对于出版商埃文·托马斯更好一些?最后,或许是对文字工作的特殊性一无所知的“将军”代我作出了决定——如对其他一切事情那样,认为别的什么人能够代替我完成这项工作?要知道,通常这类工作都是为五花八门的“名流”——影星、政治家和其他不搞写作的人做的。谢天谢地,现在我们在一起干了,有时候编辑弗朗西斯·林德莉也参加进来,大家工作得十分愉快。在几天时间里,我们对两种文本作了比较,纠正了一些错误。

很晚的时候,大约是10点钟,我们从编辑部出来吃夜宵,向位于莱辛顿大街的一家叫做“快乐的先令”的小餐馆走去(这是迪克选择的)。这时候顾客已寥寥无几,煎牛排好极了,一位盲人钢琴家在轻松地作即兴演奏,没有人打断他。一条硕大的导盲犬躺在他的脚旁。

这是我们共同工作的一段美好时日,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无论在公共汽车上、街道上、还是在这家小餐馆里。我居住的这家旅店十分清静;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天,便动身返回普林斯顿,像一只百灵鸟般的

幸福。

没有任何人"跟踪"我。一次也没有人叫住我,提一堆愚蠢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人来"保卫"我。我独来独往,犹如戴着一顶隐身帽,混迹于大街上的人群之中,逛纽约的商店,充分享受只属于我自己的谁也不知道的生活。

或许,我应当感谢去年《生活》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它们把我描绘成"克里姆林宫的公主",显然应当住城堡,坐罗尔斯-罗伊斯豪华轿车,穿毛皮大衣,戴钻石戒指。我这毫不起眼的外貌,其实是我在苏联克里姆林宫清教徒般生活的继续;在我的青年时代,那儿是不允许豪华的。后来,我在莫斯科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就是说,依然没有毛皮大衣和钻石戒指。真感谢你啦,《生活》杂志!要是没有你们卖力,没有你们制造那个虚假的"形象",我就不能在大街上如此自由地来来去去。

不过,在美国,一个人的任何事情都与别人无关。你可以在百老汇大街上双手触地,四脚朝天地走上一遭(如果你会这一手的话),谁也不会感到奇怪。正如格鲁吉亚侨民作家巴巴什维利在他所写的书里说的那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与任何人无关。我过了很久才明白这个情况。一开始,我看到报刊上有关我的每一个歪曲都伤心得可怕;我相信这一下完蛋了,我永远名誉扫地了。但我逐渐明白了,这种事必须淡然处之。因为谁都不干您的事。

*　　*　　*

1967 年是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50 周年,美国国务院处于苏联代表经常性的压力之下。苏联代表的希望是使我的

“叛逃”失去任何政治意义，把此事说成是“一个不大正常的女人所作的环球旅行”。在我的律师监督下，人们在报刊和电视上对我作了介绍，把我说成是个惶恐不安的小姑娘，说我除了纽约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发表自己的回忆录！估计在书出版之后，我便会到某些别的国家去。他们要公众相信，我滞留在美国这个地方，目的只是要得到出书的收入。因此，侨民圈子为这件事对我非常仇恨，这毫不足怪！当我如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当时所写，尚在“半空中”时，我的签证又延长了半年。只是人家忘记了告诉我所有这些详情。一直到1968年春，律师才通知我，我终于要取得在美外侨的身份了。

我同艾伦·施瓦茨一起到纽约外侨管理局去取了指印，领到了相应的证件“绿卡”，便作为美国外侨被“接受”了。在我的“绿卡”上，我“到达纽约的日子”是1968年6月，也就是说，比我从苏黎世飞抵这儿晚了整整一年。整整一年我都是一名正式的“旅游者”，一名从苏联经瑞士和印度而来的游客，而不是一个从苏联制度下叛逃出来的人。我认为，苏联人十分乐意把事情想像成这副景象，而且要把我搞成一个十足的傻子。

按照一切法律规定最终被美国接纳，我当然感到非常愉快。但是，1967年3月，美国驻德里领事在我的苏联护照上盖上允许前往美国旅行的印章，那一次难道没有接纳我？那份护照没有保存下来，因为那年夏天我在宾夕法尼亚将它烧掉了。（当时有人突然开始向我暗示一个主意，到加拿大、英国或百慕大群岛去看国际博览会。我很担心，坚决拒绝说：“不行”，怕人们会把我送回苏联，怕作完这些旅游之后再也回不了美国。）于是凯南大使决定我在1967年秋天返回瑞士。然而，瑞士却不希望再次接纳我，怕又引起舆论界兴风作浪。

国务院也可能最终作了这样的考虑:“我们将这个女人在全世界到处转移,这到底还要折腾多久? ……”于是终于决定给我侨民身份。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但是,我的所有“老板”和律师,对于向我讲明事情真象,以便我能够同他们一起讨论所有事情和采取决定的问题,一概漠不关心。他们老是让我接受我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而向公众作的解释却又完全是另一码事。

1968 年夏末,我在普林斯顿租用的住房到期,我突然接到当地一位太太,变卖不动产的代理人打来的电话。我认识这位太太,因为我租用了整整一年的这幢房子,就是她帮我找到的。我请她现在为我找一套小住宅,最好有庭院树木——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区里有不少这样的住房。然而,她对我另有安排。

我未曾料到,一个代理人对于当事人的决定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在美国,一个代理人竟能随心所欲地向您“出售”东西。她想让我看看“一幢小巧可爱的待售房屋”。我表示异议,向她解释说,我只需要一套底楼的住宅,而且我并不想买房,只是租用。我对她说,我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房子,目前,我也完全不需要房子。

“不过,不动产这可是一笔存款哪!”我这位亲爱的太太颇权威地向我解释。当时,我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么样,我到底还是同她一道去了,这纯粹是因为我认识她,同时也因为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我不想让她感到委屈。她已人过中年,头发灰白,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喜欢露着牙齿微笑。我喜欢她那快乐的性格。我们乘着她的车

在一幢白房子边停下。这房子有黑色护窗板，黑色沥青房顶，砖砌台阶，是一幢典型的三角屋顶别墅式房屋。她讲起这房子过去的主人——长岛的一位医生和他的妻子；夫妻俩已在不久前去世。我没在意，我并不需要这房子。

我们穿过一间令人愉快的、带壁炉并三面开窗的方形客厅，窗外是一座小花园。房间很明亮，墙和书架全是雪白的（完全像莫斯科我房间里的书架）。

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我并不感兴趣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到厨房。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砖砌的露天凉台，它面对一座花园，园里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一切令人惬意，与厨房相邻的一间小小的餐室也是如此……

然后，我们来到通往楼上卧室的楼梯旁。这位太太仍在讲着镶木地板，而我却往上边瞧去。园子里树木的金绿色光线透过平台上的一堵小窗洒进来。左边是一间卧室，右边是另一间卧室，与莫斯科郊外我的别墅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去年夏天同孩子们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我站在第一级楼梯上，扶着栏杆，不能往前走。我这位太太等不及了，在身后轻轻推我一下，但我仍木然不动，完全沉浸到了以一种异常的力量突然袭来的回忆之中。我像吉普赛人一样在世上漂泊无定几乎有两年之久。我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被这永无休止的流浪弄得精疲力尽。我竟忘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那位太太拍了拍我的肩头，我才蓦地清醒过来。我回到现实之中，瞧了瞧她，很快地问道："我能买下这幢房子吗？"

"您说什么？"她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想买下这幢房子。该怎么着手？"

她于是展眉大笑起来，淡蓝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都露着光彩。她非常得意，因为她预见到了她的顾主正想要的东西，而且把我引到了我喜欢的地方来。

我立即将房子买下了，但"将军"却大为不满。他谈了些上税方面的问题，认为我没有必要购房。但是我去找了城里另外一名律师，他很快将买房手续办妥了。由于发生意见分歧，我不再请求我的律师从纽约汇钱来购物（如我们以前在其他情况下的作法），而完全使用出版商支付我的第二本书的预付款。这笔钱是寄到我个人手中的，并已由我存入普林斯顿的银行。我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生性缺乏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美国第一次自作主张办了一件事情。再说，这是一幢多么令人神往的房子啊！

我的新邻居们马上为我请来了漆匠和木匠，因为需要做点小物件，墙壁也需要刷白。我很快搬入了新居，并带来一对折叠椅，一台用来收听新闻的收音机，还有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我那辆深绿色的"道奇"也停在了房后的凉台旁边。

我的邻居还带来了她的装饰工，让他帮我购置家具。这是一位胖胖的圆脸蛋青年人，十分严肃而矜持。他很希望把我的房子布置一番，使其成为高品味的典范。然而我客厅里买的沙发和圈椅是最普通的，不过很舒适。卧室里的陈设则是传统美国风格，餐室也是如此。然后，书房里的写字台、沙发、椅子也同样是极为普通的。墙上本来就有几排雪白的书架——这是那位医生原来的书房。

我的这些房间看上去显得空空落落。整个房子里只在客厅有一张金黄色小地毯：我喜欢打得锃亮的镶木地板……那位装饰工感到大为失望。

“看来您不喜欢古董，”他说道。我向他解释说，我需要陈设简单、明快、实用、容易替换。“假如明天一把大火将这一切烧个精光，我不想为无法挽回的损失而痛哭流涕，”我说。他在各方面都为我帮忙，但对于我简单的选择明显感到惊奇。或许，这又是“克里姆林宫公主”的形象使他难以同我达到共识？不过我让他相信，我在这房子里将会过得很幸福。

就这样，我42年来算是有了一份“不动产”，它使我在后来的若干年中都感到极为高兴。这幢房子具有某种内在的亲切感。在这里居住过的都是些很好的人：房子里处处都充满了他们的气息。阳光慷慨地洒进小窗，树影在地板和白墙上摇曳。每天晚上，壁炉烧得熊熊的，我在旁边听广播消息或看电视新闻。后来又有了一台电唱机：我有几张心爱的唱片，一张是从瑞士带来的，甚至有一张从印度带来的……

格林鲍姆“将军”，正如已讲过的，想为我提供一名黑人女管家，以便“接待客人”，但我说服他相信：常到我这儿来的只是一些亲密朋友，我自己完全胜任得了。我开始邀请一些朋友，并作家常饭菜。有人提出帮我买一些古董——在美国，人们非常喜欢这些玩意儿。干嘛不让人过随心所欲的日子呢？……看来，我的趣味使他们觉得古怪。

后来，我买了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我很满意，衣服终于不必往洗衣店送了。书房里摆满了书籍和纸张，厨房里也热闹起来：我把8岁的马可·扬讷尔的绘画贴在墙上。春天，鲜艳的红杜鹃花在大门口开得一片火红，金色的连翘在往书房窗户里张望，一株幼嫩的李子树在厨房门边闪烁。一棵巨大的苹果树，完全被玫瑰色的花朵盖过；从屋子的几乎所有窗户里都可以看见它，花瓣犹如雪片般飘落到地上。草丛中

长着铃兰和紫罗兰。美国春天的公主山茱萸象新娘一般穿着雪白的衣裙。

我还不习惯将这一切看做是我自己的。这样的树木在邻居的花园里同样也有。不过这一切美景对我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珍贵的，它令我赏心悦目。在颇感幸福的头几年，我曾想永远永远不离开世界上这个美妙的角落。我今后将会走得离此很远，但总是会回到威尔逊街我的家的。

*　　*　　*

我的邻居是一些很令人愉快的人：儿科医生和他的妻子——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两位未婚的姐妹，其中一位是助产护士；两名开业医生——他们是科学派基督徒；一些每天都去纽约上班的公务员。这是纽约附近一座颇享特权的小城，尽管人们认为普林斯顿主要是一座大学城。

我从房子的旧主人那儿续雇了一名意大利花匠。这是个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他这个特点与我的第一个花匠大不相同。他娶了个美国女人，给在意大利的母亲寄钱，不向人诉说任何苦衷。他的孩子们在普林斯顿上学。

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

邻家的女儿，年轻姑娘凯琳，邀请我同她一起到她喜欢的缅因州蒙希冈岛去共度假期。她答应我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旁边就是大海，我们可以在沙滩上散步、看海鸥……我喜欢大海，喜欢听浪涛的喧哗，这是我已经很久没听见的声音了。

凯琳驾着她那辆白色的舍维特牌汽车，飞快地驶向波士顿，然后经新罕布什尔向缅因州开去。我和西班牙金毛狗马

弗恩坐在后排。从布特贝哈勃每天都有火轮开往那座岛屿。我们到达这里时，天下着雨。我们在凯琳的一位熟人家里过夜，她是造船商的遗孀。她总是手拿一支望远镜坐在窗前，欣赏港口进进出出的小艇。这个女人知道每艘小艇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所有者，当然也知道这些小艇是谁造的。

第二天又是大雨如注。当我们和情绪低落的马弗恩身背背囊来到码头时，由于云雨漫漫，几乎看不见四周的任何景物。那名称不无讽刺意味的小艇 晴天”号不顾恶劣天气，仍然满载货物和一切必需品驶向小岛。这一天我们是唯一的乘客。

我们一出海，亦即驶向大洋，整个小艇便剧烈地前后左右摇晃。马弗恩和它的女主人很快便耐不住晕船。我们呆在下面底舱，同货箱和邮件箱呆在一起。船长叫我们呆在这儿，可我们需要新鲜空气。我们费力地沿扶梯登上舰桥，在这儿遭到船长一顿好骂，但我们牢牢地站在甲板上，死命地抓住把手。船长骂够了，再也无话可骂了，只好向我们挥挥手。

船长只好穿过雨和雾的密墙缓缓前进。海水一片铅灰，只有老天知道船长是怎么把握方向的。我们在舰桥上呆了两小时左右，不过感到实在是太久太久。船走得很慢，摇晃得厉害；我们的双手冻僵了，还勉强能感到有一双发麻的脚。

忽然，白茫茫的雾墙象幕布一般拉开了，雾气迅速散去，只下着霏霏小雨；在我们眼前，两座高峻陡峭的岛屿之间露出一条通道。我们慢慢靠近一座小码头，岸边山岗上显出几幢房子。这一天，我们才算第一次相互会心地露出笑容。

船终于系在码头上了，我们背上背囊，牵上疲惫不堪的马弗恩登上岸来。旅店设在一个山坡顶上，但我们的双腿不听

使唤，只觉得地面仍然在摇晃，而且在从脚下消失。我们在路边草地上坐下，一点也不能动弹。雾差不多全散了，现出一片明亮湛蓝的天空。两座险峻的岛屿几乎是光秃秃地屹立在海上，犹如两座高山。这儿是真正的天涯海角。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听见一种奇异的反复不绝的声音，是某种我不知道的乐器发出的。它优雅动人、令人快慰，能贯穿你的整个肉体。这是从灯塔发出的、不断重复的信号笛声，音色酷似低沉浑厚的猎角，温软有如天鹅绒。这经常不断的信号发出警报，通告两座小岛对从这里经过的所有行船都有致命的危险。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倾听这柔软低沉的声音，让它治愈我们心力交瘁的身体。

我们在蒙希冈岛上度过了一个星期，冒冷雨顶烈日，穿密林攀悬崖，沿小路散步，观察各种小鸟，养了一只名叫加斯的驯熟的海鸥。大海沉重的喘息声一刻不停，“迷雾信号”的声音也是如此。同这位熟知印度和东南亚、年轻而又聪颖的姑娘一块儿度过的这清新的一周，叫人永远难以忘怀。

*　　　*　　　*

1969 年11 月，《仅仅一年》一书出版了，我因此不必再往编辑和出版商那儿跑了。但我那时仍然经常去纽约听室内乐和交响乐音乐会。

奇怪的是，那时候博物馆及其死气沉沉的收藏品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向喜欢博物馆，那是对灰暗无聊生活的一种逃避。但在这儿，在美国，生活是如此新鲜、明快而又热闹，以至我感觉不到“逃避”的必要。不过音乐

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音乐不是死的，它活着、呼吸着。而且在那些日子里，我对于音乐的需要，超过了博物馆墙上那些绘画以及雕塑。音乐是同其他人团结一致的工具，这和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里总能得到的感受一样。在美国看见莫斯科音乐家那些熟悉的面孔，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有一次，莫斯科杰出的小提琴家列奥尼德·柯岗在纽约开音乐会。过后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又演奏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利赫捷尔非凡的成就也声名远扬——他在不久前才"被允许"到国外演出，这是他多年失意中的第一次出国！后来，莫斯科人弗拉基米尔·阿什克纳吉也开了几次贝多芬音乐会。卡内基音乐厅成了我习惯的莫斯科生活的继续——当我在那里聆听莫斯科音乐家们的演奏时，简直说不清我此刻身处何地……

音乐将七零八散的人们联合在一起，而政治和政府则像一堵高墙将我们隔离。弗拉基米尔·阿什克纳吉像我一样，也是一位叛逃者。几年以后，罗斯特罗波维奇也学了我们的榜样。莫斯科有许多我熟知的音乐家也想这么干，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导师和家庭的责任感，使他们未能照此行动。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我在这儿又听到了我喜爱的巴赫、威瓦尔第、莫扎特、海顿、亨德尔的作品。当我感到生活还是一个统一的伟大整体的时候，感到生活充满欢乐与自然的时候，我总是很喜爱那些工业化时代前的老大师们的作品。

我常同斯拉夫学教授 Д. А. 扎帕里泽及其妻子和儿子去听这些音乐会。他们家是我在普林斯顿遇上的，一家都是俄国侨民。扎帕里泽是格鲁吉亚人，他的妻子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同其他俄国侨民的区别，有如高加索和南方同北方地区

的区别。他们生性乐观,喜欢美酒佳肴,喜欢快乐的聚会,从不抱怨(而抱怨却是俄国人的讨厌习惯)。去听音乐会之前,我们通常总是要到卡内基音乐厅附近一家法国小餐馆去吃饭。在家里,扎帕里泽夫妇都能作一手漂亮的高加索菜。他俩都出生在格鲁吉亚,但童年时代就随父母去了法国。他们在巴黎相识,并在那里生下他们的儿子。儿子现在已是中学生,既讲俄语、英语,也讲法语。父母在索邦、牛津和哈佛大学,过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最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俄国文学。

在普林斯顿,一帮在斯拉夫学系任教的女士起来反对"这个格鲁吉亚人"——她们这样称呼他——也反对他那过高的标准。他当时是系主任。尽管在他们的冲突中他是对的,她们无理;但她们却懂得怎样搞阴谋,仍然把他撵下了台。结果,扎帕里泽教授只教一点不重要的课程,不久就决定一走了之。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决定。他的自尊心深受创伤,尽管他从不吐露自己的哀痛。他将信寄出后,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当夜便静静地死于心脏病猝发。

对此,任何人都难以置信,因为教授还年轻,看来身体也健康。但他生性无法经受狡诈的陷害。儿子要去打电话,他不让儿子告诉母亲什么事。他希望让妻子心情平静地回家,不要紧张。12 岁的孩子表现出大人一般的成熟,如同孩子们有时的作为。

安魂祈祷在纽约的俄罗斯大教堂举行,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学系的所有同事都出席了,大家明显地表现出十分震惊。之后,一大队汽车冒着一月的冷雨,鱼贯驶往波基普西山岗上的墓地,从那儿可以鸟瞰哈德孙河的全景。格鲁吉亚侨民从

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葬礼，每个人都带来一小盒格鲁吉亚泥土，一撮撮撒在墓里，要"让死者长眠在故土之中"。几个躲避革命逃到巴黎的老侨民，用惊骇而且不相信的目光望着我。但人们向他们解释说，我是"这家人的朋友"。扎帕里泽把我当做一个完全与我父亲的名字无关的人对待。他们知道我像他们一样热爱格鲁吉亚，也像他们一样，是躲避革命而来的……

仅仅因为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而憎恨格鲁吉亚和格鲁吉亚人，这是多么不公正啊！格鲁吉亚是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即使今天也如同许多世纪前一样。而斯大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归附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跑到北方去，多次沦落到西伯利亚，永远爱上了俄国和俄罗斯人；因为他喜欢力量，想同有力量的人呆在一起。雅致精美的格鲁吉亚文化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令他嫌恶，那些豪放开朗的格鲁吉亚人则完全不合他的脾味。他需要的是强人，是为战胜对手而不择手段的人；而一个充满歌舞美酒的国家造就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人。扎帕里泽一家对这一切非常了解，他们却以宽容大量的气度将我作为朋友接纳。这是一段虽然短暂却令人永志难忘的友情。它对于我的重要性，比他们一家人能够想像的更大。[①] 他们热爱美国，热爱他们的新居，他们在那里过着合乎他们民族传统的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我通过他们并在他们的协助下，了解了美国的许多事情。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在美国，格鲁吉亚人依然是格鲁吉亚

① 15 年后，我在格鲁吉亚遇见了这个家的另一些成员……关于此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叙述。

人，正如意大利人依然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依然是爱尔兰人一样。最崇拜格鲁吉亚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谈到格鲁吉亚人的时候说，他们"犹如食盐"——性格永恒不变。[①] 在纽约这地方的情形也正是如此，我可以作证。同样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自己身上也有这"永恒不变的食盐"的细胞。

*　　　*　　　*

我从来不曾忘却——现在仍然没有忘记——我1967 年获得解放，首先有赖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头几年里，我曾多次到康涅狄格州埃塞克斯他的家中去拜访他。他长期患严重的帕金森氏病住在家里。他曾迅速而毫不犹豫地帮助过我。没有他，我永远无法来到这个自由世界。

他家的大房子坐落在康涅狄格河高高的岸上。那时候，大使还能拄着手杖慢吞吞地散步，然而病情却在不断恶化。

我总是很欣赏这个人。美国驻印度大使无需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印度的学校去念书，而他却很热情地送去了。因为他确实热爱印度。他的几个女儿都懂印地语。我们总是会回复到同一个话题上来——讨论不完印度的情况。我告诉鲍尔斯，我为印度乡村捐钱办医院，他对此称赞不已。拥有30 个床位的医院于1969 年秋季就开诊，这在印度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从那天起，我就只拨款给它。开初，农民怕到那里去，特别是妇女。后来，一个女医生主持了一个诊断室，她们

① 见鲍·帕斯捷尔纳克:《诗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65 年，第349 页。

便全都去了。若干年后，这家医院在方圆数百英里都有了名气。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毫无疑问是高度评价我对印度所报感情的人之一。

我是1967 年离开卡拉康卡村的。某种预感告诉我，重新回来探望这座村庄可能将很痛苦，因为在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一次便凝聚了我的许多事情。恒河湾上有几幢房子，我在那儿度过了冬天，我在那儿作出过重要决定，我在那儿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 * *

我的《仅仅一年》一书——一个叛逃者的经历——应该很快就要开始出售。书的英文标题没有像俄文那样简明有力。英文书名叫作:《啊，多少事全在这仅仅一年中发生!》出版商、译者及我都曾试图找出英文的同义表达方式，我最终还是坚持用了这个冗长无力的标题。然而德国出版商却断然拒绝这一书名，并提出他的译法:《太阳从西方升起》。我认为这个名字很不高明，很矫揉造作。不过，不得已也只好采取折衷办法，让德文书名叫做《第一年》，尽管这也毫无意义: 无论从哪个范畴来讲，这都并不是第一个年头。或许他们并没有通读这本书。在出版界，这类事情是常有发生的。

仅仅在一年前，我的第一本书被大吹大擂，大作广告，后来，在《生活周刊》和《纽约时报》上任意摘登时又被完全歪曲。因此，我现在断然拒绝类似的摘登，不愿意作广告。现在的大众传媒对于新书的宣传评论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拉里·斯皮瓦克邀请我到电台，要在那里播送一个“同报

界会见"的节目。当我们开始现场直播后,他讲话声音又快又低,使我感到奇怪。他说:"不必讲自己的书!就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吧!"于是,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接踵而来,不过问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至于书的事,倒是谁也只字不提,我一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①]

《仅仅一年》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人们是非常喜欢宣传介绍的,总是希望更多地听到一些新的事件。书店则以为这是一本"谈旅游"的书,没打算订购它。有一本出版书目竟然介绍说,这本书是"从苏联经印度和瑞士到美国的游记"云云……

《纽约时报》谈到这本书时说:"……这本书不出我们最初的指望。"这么说来,家庭记叙性作品《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则不是他们期待于我的了。

不过,埃德蒙·威尔逊写道:"我相信,这本书会在整个现代世界引起反响。"他把我的经历看做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文献,它终将在数量浩繁的俄国自传体著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列于赫尔岑、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及其忏悔录"。这使我觉得甚至有点过分了!不过,无论如何,埃德蒙·威尔逊并没有将我的书看作什么"游记"……

---

① 拉里·斯皮瓦克现在不承认我这个说法,已"记不得"那些低声的讲话,并把那次广播节目的速记记录寄给我。那份记录中讲到,我因为出版新书而被邀请,但在记录中却没有提到这本书。自然,在预先提示过的情况下,我也一次没有提书的事……自然,听众都认为,这完全是"一般性"的谈话,有关我这个叛逃者第二本书的事,他们一个字也没听见。

那时候我感到很幸福，觉得自己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名作家。两本书都已出版了。这次没有在“皮埃尔”饭店举行盛大晚会，只是在肯菲尔德（我的出版商）家里举行了一次小型午餐会。

我觉得，书的第一部分是极为重要的，它表现了我采取决定从苏联出逃的过程。我也竭力表达出我当时体验到的对于印度的亲密感情。这完全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是苏联之外我熟悉的第一个国家。尽管恒河边这个村子一片赤贫景象，但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仍然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并非作为一个旅游者而到那里去的。我曾生活在那些印度人之中，仔细观察过他们的现实生活。

大家忘了，我最早的打算是留在印度。只是在明白印度政府不愿意同苏联发生冲突时（他们曾向我多次暗示这个意思），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的。因为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简单、最实际的一个步骤。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美国人在印度只看到“赤贫”的一面，而对于这个伟大国家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却一无所知。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如切斯特·鲍尔斯，则非常了解这个国家，意识到它对美国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然而，甚至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更倾向于穆斯林世界，或者倾向于所谓“东方世界”——中国和日本。印度的非暴力传统由于某种原因，迫使清教徒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背弃了印度文化古老的原则。是不是在“基督的纯洁性”掩饰下冒出了种族主义呢？印度人乃是今天真诚的国际主义者。我个人对于圣雄甘

地的欣美，甚至对一位"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1]的私情，以及我后来对于恒河荒芜的河岸的热爱和欣赏——这一切，除极个别之外，美国读者都是抱着极大的怀疑来阅读的。在我的读者中，同意我看法的人寥寥无几。同印度的整个生活接触，会从根本上改变你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英国人是理解这一点的。我们1982年迁往英国时，我便感觉到了这种差异。）至于印度人本身，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并且对于同他们自身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为难得的宽容大度。

在书的末尾，我对在我写作《仅仅一年》期间为我作编辑、注释、校订和提出建议的所有人表示感谢。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我有意一一列举出来，以便让人明白，这本书并不是我单枪匹马搞出来的。毋庸讳言，我不得不太多地写政治问题，写得超出了我的初衷。我对人的生活方面总是要感兴趣得多。路易·菲舍尔（哈珀-罗出版社编辑）竭力剔除我文章中所有提及上帝的地方，直到有一次，米洛万·吉拉斯到普林斯顿作客，当着路易·菲舍尔的面，激动地说出下面一番话："您应当写您的经验，写您是如何信起教来的，是如何有了信仰的。这至关重要！我个人并不相信上帝，不过，我真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您应当详详细细地写出这些！"他的话对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于是我便新写了一章，标题为《命运》。我简直想把这一章专门献给米洛万·吉拉斯，但别人告诉我，"不值得这么做"。

出版商和编辑们经常要求我反复描写我的父亲，我则认

[1] 如当时的总理柯西金1966年谈印度共产党人辛格时的说法。

为我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已经把话说完了。我憎恨再回到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回到我在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生活。我强迫自己去描写苏俄政治，描写斯大林的政治——大家实在太需要这些东西了！而且评论界实际上对此也持积极态度。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去描写小人物的生活细节——这却没有引起批评界的注意。

由于朋友们的请求，有关我经瑞士飞往美国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写进书中。我未能说明真象：我到底是怎么到瑞士的？为什么去？我没有机会充分叙述同麦迪逊大街的律师们会见的情况……这一切都没有写进书中。我的出版商倒希望代之以反复描写斯大林及其周围人的情况，描写"苏联上层"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日子以及多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我都没有机会明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唯一一次例外（我永远记得这次例外）是同OOП电视台的罗宾·戴先生的谈话。他认真地读完了这两本书，并立即就它们的内容同我进行了恳谈。在摄像机前的两小时谈话简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次谈话未能在美国播放，甚至在欧洲也只播放了一些片段。不出这些麻烦就太好了！这是1969年秋天的事。

就在那段时间，"美国之音"邀请我在电台用俄语播送我书中的一些章节。我播送了一些最具政治色彩、最反苏的篇章，这使苏联立即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大使馆拒绝这个抗议，声言播送书稿纯属作者的私事。苏联政府显然失去了耐心，立即取消了我的国籍，以作为报复。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正式命令剥夺了我"作为苏联公民的荣誉"——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早些时候就曾到苏联驻美领事馆去请求取消我的国籍，但他们却决定将此事作为"对我的处罚"而公诸于世！这个事实我是从《纽约时报》上得知的，该报大概把此事当做是我的悲剧，当然寻求过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不过我不能不解释说，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使我震惊，相反，我还请求过他们这么做。为此我和朋友们爬上了帝国大厦的最顶层，以庆贺得到解放。

于是，从这时候起，我不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了。我感到只有这样才最适合于我！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也不会让你得到安宁。

我作为合法移民——在美国的外国人——现在先得等待10年，才能申请美国国籍。通常情况下，移民只需等待5年；而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则犹如检疫一般，需等候整整10年。我常常感到惊讶，美国人对自己的法律是多么陌生。许多颇有文化的人以为，只要嫁个美国人，就足以取得美国国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倒是没错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千百名"战士的妻子"从世界各国向美国蜂拥而来时，这道跨入美国的大门关上了。在麦卡锡时代，又增加了一些更严厉的措施，尤其针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对于如此长时间的等待，我完全不反对，因为在这段时期我在美国是非常幸福的，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到别的国家去旅行。我只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异常美好的大国。

在最初几年，人们对我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十分友善的。我继续不断地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现在是我两本书的读者，这两本书用英文出版并全球发行，同时还译成了德、法、意大利、希伯莱、汉、日、瑞典、挪威、波兰以及我的本族语俄语。

俄译本是供在俄国境外的俄罗斯人阅读的，是在纽约出版的。

生活在俄国境外的俄罗斯人，对用祖国语言的出版物保持着永远的喜爱和兴趣，永远不会忘却自己的语言；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俄文图书馆、俄文书店的网络和一个巨大的俄文图书市场。

有时候，我收到一些俄国人、乌克兰人或东欧侨民写来的满纸憎恨的信件，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非斯拉夫出身的美国人写来的这类信件。那时人们对我的态度多半是友善的。

妇女是我最好的读者：她们最能理解家庭的变故、人生的悲剧，甚至在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的生活中妇女所起的作用。根据妇女对我的书的反应，我能有幸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我们大家就是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基本需求和表现都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独自一人，常常用拉娜·爱伦的名字订票——打电话时，使用这个名字比冗长的俄文名字方便一些。（几乎在刚到美国时，莫利斯·恩斯特律师便告诉过我，必须学会很快接受自己的名字。"拉娜"较之于很长的"斯韦特兰娜"要方便得多，我从此便用上了这个名字。）任何人都没有陪伴我、保护我，谁也不曾发现我是谁。人们以为我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甚至是德国人——这是纽约出租车司机对我作出的反应。我处于这种"不被发觉"的境地真是再好不过了。我便这样到了加利福尼亚，并且一下子爱上了这个美丽而情调迥异的地方。我还到了东海岸诸州，到了华盛顿。纽约则去了许多许多次。这就是说，完全可以躲开报界生活——我这样想，并为我来到美国后所遭遇的各种事情越来越感到激愤。这在当时看起来该是多么庸俗！一回

忆起我所有那些答记者问和在公众面前的露面，我全身就直哆嗦。我可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现在我在实践中重复我母亲的原则——在多年之后而且是无意识的。我母亲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国家“第一夫人”角色，费尽力气不想引起别人注意，不被别人认出，以便有可能过过自己的日子，独立于她那声名显赫的丈夫。照她长姊安娜的话说，她曾计划念完工业大学，离开丈夫，同他分手，带上孩子，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参加工作……她那高贵的地位令她非常讨厌。这地位同样也总令我感到厌烦。她多想成为一个“寻寻常常的人”啊，多想过上寻寻常常的生活啊！在过革命清教徒生活那些日子里，大家十分尊敬她的这一品格。被吉拉斯一针见血称为苏联有产者的“新阶级”，是后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我母亲娜佳·阿利卢耶娃难以设想自己在国外用“美洲快车”信用卡买珍奇珠宝。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时代来得要晚得多。

在那些日子，我在普林斯顿和纽约的鸡尾酒会上会见了不少人。我见到了为数众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以及共产主义和俄国史专家。我不能不特别指出伯特伦·P·沃尔夫超凡的才智。他有关俄罗斯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阐释了许多事情。他本人和他娇美的妻子埃拉都成了我长期的挚友。

最后，我见到了伊萨克·堂·列文，大名鼎鼎的“头号反共人士”。1967年还在瑞士时，他便试图找到我，正如他现在所言，要将我“从自由派中挽救出来”。我记起了他的名字——他当时曾给我写过信，并恳请我同他在伯尔尼或苏黎世见面。但我那时严守纪律，认为必须听从为我效力的人……再说，我对于那位叫做堂·列文的人又有什么了解呢？他又比别人好

在哪里?我怎能理解和掌握这整个"美国舞台",怎能搞清谁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我又该同谁在一起呢?我只是感谢有人帮助我,我不能一下子抛掉一些人而投向另一些人。堂·列文现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但当时他——这个老练的人、记者,史学家和作家——却希望将我逃离共产主义的事实公诸于众,以展示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并不是"经印度和瑞士来纽约出书"。哎,要是我当初能理解这一切就好了……可当时任何人,甚至连可爱的瑞士人都没有向我解释那时的情况。而当时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报刊也迫不及待地使所有人毫无例外地发了疯……

那时候,不仅美国的堂·列文想飞到瑞士来同我叙谈,而且伊曼纽尔·德·阿斯齐耶也抱着同一目的从巴黎飞来,还有大卫·弗洛依德也从英国飞来了。他们全都坚决要求尽快同我会见,看来,谁都不会放弃这一机会。但是在我眼里,其他人又哪点比乔治·凯南更好呢?我没有任何理由从一串陌生人的名单中去进行挑选。对于西方世界,对于它的一切机会和形形色色的情况,我压根儿一无所知。

从苏联来的移民,尽管抱有最崇高的目的,在这沸沸扬扬、喧喧嚷嚷的自由世界中,却是最为软弱无能的一群人。要了解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需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我们全都希望到这里来,然而我们苏联的全部教育却绝对没有把我们培养成适应这里生活的人。有这种体会的人并非我一个。我们是软弱无能的。在这个转折时刻,我们需要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客观而理智的顾问和心平气和的朋友。

甚至连堂·列文也并非这样的人,因为他也仅止是为了保守派的利益而对我的名字和我的历史加以利用(正如纽约、

《纽约时报》和东海岸自由派人士的所作所为)。

现在，在我普林斯顿的家中，患气喘病而又脾气暴躁的堂·列文满脸通红地坐在我面前，向我证明"自由派曾如何竭力不破坏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以及苏联如何要求禁止出版我的书。(对，我记起来了，在1967年那些日子里，凯南大使曾希望把出书的事搁置起来，然而所有出版商都提出了抗议。)"迁到加利福尼亚南部去吧！那儿是保守主义的壁垒。您将会看到这个国家东西海岸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我们居住那个圣迭戈区，您会作为"红色分子"受到怀疑，但也会作为叛逃者得到更好的理解。您将得到一个叛逃者应该得到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在列支敦士登同神秘的科贝克斯签约之后，已丧失了出版我第一本书的所有权利。他只是用肥胖的双手抱住脑袋，坐在椅子上默默地一个劲把身子摇来摇去。"喂，我亲爱的，我曾希望在瑞士会见您！"他终于笑着说，"我希望您看见另一个美国，一个保守的，实行共和制并反对苏联的美国。由行政部门指派的律师，正是为了阻止这么做而费尽心机，因为苏联不愿意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很感惋惜的是您错过了我们，我们也错过了您。若不是这样，无论对于您或是对于美国公众，一切都会好得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堂·列文只不过是政治谱系中的另一个极端；要深深地陷入政治，去玩政治手腕，我从来就不愿意，无论那些旗帜是什么颜色。

很久以后(这次谈话之后8年)，我同小女儿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南部，其实就是遵循了堂·列文的建议。我们就住在他以前住过的卡尔斯巴德附近。他本人和他夫人对我们都极为

亲切。不过,他把我介绍给那些人数众多的招待会,我却不怎么喜欢,于是就开始躲避。我生性就不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或许,这使堂·列文感到失望。他希望我向记者发表谈话,签署一些抗议信,但我并不热衷于此。他是个善良的人,对奥莉加也真的很亲切——对此我不能不作出好评。现在,堂·列文已经过世,他死于心脏病猝发,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我怀着温情把他铭记在心中。堂·列文使我认识了美国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即真正的、甚至极端的保守主义——为此我对他抱着感激之情。他怎么也无法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谈话,不愿意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一切他都认为是我应当作的。人都有不同的内心要求——这个简单的道理,政治家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但是,当我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之后,我就必须作出决定,在1980 年大选中我该怎样投票。我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伊萨克·堂·列文的影响和投票意向起了作用。

我们再回到在普林斯顿那几年去——那时候,我常常呆在威尔逊大街我舒适的家中,回答没完没了的读者来信,从报上剪辑对我的书的评论文章,干作家们在出书后通常要干的事情:酝酿创作新书的计划……我想专门写一本书,谈谈我同整个世界交往这一崭新机会。在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就获得了这一机会。我想写一本类似世界各地来信的东西。我现在想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们在读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后,给我写信有如写给自己的友人。他们说:"我们是您的朋友"。我觉得我的书触及了人心,打动了男女老少。这些珍贵的信件是寄给我,一个普通妇女的,而不是寄给斯大林的女儿的——它

们常常根本不涉及政治。我突然听到身边响起许多人的声音，这声音充满温暖和友爱。关于这些，我也想写出来。

不过，看来我的命运不允许我享受到生活的快乐，而且它妒忌地注视着我，要使我好景不长。在其他人中，弗朗克·洛德·赖特的遗孀和她们的女儿开始给我写信。弗朗克是美国有名的建筑师（他的名字我当时还没听说过）。我通过一番询问和了解后得知，由赖特创办的某个建筑公社依然存在，而且以其“怪异”闻名于世。不过，他们竭力邀请我前去那里。不久，这个社的另一些成员也给我来信，对我的书赞不绝口，并向我保证我在他们的团体中会生活得非常愉快而兴味十足。

对于那些“奇异古怪”的警告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一辈子都在认识不寻常的东西。几个月后，我无法拒绝一位年高德劭的太太的再三邀请，打算于1970年3月中旬到亚利桑那州走一趟——只呆一个星期，以了她的邀请之愿，然后去旧金山。6月份还要作一次愉快的夏威夷之行——那儿，在偏远的海滨浴场，我的朋友们有一幢房子。我多么想到那儿去呀，去结识一些新人，瞧瞧新的地方！

于是，我脑子里装着这些愉快的计划，丝毫没有怀疑我在普林斯顿已形成的固有生活方式有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出发去了机场，搭机到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去。当时我对于盛邀我去的那个世界绝对无知。要是有谁想警告我那儿有危险，我当然是不会相信他的。

那是完全丧失我刚形成的新生活的危险，是丧失我的独立、丧失我被承认的作家地位、丧失我从未有过的自由给我带来的新的欢乐的危险！啊，不！这简直就不可能，我也只有一笑了之。

陷　　阱

(1970—1972)

我于1970年3月飞抵菲尼克斯机场时，对坐落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中的塔里辛公司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对这个建筑艺术公社的创始人弗·洛·赖特的了解也不多。他早在11年前已经过世。他的建筑事业、他那所建筑学校，以及他们称作"联谊会"的公司，从那时起一直处于他的遗孀监管之下。他的遗孀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娘家姓米利安诺娃，是黑山(现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一位民族英雄的孙女。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是在沙皇时代受的教育，会讲俄语，在美国成了这位著名建筑学家的第四位妻子。

她和她的女儿约万娜·洛·赖特给我寄来几本书，是描述他们"公社里的美好生活"的，这个公社建在沙漠里一座由赖特

30 年代初设计并建造的校园中。(这个公司另一座最早的校园建在威斯康星州,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浏览一番它们那风格特异的照片后, 我对沙漠的景观和建筑都不甚欣赏。那些建筑令人想起戏剧布景。我考虑得更多的是, 在访问这个奇异的地方之后, 我该往哪里走? 俄罗斯画家伊丽莎白·舒马托娃邀请我在晚些时候的夏天同她一起到夏威夷去; 对我来说, 这件事要诱人得多。那儿不是亚利桑那州的荒漠, 而是僻静的海滨浴场, 大洋中无人居住的小岛——那儿才的确是我神往的地方。在那些日子里, 一些我并不十分熟悉的人常常向我发出邀请。对他们的邀请作答, 成了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也是我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一种方法。

不过, 到亚利桑那州的访问有一个极为个人的因素作为前提。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赖特的青年时代是在俄国, 具体而言, 是在格鲁吉亚, 在巴统和梯弗里斯度过的, 那是我们家也十分熟悉的一座城市。她在那里第一次结婚, 生下女儿斯韦特兰娜。那时候, 斯韦特兰娜这个名字是罕见的, 它来自茹科夫斯基的一首诗——是一个跟奥菲利亚一样, 在森林中徘徊的沉思姑娘的形象。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和她的音乐家丈夫, 一个俄裔德国人, 革命后便侨居国外, 经过多年漂泊, 定居在芝加哥。在这里, 这位30 岁的年轻妇女遇上了已年届六旬、蜚声世界的赖特(那时他刚刚同他的第三个妻子离异) , 并开始热恋。10 岁的小女儿斯韦特兰娜因此成了赖特的女儿。不久, 她的妹妹约万娜·赖特降临人世, 他们便都成了“ 塔里辛公司”的核心。那是一个建筑艺术公社, 年轻的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采用了法国古尔吉耶夫神学校的思想作为该社的指导思想——她曾在

那所学校学习多年。

斯韦特兰娜·赖特后来嫁给了公司里的一位建筑师(即彼得斯·魏斯),生了两个孩子。怀第三个孩子时,不幸在威斯康星州离斯普林-格林市不远的一次奇怪车祸中丧生,只有一个5岁的男孩幸免于难。从那时起,斯韦特兰娜的母亲再也无法得到安宁。用她的话说,由于名字的巧合,她不能不第一次给我写信。我也觉得,我们的名字和过去生活的地方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巧合。而且还有一个事实:赖特夫人和我的母亲年龄相同,也在我母亲一直喜欢的那些的地方长大。简而言之,我们俩都认定我们应当见面,都在暗暗希望同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黑山共和国是一个东欧小国,同我的格鲁吉亚一样,在美国鲜为人知。出生于此地的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经历了艰难的生活,为生存而顽强斗争,现在凭着赖特的荣誉和名声的余辉,体验到了几丝生活的温暖。现在,她是赖特基金会董事长、建筑学校校长和公司的老板——一个庞大事业的领导人。她成了美国著名的贵族。除此而外,关于她个人的情况我很少知道什么。我想见见她,更多倒是出于好奇心。

来菲尼克斯机场接我的应该是约万娜·赖特。如果从书信来判断,她应当具有演员气质,是个诚挚热情的人。她也写信告诉我说,即将迎接一位同她已过世的姐姐同名的妇女,她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显然,名字的巧合在此对大家都是一件颇具神秘意味的事情。不过我连约万娜的长相都不知道,于是便四处环视,努力在心里作着想象。

一位穿鲜艳明丽短连衣裙(当时很时髦)、蓄浓密蓬松长卷发、眼圈浓浓描画过、年纪同我相仿的女人吸引住了我的目

光。她突然也发现了我，大声喊着“斯韦特兰娜！”急匆匆向我奔来，同我热情拥抱。在人们面前我还不习惯这种过分热情的举动，感到很是拘泥，但又不能不去报以相应的热情。

她猛踩着她那红色赛车的油门，望望环绕山谷的淡紫色群山，又一次简短地向我讲起她姐姐去世的经过。“我多希望您就是我的姐姐啊！”她不停地说下去，我又感到难为情了，不知该怎么回答她。

约万娜是一位开朗、漂亮、极为自信的女人，讲起话来声音朗朗。“同这儿的自然环境完全谐调”我想道，一边欣赏着春天里这荒漠地区明丽的色彩。“啊，我们经过这一带时总是把车开得很快！”她笑道，发现我的右脚下意识地“踏着”想象中的刹车踏板……这是所有坐着当乘客而未驾车的司机都会有的自然反射。我们疾驰在沙漠中的公路上，我终于禁不住开心地笑起来，觉得同这位新“妹妹”相处在一起是挺轻快的。

在斯科茨代尔周围的灌溉地里，迤逦着一片橙树林，橙花的香气弥漫在3月中旬的空气中。离开寒冷的，还是隆冬季节的新泽西州，来到这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地方，令我想起不久前从寒冬的莫斯科飞往印度的情景——那种对比是如此明显。我陶醉在荒漠里芬芳的气息、盛开的鲜花和温馨的空气中，感到四周所有的美景都有一种迷人的魔力。我甚至发现了鲜红的叶子花。这是一种蔓生植物，爬满了这里的篱笆和房舍。这种植物在印度是很普遍的。

最后，经过一道缠满鲜花的走廊，我被带到赖特夫人那里。一开始我便明白，见到的这位妇女在外貌上或许与我亲爱的母亲相象的期望，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幻想。这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蜡黄的脸犹如一张羊皮纸，皱皱巴巴的，

一对机灵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她穿着朴素雅致的连衣裙，黑黝黝的头发上（是不是染过？）带一顶碧绿色大帽子。一只黑色丹麦犬蹲在她脚旁。我母亲那种富于幻想的、温柔的美，那羞涩腼腆的神情、那温顺的目光，在这里一丝儿也没有。我眼前是著名建筑师威严的遗孀，是他事业的负责人和继承人。她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中，露出猫一样的目光，倒很令人想起我父亲那转得更快的眼神。

她向我微微笑着，反复念叨着我的名字，然后伸出双手，把我搂在她的怀里。

我被带到一个专门接待客人的小宅子里，宅里的一切都富有情趣、华贵无比——如果同清教徒式的东海岸相比的话。还有一位衣着讲究的妇女带我去看了小巧精致的厨房，并告诉我说："您随时都可以在这儿喝到咖啡。您歇歇吧，安顿一下，也许您想稍微散散步。我们这儿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现在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赖特夫人午饭前在她家专候，鸡尾酒会设在大客厅里。"于是，把我一个人连同我的最初印象留了下来。同普林斯顿、纽约或费城附近相似的东西，我一样也没发现。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稍后，约万娜过来问我，是否照她信上说的，随身带来了晚礼服。没有——在普林斯顿我熟悉的商店里，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合适的衣服。"但是，我们礼拜六总要举行正式聚会！"约万娜再次说道，"我把我的衣服给您拿来吧，我们的身材似乎相同。"她突然这么说道，很快就走了，简直不容我回答。在美国，我习惯了没有人注意我的衣着，穿上一件"小小的黑色衣裙"到卡内基音乐厅或应邀出席午宴，我都觉得挺合适。从来没有人给我提出建议，女主人们也总是一再说："有什么就

穿什么吧！”这个地方却特别注重服装。这无所谓，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我卧室里出现了几件色彩鲜艳的薄绢制品和丝绸制品，都是非常昂贵的衣服，为“特殊场合”使用而缝制的。我穿上自己的浅绿色短连衣裙和黑皮鞋去赴今天的宴会。在我身后派来一个“护送队”，陪我到大客厅去。

夫人们都穿着晚装，男人们穿着晚礼服。每个人都披金戴银，身上闪闪发光，犹如一株株圣诞树，全都已经等候在暖烘烘的壁炉旁边。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人走进来，女主人向我介绍道：“斯韦特兰娜，这是魏斯！魏斯，这是斯韦特兰娜。”

我应该记得，那一位斯韦特兰娜的鳏夫还在这里，是一名建筑师，是赖特最老的门生之一。但在给我写信和邀请我的所有人中，却并没有他，我也忘记了他的存在。我瞥了一眼他那沙土色的晚礼服，紫罗兰色带皱边的衬衣，沉甸甸的金项链。项链上有一个宝石坠子，那是一只镶着蓝宝石眼睛的金猫头鹰。我心中暗暗嘀咕：“啊，天哪！”不过，他的脸色却是严峻的，充满了自尊，并且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面颊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神态冷静，甚至显得忧郁，看上去比其他所有人更漂亮，叫人感到真有点像光彩照人的极乐鸟。他静静地坐着，自自然然，手里端着一只杯子。我很喜欢他这种矜持的模样。只是有一次，我发现他那深黑眼睛射出的专注目光仔细地打量着我，不过很快又移开了，仍然默默地坐着。他显得孤独而又忧郁。

然后，我们到另一间屋子去进餐。这里的墙壁和天花板全用粗笨的石头砌成，与鲜红的大餐桌形成强烈对比。餐具是黄金的（或者看上去如此），奇巧的高脚水晶杯的棱线熠熠

生光。餐桌中间的鲜花摆设出雅致的趣味。石墙上装饰着古老的中国刺绣。

我们一一入座。我想，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地心里某处神奇古怪的洞穴。女主人亲自给大家安排座位；魏斯与我并列，坐在右首。我们一共大约是8 个人，是（我后来得知的）塔里辛公司范围极小的一个首脑圈子，而且这次招待会是将我作为贵宾专门举行的。一切都搞得很有意思，只是我感到坐立不安。

宴会是墨西哥式的，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酒盛在水晶高脚杯里，进餐时有穿鲜艳墨西哥皱边衬衣的年轻人服务，有的就侍立在椅子后边。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们竟是一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他们来说，在公共厨房干活和在赖特夫人进餐时为其服务是一种义务，甚至是一种荣耀。我当时绞尽脑汁，试图猜出这些一脸书生气的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说也不像雇来的佣人。当我向盘子里盛墨西哥辣汁时，突然听见一直不吭声的邻座说：“这种辣汁可辣啦！”我回答说，我不怕，因为我知道高加索菜，也有这么辣。他的声音低沉而轻微，他再也没说什么。

席间，女主人一边谈话，一边用眼角飞快地观察每一个人。她对一切事情都提出一个话题，并且定下调子，偶尔也开几句玩笑。她的每一句话在场的人都静静地洗耳恭听。（“完全像我父亲进餐时的情形”，我心里这么想，“我真是太愚蠢了，还以为这里有什么东西会使我想起妈妈！没关系，我已经拿到去旧金山的机票了”。）

“我非常高兴，魏斯和斯韦特兰娜终于见面了！”女主人说，意味深长地把我们的名字说得重重的。大家都望着我俩，

这么说，邀请我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这么说，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这次会见？对于这位聪明夫人的计谋，我本来应该更有先见之明。然而，我却无忧无虑，满不在乎。我渐渐沉入了这种豪华而具雅趣的陌生气氛之中。还余下几天时间，我决定干脆略微享受一下这一切。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威胁，"护送队"又把我送抵家门后，我在我的宅子里沉沉地睡了一觉。

魏斯一大早就来对我说，赖特夫人叫他带我去看看塔里辛公司的范围，然后再参观一下斯科茨代尔市。我们绕着整个校园转了一圈。这是赖特设计在沙漠中的一座校园，用当地石材筑成，宛如一片美妙的绿洲。这里有一群低矮沉重的平顶房屋，到处是一道道水平线条，有笨重的砖石砌体，有厚厚的墙壁，有小小的窗户，还有一大丛绿荫。对于地球，对于地球上的缤纷色彩，对于普埃勃洛人和纳瓦霍人的传统，即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美学，赖特奉若神明。他把印第安人的砖坯房与东海岸清教徒的白色小屋加以对比，想宏扬这种砖坯房。

"白房子在绿树丛中显得不自然，好像撒在草地上的白纸片。"赖特对他的学生说。他这些话在这里被人们不断反复强调。确实，此地的一切都同四周的荒漠有机地融为一体，对那些酷爱荒漠、酷爱大地和土壤天然色调的人，这大概算是完美无缺的了。而我的赞同则更多是出于礼貌。科德角风格的白房子，如同加利福尼亚的瓦顶白房所表现出的具有古罗马文化的地中海海岸地区的传统，我都非常喜欢。我不喜欢这些低矮的平房，墙壁太厚，内部也没有明亮的光线。"就像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坟墓"，我想。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给人以压抑感，包括那条巨大的中国式铁龙。每到夜晚，龙嘴里便吐出燃

烧的气体，火焰熊熊。

我的向导彬彬有礼，凡是涉及建筑学方面的事，他无不知晓。建筑物四周栽种的植物尤其美丽，在这里显得特别自然；你简直不能不连声赞叹。这个人的旧式礼节所表现出的诱惑力，也不能不令人折服——对于这样的人品，我一直是很喜欢的。在去斯科茨代尔的路上，我坐在豪华的卡迪拉克车上他的身边（这车同周围的一切，属于我尚不知道的赖特基金会）。汽车像一支利箭，在笔直的柏油路上轻快地行驶，这条公路穿过一段平坦多石的谷地。我突然觉得，坐在这个人身边有一种信赖感和平静感。他沉默不语，神情安详地坐着，一只手微微触及方向盘。我悄悄观察他，几乎找不出任何令我不喜欢的地方。他举止优美，品位高雅。这是一次默无一语的漫长旅行，差不多有20分钟或半小时，而这次旅行却是意味深长的。

在斯科茨代尔，他让我看了几家银首饰店，看了西海岸印第安人的手工制品，看了形形色色的串珠、手镯以及缀绿松石的戒指。我只想要一只小戒指，以作为在此次旅行的纪念。他便为我挑选了一只上好的绿松石戒指。我把戒指带到手上时，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的心刺了一下，一个奇怪的问题涌上心头："我要嫁给这个人吗？"这个念头使我心中害怕。那时候，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我刚刚获得的独立和自由更重要、更宝贵。最叫人害怕的是我竟没有内心的反抗力，没有一个坚决果断的"不"字。这是一个危险。我开始焦急地等待着离开。

可是周末之夜又到来了，又是正式的招待会。富有的客人们从斯科茨代尔纷至沓来。建筑师和他们的妻子搞起了室内乐和舞会，又是"极乐鸟"们光彩照人，珠宝首饰熠熠生辉，

鲜花和服饰艳丽夺目。是刻意做作吗? 是的, 当然。不过这地方有一批艺术家, 他们在形式、色调和风格的选择上都颇为随心所欲。约万娜坚持要我穿上她的浅蓝色薄纱芭蕾式连衣裙, 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古典式样, 肩上缀有名贵珠宝花饰。

我平生从未穿戴过这类衣饰, 我喜欢这种新异的装扮, 感到很开心。这是某种节日假面舞会, 不过气氛很愉快。魏斯来了, 手指上戴一只很大的戒指, 戒指上的图案是他自己设计好再交给当地首饰匠制作的。他身材高挑, 举止从容, 穿戴上这样的晚礼服和饰品, 不知怎的, 看上去比其他人更显得漂亮高雅。

盛宴和聚会五光十色、庄重典雅, 与近于僧房的小小房间极不协调, 而建筑师们就住在这些小房间里。奇矮的天花板使房里到处感到压抑, 显得阴暗。那时候, 魏斯是公司的总建筑师, 就住在一套作设计室的小房里, 包括一个房间和一个长长的大凉台。落日的余辉可以把这里照得亮亮堂堂。这里没有厨房, 没有浴室, 只有一个小小的淋浴间, 一个挂衣服的壁柜。书架也是壁柜式的, 装满了珍贵的艺术书籍。

很低矮的天花板上, 装饰性横梁使魏斯无法伸直腰板。在这种地方居住多年后, 他的背变得有点驼了。赖特身材很矮小, 他没有考虑过别人是否方便: 他喜欢这种低矮的天花板, 他到处建筑这种式样的房子, 包括给他的顾主。

魏斯一直在赖特这里作建筑工程师, 只在大师去世后, 自己才成为建筑设计师。他作为赖特最老最喜爱的学生, 被选为塔里辛公司的总建筑师。但我很快便明白, 他在这儿没有任何威信。除了那位"太后"之外, 这里任何人都不起一点作用。"太后"独自作出一切决定, 乃至纯粹涉及建筑细节的决

定。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已经看得够多了，该走了。我害怕迷上这个身材高高、寡言少语的人。我果断地向女主人说，尽管作她的客人是我极感愉快的事情，但现在我应当按原定计划继续我的旅行。

“您干么这样急呀？”她问道，用敏锐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哪怕过了复活节走也好哇！我们过节要作传统的甜面包圈和甜奶渣糕呢！您可以同大家一起染彩蛋，我们总是把彩蛋分送给客人。大家还要在荒漠里去野餐。这可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辰。”

我仍然坚持要走，然而她也是个厉害人，而且她坚持挽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她希望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

“您喜欢魏斯这个人吗？”她出乎意料地问道。我感到突然，避开她的目光，说道，是的，当然是，我很喜欢他。可此刻她的目光却在竭力穿透我的心，要寻求我的真实想法。我父亲也习惯这样提些出人意料的问题，叫人害怕。面对他这逼视的目光，人们只能通身麻木地从屋里退出去。在这个地方，他们的作为竟然也同样如此。所有人都这样——只有魏斯除外。魏斯曾经是她的女婿，得到过她的保护。在他们之间，有一种由于共同失去亲人而产生的联系，也有一种因那位年轻女人死于非命而造成的悲痛，于是，魏斯对她便犹如对待母亲一般，她对魏斯也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

我感到，要违抗她是无能为力的，此外，说实话，我内心里也有一种什么东西希望我留下来。“好吧，过了复活节走也行！”我明白，我遭到了彻底失败，而且看来已失去了对处境的控制能力，便终于答应道。

我同建筑师和他们的妻子坐在一起, 给一个个硕大的复活节鹅蛋涂颜色。在这里, 这件事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 人们发明和想像, 创造出一个个杰作, 然后把这些杰作赠送给上司和贵客。客人中从来见不到"贫穷的艺术家", 有的只是富豪。然而, 这些建筑师究竟什么时候搞他们的设计呢? 我惊异地这样想道。无休无止的庆祝会、午宴、晚宴、在荒漠里搞野餐, 仿佛已经占去了他们所有的时间。魏斯带着我四处转悠也是在上班时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次我们两人上餐馆, 那天晚上我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这一次他开口说话了。他想把所有情况一下子全告诉我——谈他同一位16 岁姑娘的结婚, 谈他们的孩子, 谈他们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他讲起那次可怕的车祸: 妻子不幸身亡, 那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那个两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于难。他至今还感到悲痛和惊骇, 仿佛那不是发生在25 年前的事情。我们互相谈了各自的生活, 就像一对老朋友似的。餐馆就要关门了, 我们已是最后两个顾客。这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种顺从感, 完全被某种无法逃避的东西征服。这也是我的女主人和周围所有人秘而不宣的愿望。婚姻, 最平常的婚姻、家庭、孩子, 这是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希望然而又一直不曾得到的一切。现在我已经44 岁, 对这件事连想也不敢想, 更别说再来一次尝试。可是, 在这个人身上, 却有某种伤感而正派的东西, 以至我对他的怜悯心已压倒了所有其他理智的思考。伴随着这怜悯心, 我产生一种情绪, 愿意为他而付出一切代价——这正是爱情。他不愿建立什么松散的关系, 他希望结婚,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我更有

了吸引力。

一周之后，我们结了婚——我到这个地方来总共仅止3个星期；而且我们都没有掩饰我们的幸福之情。许多客人出席了婚礼，他们都是赖特夫人和魏斯的朋友。在我这方面，我只邀请了艾伦·施瓦茨，他是"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律师事务所一位年轻的伙伴（他比所有其他人更好，与我维持着长期的友谊，我对他和他妻子也一直坦诚相待）。开始时他大吃一惊，过后也同大家一道兴高采烈。

"这是我女儿斯韦特兰娜！"赖特夫人向她的每位客人都如此介绍我。我感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指为一体，这有点做作。再说，那位已经去世的与我同名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又是那么年轻。我担心不能重现她的形象，而这却是此刻所有人都希望从我身上看到的。不过，现在来思考也好，怀疑也好，都为时已晚。我干脆力求作得自然，同大家一起高兴，遵照这个人的意愿。

我们收到许多鲜花、贺信、祝词和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礼品。在我们的相遇中，有着某种神话故事的意味。那些日子令人永志难忘，尽管后来产生了一些别的感情，发生了一些别的事件。但无论后来出现了什么情况，我都无法把1970年春天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只想知道，魏斯也有与我相同的感受么？但这一点我无法了解。他仍旧一个劲地沉默寡言，同过去一模一样，也从不讲起他对我的感情。我对这一点甚至感到很喜欢。

他看来显得很幸福，至少在婚后头几个月是如此。只是有一次，在我们的奥莉加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在威斯康星州他一个朋友家中温馨友爱地聚在一起时，他说："你让我死

而复生了，这些年我简直已经死了。”

我大吃一惊。这比我过去听到那些话分量要大得多，超过了我能有的希望。

*　　　　*　　　　*

不过，几乎从一开始，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有着如此强烈的爱恋，我如此希望最终能拥有安宁和一个家，以至于闭目塞听，使自己对任何叫人生疑的东西都不看不听。我仿佛觉得，在这场闪电般的婚姻中，一切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能构成危险……在那些日子，我简直无法设想我这个家注定会失败。我曾渴望幸福，渴望有自己的家——而现在，这一切我都得到了！

婚后两三天，赖特夫人把我叫到她房间里。她看上去显得愁闷而忧虑。我不知所措。

“魏斯老有个弱点，弄得他很苦恼，”她开始讲道，“他花起钱来随心所欲，完全不考虑一切，我们大家对此毫无办法。他总带着许多信用卡为大家买礼物。大家都喜欢他，他也很讨大家的喜欢。他常常赠送大家昂贵的珠宝、艺术品、贵重的衣物，而且看来无法停止作这种事情。现在他已欠下巨额债务，若不偿还，就得被迫宣告破产。他就快卖掉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场了，那个农场对他具有非常珍贵的纪念意义：他母亲曾经住在那里，他的孩子和我的斯韦特兰娜也曾多年住在那里。我们无法帮他摆脱债务，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反复过好多次了。你应当监督他，别让他-重蹈覆辙。我的斯韦特兰娜以前也总是为这事操心。”

一个干这么多活又有如此地位的人，处境竟然如此不幸，真叫我感到吃惊。他看上去永远像个有钱人，而赖特基金会作为拥有大量资金的组织也名声在外。然而赖特夫人的态度却是坚决的，她继续说道："赖特基金会有自身的债务，我们给自己的工作人员付的工资并不多，然而他们的膳食、住房、车辆、汽油、医疗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这一切费用都由基金会支付，这里任何人都没有私人财产——不需要私人财产。但魏斯却是用信用卡支付。他是个十分慷慨的人！"她挺温存地添上一句，"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一大笔钱，魏斯便在威斯康星州的塔里辛附近为我们买下了许多土地。您夏天就会看到那些地方，那可是非凡美丽的地方！魏斯为我们作了这些事，而我们只要可能也总是帮助他。但我们无法没完没了地帮下去啊！他一点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

于是，我为他付了欠债，因为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这算是我送他的一份结婚礼物。我这样做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要他再也别去作无谓的花费了。我同时还赎回了他的农场，因为现在这已经是我们共同的一份小小的家庭财产。那农场并不是什么别致的建筑物，而仅仅是处于森林和田地之间一个普通而又陈旧的农舍。在那些日子里，人间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我帮助我的丈夫和他前妻留下的儿子，一个30岁的年轻人。我开始走上家庭生活的轨道，并希望医治好这个家庭过去留下的创伤。

在我们婚后不久，我即请求我在纽约的律师将我的私人基金转到亚利桑那州来，因为所有的钱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是设在在纽约的。我的要求使律师们又气愤又害怕。可爱情的力量令人破釜沉舟——我决心拯救

我的丈夫。律师们只得同意了, 全部存款从纽约的贝奇银行汇到了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的威利银行。我们马上去开了一个合并账户。

就在那年夏天, 当我们迁到威斯康星州赖特基金会的夏季住所时, 我见到了我丈夫前妻的儿子。他是一个职业大提琴手, 毕业于朱利亚学校。然而他却希望当一名农场主。我见到他时, 他已经开始经营农场了。我同意为务农拨出资金, 用以发展肉畜养殖, 在这项事业上大家作为同伙, 而资金只由我来出。我们大家都为这个新计划感到高兴, 当年夏天就在自己小小的农场里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对于农业一无所知, 所以我认为, 一名管理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 魏斯在当地的一位老朋友罗伯特·格鲁弗斯便自告奋勇, 要来担任此职。但我家这两个男人——一名建筑师和一名音乐家——却断然拒绝, 并要我相信, 他们自己全能料理好。

我作这一切都是出于爱情, 希望在农场打下坚实的家庭基础, 却没有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复杂性。在塔里辛公社的环境里整整一年的生活, 对我来说真是又艰难又奇异。

在亚利桑那州,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房间, 一个很大的凉台, 但却没有厨房。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早晨, 是从在公司食堂吃早饭开始的。在自己房间里喝咖啡是违反规定的, 魏斯结婚后也坚决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同我在接待宾客的小宅子里独居相比, 差异何其大啊! 在那里, 我作为贵客可以一个人呆着, 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可以自己做饭吃。可是现在作为总建筑师的妻子, 我却必须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不过, 约万娜和赖特夫人本人却有自己同其他住房分开的单独住处, 各种设施应有尽有。赖特夫人有自己的卧室、厨房、洗衣房、

单独的内院和游泳池。这一对母女, 总能够躲开无数来访者的目光而清静独处。那些来访者总是拿着照相机满地跑, 搜寻每一个角落。

我家那长长的凉台, 像一节绿色车厢, 覆盖着红色和黄色的叶子花, 而一种结有鲜红野果的植物, 则装点着用粗重石头砌成的灰墙。建筑园艺师弗朗西斯和史蒂文没日没夜地干, 使荒漠里这块绿洲上的青翠覆盖物始终美丽非凡。这件事, 公司里每个人都得帮着干; 他们浇水锄草、打扫长长的林荫道和凉台。我也加入到这当中去, 我们的凉台位于侧边, 可手持相机的旅游者总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房门边。下午5 点钟人们离去之前, 要想一个人得到安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 我们便可以欣赏令人叹为观止的晚霞, 这是荒漠不同寻常的美景。

在我屋子里, 有一张小小的书桌, 几个书架, 一张大沙发床。墙是用粗石料砌成的(跟外墙一样) 。有一次, 一只灰白色的蝎子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直端端落在我的枕头上。这种蝎子像响尾蛇一样, 到处都是。那些响尾蛇喜欢爬到我们凉台的楼梯上来晒太阳。

在与我们毗邻的另一个大凉台上, 每天上午10 点和下午4 点向所有愿意前往的人供茶。那是短暂的工休时间, 目的是让建筑师们能够从他们的绘图板上解脱一下。我很快发现, 必须参与这些喝茶消遣的活动对我是很痛苦的事情: 难道我们每天同大家一起吃早饭、午饭、晚饭还不够吗? 干嘛还来喝这个茶? 可魏斯在塔里辛近40 年的生活中, 对这样的制度已经习以为常, 无法改变。比起他新婚妻子的交际来, 他无条件地更喜欢他的同事。我们偶尔也一起进进斯科茨代尔的餐

馆,通常是进波利尼西亚人开的"特里德-维克斯"饭店。这是我俩呆在一起的唯一机会。

魏斯的办公室和我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他那边的电话铃声和打字机声我听得一清二楚。正如一位献身于公司的人告诉我的: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工作和私生活是互相融合的"。同其他人打成一片,看见一些人突如其来地闯入我们的房间,在这里都理所当然。我必须集中思想回复来信,可经常不断的来访者却叫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魏斯却坚持要我"更多地同人们接触"。于是,我便去帮厨,在公共大食堂里拿饭上菜,到院子里为花草树木浇水。人们还希望我去上那道"工间休息茶",但我拒绝了这个建议。在厨房和食堂的操劳已经足够了。我认为我所有时间都在"同大家打成一片"。

魏斯现在明显地有了变化。他看上去再也没有我初次见到他时那样忧郁而孤独。他对于我们被邀出席的野餐会、鸡尾酒会和午宴都饶有兴味。晚上,他就跟别的人一样,在大绘图室直呆到深夜:那时候他们必须弥补上耽搁了的时间。"星期天是最好的工作日!"正如这儿的人们所说,"没有人来干扰"。这里谁也不休息星期日,谁也不会像美国人通常喜欢的那样,携家外出度周末。半夜里或其他任何时候,我房间里四处都响着业务电话的铃声,特别是长途电话和国际电话。甚至在城里的餐馆吃饭时,魏斯也被叫去接电话,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下来,对着变凉的饭菜。工作和跟同事们在一起,乃是他生活的实质,他差不多全神贯注于此。(我知道苏联有那么一批工作狂,没料到在美国也遇到了这种人。)

魏斯坚持要我将我在普林斯顿那座可爱的房子卖成现金,"因为需要用钱"。房子和全部家当本可以出租给到普林

斯顿来的教授们作极好的住所——那应当是一个很正确的作法。但魏斯更需要的是现金,于是我就到普林斯顿去把房子卖掉。

我那座位于威尔逊街的可爱的房子,原是我的藏身之所。我们的婚事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后——那是赖特夫人一手操纵的(她是"公关"行家)——就有一大帮人要买我那幢房子。因此,那房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卖出去了……

普林斯顿的朋友都对我结婚表示祝贺,但也有一些人对公司里的生活方式感到担忧。要是他们在我去该地之前便将他们的疑虑告诉我,那就更好了!可我那时候还在云里雾里,沉迷于幸福之中,压根儿就不把那些怀疑往心里搁,干脆就把诸如此类的议论抛在一边。我卖掉了房子,回到亚利桑那州,希望在为魏斯做完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或许就会帮我一把的:我在处理出版商、律师、税务、慈善基金会方面的问题时,需要得到他的帮助。魏斯毕竟是一个商人、一个实业家,这一切他比我懂得多得多。

他在机场接我,面色难看极了,我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赖特夫人也冷若冰霜,再也不是当初的她了。她现在是"没有时间"来接见我。在我离开此地时,发生了某种事情。看来,他们在当初对我作了最殷勤的接待之后,现在都有了别的什么想法。

我们结婚两三个月后,当我们向魏斯的债主付清所有老账(共计46万美元。)时,我在纽约的律师收到了代表赖特基金会的律师递交的一封正式函件,信是寄给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的。请求补助的类似信件我们曾经收到不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赖特基金会要求每年得到3万美元的补

助，这个请求把我们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阿利卢耶娃基金会的代理人回答说，这个基金会能力有限，而且已经承担了资助印度一家医院的责任，不过可以给予赖特基金会大约一两千美元。

当我看到这封信函的复印件时，吃了一惊。他们竟然要求这么多钱，而且要求得这么急……过后我记起来，有一次赖特夫人以她那办业务的方式对我说：“……您可以每年给赖特基金会以补助，并能作为我们这里的一名慈善家，永远享受这里的愉快生活。显然，我没有照着人们的暗示去作，首先关心整个公司的命运，而一直在为将我丈夫从经济破产的泥淖中解救出来而奔忙。

我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真个地从幸福的云里雾里跌落到地上。我当然将我的全部想法向丈夫尽情倾诉。魏斯仔细听完之后，深深叹息一声，只讲了几句话。这些话的含义我只是后来才全部明白过来的：“我亲爱的，赖特夫人很爱你。尽力同她维持友好关系吧。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面临一场悲剧。”

我只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因为我对于这个公司的习俗一无所知。不过他已有多年经验，是知道的。在这之后发生并导致我们婚姻最终解体的一切，证实了他曾经讲过的话。当我亲自了解了塔里辛公司生活的所有特点之后，我就完全意识到这里决不是适合我的地方。不过在那时候，即1970 年夏天，我的新家依然使我感到愉快。我热爱丈夫、珍惜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时辰，无法认真接受那些警告。

*　　*　　*

我们的婚姻曾在报刊上作过极为广泛的报导，似乎我们都是王族家庭的成员。赖特基金会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使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增加“塔里辛联合建筑师公司”的顾主。然而，定货数却锐减了。那时候，公司的业务多半在伊朗，那儿有顾主——伊朗国王的姐姐——能付好价钱。等报刊上吵吵嚷嚷的报导平息下来之后，我相信当了25 年鳏夫的人有权去度一个短暂的“蜜月”了。当时，一位彬彬有礼、性情随和的华人建筑师，负了外交使命被派到我这里来，对我这个“不了解情况”的傻里傻气的新娘子说，“公司的设计任务太紧”。我只好认命，向这短短的共度休假说一声“再见”。不过我仍然认为，魏斯年复一年地工作，从没有过假期和休息日，他是应该得到这样一次休息机会的。

我们只能借口看望魏斯的姐姐，到旧金山去呆上几天。他姐姐将我们安排在索塞利托一家汽车旅馆里，旅馆就座落在秀丽的旧金山湾海岸上……这真是美妙极了。我们在海湾岸边徜徉，光顾当地的小店铺，不然就干脆留在我们可爱的小房间里看书看报，倾听最近的一座灯塔上发出的“雾信号”笛声。不过，这儿的笛声与我们在蒙希冈岛上听到的大不一样……或许，这可能仅仅是我的感觉。

深夜里，长途业务电话也一直打到这个地方来找魏斯。有一次我拿起听筒，告诉对方，“他睡了。明早9 点再打来！”对方深为吃惊，沉沉地叹息了一声。第二天早上，魏斯为此生了气，要我“别过问他的工作”。他承认，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

方式，并求我说“请不要试图改变这一点。”他竭尽全力向大家表现他对事业和公司的忠诚，对他来说，就是结婚，也没有丝毫改变。

一有空闲时间，他全用来逛商店。在旧金山我们没去参观过一处有意思的历史文物、博物馆、美术馆，未曾拜访过一个老传教士团……我们只是从一家商店跑到另一家商店，总是大量地买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如此喜欢逛商店，就像妇女们一样乐此不疲。魏斯常常为我选购衣服，他认为，我在衣着上那种清教徒般的情趣已经应当抛在一边了。我则仍然试图保持自己“不出众的传统”。现在，我们在银行有一笔共同的存款，我们花钱也带有某种盲目性。我们买衣服、珠宝、鞋子，不仅为自己买，也为别人买……我觉得我们眼看又会背上刚刚还清的债务。不过，魏斯的习惯是很难克服的。他热爱生活，多年来一直遵循他固有的生活规范。

他对漂亮商品——刺绣、石雕、特殊首饰、非同凡响的晚服（他妻子应当穿这些晚服），带有某种童稚般的渴求，犹如一个小孩突然来到了他思慕已久的玩具店。但是，他知道公司的所有人都受到缺钱的困扰，便给“女孩们”买连衣裙、为“小子们”买手表，无一遗漏。也许，因为他现在拥有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于是对那些人便隐隐地觉得对不住。我并不去阻止他的慷慨大度，尽管这种对女装和各种小玩意的迷恋仍然使我深感奇怪——我是在一群过分“勇武的男人”当中长大的。但对我来说，这是艺术家的崭新世界，他们需要在整个环境中有美与和谐。这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生活方式，而我总喜欢了解新事物。

魏斯的姐姐与他相反，是一位极为冷静明智的妇女，对我

非常亲切。她同她丈夫早川(当时还任圣弗朗西斯科大学校长)一起曾来参加过我们的婚礼。现在,她尽量设法使我俩——特别是她弟弟——能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她爱她的弟弟,但看见弟弟对钱抱有一种奇怪的态度,即她所称的"内心的逼迫"时,她说:"这是他从少年时代起身上最该死的品性。我们大家为他伤透脑筋,永远都在为他还债。"她希望我能理解,不必太生气。她跟赖特夫人一样,并不怎么责备他。我明白,这责任全在她们身上,但还不至于成为我们家庭的全部危机;我相信这个恶习是可以改变的。我不能去管束他这毛病。

实际上,魏斯为我选购衣物倒令我极感高兴。还从来没有任何人为我这么做过!结果我依从了他的情趣,开始穿上用锦缎、丝绸、闪闪发光的刺绣和饰物做成的晚服。这一切对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要不是在塔里辛公司看见我周围的妇女也穿得如此华丽,我简直会以为这是发了神经病。"你应当打扮得光彩照人!"我丈夫一再开导我说,而我只好暗暗发笑,心里猜想,要是在普林斯顿,人们对此会怎样看哪……

塔里辛公司的宴会和鸡尾酒会总是一出演得十分绝妙的戏。导演便是赖特夫人本人。这些"戏"应当对富有的客人,对资助塔里辛公司或能支付数百万美元以购买这里设计的精美绝伦的宅邸的人,产生强烈印象。我生长的那个世界,一切由国家掌管,而不是由个体经营。而在这里,我从实践中学会了怎样出卖设计方案和构想,怎样把生意作得使潜在的顾主看起来颇具诱惑力。作为总建筑师的妻子,我有责任在他身边显示出一个"光彩照人"的外表,接待客人,跟他们闲聊,笑容可掬——这全不是为娱乐开心,而是为我丈夫的公司招引

顾主。我内心里对这种种做作产生了某种反感,我们人人都在富人面前极尽献媚讨好之能事。我倒更愿意各种事务都认认真真地在办公室里来决定。然而,我的抗议却软弱无力。我希望成为我丈夫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完全属于他的生活。

然而,赖特夫人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不会不发现我在那些聚会场合中颇不自在的举动,她感到不满。还有一件使他们大家失望的事:我不善于"应酬"。虽然客人们聚会时都是出于好奇而注视我,但我却不能胜任这样一个角色,而美国鸡尾酒会上那种活泼快乐、漫无目的的闲聊却要求这样一个角色。此外,我竭力躲避那些"显要"客人,尽量同我熟悉的建筑师及他们的妻子、学生呆在一起。我的位置在魏斯身边,而他却总是只同"需要的人"在一起。

我们在旧金山和索色利托的旅行是愉快的,然而却十分短暂。当我们回家时,塔里辛公司正筹备一年一度的大事:庆贺6月12日弗朗克·洛·赖特的生日。这是在游泳池边举行的有两百人参加的豪华宴会,由赖特的遗孀主持。她用扩音器宣布说:"赖特先生同我们在一起,他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简直就像在招魂。下面是一片沉默。然后她瞥我一眼,说道:"对于我们的公司及其工作,谁愿意发表点意见?"我一动不动地呆然坐着。"嗯?"她继续说道,将所有在场的人扫了一眼,"谁能鼓起勇气发言?"我一声没吭,尽管我知道,大家都期待我讲几句赞扬和感激之辞,然而我无法依从别人的意志,在一个演戏的场合去作这件事。另一名妇女起身冲着赖特先生、他的遗孀和整个公司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这才挽救了局面。

这位太太是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一位世界著名钢铁大王的遗孀，她每个周末都给赖特夫人送来兰花。此刻，她激动地讲述着她心中的赞叹之情。宴会得救了，总建筑师夫人也得救了。

……人们仍旧不断地邀请我们去作各种公开演讲。菲尼克斯地方电视台一名前来采访我们的记者——他一再说读完了我的"全部"著作——在采访完毕后问我："请问，您仍然是共产党人吗？""您可是读过我的书的！"我很惊讶地说，"如果您真的读过，您应该知道我的立场。"我已经知道，在东海岸写的东西常常传不到西海岸去，而在东部地区，关于我的反共立场人们是写得很坦率的。不过他应当明白，人们跑出来正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可这个看来是知识分子的人倒还在怀疑我"仍然"是共产党，这使我大为震惊。在东海岸地区，任何人也不曾怀疑这一点。

若干年后，一位经常邀请我的太太从亚利桑那州写信对我说，她的一位女友认为我是"共产党"，并对她说："她生来就是共产党，所以，永远也是共产党。"这是一种偏见，我在美国还没有遇到过的偏见。

我投向丈夫寻求安慰，可是，看来他对我的书也仅仅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而已，因为他"没有时间"。这就是说，他娶了一个女人，而他对那女人的生活实际上完全无知，就像周围其他人那样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不喜欢他买的一件衣服，那衣服饰有闪闪发光的鳞片和毛皮。"这简直是给某个公主穿的！"他竟深信不疑地回答说："当然！你正是俄国的公主嘛！"对这种蠢话，无论我怎么力图否定，他仍旧坚持他说对了，执拗于他那美国人的偏见。而且，他完全顾不上我，

顾不上我的痛心。他正潜心于完成两项重大设计——伊朗国王姐姐的宅邸。

关于塔里辛公司及其生活方式,每天都传来一些新的发现。这里给建筑师们的工资微乎其微,或者完全不支付……“赖特基金会正处于经费紧缺之中”,人们对我说。看来,这倒是一种常有的情况。基金会的统一收入供建筑师们作为“一切必要的开支”——这是来自他们工作的收入,只由基金会、而不由公司的每个人收取。

这里不存在个人收入。建筑师们没有星期、没有年休地一直干,说真的,连节假日也没有,因为在全国性的大节日里,他们得热情周到地招待客人,准备200 人的饭菜,把它们端上桌,刷洗杯盘碗碟,在一个小小的乐队里演奏,为大家唱歌跳舞……而且——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不能忘记了自己的绘图板! 我常常看见他们在绘图室里一直干到清晨。

魏斯在这里度过的40 年中从来没有休息过。[①] 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既然赖特本人工作起来从不休息,公司的所有成员便群起学习他的榜样。然而,这里有许多家庭和孩子,有许多年轻夫妇和小学生,他们总是在大家身边转来转去,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诸如图书馆、儿童乐园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并不鼓励生孩子。有一次,赖特夫人宣称,她“主张性和饮酒,因为这对于艺术活动有刺激作用”。但她不主张婚嫁成家,生儿育女。

赖特夫人在这里身居最高职位,因为她和她丈夫是这个

① 他现在55 岁,1932 年来到塔里辛公司时,他还是20 岁的大学生。

公司的创始人。接下来是监护人委员会,其中包括她的女儿约万娜及其他一些人。魏斯则是赖特夫人的副手,也是赖特基金会及公司的副董事长。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各种事务,而实质上是由这位遗孀一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她对其他人作出的决定加以否决。她身边有一个由崇拜者和仆从组成的小圈子围着她转,其中也包括她的一名私人医生。各种决定实际上是在这个小圈子内作出的。再次,才是那些"作牛马走"的,大约有50 名建筑师和他们的妻子(常常是些作艺术装饰工作的),他们是创收的人。在这儿学习的全体学生抱定一种思想:塔里辛——这是一所建筑学校,学生们为了获得在这里接受教育的荣誉而支付很大一笔钱。不过,我在任何地方都没看见有什么教室。"学习"的主要形式乃是绘图,而学生们的工作则是帮厨、料理花园、分发邮件、倒垃圾……他们住在荒漠地上的帐篷里,生活在毒蛇和蝎子中间,也不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建筑学方面的培养。可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是颇有才华的艺术家。许多人大失所望并离开了塔里辛公司,正如年轻夫妇弗里德里克和大家称之为萨沙的亚历山德拉所作的那样。

这对年轻夫妇不得不离开塔里辛公司,因为赖特夫人"不赞成"他们结婚,不准许他们结婚。他们一起到亚利桑那州某地工作去了。"人们结婚以后,就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了。"赖特夫人不无责备地说道。无疑,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也怀疑起魏斯来。她因为"自己的男人们"同他们的妻子要好而吃醋,因为这些男性工作人员只应当属于她——整个事业的女主人。

她喜欢人们崇拜她,奉承她,特别喜欢有人早上给她送去

鲜花。每到星期天，她让所有人聚在大客厅里，向大家布道，宣讲“上帝与人”，宣讲他们的劳动，宣讲赖特，当然，以及她那“绝妙的充满灵感的”艺术。塔里辛公司被称作“与世界相悖的真理”。这儿的生活便是世间的真理，赖特夫人一再这样强调。她自行宣布为精神领袖，是她自身那种宗教的献身者。她无法容忍人们星期天去上别的教堂，我们也应当视她为我们的母亲。

这最后一条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是太珍贵了。许多女人都想取代她的位置，然而，尽管她们的愿望是善良的，我对这种取代却从来不予理会。在这里，赖特夫人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我将她“当做母亲”对待。她在忏悔仪式上一再说，塔里辛公司的所有人，将他们生活中最秘而不宣的隐私也告诉她，找她评判。我拒绝这么做，于是她又一次感到失望。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这个人其实如此平庸。”从她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天大的缺点。而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尊严。

当然，在头几个月里，我还不知道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米利安诺娃是神秘主义者、精神领袖格奥尔吉·古尔吉耶夫的门徒，不知道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法国古尔吉耶夫的神学校度过的。古尔吉耶夫的学说，在罗曼·兰道所著《上帝——我的神奇故事》(1937年)一书中备受讥笑。在这本书中，古尔吉耶夫连同其他“现代神秘论者”，被描绘成伪预言家。有一次，兰道本人领教了古尔吉耶夫的催眠术，便对古尔吉耶夫的本事大加嘲笑——这个来自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同一些藏族老师有接触，或许是从那儿学了些西藏的宗教舞蹈。奥利吉万娜(这个名字是赖特先生改的)把那些宗教舞蹈列为塔里辛公司的

科学必修课，并由她本人亲自教授；后来又委托她女儿约万娜来教给别人。只有在这里，“神秘”才用赖特在他建筑学上的术语叫做“天然”，赖特曾把他对“大自然中有生命的屋宇”的新态度叫做天然建筑学。

塔里辛公司就是奥利吉万娜1932 年根据古尔吉耶夫神学校的模式创建的，她本人就是那所学校的高材生。不过，只有很少的崇拜者知道她的全部巫术，她当时完全沉湎于那些巫术之中。

问题在于，古尔吉耶夫多次应奥利吉万娜之邀，到塔里辛公司来，而赖特本人却从来不曾着迷。古尔吉耶夫的“威望”在赖特心中微乎其微，就像藏舞对他毫无振奋之力一样。赖特只不过是允许他年轻的妻子一切按她自己的兴趣办罢了——他的妻子是非常热衷于创建这家公司的。他本人则只需要威斯康星州那一带的山丘、田野和谷地——他在那儿，在他叔父的牧场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从威尔士来的先辈曾经在那儿居住过。在那儿，在那些地区的大自然中，在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中，在那些尚未遭受文明破坏的景观的美与和谐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灵感。他以如此一腔炽烈之情热爱着美国的西部地区，热爱着亚利桑那州的荒漠。这是他的工作和建筑创新所吸取的美国源泉。他去世后，他的名字几乎被他的学生视为神明，奥利吉万娜这时才有机会偶尔向学生们说，“赖特和古尔吉耶夫是一起的，他们如影随形难以分开”。不过，魏斯对此一直加以否定。

有关赖特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喜欢”什么，曾经“讨厌”什么，这些无穷无尽的故事，成了塔里辛公司所有闲聊的话题。似乎这儿的人们再也不知道天地

间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我常想:“赖特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在苏联,斯大林的党徒对他所搞的“个人崇拜”,使我对把一个人大加赞颂和大加神化那一套了若指掌。我在美国、在民主的美国竟然又看到了这一切,这是多大的讽刺啊!这个国家是以合理待人,以其平等而自豪的啊!

魏斯常常说起:“赖特先生在世时,这儿的一切都大不相同。”但他的话总是到此打住。他从不允许自己批评赖特夫人。他对赖特夫人忠贞不贰,像一个侠义之士,一个奴仆。不过,我已有耳闻(从别人处):赖特先生在世时,这地方是热闹而又快乐的。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而那时候赖特夫人是不能违抗她丈夫的。那时候她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公司巨大的自给经济,向公司提供所有蔬菜、水果、甚至果酒。现在,这一切早已被忘却,所有食品都按批发购买,而且塔里辛公司更像一座博物馆,一块圣地,到处挂满了赖特先生各种姿态的照片——犹如他仍然还活在这里。

然而,他是再也不复存在了,而且再也没有人作出过建筑学上的伟大开拓。为了创造一种“赖特式”的建筑设计,人们对赖特那些旧图纸加以“改造”——而他本人,这位孜孜进取的创新家和发明人,是必定会大为不满地否定的。作为举世无双的天才,他未能“教会”他的学生也成为像他本人一样大胆求新的人。

诚然,赖特第一次结婚所生的3个儿子(他有许多孩子)都成了建筑师。可这件事情在塔里辛公司却从来无人提及,仿佛他就仅仅只有一个女儿——约万娜。我后来才了解到,在赖特的头几个子女和奥利吉万娜之间,因为遗嘱问题而引发了一场争端。赖特在遗嘱中,把一切都留给了奥利吉万娜

和公司，仿佛除此之外谁也不存在似的。这些事实在赖特的一些书和传记里透露出来（例如1973 年罗伯特·图姆布利写的一本书里）。然而赖特夫人也写过一系列有关赖特和公司的书，她在这些书中维护了她和赖特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甚至把自己说成是赖特的"激励者"。赖特去世后，公司不得不多年为他支付税金，而这是赖特所拒绝支付的。他"不承认"所得税……只是依靠出卖赖特给他的遗孀留下的大宗东方艺术藏品，才得以付清欠债，将公司保留下来。

现在，这位遗孀真个地管辖了这里的一切，并且不无道理。赖特夫人无疑在生意上很有能力，善于找主顾，善于做广告和理财。她头脑清醒，又厚颜无耻地看待生活。她甚至对建筑设计方案也要指手画脚，改来改去。她以前的女婿魏斯·彼得斯也全盘接受她的意见。大概已故的赖特在棺材里也会辗转难眠！魏斯总是像石头一样默默无言（彼得在英语中也就是"岩石"的意思），坐在他那张光亮的红木桌前，聆听赖特夫人对她的"幼儿园"傲慢而郑重其事地宣讲她那尽人皆知的真理。这仿佛与他完全无关。这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防卫反应。"我不允许在我们校园里抽烟！"她用她那低沉的嗓音，意味深长地慢慢说道，要是有客人在进餐时漫不经心地取出香烟来的话。其实，这儿没有人抽烟（除一位太太之外，她是赖特夫人的心腹，可以为所欲为的）。

赖特夫人对火焰、生着火的壁炉和未熄灭的烟头都大感恐惧：塔里辛公司过去曾遭到过几次大火灾。几名学生身穿带皱边的衬衣，站在椅子后面侍候她；待她吃完饭，由她最喜欢的几个人将她送入卧室。所有人都默默地听从她讲的每一句话。她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家则早有

准备地一次又一次做出笑脸。这一切都像在做戏，许多客人都讥笑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诚然，那都是同她离得远远的时候。不过有她在场时，他们也只能点头称是。

到美国3 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身边那种无忧无虑、快快乐乐、毫无拘束的气氛，我惊讶自己现在到底身处何地？令我想起我的苏俄，想起它的种种禁令、种种控制以及普遍存在的苦恼沮丧情绪的一切，哪怕是一种微微的暗示——甚至连这一类相互关系的影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引起我发笑；情况不好时，则叫人垂头丧气。我把这种感受告诉丈夫，可他好像是听而不闻。他忙于沙姆斯·巴列维公主第二套别墅的设计。于是我干脆回到自己屋里，闷坐在那儿，直到换衣服去接见客人。

魏斯喜欢的休息方式，是参加在当地富豪家举行的有很多人出席的鸡尾酒会。他只同有钱人交往，也只邀请有钱人到塔里辛公司来；与贫寒的演员或腼腆的知识分子从无往来。那些有钱并因而有势力的权贵才会在这里得到介绍。“干吗要叫我到这种地方来？”我常常想，“那伙人需要我来干什么？他又需要我来干什么？”

有时候我们一起去上饭馆。不过很奇怪的是我们之间竟无话可谈！他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虽然不止一次去过欧洲和亚洲。将各种不同的国家及其文化加以比较，他是毫无兴趣的。他对于印度这个国家也兴味索然。“一个穷国，艺术乏味。”一切能吸引我的东西他都感到格格不入。有时候，他对我的知识和阅历、对我的意见、乃至对我与他大相径庭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简直叫我吃惊……“他同他那第一位斯韦特兰娜在一起生活时又怎么样呢？”我有时想道，“啊，不，她本身就是公司的一部分，是她的

父母创办了公司，弗兰克·洛·赖特本身就是她的继父。那时候大概一切都有不同……那么，所有这些人干么一定要召引我到这里来?”我当时还沉迷于爱情，无法直截了当地得出答案：那是为了钱啊。

*　　*　　*

1970 年夏天，我们乘作一辆卡迪拉克轿车(赖特基金会的财产)，穿过亚利桑那州的山区，去落基山脉，然后经过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堪萨斯州，来到威斯康星州碧绿的大平原，作了一次奇妙的旅行。

每年夏天，全公司都要作这样一次旅行，回到亚利桑那州时已是晚秋。这是遵照赖特先生数十年前定下的惯例而作的。这是建筑师和他们家庭的一次休息，不过一切都得由上面来组织安排。赖特夫人亲自作出决定：谁同谁一起走，什么时候走。然后，直接向她指定好的人们宣布——什么时候出发。这种“休息”有一星期或10 天时间便足够了。另外一个星期，他们将在秋日返回亚利桑那的途中度过。塔里辛公司每年都如此度过夏天，一成不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观察了解美国的机会，而且正好是我所希望的方式。不用说，无论在途中还是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那些接连不断的公务电话也追随着我们。我们总是想着那些承包人、建筑工和设计方案，放心不下[①]。有许多时间都是在

① 因为塔里辛公司承建的一座剧院屋顶坍塌，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打官司。

沿途的电话亭里度过的。不过在我驾车的时候,魏斯也可以休息一下,哼几句可笑的讽刺歌儿,朗诵些诙谐的诗句,不然就干脆打个盹儿。看来,他又变得像过去一样愉快而和蔼了。远离了自己的女老板和她那随时盯着你的目光之后,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像一位优秀的向导,向我不断讲述我们经过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于是,美国的整个历史便活跃起来。这条路他走过许多次了——每年走一趟,差不多走了40 年……魏斯真的希望我了解得更多,能喜欢上这些美丽的地方。时间、地名、事件哗啦啦向我倾泻而来,有如瀑布一般。落基山脉、大峡谷、纪念碑谷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景色都是美丽而壮观的。这次东部之旅以及后来的回程(经过新墨西哥州),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我们最终进入生机勃勃,碧绿一片,到处是田园风味的威斯康星州的时候,魏斯简直已经充满了抒情意味。他特别喜欢这些地方,因为赖特先生本人就喜欢这里——这是他的故乡啊!1911 年,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大庄园,将它取名"塔里辛",是借用中世纪一位威尔士诗人的名字。这座房屋是赖特和他一位顾主的妻子的宅邸——她叫奇内夫人,后来投奔了他……他们很和美地在此住了许多年,直到那可怕的一天到来——一名精神失常的黑人厨子放火将这幢房屋化为灰烬。他手持利斧站在门前,将所有试图逃跑的人砍倒在地……那天赖特在芝加哥,回来时发现已经屋毁人亡……

这件事发生在1914 年,直至今日在塔里辛公司还经常被人提起。赖特先生很喜欢奇内夫人,但她始终未能同丈夫离婚。她葬在洛德-琼斯家族一片小小的墓地上,后来,赖特本人也葬在了那里。不过,关于他的第一位妻子凯特林,他6 个

孩子的母亲，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见任何言传。他的第三任妻子米利亚姆·诺埃尔，也同样未被人提起过。

我们应当相信，赖特只有同奥利吉万娜在一起才真正感到幸福，也只有同她在一起，他那卓越的天赋才得以焕发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在奥利吉万娜写的所有书中都有反复描述，尽管这是对艺术史的地地道道的改写。其实，他们相遇的时候，赖特已近花甲之年，那时他已建立了自己创新的方法和思想，在建筑学上已被公认为领头人，而当时奥利吉万娜只不过30 岁左右。但她希望肯定的正是这种意思。这种对众所周知的历史的篡改，这种颠倒是非的作法，使我又想起苏联史学界类似的企图——置人和事实于不顾，篡改历史纪年，随心所欲增添任何适用的东西……在这里，与苏俄那种专制独裁的手段类似的现象一直尾随着我，我不禁又自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来到这处于专制下的原始共产主义之地？"住在普林斯顿是何等舒适惬意，何等自由自在啊！

但是，我不想叫这些问题改变我的决定，我要把思想集中到愉快的事情上来，避开不愉快的东西，去享受私人关系和家庭的快乐。

这年夏天，我在威斯康星州目睹了当地一件大事：整个洛德-琼斯家族的大聚会。这是赖特母亲那一系的亲戚，是从威尔士迁来的一个大家族。每过几年，约两百名同族人要到这里来聚会一次，像浪潮般挤满此地。唯一神教派教堂的小钟楼打开了它那通常上锁的大门，人们用新鲜的草木将它装饰一新，在那里作祈祷。他们谁也不理会古尔吉耶夫和他的藏舞。

我迅速地读完了赖特颇喜爱的一位表姐马吉奈尔·洛德-琼斯写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强大的琼斯家族之谷》。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写她的先辈如何开垦了这个风景秀丽的谷地。我们眼下正在这里。这个峡谷往四周延伸，一片碧绿，美丽富饶，有大片的牧场和草地，牛羊成群。这是美国最好的体现，而且毫无疑问，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孕育出了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在他自己的传记中，他以极大的温情描述了这里的山峦、田野、他舅舅的小农场——他从小便在那里干活。（这座农场后来魏斯买下，现在已属于我们所有。）这位建筑大师还怀着强烈的眷恋，在自传里描写了冬天白雪覆盖的田野里那些干枯的杂草杆儿。但他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把自家的孩子称作"流着鼻涕、叽叽乱叫的一群脏孩子"，总是讨厌地妨碍着大人。（我读到这里就掩卷了，因为我厌恶那些对自己的孩子漠不关心的男人。）

总之，包括赖特许多直系后裔在内的洛德-琼斯家族聚在了这里。赖特夫人在他们中间便黯然失色了，默默无闻了；然而，她仍然必须在塔里辛接待他们。当家庭聚会结束，整个大家族各自回家的时候，她看上去很兴奋，并不掩饰自己兴高采烈的情绪。

* * *

威斯康星州的夏季是炎热潮湿的，不过到了9月，天气就变得凉爽而舒适。这是这一带谷地最美妙的时节。四周的一切，每一棵草，每一朵野花，都变得十分明洁。我常常到小树林里去散步，呼吸洋溢着芬芳气息的空气，觉得自己变年轻

了，每一根神经都同这一片片蓝天、这一朵朵蓬松的云彩、这一棵棵沙沙作响的树木和谐融洽……很多年前，我曾有过同样的感觉，那时我知道是什么缘由。可现在呢——难道现在还能产生这样的感觉？……

过了几周内心平静的幸福日子，当地医生证实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怀孕了。这个消息大出我的意料，我完全没有这种打算哪！似乎是上帝在补偿我同在俄国的儿女的分离……我心中有一种奇妙而宁静的感觉，走起路来腾云驾雾般轻快。魏斯得知这一消息，也感到阵阵惊喜，赶紧去告诉了他过去的岳母k k 他对她一向是毫无隐瞒的。当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却完全变了。他什么也没对我讲，但我感觉到，他那股高兴劲已经烟消云散。

四周笼罩着一种奇异的气氛。我从人们的言谈和暗示中得知，自从1959 年赖特去世之后，塔里辛公司便作出决定，不准再生小孩。只允许约万娜一人生了一个女儿，她现在已经12 岁。不过比这女孩更小的孩子是再也没有了。这仿佛同赖特夫人和她周围那伙人奉行的某些神秘理论有关；赖特夫人是经常同已经去世的人接触的。我们无疑大大地破坏了她的规矩。

“这件事，难道你不打算想点什么办法吗？”有一次，魏斯畏畏葸葸地问我。“当然，不行！”我回答道。这种念头本身对我来说就是可怕的：生活和命运给我这个孩子，来填补我那些可能永远失去的孩子们留下的空缺……怎么能拒绝这样的赐予？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44 岁，我丈夫已58 岁k k 怎能不珍视这孩子？独裁者总是要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全世界的独裁者都是这种本性。看来，我怎么也逃不掉独裁者的控

制……真是在劫难逃啊!

我这否定的回答被报告上去了,接踵而来的当然是一场大风暴。赖特夫人不再直接同我谈,却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她错误地以为(正如别的许多人也这么认为)乔治·凯南大使及其夫人是我的“美国教父母”,便去他们那里求助。然而,凯南一向只对我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实际可行的建议,对我的私生活则完全不曾干预。可这一次,有人却要他们马上进行干预,劝我“别作这样的蠢事”。赖特夫人打电话缠住大使,打了很久。大使先生——一位很有教养、彬彬有礼的外交官——在她那口音很重的英语的威逼下,气得面部抽搐着,力图向她解释清楚,要她一定也看见“问题的另一面”。可她是完全不容商量的,并威胁要亲自去普林斯顿找他,向他最后“讲清一切”。大使先生绝望地向他妻子挥挥手,他妻子拿起另一只并联电话,大声嚷了一句:“现在有人按约来拜望凯南了!”于是大使先生才得以解脱。后来,大使夫妇向我讲起这件使他们大为吃惊的事时说,在那之前,他们对我在塔里辛公司里的生活实在知之甚少。

交涉结束了,一切事情照旧进行。不过,每当我想到今后的日子,就越来越感到心里忐忑不安。在诸如此类的风习之下,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在如此不受欢迎的地方,我的孩子将命运如何?我曾想过,这孩子能最有效地巩固我们的家庭。我希望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可是,仅仅由于一个邀请我到此地来的女人的无限权力,事情变得有点可怕了。这女人现在对我大感失望,并为我在她这个小小的王国的出现恼怒不已。

就在这时候,魏斯和我驱车返回亚利桑那。现在由魏斯

亲自驾车, 他不像通常的习惯开得那么快。时值晚秋的11 月份。沿途我们曾在芝加哥逗留, 那儿凛冽的寒风几乎将我们刮翻在地。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家旅店。我们又行经伊利诺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 在那里的陶斯县, 我们参观了当地普埃勃洛人的艺术。正由于同魏斯一道乘车遍游各地, 我对美国有了许多了解。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伴侣, 兴致勃勃, 把他所知道的当地的一切都介绍给我看, 讲述给我听。在远离塔里辛的地方, 他又重新变得心情轻松, 令人可爱了; 他喋喋不休, 老开玩笑, 要使我高兴起来, 而且对我也变得很殷勤: 一句话, 他恢复了自我。

是塔里辛公司使魏斯变得死气沉沉, 是公司使他不讲话, 甚至仿佛也不思考。他身上承担着很重的义务和责任, 却没有任何权力。他是害怕那位严厉的孀妇么? 在他俩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事情么? 为什么这么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 竟使这6 英尺高的堂堂男子变得俯首贴耳、唯唯诺诺? 我找不出答案来。他也默不作答。但在他的行为中, 差异却如此巨大。这种差异在此地其他人的行为中也看得出来: 只要那寡妇在场, 大家就变得死气沉沉。现在所有人都心情平静、轻松愉快, 因为赖特夫人在她那一帮贴身"宫女"、那位私人医生和那条丹麦黑犬的陪伴下, 到欧洲去了——那狗关在一个专门的笼子里, 一向跟着她到处旅游。

在这美丽的晚秋时节, 我们穿过一片又一片广袤无垠的地区, 在途中迎来了感恩节。可惜我们不是在家里, 不是在朋友中间——在美国, 感恩节是多么热闹、多么愉快啊! 美国人这一天总是呆在家里,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我们的旅行日程是根据工作的需要选定的, 魏斯外出总是选在大家都方便

的时候。我们这时想到了亚利桑那州塔里辛公司的感恩宴会，而那时我们的汽车却还在公路上疾驰。当大家在餐桌前坐下，开始吃火鸡肉时，我们却到了伊利诺州的小城斯普林菲尔德，城里的街道上行人寥寥……

“圣尼古拉，”我大声念出一座高层建筑上赫然的名字。“啊，这是一家著名的旅馆，林肯曾在这儿住过——这是‘圣尼古拉’！”魏斯说。“我们就住这里吧，或许在这里能吃到上等夹肉面包呢！”

我们停下车，走进旅馆大厅；就像迎接其他人一样，当地教堂的几位和蔼可亲的女士迎接了我们，并邀请我们同别人一道进餐。这是旅馆为客人及节日里所有的旅行者准备的宴席。隆重的宴席上摆满了一切可口的食品；在这一天里，这都是很寻常的，有火鸡肉、南瓜大馅饼、蔬菜、色拉；宴会很热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们待人那种新教徒式的讲究实际的基督精神充满了美国式的慷慨和淳朴，实在是太好了！她们让我们坐在铺有新桌布的餐桌前，桌上摆着鲜花；人人笑容可掬、热情友好。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一个最美好的感恩节。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多年之后我能记得起来的最美好的一天。救苦救难的圣尼古拉，在这一天没有抛弃我们。

新墨西哥州也充满了饶有趣味、令人难忘的印象。我们参观了印第安人艺术博物馆、大卫·劳伦斯故居，欣赏了城里古老的西班牙巴洛克式教堂……我们还在这里为塔里辛公司的所有人买了圣诞节礼物、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昂贵的服装和首饰。魏斯还为我挑选了一些很漂亮宽松的连衣裙，上面饰有绣花、发光的鳞片和小玻璃珠子。我蓦地想起了第一次怀孕时的情景，那还是在我18岁时，正是战争年代……那是

1944 年,在俄国阴晦的日子里,莫斯科一片昏暗,商店里一无所有。要找点什么为孩子做块包布也很困难……我们都是大学里的年轻学生,我丈夫只比我大4 岁。我怀上孩子后,我们感到何等幸福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看书,根本没想到这些豪华而又不必要的珠宝、毛皮衣服、各种礼物、炫耀奢侈的宴会以及金钱。那时我们很年轻,沉迷于爱情,压根儿就没去想世俗的荣华富贵。这一切对我有什么用? ……

但是我把这种导致我对眼下生活状况产生怀疑的思绪统统赶出脑际,试图回到"常轨"上来,它能使我对于迎接我们未来的节日做好准备。我们一回亚利桑那,圣诞节马上就要到来。我们现在不慌不忙地沿公路前进,一路穿过荒漠,欣赏满目皆石的自然景观,并为谁能首先发现高高的仙人掌争论不休。你要是第一个看到仙人掌,那就是一种吉兆。

*　　*　　*

圣诞节过了,随之而来的又是复活节——这是我在塔里辛公司过的第二个复活节。一切真有着天壤之别! 那时候人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欢迎我,现在,因为我怀着要到5 月底才会呱呱坠地的孩子,大家都感到很尴尬。

魏斯决定在长长的、车厢般的露台上盖顶篷,将我们那个兼工作室的居室面积扩大。我想,现在正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请他盖间小小的厨房和浴室。这对孩子来说,今后是必不可少的。我还想是否可能在什么地方安一台洗衣机……可那一群建筑师却全是些死死追求风格和刻版模式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把露台的空间分割开(我请求给孩子隔一个小房

间),露台的空间必须保持原状。浴室是"不必要的",因为已经有了淋浴间。建一间小厨房倒是允许了:将它隐蔽在大门后边,这样,不用厨房时可以藏得无影无踪。只是不得破坏原有的基本格局!

但是,我可以每天早上为自己煮一杯咖啡了,也有条件为孩子煮食物了。不过,既然这"改建"用的是我的钱,那么我认为,要求建一点居家所需的设施,就是有一定理由的。然而魏斯却向我声明:"建筑师自己明白该怎样改建"。简直难以相信,他又变得多么固执己见,多么不通人情,对我的需求这么充耳不闻,对我讲的话这么怒不可遏。而且他对未来孩子的打算,也抱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

因此,他的姐姐早川夫人邀请我产前最后一个月到她家去住,并且就在加利福尼亚生孩子,我便如释重负地愉快接受,这就一点也不为怪了。她还建议我生产后就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因为她对塔里辛公司的规矩了如指掌——我一但有需要,公司里是不会有任何人出来帮我的。我征得丈夫同意后,非常高兴地出发了。我想,大概他是希望我们不要打扰他。我不知道他姐姐的"邀请"是不是他自己安排的……

甚至在斯科茨代尔为对我做观察,按规矩应当为我的孩子接生的医生也说,他对塔里辛公司的情况很了解,"那简直是一座疯人院!"他说。好多年前,他曾被邀前去为约万娜的女儿接生,因为奥利吉万娜希望孩子出生在塔里辛。"她试图强迫我事事按她的想法去作。但无论为谁,我都不会上门接生。这不合我的规矩。于是她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干脆表示抱歉,一走了之。那位太太曾对我解释我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作了这一类谈话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坐上飞机,直奔加利

福尼亚去了。

我们的奥莉加·彼得斯出生在圣拉菲尔一家小小的地方医院。圣拉菲尔是一座美丽的小城，由圣芳济派修士于18 世纪创建。一切都是轻松而幸福的，孩子很健壮，唯一令我伤心的是魏斯不在身边。到了需要上医院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找到他……当时是早川教授亲自将我送去医院的。

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纠缠不清而又愚蠢的报导，这同样也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早川家对新闻界的态度是"他们要啥就给啥，这比避开他们更好"。所以，他们压根儿就不协助我避开，而宁愿把我向他们"和盘端出"。当女儿出生的时候，一向喜好广而告之的魏斯竟带了一大帮电视记者到医院来，使医生和我自己都气得发疯。他自己却颇为得意！"有人在大街上就将我拦住，祝贺我喜得贵子呢！"他欣喜地说，心里很是自豪，好像是第一次得子的年轻父亲在说话。

……他是很高兴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报刊转来许多信件对此事进行评述，大多表示了热情的祝贺。美国人对于任何外部事件都抱着浓厚的个人兴趣，这个特点总使我吃惊。不过，我们当然也无法逃避来自俄国侨民的充满恶意的政治性信件。有个假仁假义的女人（没有署名）甚至这样写道："在您这样的年龄，这多么骇人听闻！"

哪怕时间短暂，能滞留在早川家中，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牢固稳定的，持续了很多年。他们让我看了彼得斯一家祖辈的家庭照片。其中一位是美国内战时期北方的工程师，他留下了大量在战场上拍摄的绝无仅有的照片。弗列德里克·彼得斯夫人（魏斯的母亲）曾试图在她的有生之年把她儿子拉出赖特的公社——她

活到80 多岁,但是,她当然最终未能如愿。魏斯对公司的态度,具有中世纪的仆从对主人那种愚忠。他姐姐常说,魏斯是“读着亚瑟王宫廷故事集长大的”,而且赖特之于魏斯,简直就是这么一种理想的体现:“他找到了自己的国王。”

他姐姐向我解释说,魏斯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看到公司的本来面目,他不想承认他像个忠诚不贰的宗教狂似的干了差不多40 年而未能按劳取酬。他不想看到那里在如何不公正地剥削所有建筑师,人们事实上在从事着无偿的劳动。赖特先生生前,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这位建筑大师非常珍爱他的同事和助手,对他们又热情,又关心。

大师去世后,魏斯亲自驾驶一辆大卡车,将他的遗体从亚利桑那一直运往威斯康星州的斯普林-格林市,以埋葬在洛德-琼斯小教堂旁边的一块小墓地上——这是赖特的愿望,他要葬在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地方。魏斯得到了赖特先生遗赠的一条黑白二色围巾。他无比珍惜这件最贵重的礼物,仿佛是国王的权杖交到了他的手里……既然他对公司如此忠心耿耿、崇奉如神,自然就失去了正常合理的眼光。崇敬之情达到极端,对于批评,当然就视为“大不敬”,同时,也使那些怀疑对成年人是否有必要搞这一套玩意儿的人深感苦恼。

“您应当明白,他永远也不会离开塔里辛公司的。”他姐姐对我说,“他投入的精力太多了,全身心都放在那儿了。对此我连提也不能提。您要在那里生活下去,恐怕是太难了!不过,我们对您在各方面都是深表同情的。”

关于古尔吉耶夫和“他那一套瞎话”,关于整个“伪东方文化”和教给建筑师们的藏舞,早川教授讲得更是直率。他嘲笑这一切,是因为其中根本没有对东方文化的认真研究——无

论是中国的、日本的, 还是西藏的——有的只是对其"神秘主义一面"的迷恋。早川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严肃的语义学家, 他不承认对待事实那种肤浅的态度。我们大家都很明白, 魏斯仍会孜孜不倦地照此办理下去, 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业已形成的习惯。因此, 我现在的任务只能是, 一方面哺育照管刚生下的女儿, 一方面去适应他的生活, 赞同他的习惯, 同他协调起来, 没准儿还得改了自己的整个脾性, 以便保住这个家。

*　　*　　*

在旧金山附近磨房谷的早川家中住了两个月后, 该是启程"回家"——回塔里辛公司的时候了。魏斯前来接我们, 我们得飞往威斯康星州, 到公司的夏季住所去住。赖特夫人打电话来说, 她已吩咐为婴孩安排好另一个房间——这件事我并未向她提起过。但她希望减少一些不愉快的因素。做这类事她是很在行的。

在大姑子家那正常情况下的生活, 尽管时间短暂却过得满不错。我们有许多时间是在他们厨房里度过的, 因为主妇是出色的厨师。早川教授带回鲜鱼——他喜欢在河湾里钓鱼——魏斯的姐姐便加一点蔬菜, 做中国式或日本式的鱼。因为她在收集各个国家的菜谱, 我便做了格鲁吉亚的契西玛、恰纳西、帕哈利等菜肴(契西玛是一种醋调蛋黄白汁鸡汤, 恰纳西是蔬菜烧羊肉, 帕哈利是用青豆加上碎核桃、蒜和各种调料拌成的凉菜)。美国人都天真地以为, 整个苏联都只吃红菜汤、馅饼, 或有时吃点饺子! 大姑子很高兴地得知我竟知道如此丰富多彩的民族菜肴, 将许多菜谱一一记下。在她宽敞雅

致的厨房里，这种温暖的时刻令我真正感到兴高采烈，因为我们很快就回到了我们的公共食堂……

终于，我们来到了威斯康星州，要在那苍翠的谷地和山岗之间呆上整整三个月，在加利福尼亚过过那干燥寒冷的日子后，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变迁。时值6 月，是一个芳草萋迷野花吐艳的月份，还不是太热。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一切都能显示出它的神奇！……这时候，我丈夫前妻的儿子正专心致力于我们农场的事务。他装了一个青贮塔，修好了一座大仓库，雇佣了一家人帮工，从科罗拉多州买回一大群母牛和一头在展览会上得过奖牌的公牛。

他在实现自己生活的理想——经营农场。他的大提琴早已扑满灰尘，锁进了柜子。这儿也有爱尔兰猎犬——爷儿俩都喜爱的一种犬。爷儿俩有意无意地将四周的一切，都恢复成往昔同另一位斯韦特兰娜在农场幸福生活那些日子里的景象。我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但并没有阻止，反而加以促进。

我坐在家里小小的露台上，手里抱着奥莉加，一只狗躺在身边。我着迷似的遥望着归来的畜群，它们被落日的余辉照得透亮。母牛的铃铛不时丁当做响，山谷里充满柔和的光线，四周笼罩着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这一切会成为我自己的家吗？会成为我女儿未来的家吗？坐在这陈旧的摇椅上轻轻摇晃多么惬意。父子俩都出去查看事情的进展情况了。我们迫切需要一名管理员，但我丈夫前妻的儿子却希望独自一人去管理那个庞大的家业，不允许任何人接触它。随他们去干吧，谁也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我只是像银行家一样去支付一切费用。我不愿意引起争吵，不愿意为坚持要管理员而伤了和气。

很多年来这都是他们的农场。魏斯早在30 年代初就买下了它,目的是要保住上一辈的遗物,那就是詹金·约翰斯舅舅的老农场——赖特童年时代曾在这里干活,决不可让它落入“外人”之手。魏斯将这座农场称为“昴宿五”(意思为“继承……的”)。使用这个名称之后,这农场在周围便有了名气。这是他自己在继承那位大师,这才是他的本意。我能保住这座农场,为他们,为我们大家赎回这座农场,实在是太好了。父子俩看来喜气洋洋,他们同工人商量一阵,然后就去查看青饲料,再去看牲口棚。

我轻轻摇动着在膝盖上酣然入睡的婴儿。山谷里一片金黄,牛铃丁当做响。我暗暗祈求,“让这美好的时刻长驻不逝吧”……

*　　　*　　　*

此刻,塔里辛公司仍继续着它惯常的生活,没完没了地接待客人,在漂着浮灯的水池上野餐,同贵宾一起娱乐,千方百计寻求新的主顾、新的靠山和新的经济补贴。

在所有聚会中,我都得同丈夫一道,向“潜在”的老板笑脸相迎,尽管我最乐意的事情是同我新生的女儿呆在一起。当我外出时,则不得不去找“临时保姆”,这样就可以把孩子留给她们。我照所有现代医生的建议,用母乳喂养孩子;但在这个地方,却引起了那些不曾生养过孩子的太太们的嘲笑。“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这么作了!用奶瓶喂她一些配合食品吧!”她们对我说。那些太太对孩子根本一无所知、完全不懂对一切“天然品”的新追求,对回归自然的运动也一概茫然。在这

里，一切都如此戏剧化，乳母喂奶的姿态使她们见了浑身抽搐。

我们不得不每天都叫临时保姆来。我们的临时保姆，一位是年轻姑娘帕梅拉，另一位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已离婚的莉丝。她俩都是本地人。在塔里辛公司看来，她们是"外人"。于是赖特夫人坚持要我用"自己人"做佣人。但我明白这里所有人都各自忙于无休无止的工作，根本不能考虑去请她们；此外，我喜欢抓住各种机会同"外界"交往，同正常的、友善的人们交往。现在，我在这儿很少见到人。公司的妇女们对我不再有什么兴趣。只有年轻的学生有时来跟孩子逗笑一阵——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小小的乐趣。

我们农场里有个工人的妻子叫玛里恩·波特，对我很好。他们在农场附近租了一幢小房子，我常常到她家去，坐在一把旧圈椅上喂孩子。我在这儿不会被人嘲笑。玛里恩跟我同岁，她自己也有孩子，同她在一起相处真好极了！她给一家人做饭，她那胖胖的身材叫我想起我童年时代那位难以忘怀的保姆。"就搬到农场来住吧！"玛丽恩说，"我会帮您的，您会觉得这儿就是自己的家！"

是啊，为什么不呢？现在这里正是我的家，不仅在法律上是我的家，而且还因为是我赎回了它，作每一项新的改建、筑每一道篱栅、买每一头奶牛都是由我付的款。我为我丈夫和他前妻的儿子把一切都办成了，可他们却不希望我住在这里。我丈夫前妻的儿子要求有自己的"独立性"，因为有一位与他相熟的姑娘经常从城里来找他。我丈夫则对我"过问农场的事"表示不高兴。他要我同他住在一起，而同他住在一起却很少见到他，因为他整天忙于同别人打交道。当我为使他们满

意而作了这一切时, 他俩对我、对孩子的态度却令我深感委屈。我感到孩子已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我尽量用更多的时间同她呆在一起。奥莉加是个健康、活泼而又不好闹的孩子。

然而, 魏斯却坚持要我“找些什么机会加入公司生活”。他又同我疏远起来; 同他讲我的感受、我的需求, 那等于白搭。很显然, 他希望看到我“扮演”他那第一位斯韦特兰娜的角色。那位斯韦特兰娜会拉提琴, 在周末的正式招待会上总要在他们的三重奏或四重奏中演奏。她父母和她的家都在这里。我试图向魏斯指出, 我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不可能“扮演”另一个女人的角色, 他不吭声。他变得灰心失望, 他个人的期望未能如愿。所有人都对我感到失望。大家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连他也不例外。人人都明白, 他对自己新的婚姻感到沮丧, 因为我“完全不是那一个”斯韦特兰娜……

我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照料孩子成了我一件新的操劳, 而且是极为重要的操劳, 因为过去我的孩子是有保姆的。我成天跟孩子在一起, 亲自给她洗澡, 喂她, 观察她每一天的成长。这使我很满足, 我花的精力得到了3倍的报偿。“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重要呢?”我想。父亲和兄长对这个小女孩没表现出任何一点关心。

秋天, 一位税务稽查员来到农场。他对魏斯和我深表不满, 因为它发现我们农场没有设会计, 一切杂乱无章, 也找不出一张报表。花了大笔的钱——数万美元——而没有任何单据。这还仅仅是支出。收入则还得经过好几年时间, 等牛犊长大可供出售, 畜群总数每年有了增长之后, 才谈得上。“你们必须配备一名管理员, 刻不容缓!”税务稽查员说。我早就知道, 我们的大提琴师和建筑师, 正如一开始那样, 对于管理

大规模的事务还难以胜任。不过他们到现在为止也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为了咨询意见，他们在当地今天请这位农场主，明天请那位农场主，但他们不愿听罗伯特·格雷弗思的话，而罗伯特·格雷弗思曾再三建议由他来作他们的管理员，为他们效劳。

不久，我们又购置了一座小农场，因为我们的畜群没有足够的放牧地。这是一处奇特的老房舍，出售者是一对上了年纪、名叫马克- 卡钦的夫妇。因此，这农场也叫做 马克- 卡钦”。我们毫无计划地四处花钱。我感到我们很快就会遇上大麻烦。

“ 你们培育肉畜的工作注定会失败，”罗伯特·格雷弗思对我说“ 像你们这样的小农场，不宜作这种工作。你们应该养几头乳牛，好卖牛奶；应该养些母鸡，好卖鸡蛋；这样做，至少能保本，还会有点小小的进项！”是的，这位讲究实际的老朋友说得对。可魏斯不愿听他的。他和他儿子都想干大事业。严重的麻烦已经像乌云一般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形成。然而谁也不听我的。他们只从银行拿来一张张票据要我签字。那是新的借债、新购买的机器、材料和饲料的票据。

* * *

四周的土地是这样碧绿，这样富饶。经常目睹着这美丽富饶的地方，身处这样的环境，简直可以延年益寿。每天穿越田野和谷地，渡过流水滚滚的威斯康星河，看见开阔的天空，地平线上蓝色的山峦，人不能不感到心旷神怡。这是一片迷人的土地。

赖特建于1911 年的塔里辛公司，就被这一片土地围绕。在这片土地上，任何人也无权搞建设。这里的山峦、峡谷、森林，因摆脱了建设而得以保存，森林的野趣及其野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山岗下有一条小河，被峭岩阻挡后，形成一个池塘。池塘岸边垂柳依依。枝叶粗壮的老榨树和老榆树庄严矗立，守卫着片片如画的草地。野生的兰芹、菊苣、母菊、木犀、三叶草和矢车菊长得高高的，还没有刈割。沙石小径蜿蜒曲折于田野和草地之间。大地上空，团团白云升腾飞动，带来迅雷骤雨。然后，一道彩虹横空架起，跨过周围的一切——所有的玉米地、草场、畜群、红色的粮仓、饲料塔楼、整个风景迷人的山谷。美国的乡村就在身边，展现着她的全部美景，这美景与我在此以前居住的城市和郊区迥然不同。这是一片同宇宙间各种规律协调一致地生活着和呼吸着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同样也应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每天，我都将小女儿放在小推车里，带她在池塘四周散步。她仰面躺着，在和煦的阳光下，扳弄自己的小脚丫子和小手玩，她将大脚趾塞进嘴里，眼睛望着上方——望着沙沙作响的大树，望着湛蓝的天空中瞬息万变的蓬松白云。我们感受着夏日的芬芳与和暖，来到池塘边，停留在树荫下。我在草地上坐下，望着垂柳和一汪池水，心里琢磨：这水流、这生活的长河，会将我带向何方……同孩子一起玩耍，用乳汁喂她，坐在温暖的草地上一动不动，直至她在我膝盖上酣然入睡，真是怡然自得。天气暖和而湿润，老椴树上响着一片蜜蜂的嗡嗡声。这些大树和白云无疑会永远驻留在孩子的脑际——这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我愿她在吸入这种空气的同时，尽量汲取我身边这片美景，愿她在今后长大成人时，能在记忆里唤

起这些景象，并能将它们称作——祖国。

我们在池塘边的坡地上采摘野花，回家时我们带上花束，不慌不忙地慢慢走着，怕别人来提个什么愚蠢的问题，打断我们对于生活之美的尽情欣赏。有时候，一些大学生半道上停下来，往小车里瞅，逗孩子玩。孩子总是张开还没长牙的小嘴，准备着向她们发出微笑。有时候，赖特夫人扶着医生的手出来散步，也遇上我们。一条大黑狗跑在他们前面，一辆打高尔夫球用的电动小车缓缓跟在身后（以备万一之需，要是赖特夫人想坐车的话）。她也会停下脚步，把她那张从无笑意的严厉面孔凑到孩子的小推车上。孩子却并不报以微笑。我站在旁边，观察她们目光的默默交流，我明白，我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在这样紧张的、但却各富表情的时刻，我深深感到，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大概已不长了，至多，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这一点倒是不幸而言中了。

在塔里辛公司，对我和魏斯常常有一些潜流般的窃窃私语，而且有些片言只语和暗示也传到了我的耳里。不过，有关我的言行，甚至我的想法，赖特夫人都得到了最充分的汇报，因为注意所有人并去向她汇报，在此地是习以为常的。我不能过分掩饰我的愤怒，原因是美国的所有劳动法在这里被践踏无余：这里没有休假，没有周末，人们得在制图室干到深夜，劳动时间没有任何额定。而对于这样的劳动，却不向任何人付工资。我无法理解，她怎么这样对待如此忠诚于赖特的思想与事业的人，。

有一些年轻学生喜欢上我屋子来同我闲聊。但赖特夫人却禁止他们这样做，硬说我对他們 有坏影响”，原因是我持公开批评的观点。对于她的权力和尊严的不可动摇性，她常常

感到惊惶不安;显然,她认为我作为总建筑师的妻子,是在觊觎她的某一部分权力。然而,权力和对别人发生影响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满足。我在任何情况下压根儿就没有过这种奢求。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公司内,我只渴求一点:不要来打扰我,让我清静。而换一个女人要是处在我的地位,想必就会在太阳的照耀下,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我只不过需要同家庭有交流,我只需要安宁——而在这里,这却是不可能有的!

赖特的女儿约万娜,一个颇富天才、有表演技艺、自尊心重的人,确实就为了权力在塔里辛公司里同母亲展开了争夺。她在青年中颇受欢迎,歌唱得好,诗写得好,而且又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她对她父亲的创作了如指掌,而且长相也很像她父亲,因此在那些学生眼中,她能完全代表她的父亲。她同其父一样傲慢,一样易怒,有时一样粗暴(据传)。她具有当首领的素质,很容易使别人追随她。约万娜很清楚自己的身价,她母亲也同样明白。母女俩的竞争是公开进行的。此外,约万娜对于赖特夫人的私人医生也无法容忍,这个医生在她母亲身边占据着亲近而恒久的地位,甚至还参与讨论公司的事务。约万娜不无根据地将他看作这个公司的外人,与建筑学毫无干系。不过,她在这场激战中却败北了,因为赖特夫人不许任何人批评她的亲信,而约万娜在进行非难攻讦的时候,又实在是太坚决、太急躁、太直截了当了。

聪明而狡猾的赖特夫人经常向大家(甚至向我)抱怨约万娜的"粗暴举动",决定将这个女人在半道上赶走。我不记得她女儿什么时候发过母亲的牢骚……相反,约万娜一直强调她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近"。赖特夫人确实当着我们的面开

始编织说媒的罗网(我自己也曾陷入这个罗网),很快,我们便目睹了约万娜同一位学生之间的风流韵事。这位学生比她要小25 岁,而且是赖特夫人完全忠诚的崇拜者。他出身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豪门之家。不久,他便和约万娜一道乘他的汽车前往加州……

现在赖特夫人是比较自在地喘了一口气了,她甚至不想掩饰她那轻松愉快的心情。约万娜又焦急又气愤,由于大量饮用加有各种各样镇静剂的酒而使神经大受损伤——但她从来不是酒鬼或瘾君子。她不过是失去理智,用粗鲁的态度来对待她的母亲罢了。[①]她冲着我也大发脾气,尽管我并没有妨碍她,甚至希望帮助她。但她再也不是在菲尼克斯机场来接我的那个热情可爱的妹妹了……

那年夏天就和过去一样,魏斯仍然在赖特夫人和我之间,在约万娜和她母亲之间煞费苦心地巧妙斡旋,不过,他通常是支持赖特夫人而反对其他所有人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使他深

① 过后几年里,约万娜嫁给了这个学生,并经常同他一道外出。可回到塔里辛公司后总是同母亲发生矛盾。后来,赖特夫人厌倦了这些冲突,在那位可恶的医生协助下,宣布约万娜是瘾君子,需送研究所进行专门治疗,约万娜便被关进康涅狄格州一家此类私人机构。她渐渐失去了丈夫,被剥夺了所有权利、金钱、财产。塔里辛公司的经理们(其中包括那位医生)宣布是她的全权监护人。这样,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一场神经战遂告结束。1985 年赖特夫人死后,约万娜似乎终于摆脱了被监禁的处境,而实际上她已被多年来的"治疗"毁了。只要那位医生还在任经理,并同其他一些人实质上控制着建筑学校和她父亲这家公司,她在塔里辛便没有容身之地……

感压抑。他是个有完整人格的人，他需要一个能融入他的工作和公司中去的妻子，他那第一位斯韦特兰娜便正是这样一个人。不过，在显要的客人面前，我们仍然一起满面春风地露面，而且至少在外表上竭力不露任何声色。

有一天，从芝加哥来了一对有钱的夫妇，大家都期望他们能为赖特的一个早被遗忘的建筑设计拨款。这是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离塔里辛公司不远。这对有钱的夫妇受到“红地毯”规格的接待，被安排到最好的客房住下，让他们吃喝玩乐。我得积极地参与进去。这位太太是个愉快、文雅（穿一件黑色小连衣裙）而且腼腆的人。她对塔里辛公司这种异国风味和围绕他们掀起的轰动略感害怕。他们走了，很显然，并没有作出任何许诺。过了几天，赖特夫人愤然地说：“这些人连致谢的明信片也没寄一张来！”可能他们明白了：这里的人为什么要那样接待他们。

秋天到了，也就是该回亚利桑那州的时候了，但魏斯和我希望在威斯康星多住些日子。我们喜欢这个地方，可是喜欢沙漠干燥空气的赖特夫人总是急着要到西塔里辛公司去。或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座建筑物对她更为珍贵，因为那是赖特同她一起在1934 年建成的。在那里，既不会想起奇内夫人的惨死，也不会想起她的亲生女儿斯韦特兰娜的去世。威斯康星的塔里辛公司是如此美丽，但同时也比较沉闷，使她感到压抑。她总是容易怀疑、恐惧，并对火灾充满了忧郁的思虑。

她临行前叫我去“谈一谈”，我抱着沮丧的心情去了。我明白，这不会是一场愉快的谈话。她直截了当地当面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在公司里显得不高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喜欢公司的基本原则本身。我宁愿保持沉默。但

她非常希望我能同她保持意见一致，希望我能接受一切现状，能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对她唯命是听，希望我最终能属于塔里辛公司。她知道怎样驯服烈马——更强悍的烈马——对此她有多年的实际经验。不过她同我交谈时倒挺温存，以便竭力洞察我的内心，试图以柔克刚。

我这个人实在糟糕，头脑简单、不可救药。我无法"表演"出对她的爱，哪怕她最希望得到的一点忠心也没有给她。然而我需要安宁，便要她深信——完全真心实意要她深信——"一切将会好起来"，但却完全不知这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她拉起我的双手，将我紧紧地拥在她身上。我试图挣脱她的拥抱，往后稍稍退却一点，然而她牢牢抓住我的手腕，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眼睛，不容我的目光躲开。然后她缓慢而有节奏地喘着粗气，凝视着我。我失去了一切意志力，一动不动，通身麻木地站立着。内心的恐惧像冰冷的浪头向我袭来，我不能动弹。紧张的几分钟过去之后，我放声大哭起来，而我的双手仍然被她紧紧地握着。此刻，我做了件按心愿永远不会去作的事：在她手上吻了好几次。她这才把我放开。现在她深感满意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缓缓地说，显得意味深长。我像孩子似的向她道别，用双手擦干眼泪，然后走了。回到家里我还在哭泣，为刚才发生的事而浑身颤抖。我告诉丈夫，我永远永远不再单独同赖特夫人在一起了，因为在她那催眠般的目光下，天晓得我会应承下些什么事情来。我颤抖着、恸哭着，失去了自制力，害怕交谈。魏斯仍然很镇静，保持着他那麻木不仁的习惯。他说，这一切纯粹是我的胡思乱想："赖特夫人是爱你的，而你却不能投桃报李。她对此很是伤

心。她像母亲一样热爱大家。”

啊，我现在明白了宗教教师和所有教会牧师的“仁爱”，他们将自己的信徒变成盲从的奴仆。我离开苏联，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在美国，落入又一个“精神领袖”的魔掌！

“这么说，你是完全不理解这个地方了，”魏斯忧郁地说，“生活在塔里辛公司，这是一种很大的特权，这是最佳生活方式。我以为我通过我们的婚姻，给了你这种特权。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怎样。你不能住在农场，因为你应当同你丈夫生活在一起。你应当找出一种方法来加以适应。”他一边说，一边往他的办公室走去，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处理家务事。

……我行驶在乡间马路上，这里完全没有车辆。奥莉加就在我身旁，坐在从我们的临时保姆莉丝那里借来的小篮子里。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望着马路两边令人赏心悦目的山峦和田野。这总是能给我的内心带来安宁。

要么我带着奥莉加回农场去，同马里恩聊聊，就像我同莉丝、同讨人喜欢的当地医生，乃至同商店女售货员闲聊那样。我实在需要同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在一起，以恢复我内心的平静。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喜欢同奥莉加一起玩，从不提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要求。然后我回到塔里辛公司，躲避着不同赖特夫人见面。我决定拒绝她以各种借口向我发出的邀请，因为我担心她向我施加压力：这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不欢而散，也可能逼得我臣服于她的权力。我刚刚冲出藩篱，这后一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我在苏联生活了40年，像党和政府的奴隶一般。在这里，在美国，我才开始创造自己的个人生活。现在能再次套上羁绊、再次陷入这个女人的权势之下么？在这个孩子不受欢迎的公司里，我女儿的前景如何？为什么到

头来我得强迫自己去"适应"他们?这种适应将会成为我走回头路的可怕的一步啊!

* * *

乘车从塔里辛公司去斯普林-格林购物,不可避免地要走魏斯的前妻、第一个斯韦特兰娜曾经走过那条路。她也曾在城里买食品、顺便也去去药店、理发店,可能也跟我一样,常常去道奇威尔,当然也曾多次往返于我们的农场、塔里辛公司和斯普林-格林之间,途中也经过罗德-琼斯教堂。我的思绪常常回到这位外貌姣好、黑发黑眼睛的29岁妇女那儿。从照片上看,她的孩子酷似我的奥莉加,因为他们都像魏斯,他们的父亲。

她初见魏斯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只有16岁,(魏斯当时20岁);魏斯刚刚离开了波士顿的工艺学院,到这儿来向赖特学习建筑学。他们很快恋爱上并结了婚——完全违背了赖特夫人的意愿。赖特夫人认为,对她女儿来说,结婚还为时太早。这对年轻夫妇不得不离开塔里辛公司,到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即彼得斯一家的故乡。他们在那里很幸福地生活了几年,直到赖特本人最后坚持要他们回公司为止。斯韦特兰娜也曾被迫为争取自己家庭生活的权利而作过斗争,不过,大师本人对这对年轻人非常喜欢,因而对他们加以庇护。

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时候,魏斯为自己的家设计了一幢住房,就靠着塔里辛公司,在毗邻的一座山岗上。然而,赖特夫人禁止了这种"与公司分离"的现象。房子仅仅停留在图纸上。

大约在斯韦特兰娜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孩子，驾着她的吉普车去斯普林-格林。路上，吉普突然失去控制，滚到了乡村公路的坡下。她死了，两岁的达尼埃尔也死了。大孩子被摔出车外，虽撞伤了，但幸免于难。有一次，我想到这件事，便在琼斯教堂旁边停下来，斯韦特兰娜就葬在那里。我去寻找她的坟墓。找到她的坟墓，我震惊了k k 墓石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斯韦特兰娜·彼得斯"。小达尼埃尔就葬在她的身旁。我的奥莉加长得与他十分相象！我浑身阵阵发冷。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小心地驾驶着汽车。

当然，我早就知道我们同名。但是，这次在墓地里同要我来扮演其角色的人的奇遇，对我却是一种警告。从那时起，我便把同奥莉加一起走这条路视为畏途。现在，在我心中已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一种综合反应，对此我真毫无办法。由于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重复这个女人的生活，当她丈夫的妻子，我恐怕也避免不了这种悲惨的结局……或许，连我女儿也不例外。

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感迫使我认真考虑奥莉加的洗礼问题。我坚信，那样她一定会受到上帝的保护。

魏斯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不过，他喜欢这件事却另有原因。那是因为由弗·洛·赖特设计，而由魏斯10 年前在米尔沃基修建了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现在，正打算庆祝"修复"这座报喜节教堂。所有在美希腊人的大主教雅科沃斯届时将光临庆典。何不利用这一良机为我们的奥莉加行洗礼呢？

这些事我一无所知，我只希望静悄悄毫不张扬地为她行洗礼，在什么地方都一样。对我来说，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但魏斯却希望在他的好友吉恩·马塞林克绘制的祭坛前为奥

莉加洗礼。吉恩曾经以魏斯的第一个妻子及儿子为原型，绘制了一幅圣母同圣婴的圣像……这些现代风格的圣像（完全是非传统手法的）是报喜节教堂圣障的装饰。这座教堂，赖特决心按希腊剧院的样式修建，希腊人只好暗暗忍下这种秽渎；不过，这座教堂后来渐渐引来一些旅游者，最后它受到了整个教区的赞扬。现在，大主教就要前来重新祝圣祭坛，再没人对教堂奇怪的轮廓大惊小怪了——它像一个巨大的碟子将一个翻转的同样的碟子罩住……弗·洛·赖特自小就没上过一家教堂，但他认为，正是这种古希腊式样的半圆形剧场，而不是那种圆屋顶上装十字架的传统设计，更合希腊人的精神气质。

所以，魏斯挺热情地通知米尔沃基的报喜节教堂执事会，说我们决定在那里为小女儿行洗礼。大主教早已表示，在将祭坛祝圣之后，愿意举行一个加冕仪式或洗礼仪式。能为修建这座教堂的建筑师之女举行这种仪式，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对于新闻舆论我真是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又被推上了公众和报刊的风口浪尖，而这，我是多想远远避开啊！我只想举行一个私人的、毫不声张的仪式，我们的教母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是，能在报刊上提到修复这座教堂的塔里辛公司的建筑师们，这机会却是十分诱人的。于是我们——甚至还有婴儿——又得屈从于塔里辛公司的利益。赖特夫人对于去米尔沃基同大主教见面，并在报刊上披露这件事也激动万分。

魏斯和我打算邀请一些好友作奥莉加的教父母，但教堂坚称“只有希腊人”才能充任教父母，而且已经指定了某些人选。这便是米尔沃基的法官和他的妻子。“风俗便是如此！”人们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同意任何愿意为你们的孩子当教父的人！我们这儿只能遵循希腊的风俗办事。”尽管我在俄罗斯

东正教中从未听说过有此类规矩，也不得不同意了。魏斯认识那位法官，不过我喜欢的倒是他那娴静美丽的妻子，我们因此才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在庆祝希腊东正教报喜节教堂落成10 周年及其 修复”那一天，塔里辛公司的全体人员都来到这里，因为这座教堂的建筑是他们最喜爱的杰作之一。画家吉恩·马塞林克虽已不在人世，他的名字仍然时时被大家提到。由于他潜心钻研圣画，并为这座教堂的圣障作了壁画，他甚至转而皈依了东正教。

庆祝修复的仪式一大早便开始了，这是一个时间拖得很长的古老仪式：寻找上了锁的教堂的钥匙，端着礼品围绕这幢房屋转上许多圈，最后，进入教堂，由大主教洗净祭坛，在修复的、被全部烛光照得通明的教堂里久久地祈祷……洗礼应当下午在一个地方举行，不需要所有教民出席，但几位神甫却忙个不停。晚上很晚的时候，为表示对至圣的雅科沃斯的感谢，米尔沃基整个希腊人社团为他举行了一次宴会。

魏斯欣喜若狂，因为奥莉加将在由他的朋友马塞林克绘制图案的祭坛前举行洗礼，在这里，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的面貌与他的第一位斯韦特兰娜和他的儿子布兰多克十分相像。这一切，就跟小说或电影一样，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巧合和稀奇古怪的情节……

大家都心满意足。当按希腊方式将奥莉加三次浸入很深的圣水盘时，她拉开大嗓门哇哇直哭，整个教堂里都听得见。身穿黑色长袍的神甫们唱起了祈祷文。大主教亲自为她行洗礼，而那位担任教父的法官将她裹进一张教堂用的毛边毛巾。（既然一切都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我们未能搞到一条相应的洗

礼裙，这使教母很感伤心。不过，相反地我倒觉得一切都满不错!) 就连为纪念我外祖母奥莉加·阿利卢耶娃而起的奥莉加这个名字，也再好不过了。这在希腊是最常见的名字之一。在希腊，人们还记得奥莉加皇后，她是二三十年代在希腊最受人爱戴的人。甚至婴儿在5 月21 日这天出生也使大家感到高兴——这一天是希腊基督教奠基人圣康斯坦丁和叶莲娜的纪念日。教堂修复之后，整个充满了深深的圣洁感，我们的女儿受到了大约是所能受到的最出色的洗礼……

好几天，她身上都散发出烛油和焚香的气息，但长时间的仪式使她疲乏不堪，她一口气睡了好几小时。然而，对于水的恐惧，却一直保持了好多年。

……当我们沉浸在温馨幸福的心境中，返回塔里辛公司的时候，遇上一场暴风雨。尽管时间很晚了，魏斯仍被赖特夫人立刻叫去。他从赖特夫人那里回来时，脸色很不好看，往椅子上一坐，用双手捂着脸。

“ 我们犯了一个大错，”他绝望地说道，“ 不过你别着急，全由我来兜着。我本该知道这件事！ 我本该把这件事考虑得更好！”他所有的高兴劲全没有了。这一次我们又犯什么忌啦——我猜不出来。

“ 赖特夫人伤心透了。大家都看见了，她甚至没留下来同大主教一起进餐。她说她要走了，因为她再也受不了所有这些表演。她感到，我们完全把赖特先生忘在脑后了，而我们这个婴儿倒成了公众和报刊注意的中心。然而最糟的是，她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有意策划的。我至少做到了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打消她的想法，而且她相信了你是打算不事声张地，以私人的方式来操办此事的，并不想让舆论知晓。是那些希腊

人只想自己满意，才把这事搞得满城风雨的。”

这就是说，她又使魏斯的高兴劲一扫而光，使他变得垂头丧气！她破坏了我们这次庆典，给我们愉快的心情大泼冷水。我再也无法克制，把我对这个刁钻古怪、醋意十足的女人的看法一古脑儿向魏斯讲了出来。但他已疲惫不堪了。实际上，他是希望大家都高兴，人人都满意。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 * *

那年10 月末，秋天时节，我们乘飞机回到亚利桑那。又是无休无止的节日、庆典。首先是感恩节，同许多客人在一起度过；接着，圣诞节又临近了。从威斯康星同我们一道回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临时保姆帕梅拉（尽管我倒是更喜欢文静的莉丝，一位四个孩子的颇有经验的母亲）。她住在亲戚处，但到我们塔里辛公司来带奥莉加。赖特夫人又一个劲坚持，要我从公司请“女孩子”，而不用“外人”。但是，我只想把孩子交给我了解的人。把孩子交给赖特夫人本人亲近的女人，我是不放心的。

赖特夫人又找机会同我单独相处，而我总是找出各种借口加以躲避。我忘不了在威斯康星那不愉快的一幕。她邀请我去“喝杯茶”，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当然，她是知道我害怕什么的。她绝顶聪明，颇富洞察力，是一个真正能了解别人内心世界的人——这一点不能不承认。她喜欢拥有权势，善于随机应变，耍弄阴谋，而且深谙经商赚钱之道，懂得如何利用报界，使之有利于自己。在这一切问题上她都可以获得尊敬。而且我常常感到，她对我是喜欢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想将

我整个地掌握在她手上,使我屈从于她的一切任性的作法,就像她对魏斯所作的那样。因此我是反抗她的。她对于这种把戏无疑十分了解,她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一切令我痛苦,而魏斯长时间到伊朗去出差又使我孤独寂寞;有一次我失去自制,竟在我的医生的诊断室里放声大哭起来。这位医生本人也与公司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他瞧瞧我,说:“要明白,您只有一次生命。从您怀孕之初我就在对您作观察。您常常忧心忡忡,痛苦落泪。我让您到加利福尼亚您大姑子那里去,甚至让您在那里生孩子,是因为我明白您在公司里的处境。但是按规定我是不能这么作的,因为我是您的医生,有责任在这里对您作观察,叫您丈夫呆在您身边照顾您。但是我对于塔里辛公司和那位太太是太了解了,她在这儿一手遮天……为什么您不找一种妥协的办法呢?到不远的地方去租一幢小房子吧!您搬过去,使事情产生这样一种变化,或许彼得斯先生也会满意的。”

我完全不相信我丈夫会喜欢这个主意,不过,当他从伊朗回来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我们共同在公司附近买一幢小房子,将它用作我们一起生活的地方。开始他是赞同这个计划的。一起买幢房子并不是要分开。

我们找到一幢不大的房子,并连同全部家具、陈设、杯盘、刀叉之类全部买下。房主是芝加哥人,很想离开这荒漠之地,实际上是把那房子抛售了……不能有更好的主意了,我除了衣物书籍之外一无所有——我在普林斯顿的老家当,早已悉数卖光。

1971 年圣诞节后,奥莉加和我搬进了以彼得斯夫妇的名字注册的新居。帕梅拉仍然到我家来照看奥莉加。这地方可

安宁多了！周围再没有无休无止的来访者、旅游者了，也无须去同各色人等保持强求的“一致”了；把这些人凑在一起犹如送进了一座成人幼儿园。但魏斯仍然留在塔里辛公司。我出走的愿望使他深受创伤，我们搬走之后，他便纵情宣泄他的痛苦，倾吐他的积郁。他知道，我们一直等待着他，我们的大门日夜为他洞开，然而他很少同我们相聚……

当地报刊当然了解到了这一“新闻”（大概是来自塔里辛公司吧？），即我们买了一幢房子，而且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山阴”——正如我们在斯科茨代尔的村子也有个浪漫名字一样——平静地生活了一个月后，一天早上，我家门前来了一名本地记者。尽管是一大早，我只穿一件早晨下厨穿的长袍，打着赤脚，仍然很礼貌地对待他。那时候我还相信，只要同记者坦率诚恳地谈话，他便会把意思原样地传达给读者（这简直是一个要命的谬误！）不过，我没让他进屋，我们隔着一道网门交谈。他越过我的肩膀往屋里窥视，想看清屋里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他装作吃惊地问：“可您为什么住在这儿？”我回答说：“这是我和彼得斯先生的私人宅邸。”

但他已经听出了别的什么。“您是单独居住吧？您要离婚？”他多嘴多舌地问。“当然不会！我只是离开了塔里辛公司的集体生活。”

我的这番回答很快在当地报纸上报道了。这时不断有人打来电话。从塔里辛公司传出话来说：“他们已经分居了，她丈夫现在只盼着离婚。”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讲的，但说我丈夫盼着离婚，我眼下倒是一点也不清楚。

我坚持说，这房子是我们共同买下的，并拿出房契为证。这时，魏斯出来辩护了。他也是在报刊上宣布，他拒绝这幢房

子的一切权利，他确实希望我要么尽快回塔里辛公司，要么就办离婚。这两个办法我都拒绝了，并找出一个折衷方案。但魏斯坚称他"任何折衷方案都不接受"。我感到是赖特夫人在操纵着他。没有赖特夫人，魏斯是一步也不敢动的。

我去找亚利桑那州的所有朋友帮忙，我知道我是有这种朋友的。我们的税务稽查员，一个胖胖的和善的人，把一切过失都归于农场：我们在那里培育肉畜的计划很快宣告失败了。他坚持认为，我应当立即停止农场里的所有经营活动，"因为您那些男子汉连如何造决算表都一窍不通！"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该雇一名管理员。不过，我并不打算现在就"停止经营"，因为我继续指望着某种折衷的解决办法，指望着有可能保住家庭和另立的门户，指望着魏斯能做出某种明智的和解，能有所让步。他知道，塔里辛公司并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们在菲尼克斯的老律师同意我的看法：魏斯对于我获得宁静和家庭生活的要求不够关心，特别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不是那些到塔里辛公司来猎奇的年轻学生，觉得越是奇异就越好。赖特夫人向我发出邀请，要我"回家"。我无法对我到底该怎么办作出抉择，因而苦恼不已；而记者们却一个劲来电话，甚至登门造访。

现在被我视为朋友那位医生又出面过问了。他真诚地愿意帮助我。他建议魏斯和我去找一位婚姻问题专家——一位很客观的职业心理学家，要他同我们每个人都单独地谈一谈，了解清楚我们的愿望和委屈，找出一个解决冲突的合理办法来。"去找 ε. 医生吧！"他一再说，"我知道他是个很正派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他会帮助你们把关系弄清楚，不然，那些

个报刊简直会把你们气疯!”

于是我去找那位菲尼克斯的医生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一位精神病学家谈话。一个与我并无利害关系的诚恳的人,在倾听我讲述我的经历,这令我感到很高兴。我更加不理解我的丈夫和他的行为了。我相信,现在没有我了,他在做什么,想什么,或拿什么主意等一切方面,就完全听命于他过去的丈母娘了……

医生 ε.,菲尼克斯市著名的婚姻问题专家,是一位生性乐观、举止文静的中年人。他倾听完了我从童年起的漫长经历。他态度委婉,精神集中,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过后他叫来魏斯,期待他也有同样诚恳的叙述。最后又把我叫去。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同我们单独谈话。这段时间,我和魏斯彼此都没来往。

然后他向我讲了他的结论。结论是十分不妙的。他说,他确信这样一种情况:当妻子在为保住家庭而寻求折衷办法的时候,丈夫感兴趣的却只是如何尽快 摆脱”这个婚姻。“我这样讲很感遗憾,”他说,“但我对他毫不怀疑——他希望解脱。我认为他对我是完全坦诚的,谈到他的感情时毫无隐瞒。”

好了,现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了。他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一个错误。他不喜欢孩子,对孩子漠不关心。

ε.医生看出我非常震惊。“你听我说,亲爱的,别再作回塔里辛公司的打算了。”他建议道。“您恰好会受到这么作的诱惑!您回到那个地方去,只能又从那里逃出来,这样做简直会把您自己给毁了。那地方实在不适合您。您需要一个普通的、传统的家庭。您希望像普通人那样过日子。您希望成为

与大家完全一样的人。可魏斯笃信他那一套哲学。您落到那地方实在是太倒霉了! 我还记得报上对您那过分仓促的爱情和婚姻所作的报道。成熟的相互关系,要求从一开始便能相互理解k k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年人才可能建立起稳固的家庭。可你们仅仅是相互认识而已,我要说,这是很不明智的。您丈夫应当明白,很少有人能以他这种方式生活。他可是58 岁的人了,而不是一名中学生。我对他并不感到同情。我觉得他压根儿就是在冒险,这可不是好事。”

我没有事先同 ε. 医生商量,就答应他不打算回塔里辛公司去。他吩咐我说,无论有事无事,我每周都应当到他那里去一趟。“整过这件事使您太震惊了,您很需要同一个不偏袒的人谈谈。常来同我聊聊吧! 这种处境对您来说是困难的。”

当然,他说得对。我便每周都到他那里去,心里忍受着诱惑的熬煎k k 我渴望回家,想后悔,想答应一切条件。要是没有 ε. 医生的帮助,我一定就这么干了!

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我无法再抗拒我的渴望,便坐上车,直奔塔里辛公司。天已经黑了,我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停下。我知道怎样从后门进入我们的房间和望得见公路的露台而不被任何人看见。这时候,人们通常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度过一个漫长的工作日后都累了。我蹑手蹑脚从花园溜进露台,靠近了通往室内的玻璃门。

我感到心灰意冷。一切依旧,跟我离开时一样,这儿的所有东西依然存在——墙上挂着古老的兵器、中世纪的伊朗军刀、悬吊的植物、书籍、晶簇及其他矿物——魏斯喜欢在身边看见的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我悄悄穿过客厅,看见魏斯身穿丝绸长袍坐在那儿,赤着脚,背向着我。他正看电视,一动

不动，像一块石头。我走近他，用手摸摸他的肩头，忍不住泪珠滚滚。

他站起来，面庞正如我第一次看见他时那样，一脸忧郁，两颊布满了一丝丝深深的竖纹。他面色苍白而疲乏，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你得走，”他说，生怕有人看见了我。“你得走，你得……”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我也同样如此。他向大门走去，仍然赤着脚，我就跟在他的身后。他知道我是从哪条路来的，跟我一道向我的汽车走去。那汽车就停在一丛仙人掌和一堆荒漠上的巨石中间。四周空无一人，只有明亮的星星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我们都没吭声。

于是我又返回去了，仍然止不住热泪满面。从汽车的反光镜上我能看到他，他还站在路边。我穿过荒漠，行进在一丛丛仙人掌中间，沿着约万娜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那条路往前走。这是一条尘土满天的石子路，通向不远处的柏油大道。我是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

*　　　*　　　*

我们的分居生活，报界向全世界作了报导。我收到各种朋友的来信，他们向我提出建议或给我以帮助。我女儿奥莉加的教母，在女儿第一个生日从米尔沃基赶来看她。姑妈和早川姑父也从加利福尼亚来了。魏斯在这一天也送来了鲜花，还呆了一会儿，要看看奥莉加。女儿则坐在魏斯的膝盖上，平生第一次尝了尝香槟酒的滋味。

强烈的痛苦似乎减轻了一些。另一次，魏斯带来了他的两位德国朋友，他们想看看奥莉加。后来，又有一对瑞士夫妇

(丈夫是美国人),也同他一道前来——他们的男孩比奥莉加仅仅早一周出生。我们将两个孩子都安放在学步栏内,在他们头上戴上牛仔帽,为他们拍了几张很滑稽的照片。大伙都喜笑颜开,可是不幸却悄悄来到了。

由于报界一个劲地误传,已经多次提到所谓"离婚"的问题,我只好去求教一位老朋友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律师:我该怎么办才好。我不想离婚,但魏斯却希望尽快离掉,并把诉诸法院的"特权"留给了我。那位律师来到亚利桑那,我们便坐下来讨论事态。"你们在银行的合并账户已经分开了吗?"他立即提出他的第一个问题。"没有,干嘛要分开呢?"我惊异地回答。"您得注意!"他说,"你们已经分居了几个月,而魏斯却继续使用银行里您名下的支票!你们的农场怎么样了?您大概还在按他们的账目悉数付款吧?"

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律师明白,不可再耽搁时间。他立即动身到银行去,将我们的合并账户分开。然后他又赶往威斯康星州,走访当地银行,查看了农场,正好见到农场在最紧张时候的所有各种活计。他一回到亚利桑那便愤愤不平地来找我,并把"在美国的实际生活"经验教给我,不过我是一直没有学会……他讲的话当时听来似乎有些无耻,不过我忍住了,因为他是我朋友的丈夫。不过我很害怕听见他讲的话。

"这个人不会再爱您。他希望得到解脱。您以为您能用您的钱来把他拴住么?爱情不可能用金钱买到。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结婚,但现在对您来说是申办离婚的最好时机。请相信我,现在一切对您都是有利的,绝对一切!您将得到这座农场,因为您已投入了比它当初的价值高过数倍的资金!您应当从他和他那儿子手中收回农场。那个儿子没有任何权

利以这种方式花您的钱！您和您女儿将得到一切。我们要将此事诉诸威斯康星州法院，那里所有人都知道，您为这个不动产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您可以把这座农场为自己保留下来，也可以把它卖掉，或者，可以出租土地。土地可是一笔很保险的存款。您面临女儿的教育问题，您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您明白您为这次婚姻已经丢掉多少钱了吗？[①] 现在您剩下的钱只及你们结婚那天您带给他的资产的三分之一了！而且，您还支付了他的全部老账，把他从破产之中拯救出来。您知不知道您还支付了财产赠予税？这是一种特别税，因为借贷是您作为赠品提供给他的。他是怕向您借贷，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得把这笔钱还您。啊，我对这个人真是无话可说。”

听着他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我心中慢慢升起一股怒气。这个年轻人什么也不懂。老在这里讲钱、钱、钱！“不过我已经讲过了，我不想离婚。我作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爱。我爱他，您知道吗？”

“可他并不是这样！”律师毫无怜悯地冲口说道，“他要离婚，只要您给他诉诸法庭的机会，他就要离开您，把您抢夺一空，您将落得个一败涂地！我要飞回我的事务所，把一切材料准备好。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他这么说着离去了。后来我那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她丈夫如何对我的处境作了深入研究，打算如何帮助我。

许多许多年后，当我历尽孤独和艰辛——在美国，这对于一个离婚的单身母亲来说是常事——当我完全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位年轻的律师当初是多么正确：在

① 总数超过70 万美元。

美国,一切正是如此! 不过,在1972 年,我还没学会按美国方式来生活,我那来自苏联的偏见还支配着我。他当时为我作出的所有建议,我认为是庸俗的、无耻的、残忍的。我办不到。我不能按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人们不曾教我们去考虑家庭生活中物质的这一面(“只知道‘爱情! 爱情!’”),我不能去一个劲地数钱算账,考虑女儿的将来……我完全没意识到,他给我提出的建议是摆脱现状的最好出路。

所以,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正式信函,通知他说,我不打算提出离婚,说我对他所作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①] 同时也感谢他的良好意愿,不过我对整个这件事完全持另一种看法。

不久我收到他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不再办理我的业务,并附上收费单。不过,他还是建议我尽快签署一个划分财产的协议,以便对我们的分居生活作出合法规定。但他写道,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再帮忙。

财产分割协议于1972 年7 月签署,当时菲尼克斯的气温高达华氏120 度以上。5 名当地律师和我们的税务专家出席了签字仪式。我放弃了对他那座农场和土地的要求,只把一座小小的马克-卡钦农场留给了自己,不过当即就把它卖了。我无力去作抗争:魏斯和他儿子不想我在“他们的地盘”上留下任何东西——看来,他们认为整个威斯康星州都是“他们的地盘”……

魏斯和我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争吵。他的儿子布林道克也是满意的,因为他的一个有钱朋友

---

① 他停止了农场的一切业务,将银行中我的存款与丈夫的作了划分。

马上就要买下"阿德巴兰"农场，连同土地、畜群、汽车在内统统买下，因此，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在现在属于他朋友的农场里过日子、干活。(我一直对这个年轻人抱着怜悯之情，他童年时就悲惨地失去了母亲，在冷冰冰的塔里辛公司孤孤单单地长大成人。)父子俩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中谁也没有考虑过奥莉加的将来。

我得到的是照管女儿的全部责任，却没有得到她父亲一个子儿的赡养费。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作为塔里辛公司的建筑师，却没有一笔真正能算一回事的收入。在那里谁也没有收入……

我们从律师事务所装有空调的凉快房间里走出来，踏上菲尼克斯炎热的大街。那里简直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我的代表，一位当地律师，当时深感失望：他认为，我已丧失了一切。我倒是无所谓。

某种有意义得多的东西已经失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　　　*　　　*

小房子里的家当已经包装好，我们要迁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对我来说，明白应当怎样过独身生活的城市，在美国只此一座。邻居们告诉我说，我过去住过的老房子现在又空下了。我立即提出将它买下。我认为，我在那里可以找回我两年前抛却的一切。那是我十分喜爱的威尔逊街50号！

"比肯斯"公司的一辆大卡车装走了我们的全部家当，亚利桑那的这座房子则只有卖掉了。我感到浑身精疲力竭，精神上备受压抑。不过，发生最坏的事情的时候，我永远显得沉

着冷静……ε. 医生一再要我回到有老朋友的地方去; 而且跟以往一样, 看来他说得很对。

魏斯同我们一道飞往费城, 然后马上又乘返航的飞机回去了。一位认识多年的老司机, 开出租车从普林斯顿到机场来接我们。在飞机上, 我和魏斯一直没有交谈, 但我们轮流抱着一岁的奥莉加。奥莉加跟平常一样, 爱笑爱闹, 挺快活。一到费城我和魏斯便告别, 他匆匆向登机的大门走去。他脸色苍白, 不过还是吻了吻奥莉加, 也吻了吻我。

赖特夫人(正如朋友们后来告诉我的) 生了好一阵子气, 过后便吩咐所有人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报界把塔里辛公司搞得很狼狈, 但谁也不想再去谈论我们了。一年之后, 魏斯向亚利桑那州马利可普区法院提出离婚(我们办理结婚就在那里) 。仅仅过了10 分钟, 他便拿到了离婚手续; 因为我没出庭。既无仇恨, 也无争吵, 一切办得妥妥帖帖。他摆脱了所有责任。

倒霉的媒人赖特夫人不愿意有人提起她的失败, 正如政治家不喜欢回忆他的受挫。她对另一个斯韦特兰娜的"母爱", 原来竟是假的。

至于她那位建筑师以及他感情上的问题, 这一切倒竟然与她无关。她甚至将一切过错归咎于他。但是人人都很清楚, 邀请我到公司来参观的并不是魏斯。如果没有她的赞许和愿望, 魏斯永远不会同我或同其他任何人结婚。魏斯又沉溺于他的工作了, 犹如醉汉沉溺于美酒一样——许多年来他一贯就是如此……

对于我和奥莉加来说, 现在是我们一个新生活开始的时期, 一个寻求独立生活之路的时期。

忧郁的十年

(1972 —1982)

一辆天蓝色福特汽车在宽阔的州际公路上飞驰，经过宾夕法尼亚广袤的乡野。

8 月下旬，高高的小麦已经成熟，不久前一场雨水使草地显得碧绿耀眼。汽车经过特拉华河的分水岭。大河流经这里时，夹在高高的陡岸之间，汹涌咆哮，飞奔而下。现在，四周展现出片片田野，间或也有些荒芜低矮的山岗。孤零零的硕壮的大树，树冠呈圆形，东一棵西一棵地肃立着。

几乎穿越全国的州际公路，看不见尽头；一条条地平线在眼前不断展开；草地上明丽的斑斑野花，一个个小小的树丛，之后又是无边无际的田野，煞是惹人喜爱。1967 年，凯南夫妇邀请我去宾夕法尼亚的小城东柏林附近他们的牧场，我第一次飞行在美国上空；打那以来，我还没有见到过

宾夕法尼亚的乡村。现在，我带着我的女儿到山中一个遥远的湖边去度她的第一次夏令营。她这时9 岁。

去这个夏令营是我的一个朋友建议的。他是科学派基督徒，在普林斯顿行医；普林斯顿是我们从亚利桑那回来后居住的地方。除了说夏令营对奥莉加将是一次美好的新经历外，我们这位朋友还坚持认为，我应当同女儿一道来作这次漫长的旅行，以便彻底摆脱我的恐惧心理——我一直害怕开车带她。这个毛病我是在威斯康星州患上的，那是在我看到彼得斯的第一位妻子的坟墓之后——她同她两岁的儿子一起死于车祸。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摆脱这个恐惧心理。但那位科学派基督徒的建议是对的：在同女儿一道经过这漫长的旅程之后，我终于从恐惧心理中解脱出来。现在，在同她一起返回新泽西州的路上，我有了一种轻松和幸福的感觉。

奥莉加读着杂志，将她那长长的双腿（跟美国人的一样）从后面伸到折叠座椅上。购买这辆大汽车是为了实用，并非为了观瞻。它简直就是一辆大马车，一辆四轮大马车，上面可以装家具和自行车。现在，车后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房间，堆着装便餐和水果的筐子，还有几个装苏打水的罐子。

这辆福特已是我的第三辆汽车（从1968 年算起）。一辆墨绿色的“牧师轿车”曾载着我到亚利桑那和威斯康星旅游。我曾建议把那辆车给魏斯前妻的儿子，但他拒绝要这“老掉牙的大车”。他想有一辆时髦的雪铁龙，我们使他如愿以偿了。因此，那辆“老掉牙的大车”又回到我的身边，并在1971—1972 年在塔里辛公司时，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那时候，我们就驾驶着那车在威斯康星美丽的乡间公路上跑来跑去——奥莉加坐在她的篮子里，篮子放在前排的座

椅上。我们一路上不断停下来采摘野花, 那地方遍地是野花。同时车上的录音机继续放着音乐——我俩都喜欢音乐。要不, 我们便去道奇威尔洗车; 要不, 就将车停在威斯康星河畔的野炊坪边, 欣赏这条大河奔腾不息的河水在落日余晖下呈现出的一片玫瑰色……

在亚利桑那, 我仍然将奥莉加带在身边, 放在前排座椅上的小篮子里, 一直到她长大到可以坐在汽车的儿童座椅上为止。我们也将车停在荒漠的道路上, 停在一丛丛仙人掌之间, 就呆在汽车上吃一点夹肉面包, 因为地上到处都有蝎子和蛇。我一边咬墨西哥塔可饼, 一边瞧着我这道奇; 它满身尘土, 扑满了荒漠上的沙粒。

然后, 老道奇载着我们回到普林斯顿, 为的是又停在威尔逊街50 号我们的家旁。我喜欢这辆车, 本来想用得再久些, 但是现在奥莉加坐在前排她那专门的儿童座椅上, 总想去打开车门, 不然就去碰碰方向盘。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我将我这个老朋友换成了一辆新道奇——一辆74 年出品的运动型双门轿车。这辆车的车顶有一个窗口, 它的浅色调也令人愉快得多。后来又时兴起"大车厢"即大型家用轿车。我喜欢像美国的家庭主妇那样, 用孩子啦、自行车啦、衣筐啦、在超级市场买的大包小包东西啦, 塞满自己的大车。什么东西都有足够的地方堆放。我们的大车厢福特车是1979 年才买的; 那是大路上一只真正的蓝鸟, 我们非常喜欢它。

我常常同奥莉加一道, 坐上我们的蓝鸟, 到新泽西州南部大洋的岸边。从普林斯顿到那里只有两小时的路程。在那儿, 我俩一起度过几小时愉快的时光, 在名叫船底的小城边或巴勒加特灯塔附近的海滨浴场去游泳。一只只小小的渔船在

海湾时隐时现，我们则在沙岸上徐徐散步。新泽西州大洋区笔直的公路，穿过一片片幼嫩的松树林和柞木林。这地方可真妙极了，我常常在想——我们要从极可爱的普林斯顿迁走吗？可是，我们应该永远留在那些好学校旁边啊！

同奥莉加一起坐汽车路途最长的一次旅游，要算我们去北卡罗来纳州了。那里也有一座灯塔，屹立在加特拉斯海角上；沙滩上也有一个长条形海滨浴场，也有落日的余晖，有沙暴，有大海无与伦比的礼物。坐在大洋岸边，我常常回忆起莫斯科河边的沙滩浴场。那是在莫斯科以西的地方，我常常带着儿子和女儿，还有女儿那位满头金发的小伙伴，一道前往……或者，又回忆起美妙绝伦、令人永远难忘的黑海岸边那些遍地铺满滚烫砾石的浴场；或者，又回忆起东克里米亚的公路，我曾不止一次驾车从莫斯科驶往那里。我坐在沙滩上，用草帽低低地盖着头，倾听潮水的低吟，孩子游水的嘻笑，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地方……

地球无疑是圆的，你从一个地方起步，最终又将回到原地，而你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养育自己的孩子。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在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的……政治疆界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则是严酷的，不过，有时也能获得短暂的安宁，感觉到一种永恒。这种时刻，常常正是在海岸上才能产生。

我在暖烘烘的太阳下打盹，心里在想，我这最后一个孩子，我的奥莉加，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一种恩赐啊！正因为有了她，我的生活才如此充实。我们在日复一日平凡的共同生活中获得了多少幸福啊！在这种极幸福的时刻，我感到我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抱怨什么。广阔的生活之河自己知道流向何方，我干脆就随波逐流吧！

*　　*　　*

现在, 在美国过了最初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后, 在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 我又回到了普林斯顿, 独自一人和小女儿在一起, 更多的是被她所牵制, 我控制她的时候倒要少些。现在我的整个生活就是教养女儿。

我现在经常会见的再不是出版商和编辑, 而是儿科医生和临时保姆。后来, 接触的又是女儿的老师和她同学的父母。对我来说, 她确实成了整个地球旋转的中心。以一种奇异的、始料不及的方式, 我又一次在体验我在俄国非常熟悉的生活方式: 我曾在离异状态下, 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我没有去作"俄国专家"、俄语教授和"苏联事务"通; 现在我生活在较为正常的人群之中。他们绝对地远离政治, 也不似塔里辛公司那种"怪癖人"。现在一切都更单纯、更平凡、更轻松。

奥莉加还很小的时候, 魏斯曾4 次来普林斯顿看望他的女儿。然后, 在长达6 年之久的时间里, 他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从他姐姐处得知, 他仍然健在。后来, 在奥莉加满10 周岁的时候, 他突然又来了; 父女俩都一语不发, 显得挺尴尬, 犹如两个陌生人。魏斯天生不是当父亲的料, 他从来也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 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尽管奥莉加多才多艺, 跳舞、唱歌、游戏、绘画样样在行, 但他们仍然找不到共同语言。

我们又住在威尔逊街我那幢白色的老房子里, 遗憾的是, 在我们短暂离去的期间, 它已遭受了一番"改进"。买下我们

这幢房子的一对年轻人(后来又将它卖给了我们)增建了一间可停放两辆汽车的停车房,一个装栅格的大阳台取代了几个窗户——这是美国的传统"游廊"了。这些大型增添物将房屋所有的匀称美全破坏了;但是,一个年轻而富有的家庭的需求就是这样。他们还在停车房里放进一艘大摩托艇,还打算在车房上面修建几间"客房"。

当我回到普林斯顿,看到这一切辅助建筑和"改进"之处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一幢房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这么轻易地毁坏啊!(这些东西都在购买契约上提到,然而我却一心想着我那老房子。)我如此急不可待地要回到我那幢"可爱的小房子"去,以至一些细节也没有过问——为什么税金和价格都上涨了?……

不过,有些东西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工作室里的绿地毯还是那一张(是那位胖胖的装饰师放的)——现在让奥莉加住这里,她的玩具则放在曾作书架用的木架上。

谢天谢地,那间美丽的方形客厅还未遭破坏!两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也没有对楼上的卧室动干戈;仍是那两间朴素的房间,左边一间,右边一间……

损坏最严重的是花园。不知为什么他们砍掉了很多树木,使邻家的房屋无遮无掩地显现出来,失去了僻静感。有一侧则建了一道很难看的栅栏,而过去那里与邻舍的界限只是一些花草和枞树。由于那些巨大的附加建筑,整个房子看上去显得很不对称。那些建筑完全破坏了这座小型房舍具有的魅力。

我将房子漆成深红色,就是那种"粮仓的"颜色——这是美国人挺喜欢的色调——目的是使建筑物在视觉上显得小一

些。客厅里铺上了我们的地毯,那是纳瓦霍印第安人织的,是魏斯送给奥莉加的礼品。全部家当都是装在比肯斯大卡车里从亚利桑那州运来的,然后又恰如其分地安放在了我这亲爱的老房子里。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了!

过去那些老邻居仍然住在那里,都全力以赴地前来帮忙。住在马路对面的儿科医生——他妻子是我的至交好友——在以后的10 年中成了给奥莉加看病的大夫。两位未出嫁的姐妹也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在家务事上给我出主意,非常喜欢奥莉加,常常长时间地陪伴她,分文不取,为的只是自身得到满足。现在,没有花匠我也习惯了,还学会了用自动刈草机清割草坪。一年之后,当广播和报纸在讨论我们由亚利桑那州法院最终判决的合法离婚时,我却跟在刈草机后面满园子跑,让它的达达声将我的种种情感和委屈淹没掉。刈草机在许多情况下都帮了我的忙。只要清割草坪,一切便置诸脑后了。

每逢星期六,我们整个威尔逊街便响起一片达达声,大家都在修剪自家的草坪。奥莉加这时就坐在树下的学步栏内,稍后,又坐在一只沙箱里。后来,我给她买了金属吊杠,让她学着去爬;我以能亲手组装这复杂的"组合件"而颇感自豪。一架小秋千就挂在一株老苹果树的粗枝干上。

按照俄国的老传统,我认为她应当很早就开始学习外语——我开始学习德语是在4 岁的时候。但是,雇请外国或本国家庭女教师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我的大孩子们就跟其他人一样,在莫斯科时直接上了小学。在那里没有任何选择可言:大家都只进国家办的学校,按国家制订的教学大纲学习,进国家办的托儿所或幼儿园……

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世界里,在我的新生活中,我力求避开同一切国家的,一切由政府控制的机构打交道,而争取首先让孩子上私立学校,这是十分自然的——我那时付得起钱。不久,我便只好打消聘请法国家庭女教师的念头,因为在美国,这只有大富翁才请得起,而我并不属于大富翁之列。不过,我并不赞同我的邻居们对公立学校、对"社会责任"的兴趣,以及要在涉及孩子的事情上"从社会获得一切"的向往。我已经明白了,我只会送奥莉加去那所圣心天主教学校,几年前我在普林斯顿见到过那所学校。她上学暂时还小了一点。

同所有美国孩子一样,她在看电视上花去了许多时间,少儿节目也确实办得很棒。电视成了我的好帮手。如《罗杰斯先生的邻居》、《塞沙梅大街》等这样一类节目,都使奥莉加跟所有孩子一样成长起来,对她的发展有极大的帮助。这恰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啊!我们生活在美国和英国期间,我从未教她学会一句俄语,她也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并没有移民那种"人格分裂"。

电视教她学会了英文字母表,陪同她作游戏、讲滑稽故事、教她基本礼节和行为、介绍世界上的事情。在这样的早期阶段,电视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好教师,它还不是什么敌人!电视还是一位很好的临时保姆,不然我就不能离开孩子半步。我坚决不雇请长期保姆,要让女儿同我在一块儿长大,要让她永远记住"同妈妈"在一起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可没有同妈妈在一起。

幼儿教育节目我们是在一起看的,电视机就放在她的幼儿室里;她甚至同所有美国孩子一样,吃饭的时候也在看电视。每天晚上,当她在楼上自己的寝室里睡去之后,我便坐下

来看好来坞的旧古典影片，或英国 OOΠ 的杰作，一直看到深夜。这同在莫斯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也完全不同！在莫斯科，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同保姆一起度过，而保姆大不了只能给他们念点书，同他们玩。

奥莉加从小便比莫斯科那些孩子要坚强和有独立性得多。首先，她从不单独留在家里，从老早的时候起便陪着我四处跑。在她才一个月的时候，魏斯和我便带她同我们一道上餐馆：她静静地躺在她父亲的膝盖上。稍后，我们总是带她一道上斯普林－格林餐馆；这是魏斯引以为豪的地方——他曾参与由赖特设计的这座建筑物的修建。在这儿，我们让奥莉加坐在放置于空椅上的她的塑料"座位"上。她乘飞机、坐汽车四处旅行，喜欢处在一大群总是对她笑眯眯的陌生人中间。在超级市场里，她也总是同我一道，就坐在购货小车里，像美国儿童那种做法。往后，便是电视、托儿所、幼儿园……她的童年比我那儿子的童年要有趣，要丰富多采得多——我那儿子在7岁前一直同大字不识几个的老保姆一起，住在郊外别墅里。

奥莉加在两岁半时进了普林斯顿长老会教会附设的托儿所。这里允许母亲们协助教师，带孩子们上厕所——孩子们还用尿布裹着，那是一种专门的纸包布，用过即扔掉，不用洗涤。美国托儿所在初期阶段是没有任何功课的，这种气氛对我来说简直是新鲜事儿：但我明白，我也必须重新学习，如果我希望按美国的方式来培养女儿的话。

在普林斯顿那些年，奥莉加的姑妈和姑父——早川先生和夫人没少来看望我们。山姆大叔（人们事实上这样称呼早川先生）非常喜欢奥莉加，称她是"亲爱的小朋友"。他俩十分

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塔里辛公司, 并向我保证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奥莉加和我将永远都是他们家的成员。

来自长老会教会的几位太太决定帮助我们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过去, 我从未遇到过"临时保姆"大学, 可现在应当习惯于新的办法。原来, 这儿设有一种代办处, 可以在那里很容易地雇到大学生, 在你外出时为你照看若干小时孩子。在普林斯顿这10 年里, 从我家来来去去的临时保姆真是不计其数, 从12 岁的小姑娘到上了年纪的退休太太都有。那小女孩算是最好的, 她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多子女家庭。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太太则最差劲, 我还不得不留在家里给她们帮忙……有一位爱吵闹的爱尔兰老妇, 我和奥莉加实在很怕她。来作临时保姆的学生, 有好的, 也有差的。也来过几位太放肆的中学生, 她们在孩子的房间里抽烟, 还带来自己的"男孩";不过, 在所有的保姆中, 只有一个值得专门谈谈。

* * *

她是教会的几位太太推荐来的, 因为她曾在普林斯顿一家宗教学校念过书, 算是"靠得住的人"。她身材高挑, 双腿修长,30 岁上下, 穿一条当时很时髦的迷你裙。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 一头披肩黑发, 嗓音挺悦耳。她曾是一位职业歌手, 也在乐队吹过法国号, 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教师, 后来决定试进一家宗教学校。在够自由够现代化的长老会, 条条道路对妇女都畅通无阻。

她第一次上我家来, 坦率地承认她并不喜欢孩子, 因为她曾不得不长期陪伴她姐姐的孩子。她性格快乐, 态度和蔼, 喜

欢向我讲述她的生活。不久,她请求我允许她晚上把她的男友带来,也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已经结了婚。“我在发现宗教学校的新鲜事!”我想,“结了婚的神甫——是情人?”“啊,他对此事并不在乎。他同我在一起。”她轻松地说。

但我回绝了她这个念头。如果不是在我家,那倒听便。她确乎长得很漂亮,看来,宗教学校的新规矩压根儿就不禁止学生获得世俗的享受。看来这件事实在令我哑然失笑——原来,她竟然还是一名优秀传教士呢! 每逢星期天,便派她到各个教堂去作祈祷,那是为了实习。派她去的人还挺满意。我喜欢听她闲聊,也喜欢她的经历,而她对我也颇为亲近。

春天,毕业的时候到了,按东正教的说法,她该行按手礼,被授予教职了。她姨妈和母亲从她的出生地加利福尼亚赶来。她请求我让她们住在我家。我同意了,心想,有时让她们替代着照看一下奥莉加也好,让我有机会出去办事。没想到两位太太来了以后,却在新泽西州到处寻访文物古迹,我反而得在家照顾她们,管她们的吃喝。

后来才得知,我这位保姆接受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建议,是美军向宗教学校提出来的。现在既然招募妇女去海军,那海军中就一定需要女神甫。这是头一次,是第一次尝试,但是,在海军基地作岸上无线电员的姑娘,显然需要“精神帮助”,需要忠告和隐秘的谈话,我们这位临时保姆便同意到美国海军去作第一名这样的女神甫!“我喜欢一切新鲜事,”她说,“我将得到优厚的报酬,成为名人。”

她刚刚正式答应,报刊便铺天盖地宣传起来;不过,她的外表,特别是她那超短裙,却在读者中引起了并不十分愉快的反响。但这丝毫也没令她感到难堪。毕业后,她便去华盛顿

会见海军将军, 在那儿被授予中尉军衔。过后, 她去了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海军基地。那里有一所海军神甫学校, 她将在那儿学习。最后, 她去佛罗里达的海军基地定居下来, 那也是她长期工作的地方。不过, 这还不是她的全部经历!

她另一位新的情人, 一个已婚的神甫尾随她来到纽波特。为了她, 这位神甫抛弃了自己的家庭, 两个女儿和在宾夕法尼亚某地的教区。他干脆声称, 没有她, 他压根儿就活不下去。在纽波特, 他就住在不远的一家汽车旅馆里, 她常常去探望他。她给我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 说同他在一起时, 她多么幸福。她还告诉我, 说他就要办理离婚, 同她结婚了; 我对这事却感到怀疑。不过, 在自由主义的长老会, 也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确实很快结婚了。为了接待众多的祝贺者, 普林斯顿宗教学校校长将自己的一座大花园和房子提供给他们使用……没有一个人感到惊奇, 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或许只有本地的天主教徒除外, 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的话。她很想在我家来接待客人,“ 完全按家庭的方式来办”——但我断然拒绝了。

婚后, 他们双双前往她供职的佛罗里达, 在那儿, 她丈夫很快找到工作, 作了海员的 宗教顾问”……

*　　*　　*

在那孤独烦愁的10 年里, 宗教和教会在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需要一种支持。然而这不是俄国教会, 也不是希腊东正教。奥莉加在希腊东正教教堂行洗礼, 是她父亲从

“建筑方面”考虑而选择的，并没有考虑到宗教。那时候我认为，美国新教更接近于人，更接近于人的实际日常需要与他们的困苦。我很早以前就曾写道，我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尤其是在基督教内部。当然，神学家们会因为我这一套“异端邪说”而对我大加挞伐；然而在美国，这一方面有最充分的自由，也能完全得到容忍。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对此颇为赞赏。

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威尔逊街不久，当地一位任主教的牧师来我家闲聊，并了解我们是否有什么需求。我们的经历他非常了解，他干脆就邀请我们去他的主教教会，说我们在那儿会成为受欢迎的客人，谁也不会要求我们转入新的宗教。而且参加弥撒的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圣餐。我很喜欢这样毫无拘束，自由自在，也喜欢基督教对他人的关怀备至。对于那些看上去与普通人无异的牧师，我也很感兴趣；他们结婚生子，懂得日常生活的所有细微琐事。他们不穿长袍，不蓄大胡子，无须人们去吻他们的手，不忌讳谈论最普通的事情。

从那天起，我们便开始上普林斯顿大主教教堂，一直上了许多年。奥莉加已渐渐学会唱赞美歌，爱上了音乐和弥撒。她生就有一种宗教精神，喜欢上各种教堂，作祈祷时总感到无限美好与幸福。我们对于诸圣教堂、对于优美的音乐、出色的合唱、热心而虔诚的教民，都非常习惯了。我们周围确乎是一个慈爱的基督教大家庭。不过，我的不幸在于，我不仅视教堂为上帝，甚至常常也希望不视教堂为上帝……我生性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的宗教信仰却在逐年增强。

英国圣公会教会不存在形式主义，不存在对他人的偏执，有的只是兄弟般真挚的情谊和全体基督教大统一的精神。我

只希望奥莉加能了解并热爱上帝。要是硬拉她到希腊人那里去,强迫她听人们用她不懂的语言作祈祷,那就真是太奇怪了。拉到俄罗斯教堂里去也是一样。她从小就知道,教堂有各种各样的,祈祷的形式也各有不同,而且她已习惯于这个事实;这使她后来培养起了包容一切的性格。诸圣教堂在她的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希望在我的孩子中,哪怕有一个能从小接受基督教的熏陶,能从小懂得热爱上帝,懂得信仰给人带来的帮助也好。

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我便带她到教堂去,还悄悄拿些葡萄干和饼干给她,为的是塞住她的嘴,使她不要乱嚷嚷。不久,她习惯了呆在诸圣教堂里,还同我一起照着小本子唱赞美歌。再没有比我们一起唱歌更好的了;这不是合唱,可你却亲自参与其中,而且永远使人深为感动。在复活节周,在复活节前的礼拜日,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去上诸圣教堂。那些年,我们的节日总是同这座教堂联系在一起。神学校校长是个胖胖的、乐乐呵呵的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眼睛和一把小胡子,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教会了我用英语阅读和学习圣经(詹姆斯王的译文)。“我们的在天之父”的英语诵词刚一自然地响起,,我便开始用英语祈祷。我一次也不曾感受到这是“异乡的教堂”。很快,圣雄甘地讲的一个古老的真理得到了印证:“上帝只有一个,通往上帝的路却有许多条,走哪条路都没错。”但是,我永远没有忘记对圣灵的祈祷词,这段祈祷词是曾在莫斯科为我行洗礼的尼古拉·戈卢布佐夫神父教给我的。我在英语中哪里也没有找到这段祈祷词。它只属于东正教。

当教堂的牧师 催促”我,硬拉我,暗示或教导我时,我总感到不自在。我心里深知,我的上帝是爱我的,是在帮助我

的，为此并不总是需要教堂或牧师。

后来，我开始认真研究科学派基督徒的著述，因为他们曾大力帮助过我和我的女儿。奥莉加那时已经两岁，却还完全不会讲话。儿科医生对此并不总是表示理解，于是，便把她送到语言矫正专家那里。

医生要我填一份答问式调查表。她刚一读这张表，脸上的表情便发生了变化：孩子的父母已经年老，我母亲是开枪自杀的，我哥哥是酒鬼并最终死于酗酒。医生望着奥莉加，我发现，她对这孩子的未来丝毫也不乐观……她挺谨慎地对我解释说，应该作一系列的检查和测试。“我们得查查她的听觉，她可能根本听不见，”医生说。

我含着泪水回家，心里不断想像着那些无益的测试。那些测试会很快宣告她是个病孩，是个没指望的人。医生无疑已经设想奥莉加有许多先天缺陷。我跑过大街，到一位近邻家里；这位邻居在按科学派基督徒的方法行医。她听完我的话，不禁笑着说：“当然啦，我早跟您讲过了，那些医生是不会给您提出什么好建议的。”

然后，她平心静气地跟我讲了很久，说孩子当然是绝对健康的，但是母亲的恐骇不安却可能会在她的行为中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来，说她讲话拘谨迟疑，也就是‘她怎么也不开始讲话”，实际上正反映了母亲的心态。她绝口不提任何亲戚和前辈，说他们与事情无关，建议我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这些偏见——这对于我，简直犹如一剂万应灵药！美国人只讲基因和遗传性，当然是讲消极的遗传性。

这位邻居给我一本马丽·贝克尔·埃迪写的书《科学与健康》，还有其他一些专门的读物，我便开始一一研读起来。很

快我就感到自己乐观多了,我从小就具有的乐观主义恢复了。几周以后,精神也振作起来,再没发现心区疼痛,疼痛消失了……家中的气氛变得和谐美好,我们俩感到更加幸福。过了一段时间,我女儿也同她的小朋友一样开始讲起话来——这一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再也没想起那位语言矫正专家。不过,其他父母亲也可能会听她的话;对他们来说,医生的话就是法律!医生们所谓“遗传性”、“不可避免”、“是固疾”之类的讲法,会给他们病员的生活带来多少不幸和忧虑啊!他们不给病员以帮助,反而使病员陷于沮丧的境地!在恐惧和抑郁的心情下,健康状况永远得不到好转。

实际上,开业行医的科学派基督徒都是些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建立乐观主义的生活观。当我感到在最美好的愿望和感情上被偷盗被抛弃的时候,他们帮助我战胜孤独的困难时光。这决非什么“病症”。任何初来美国,刚刚身处这里环境的人,在类似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幸的感觉。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这一点都很清楚,可医生却常常除外。科学派基督徒们帮助人恢复生活的愉快感,恢复内心的平静与自信;您会开始感到别人是爱您的,您也为别人所需要,您有能力,有才华,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您能干许多事情,您会“一年年好起来”。对科学派基督徒来说,“老”这个字眼是没有的。当然,随着内心向良好方面的变化,您再也不会感到什么病痛。有一个基本点就是“病从心上起”k k 这是一个最合乎实际的结论。一旦您把您的态度,您的情绪和思想从消极变为积极,您就药到病除了。

“您得感谢您已经得到的东西!”当我抱怨我现在的生活

更加抑郁，不如头几年在普林斯顿仍然住在威尔逊街那些日子时，科学派基督徒便对我说。“要记住已经拥有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且要为此不断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劝我说。后来，他们在一次甚至更大的不幸中给予了我帮助……

离婚后的几年，我一个人带着小女儿一起生活，实际上，我一直关在家中和厨房里，去超级市场和杂货店成为“与人接触”的唯一机会，而仅有的消遣乃是看电视。每当奥莉加睡去之后，电视和一杯加滋补药的杜松子酒便陪伴我度过漫长的夜晚。每天晚上这样一道程序我已习以为常，还渐渐增加了杜松子酒和滋补药的剂量（质量也有提高）。我蓦地发现，我的行为酷似我的哥哥，他不到40岁便因酒精中毒去世。我惊恐地发现我已戒不掉酒了。

我的医生告诉我，这不是上了酒瘾，因为我并非一大早就开始喝酒。这算是一种小小的慰藉。我一贯厌恶别人酗酒，而现在我正好干着这种事情，对自己简直憎恶不已。

可是，当我将这一切讲给那些科学派基督徒听时，他们却完全从另一种观点来看问题。他们致力于恢复人对自己、对生活、对健康的信念。他们竭力把我从伤感的情绪引向我实际取得的成就——我的书啦、孩子啦、朋友啦、才干啦……等等。

我的生活走进了死胡同，我无论如何不相信生活中还有好的事物，但我终于治愈了这种情绪。说实话，这花费了好几年时间。但这事终于过去了，我对杜松子酒和滋补药习以为常的嗜好也消逝了。现在我可以同大伙在一起喝酒，也可以滴酒不沾——这再不会令我不安了。不过我再也不会在深夜里举杯独酌，诅咒人生。我热爱生活，并且正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　　　*　　　*

从上幼儿园开始，奥莉加有很多时间都不呆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她需要多与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家里就只我们两人，再就是电视机。对于某些孩子来说，这已经就够了。但奥莉加身上的精力却3 倍于人，它需要释放出来。我简直无法再使她满足：她总是喜欢同大伙儿在一起——夏令营啦、学校啦；哪里最热闹，哪里就最好！

在长老会教会的托儿所里，女教师托马斯太太同两岁的孩子讲起话来，就像孩子们已是幼儿园的大孩子似的。她让孩子们用颜料涂画、踏着音乐的节拍运动身子、打秋千、登梯子、玩沙子。我常常既是母亲又是帮手，尽力扶住他们，不使摔倒，不让他们从敞开的大门跑掉，不让他们啼哭。但是我整天只听见这位女教师说："彼得斯太太，别管他们！让他们去表现自己吧！"——这包括他们掉下来，砸破鼻子，哇哇大哭……我试图保护他们，却激起她勃然大怒。"彼得斯太太！"我又听到她吼叫开了，"我们可不用这样的方法监视孩子！我们得让他们习惯于吃点苦头！别管他们吧！"

我认为她有些小瞧我，太残忍。别的母亲年纪比我小一半。她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从来不同我聊聊；有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吃午饭时我遇见她，她却转过身去，做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不过，奥莉加在这个托儿所里倒是学会了许多东西。

我们也将邻家的孩子邀到一起，让他们一道玩——轮流到每一家玩。我尽量从这些年轻母亲的身上了解更多的东西。其中一位是日本妇女，是出色的母亲和家庭主妇。不过

有时我也产生怀疑, 这一切是对的吗? 在亚洲, 在印度, 孩子乃是母亲的一部分, 要在母亲的身边呆很长时间。同母亲的这种密切关系, 是他们的一种心理保护, 直至成年也是如此。在日本和中国, 母亲的形象在孩子的生活中几乎是神圣的; 孩子即使长大成人, 对母亲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不喜欢现代西方将老人和孙辈分开的做法——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对被关在养老院里那些不幸的爷爷奶奶, 简直怜悯得流泪。

有一次, 我们到离普林斯顿不远的麦道雷克斯一家疗养院, 看望魏斯的老姑母。在餐室里, 看见几十只手伸向3 岁的奥莉加, 仅仅为了摸摸她, 我的心简直被震撼了。她从一张餐桌走到另一张餐桌, 对所有人微笑着, 让大家抚摸自己; 这小姑娘似乎知道, 他们是多么地需要她。

我完全无法理解, 儿女成年之后, 都希望摆脱父母, 将他们赶到养老院去——即使儿女们有足够的住房和金钱, 可以为父母安排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在这个问题上, 我倒真的认为在对待孩子和老人方面, 亚洲的规矩更好一些: 对孩子温存, 对老人敬爱。

奥莉加3 岁时, 准备到圣心学校学前班上学, 这所学校漂亮的现代建筑我早就注意到了。现在我得去同那位女校长谈谈。

修女朱迪·加森人很年轻, 长得也漂亮, 对人非常关心而热情。她曾在纽约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但她突然感到一种 召唤", 而进了从事女童教育的耶稣圣心僧团。

普林斯顿这所学校是由法国著名建筑师拉巴久修建的, 而在普林斯顿建这种学校的想法本身, 却属于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雅克·马里敦。这所学校开办于1863 年, 本来应该以

马里敦的名字命名，但因为他那时还健在，这事就办不成——使用尚在人世者的名字是不应当的。于是，这所学校使用了苏格兰修女和教育家珍妮特·斯图尔特的名字。不久，马里敦去世。后来，他的妻子也去世了，他妻子将自己出色的藏书捐赠给了学校。人们认为他俩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

女校长加森修女带着我一一参观各个教室，向我讲述天主教教育的原则，那就是要把女孩们培养成坚强、善良、乐观、对他人的需求有同情心的人。这里招收所有人种和所有民族，以及所有宗教派别的孩子。爱，乃是一切的主要基石。我专注地听她讲解，为有可能将我的女儿送入基督教学校而高兴。这儿的一切同我至今所了解的国立学校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啊！在苏联，更是不存在别样的学校。我感到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走运了。

我一直深深地抱着一个诚挚的希望——让奥莉加自始至终在这里学习，为在美国上大学打好坚实的基础。从斯图尔特学校毕业的女孩子，被美国所有名牌大学录取。不过这却是一件要花钱的快事，而我在理财方面从来缺乏才干。

在苏联，钱的意义并不大，几乎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不知道该如何"搞钱"。在这里，我得张罗家务，照看园子，从事维修；我女儿在昂贵的私立学校念书；我有一辆汽车；我的经济状况又被我们的婚姻破坏得十分惨重。最糟糕的是，人们却认为我在某地藏有数百万巨资。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述我的艰难，或为我提出切实的建议。我只是听到人们讲"如何少交税"，这倒完全没有使我不安：这是美国富人的一种通病，是他们永恒的话题。不过所有人都相信我大约应当属于普林斯顿有钱人的一类。实际上我那几年的生活不外乎处在中产阶

级的中等收入水平上。可"宣传"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说你是百万富婆,这名声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只有我的银行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在普林斯顿,就连银行也认为我"在某地还有不少存款",认为无疑有人在帮我理财。没有任何人帮我理财,眼看无法支付每月的账单,我倒常常显得心慌意乱:这些年开始通货膨胀了。"那就贷点款吧!"人们对我说,"利钱可以从税金中扣除!"

正如我现在明白的,我的存款程序有不对之处。我必须重新考虑,以便让存款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月息。但我的银行根本没顾这件事,因此我的欠债已超过3万美元……我于是决定变卖房产,以付清欠银行的所有债务,让奥莉加从收费昂贵的学校退学,带她到加利福尼亚去。伊萨克·堂·列文一直写信来说,那地方过日子很轻松、很便宜。

因此,我于1976年去了加利福尼亚,我已在普林斯顿度过了4个平静的年头,这里的威尔逊街上有我实在喜欢的房子,奥莉加在好学校里也学习突出……我简直看不到别的出路!谁也不理解我的实际困难,大家都想像这是由于某种复杂的、荒谬的"原因"使然……现在,比肯斯大卡车载上我们的全部家当朝加州开去。成千上万个家庭作了同样的大迁徙,从那些寒冷的州区迁往"阳光和煦"的地方,因为那里生活更便宜。在那些日子里,报纸上便是这么说的。我没有朋友能在这种境况下给我提出好的、行之有效的实际建议。我那帮朋友全是富人,日子都过得很优裕,可我不喜欢去向别人诉苦。他们反正不会理解我,也不会相信我。某种可笑的骄傲不允许我去求助于人。我认为收拾家当一走了之最为适当。

在我看来,这些"欠债"是很可怕的——我宁愿卖掉自己

的房子来还清它们，也比呆在这里，痛感无力偿付日益增加的账单，并在我那家银行不断借债更好。银行归根结蒂必然会有责任向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更好建议……

* * *

在加利福尼亚，堂·列文卷起袖子张罗起来。我们似乎身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国度，因为加利福尼亚和新泽西之间的差异实在大得惊人！我们租下房子，打开行包，便开始寻找学校。由于斯图尔特学校的学前教育是依据马丽亚·蒙台梭利体系[①]进行的，我便决定将奥莉加迁入当地采用蒙台梭利体系的学校，使她不致感觉到太大的差异。奥莉加很容易适应新地方，很快交上了一帮小朋友。我变换到他乡异地，就并非那么容易适应。

在加利福尼亚我感到无限欣喜。在我看来，深蓝色的太平洋与可爱的黑海颜色十分相似。这里的松树、夹竹桃和桉树也使人想起黑海疗养地的植物。我童年时代的每个夏天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天空也是那么湛蓝，空气也是那么清新，太阳也是那么耀眼……

我突然觉得患了思乡病，这在东海岸时是从来没有过的——在那里一切全是另一回事，不存在任何思念。我不知道出现这种新的感伤情绪应当怎么办。不过，这地方仍然令我

① 马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曾提出一种学前教育法和初等教育体系，有大量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译者注

留连！太阳晒干的桉树叶发出阵阵香气，夹杂着橙子树林的芬芳，还混有松针的气味。太阳匆匆落下，海洋渐渐变成深蓝色，然后变成浅紫色，最后变成深紫色，跟黑海的日落一模一样。我一大早便带奥莉加去上学，然后将车停在满地砾石的海滨浴场边，久久地凝望着汹涌而来的海浪，忘掉了我是置身于何地……

漫无际涯的太平洋不像其他任何一个大洋。它奇大无比；您知道它覆盖了半个地球，您只要走进它的水里，就能感觉到这一点。

沿岸那一座座美妙绝伦的小市镇——莱奥卡迪亚、戴尔马普、恩西尼塔斯、卡尔斯巴德，显得古旧而又舒适。形形色色的新建筑尚未彻底吞没这些地方，但已从四面八方向它们涌去。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人越来越多，巨型超级市场转瞬之间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市场近旁都建有沥青铺就的停车场。

我指望在加利福尼亚会感到经济上轻松一些。然而，由于我在奢华的普林斯顿过了多年的美式生活，都不善于节省了——不知道该如何使那些年我们拥有的钱用得久一些。每次搬迁也花去大量的钱。最节约的当然是40 年如一日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在美国，人们常常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老是有人建议我搬迁——“搬到生活更便宜的地方去吧！”想到我过去带着两个孩子在莫斯科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多么简单，我常常为离开周围所有多余的东西现在如何生活感到不寒而栗。同俄国、印度和欧洲相比，美国人家里塞满了无用的劳什子、大量多余的衣服。那些儿童玩具可真多呀！从很小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培养没有限度的购买欲。

奥莉加的女伴们的房间总使我感到大为震惊: 真是杂乱透了, 好多东西干脆就乱堆乱放在地板上……我尽量只购买必不可少的东西, 可是在美国"必不可少"意味着在其他国家足够几个家庭之需的数量。我一位在普林斯顿的法国女友, 已在美国生活了25 年, 仍不能习惯美国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到了这气候暖和的地方, 我毅然决定放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 并通过各种慈善组织和教会, 成袋成袋地分送出去。

我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回到普林斯顿, 发现离婚女人在这个社会里得不到同情。我在苏联经历了两次离异, 从来不曾感受到我的处境有什么难堪。可在这里我明白了, 我在众人心目中乃是个十足的"罪人"。在我结婚和离婚之前曾热情接待过我的那些家庭, 现在再也不邀请我去做客了。这些不公正的态度使我大感委屈, 于是在这儿, 在加利福尼亚, 我期望着奥莉加的亲戚早川一家会给我们以支持, 帮助我们找一些好朋友。然而, 早川教授现在却全身心专注于政治之中。

他在积极投身民主党30 年后, 现在转而加入了共和党, 而且那些共和党人劝他赶快参加参议员竞选。堂(这是家里的称呼, 正式的名字叫塞缪尔·伊什) 作为卓越的演说家, 学富五车的语义学教授, 现在奔波于全州进行演说, 而他的家庭则暗暗祈祷, 希望他不要进入参议院, 因为那最终的结局意味着他家中所有成员的生活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所有人都大感吃惊的是, 他在初选中赢得了胜利, 过后又进入了参议院, 诚然, 只是以寥寥无几的选票。他妻子, 也就是奥莉加的姑妈马吉, 拒绝住在华盛顿, 在参议员家中扮演"政治主妇"的角色, 拒绝去举办无休无止的鸡尾酒会, 人们要在那些酒会上议决各种政治问题。她学的是植物学和园艺学, 她留在加利

福尼亚编辑她的《植物学杂志》,研究高山苔藓(这是她的专业),继续过去那种生活。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她得同丈夫一道进白宫时,才去一趟华盛顿。参议员夫人这种地位,她久久不能习惯,只是在早川退休之后,她才终于学会了享受也为她提供的福利待遇。如今,她却为时已晚地突然失去了她那朴素的、令人愉快的举止风度……于是我失去了这两位平易近人的亲戚,因为那时候他们自己的问题也实在太多了。

我当时就认定,现在应当是我重操旧业的时候了:搞写作。我现在想用英语写作,并且为了在这方面受到专业训练,我上了一所函授学校。这所学校的组建是同美国其他许多教育计划一样的。我学的功课叫做"学习为孩子们写作",该课的授课中心在康涅狄格州,学校的教师全是一些资深的作家和编辑,所有希望在为儿童写作这个舞台上试一番身手的人他们都教,从绝未染指为儿童创作的作家直至家庭妇女。学校为我们寄发参考资料、讲义和作业;我得完成这些作业,再寄回去。我的作业寄回来时,编辑用红铅笔在纸页上写画着各种记号和解释。

我为全身心投入这个工作而喜不自胜!我的头两本书是用俄文写成的,我曾同它们的译者有过诸多的不愉快……现在我却颇具灵感地作起这些作业来。

不久,便听见一个确切无疑的消息:我的几位老师想创作一些关于"虚无之物"的虚构故事、幻想小说和童话作品。而我一直只能像新闻记者一样写"实有其事"的事情,在一切细枝末节上总是忠实于真实的事件。

例如我曾写过一篇有趣的报导,写的是奥莉加上的那所游泳学校,写两位出色的教师把一只名叫莫瑟斯的大黑猫投

进游泳池。当莫瑟斯紧紧夹着一双耳朵,在池里纵横畅游时,小孩子们便一点也不害怕地往水里跳——这件事使大家非常开心! 父母们一连几小时陪着孩子,观察整个教练过程。这学校是个奇妙的私立小机构,由一对女朋友主持。我描写了这件事的"真实故事",起名叫《观察莫瑟斯》,还写得挺不错的。

但是此后寄来一个作业:改编一个故事,臆想出一个不曾存在的人,一个出场人物,围绕这个人物性格编出情节,发挥充分的想像力,创作出一篇描写子虚乌有事件的故事。于是我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对于随便编造和臆想没有兴趣。我一直认为,真实比一切杜撰更为有趣。干嘛要去寻求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呢? ……但我到底还是完成了作业,编造出一个女孩的形象;然而这一切是那么难以令人信服,显得苍白无力。我确信,我应该只是如实写出我所见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应按新闻报导的精神来写。要像我已写过的那两本书那样写,像"实有其事"的故事,决不加油添醋。在这方面,我的灵感抛弃了我,我便停止了"为儿童"创作的一切尝试。或许,在这些函件往来中我们彼此并不理解,但我绝对不想为孩子"编造"故事,这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我想,我显然只应当为成年人写作,因为他们能完全如实地理解一切……

我感到我在某个时候又会重新开始写作——可能是继续我的头两本书——又回到我原来的计划中去:把我面临的现实生活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不虚构任何情节。没准我还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这是我从小就有的理想……不过,干这项工作目前时候未到。我将在某一天重新写出自1967 年那个特殊的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情。我的第二本书所讲述的事

情，就到那一年为止……

不过，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些理想。现实生活是，我每天得送女儿上学、购物和操持家务。在加利福尼亚，我们买了一座小木屋，这是以前两位作世界旅游的旅行家夫妇修建的，在设计上是仿日本风格：外形像个颠倒的“门”字，附带一个小花园，中间有一条小溪，还有一个形状像一只菜豆的水池，遮掩着通往倒“门”字形建筑的入口。为了使人产生整体印象，他们还种了一些竹子，在小溪边立了一尊石佛……如果在普林斯顿，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奇异装点，但加利福尼亚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颇具异国情调的地方，这里一切看上去都是自然而然的。

我是从一位大卡车司机和他的妻子手上买下这幢房子的，房价惊人的便宜。两辆大卡车就停在房边，邻居非常希望摆脱这家人，因为这家人“破坏了景观”。于是，一位房产销售代理人便将我引到这里来了。（这些房产代理人实际上可以决定你应当往哪里搬。）这对年轻夫妇的墙上挂着一条格言：“上帝赐予，山姆大叔收取”——这是讲的税收。

他们急于到北方去，那里有矿场，他们能找到工作。我们很快达成这笔双方都满意的交易。这对年轻夫妇是很令人愉快的人，但太天真，不了解外界的事情，只知道加利福尼亚……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苏联卡车司机看来，恐怕要算闻所未闻的豪华。实际是，他们在美国社会阶层中仍属于所谓“中产阶级的底层”人物。他们很热忱，很善良，还把奥莉加要进的游泳学校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就是黑猫莫瑟斯大展才能那地方。

就是凭着朱迪和吉恩两位游泳教练耐心努力的帮助，奥

莉加才终于不再怕水;这样的惧怕,来自她永远难忘那次希腊式洗礼:人们曾将她三次浸入水中。打那以后,奥莉加就游得非常出色了,我们也就经常回忆起朱迪、吉恩和那只猫。那黑猫每次上岸,人们总是把它裹在一条漂亮的红毛巾里,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它的住舍去,而它却瞪着一双大大的绿眼睛蔑视着我们。这是一只华贵的波斯猫,长着丝绸般光滑的长毛。朱迪一直保守秘密,只字不提她是如何教会这只猫游泳的……

我们在这幢 日本小房屋”里住了一年多,而且很喜欢它。对我们来说,这是在加利福尼亚一段轻松愉快的时间。我们欢迎好友来访,特别是一对意大利老夫妇——罗莎和迈克尔·詹西拉库兹,他们把我和奥莉加当做干女儿;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因而同我们一样享受着这友情的甘露。但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具鲜明性格特点的当然是弗朗西斯。她是赖特的儿子约翰的遗孀,所以她也叫做赖特夫人。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她同 老赖特夫人”混为一谈。关于那位老赖特夫人,我在前一章中早有言及……

弗朗西斯·赖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她所知道的塔里辛公司的历史——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她就了解——以及赖特本人的历史,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她很喜欢赖特老人,回忆起他时满怀温情。可是谈起那家公司,她却必然称之为“ 挂在这位天才建筑师脖子上的一帮可怜虫,这位天才必须供养50 张嘴!”对奥利吉万娜,她称之为 一个寻求自我肯定的可怜女人”,而对我过去的丈夫,则称为一个“ 不幸的弱者”。这些都是她从80 岁的高度以及同建筑师丈夫一起生活的高度作出的毫不妥协的判定,也是她从她对美国社会与艺术的

了解的高度作出的坚定判断。我在离开塔里辛公司之后，曾收到过她一封亲切的来信，她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得以见面。啊，这一天不就来到了吗！

她的个儿非常矮小，像一只毛茸茸的不安静的小鸟，几乎是没有形体的，却凝聚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力量可以迫使别人无可争辩地服从她的诱惑力。她的嗓音铿锵有力，讲起话来字正腔圆，一望而知"受过表演训练"。她年轻时就当过演员。然而比剧院啦艺术啦更吸引她的，乃是替别人看病治病。她很清楚地知道：她帮得上忙，而且也不断地帮忙！

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在剧院呆了一个不长的时间，便嫁给了一个科学派基督徒开业医生，不久，她自己也做了医生。后来，约翰·洛德·赖特受雇在芝加哥附近建一幢房子，她便钟情于这位建筑师了。他们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不平静的生活，有时硕果累累，有时又陷入贫困的深渊。现在，她成了寡妇。她那唯一的房子，就是约翰·赖特在很大程度上按他父亲的风格建造的，房内满是纳瓦霍印第安人制作的工艺品和地毯，还有弗朗西斯自己画的画。洋溢着早期现代主义气息的屏风、约翰的作品、中国铜锣、刺绣品、植物，所有这些希奇古怪、具异国情调的东西全混在一起。在塔里辛公司，这一切我早就习以为常了。这一切的中心，便是弗朗西斯本人。她像某种非人间的小鸟，戴着蓬松的白色假发，长一对精心修饰过的灰色大眼睛，浑身挂满具有个人特色的珠宝，穿着缝制精良的昂贵"裤装"——简直就是加利福尼亚演员的化身。

她一个人过日子，虽然常常生病，却不让亲戚住到她那幢大房子里来，因为她家里满是艺术品，并且如她所说，到处都留有"过去的影子"。她一字一字地说："我要欣赏我自己这

些伙伴!”

然而总有许多人来拜访她,向她寻求帮助,征求她的建议,同她作基督教科学精神的谈话。这种谈话使许多人得到帮助,它帮助人们摆脱个性方面的不幸,摆脱抑郁情绪、恐惧,以及其他非正常心理状态。这些问题都是物质生活非常富裕的社会造成的。弗朗西斯早就不去上科学派基督徒的教堂了,因为她声称,她“不喜欢穿上精神病人那种拘束衣过日子”。但她继续不断地帮助别人,喜欢倾听那些不幸的事情。在她的理解中,一个基本点就是:“把人们从担惊受怕中解救出来!”由于人们内心中隐藏着恐惧,一切病症和不幸就会从外在表现出来。当她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病人,让他们睁开眼睛洞悉他们个性中软弱的实质的时候,她便会感到十分幸福。“我知道恐惧心理是怎样显露的!”弗朗西斯说,“他们对我还只字未提时,我就知道,这个人心里充满了恐惧。这真是太可怕了。”

她同我作长谈,竭力让我摆脱对魏斯的回忆。我曾喜欢魏斯,永远也忘不了他。她理解这一点,想砸碎这条锁链。“您应当忘却在那个地方,在那些可怜人身边发生过的一切,去享受自己的个人生活!”她坚决主张道。我在理智上理解她,但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从爱情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那时候她已不在人世了,但我总喜欢想起她,喜欢她为助人而作出的努力。

弗朗西斯对我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好客,让我睡在楼上曾属于她丈夫的房间里。第二天,我为她做了一份我喜欢的格鲁吉亚清炖鸡汤,她感到非常满意。她不断地一个劲抽着长杆雪茄,我在窗门紧闭、装有空调——美国人的习俗——

的房间里感到窒息。……但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过后，她让我为她朗诵几页回忆录，那是她丈夫的朋友和学生写的，描述了她年轻时同约翰·赖特的生活情况。我读着，弗朗西斯专心致志地听着——好像在一旁听别人的故事——突然，她热泪盈眶，对此她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如此接近地看见她的内心状态，反被这样一种特权弄得十分沮丧。

由于同这非凡的、天才的人长时间地交往，我常常十分疲累。但是，她却从来不使我感到压抑，不像同弗朗克·洛德·赖特夫人在一起。弗朗西斯是个开朗、快活、机敏的人，她爱讲笑话，从不苦恼，只是努力地去帮助别人。

我同她有一个完全相同的爱好：印度哲学家克里希纳穆尔蒂的著作和他的人格。她去听过这位哲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座谈，我后来也在英国同他见过面。

……一年之后我们返回东方，到了普林斯顿，弗朗西斯给我写过几封很有鼓舞力量、很“解放”的信。她写的信就和她讲的话一样：

“……每个人都有权坚持他自己的理想，直到他想改变这些理想为止……亲爱的，您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随时将它抓住……只要理想能使您满意，能起到它的作用，您就要同它共存。要永远处在能使您变得高尚并充满信心的环境之中：请求上帝给予支持吧。为什么要容许低贱习俗中的现象来苦恼您呢？放开它们吧，让它们去吧，不要老是抓住它们不放。”

“……在别人面前抬高自己是没有任何高贵可言的。高贵在于超越我们自身的利己主义。”这是她最后的一番忠告。

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追悔没及：过去竟没有陪同她

一道度过更多的时间,这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办不到的难事啊。我还感到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从她那里了解到什么了。我多么需要得到像弗朗西斯这样坚强的人的帮助啊!或许,她也能够教会我作一名战士,作一名胜利者。她一生都在拼搏。她从芝加哥的欧洲侨民贫困区出来,就给自己提出一些目标;她达到了这些目标,并不断前进……她是美国成功哲学的杰出代表,而且她真诚地希望帮助别人去取得成功。

*　　　　*　　　　*

正是由于我对斗争啦、成就啦、爱面子的上进啦,既无愿望也无兴趣,才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离婚后,我一年年慢慢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某种绝望的境地。在美国,人必须抱有一个目标,并为达此目标而作出一切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努力。我1967 年来到这里就抱有一个目标:尽可能生活得安宁。对一切情况都去关注,这是办不到的。“著名叛逃者”、所有报刊、电视、我那两本书的出版等等,事情都发生在仅仅两年之内……哪有什么安宁可言!不过,最初这两年快完的时候,为了平静地生活和写作,我总算是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了。或许,这就是我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的新生活的开端吧。

然而,奥利吉万娜·赖特却算计着让我嫁给她的一名建筑师,因为她在达到她所期望的目的的手段上是很老练的——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尽管为时不长)。但是她以及这次婚姻的整个过程,都对我造成了长久的伤害。我在身体和感情上都失去了平衡:45 岁上生下第三个孩子,经常不断的内心冲突,同我在塔里辛公司陷入那个社会进行搏斗,都足以摧毁最坚

强的性格。我的财力枯竭了，而新的进项却一点没有，连指望也没有。我没有再写书，而我头两本有广泛影响的书，出版商也似乎认为没必要再版。

因此，要回到我们过去在普林斯顿那种定居生活，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奥莉加在城里最好的学校念书，我们幽居在家里，避开了公众。很可能，靠我那"中产阶级的收入"，我仍然能恢复过去的一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为我出主意的所有人，更是一群喜欢听我的新闻的拨弄是非者，或者是一群很有钱的人，对我的困苦无法理解。正如在莫斯科时人们所说，我是个"不会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分子"。不过在莫斯科，这种品性只会博得别人对我的好感，但不是在美国！

因此，我本该尽我的所能，找出在普林斯顿重新安顿下来的办法，但是，看到那些数字，那些价格和我的经济能力是如此不相适应，我赶快逃出了普林斯顿，到什么地方去过"量入为出"的日子。老是跟在普林斯顿有钱人身后亦步亦趋，我是极端厌恶的；我知道，这在经济上完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所有这些尝试都随着1982年前往英国而告终，正如我今日之所见，这在一开始就注定要一败涂地……）但给我出主意的人很多，而切实可行的主意却一个也没有。

尽管我们从这里不断地来去往返，在普林斯顿却只有一个人年复一年地始终坚持认为"对于您的成长和您女儿的教育来说，普林斯顿是美国最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诸圣教教堂的神甫。他请我相信——甚至连原因和细节也一一讲到——"这儿对您来说是世上最好的地方"，要我让奥莉加进圣心天主教学校，而且别改变主意，既然已经清楚了

我们迁往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失败…… 毫无疑问, 他是对的——正如我现在所见。他讲这些话并不是根据实际的计算, 而是出于宗教的直觉和洞察力。他这种持久的坚定性深深吸引了我, 他如此坚持对我讲这同一个道理已经有好多年……可是, 我的天哪! 还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意见我都不得不悉心倾听啊! 这些意见也是来自非常权威的人士呢!

在美国, 既然没有任何人禁止您自由迁徙, 从这座城市搬到那座城市, 从这个州搬到那个州, 有搬迁及财产保护公司为您提供种种方便, 我便觉得再到其他什么地方试试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而不能老住在一座城市里。在苏联, 所有人都这么过日子: 既然定居了, 那就得永远住下去, 因为随着迁移而来的将会是难以置信的实际困难。“ 所以, 我干么不在此时再尝试做点什么, 去个什么地方呢?”我脑子里满怀诱惑地这么嘀咕着。这些搬迁, 这些变动, 更是极大地削弱了我有限的财力并使我产生了不稳定的情绪。

在那几年, 某种愤恨、自怨自艾和“ 逃避现实”的情绪压倒了我——过去可没有过这些, 甚至到了美国也没有。正如我的感觉那样, 我实际上已“ 折断了脊骨”。但是, 如果你避开所有的人和事, 独自跑到僻静处, 悄悄舔净你的伤口, 那么, 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只有自认失败。在这里, 人们不会这么干。这里的人压根儿就只靠微笑、靠朋友、靠聚会、靠吃饭; 在这种场合, 您会了解到新的机遇, 接触各种人物, 并表现出自己的优点, 也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诉苦, 不可发牢骚, 而要以最乐观的语气表示你甘愿效劳。美国人可受不了你诉苦, 尽管在俄国我们喜欢靠在朋友肩上发牢骚, 这种作法甚至还满不错……在俄国, 谁都不喜欢那一帮子万事亨通的人、自负自傲的

人、挑衅劲十足的人，以及经常满脸堆笑的人……这些都被认为是十足的愚蠢！

现在，我的一些老朋友试图帮助我"重新入世"，去结识那些有意思的人。一位波兰作家，同我一样的叛逃者，就曾邀请我去纽约作此类会见。我过去的一位律师，现在是很熟的相识，也邀我到曼哈顿他家里，出席一次大型宴会。所有文化界名流（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客户）都在那里，聚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但这类活动令我厌倦。我承认，我觉得这一切是浪费时间……

我的翻译巴·亚·恰夫恰瓦泽的姐姐住在英国，她建议我"写信雇一名苏格兰保姆"，即雇一个年轻的英国姑娘。在英国，这么做是习以为常的。年轻姑娘们都乐意到美国挣钱，住在主人家中，干一切能干的事，特别同孩子相处很好。那时候，我就可以有多得多的时间了。全世界都以为，在我的生活中，仆从啦、司机啦、厨师啦、家庭教师啦……围着我团团转，而实际上，我甚至把这种实际的需要都当成了望尘莫及的奢华，所以断然拒绝这么做。再说，我也不希望在我和我女儿之间插入别的什么外人——如我自己童年中一贯的情况。

对于我的孩子，我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母亲，把自己整个献给她，毫不犹豫地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在我的仍然还是苏联的教育中，"从苏格兰雇一名保姆"这件事，怎么说也有点别扭，我会在以后的一生中为自己感到羞耻……相反，恰夫恰瓦泽一家则属于旧贵族，这个主意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完全实际的。"哎，我可不是贵族出身！"我不禁自言自语道，拒绝听取这个好的建议和种种说明。他们要我相信，在这些苏格兰保姆身上和她们的服务中，不会有任何假绅士派

头。

普林斯顿那帮太太夫人们，喜欢邀请我到她们客厅里，以向客人炫耀，却不喜欢听人讲述生活中的困难。她们要么是些有钱的寡妇，靠大笔的收入生活（正如我在美国嫁人之前那种日子），要么是些头面人物的妻子——从大学教授、大公司的监护人到退休外交官。普林斯顿这座城市我是了解的，压根儿不是什么大学城，而是大显贵、各种头面人物和富人高度云集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这也是"最适合"我的地方；诸如此类的看法只使我更加愤怒。我希望走自己的路，不去听任何建议，只按我的想法去作。我跑到这个能作自由选择的世界，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办法就是不去做出任何特别的努力，不作任何改变，而只随波逐流。我实在太劳累了，这迫使我只能随波逐流——这种劳累是我在过去的年代中从未感觉到过的。宗教和我的信仰成了在那些年我可以信赖的巨大支柱和道德力量。这仍是那个对天主教徒们、主教们、以及科学派基督徒们都极抱好感的普世教会运动；不过，现在星期天上教堂已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事情了。真的——不管是哪一座教堂，只要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我内心平静的需要，对自身力量的信念，对我的上帝的信念——他爱人、保护人、理解一切。在天堂里，应该有人关照我，不叫我在自由的迷宫中彻底完蛋。我对此深信不疑。

*　　　　*　　　　*

现在我对笃信宗教的人的兴趣，超过了对那些持不可知

论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知识分子在大学城普林斯顿占有很大的数量。我感到，对上帝失去信念，对我来说将无异于死亡；我感到，这将使一切的一切毫无例外地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因此，在我自己的普世教会运动中，我想方设法使各种信仰调和起来，甚至包括像天主教徒和科学派基督徒这两个积怨很深的敌人。神学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我是在为弱者寻求援助。而基督教的这两个支系都在积极地帮助人类。

在加利福尼亚，继弗朗西斯·赖特之后，我们最好的朋友要算那对意大利老夫妇了。罗莎过去是军队中的护士，她的丈夫迈克尔曾作过意大利圣方济派修士，天主教僧团出身，迁来美国生活。他们的生活经历简直算得上一个精彩的电影故事。他们都已年届七旬。

罗莎出生于新泽西州，原来的丈夫亡故之后，决定在意大利人中为自己物色一个好丈夫"以度余生"，并为此而来到加利福尼亚。迈克尔在意大利度过多年的僧侣生活之后，认定誓不结婚是违背基督教诲的。因此，他来到美国寻求宗教自由。他认为，婚姻是一个人正常而合法的需求，他希望为自己找一位未婚妻，因为他已经有一把年纪了。

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相遇了，他在加州离卡麦尔市不远的一些地方学校教拉丁语。他们相遇的时候，都已是50开外的人了，他们立刻明白他们找到了自己"寻求"的东西。我从未见到过比他们更温存的夫妇，比他们更互相关心的人。他们很快便请我带上5岁的奥莉加到"自己的家里"去做客。他们的家就是他们俩夫妇，还有一只名叫蒂纳的小狗，那狗老是狂暴得浑身发抖。蒂纳明白，当这位小姑娘到来的时候，它独享的王国便告终结，它将被锁在储藏室里，因此，它一个劲地跳

起来咬小姑娘的鼻子。然而, 它却只得让步。

詹西拉库兹夫妇对我和奥莉加流露出带有南方意大利人气质的热情。他们几乎每天都邀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吃饭, 向我们展示精美无比的烹调艺术, 互相比赛, 把制作真正家常便饭的秘密告诉我。他们当然很藐视在商店买的和在烤箱里烤的美国成品或半成品菜肴, 简直是断然拒绝! 他们也懂得合理的饮食制度, 所以, 他们作的饭菜并不仅仅是什么兔肉啦、通心粉啦……而是在饮食上不允许随便用什么填满肚子的真正发明。

他们带我们一道去山上不远处一家小小的本笃会修士修道院, 那儿的修士每逢礼拜天都要唱古老的格里高里教堂歌曲: 这时, 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参加祈祷。我们从修士那里买一些他们自己烤制的极好的面包。

他们拉上我们一道去圣迭戈的商店买东西, 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现出热情和兴趣, 就像年轻人似的, 还强迫我也打起精神来……我们也常常无休无止地谈信仰, 谈俄罗斯, 谈历史和生活。他们可真是见多识广。他们拥有的并不是书本知识, 他们对生活, 对人深挚的爱令我赞叹不已。他们积蓄不多, 生活过得俭朴, 可是在他们的安乐窝里——也就是他们自己那座带花园的住宅里, 有汽车和停车房, 这些东西仍然是一般苏联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对我讲的故事反应激烈, 对任何事情从来不抱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那些日子里, 表现出漠不关心态度的只有奥莉加的父亲。他常常因事去洛杉矶, 但一次也没来看过女儿。他很少打电话来, 但就在谈话时, 也没对女儿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女儿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不想宽恕我从他的

塔里辛公司出走:一切问题都在这里。依照他们的规矩,我现在应当被抛弃、被忘却。他们认为自己几乎就是某个神圣的僧团,背弃他们就意味着连表面的正常关系也完全不可能维持。我在生活中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全无兴趣。从洛杉矶到我们这儿,汽车在高级公路上总共只需要两小时啊!

不久,连蒂纳也懂得了,同它主人新喜欢的人最好和平相处,于是只要我们一来,就静静地躺在圈椅上。只是它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暴露出它的真实感情:它无疑在想把我们一口生吞下去。至于奥莉加,她可从来不怕狗,无论是大狗还是小狗。

有时候,我们在星期天去参加大弥撒,那是由圣芳济派修士在庞大的圣路易雷老传教士团里举行的。举行这种弥撒的对象不是经常前来的教区教民,而是受雇到这里来收割庄稼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以及众多的朝鲜人、越南人、菲律宾人和萨摩亚人——他们住在离奥申塞德军事基地不远的专门的难民居住点。这些人都贫困不堪,疲于工作;但在星期天,他们都穿上干净的衬衣,朴素但还算体面的外衣,看上去倒是很整洁的。

他们应答的声音是多么庄严而热情啊:“愿同你们在一起!”这声音显得协调一致。当他们领了圣餐,转过身从祭坛走回自己的位子时,我多么欣赏他们那严肃的面孔啊!那都是些纯洁开朗的面孔……年轻姑娘和小伙子看上去非常清纯,全然不像大城市和富裕的城郊地区的青年人那般龌龊。这儿有真正的信仰,朴素、天真而强烈的信仰。

我们同罗莎和麦克尔一道,还去参观了加利福尼亚其他

一些天主教老传教士团。这些传教士团从圣迭戈到旧金山沿海岸一排儿延展开去，尽头上最后一个是多罗列斯传教士团。还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我曾去参观过圣哈维·德·巴克传教士团和圣巴罗梅奥传教士团；到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圣芳济派僧侣尽力不去欺凌印第安人，而是教他们学习各种手艺，在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没有敌对情绪。我们还去参观过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传教士团以及那里名闻遐迩的燕群。那些燕子每年都预报春天的到来。

对我来说，整个加利福尼亚就是圣芳济派的国度，我也总是思考这个国度。它的外貌具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一种如此坦荡，如此非凡的东西。各种人、各种民族、各种风格都如此融合在一起，就如同在真正的、非教条式的天主教中那些优秀的圣徒和神学家那样水乳交融。加利福尼亚和清教徒般的东海岸有着多大的差异啊！有一次，我同几个熟人去长老会教堂，但这样的错误我们再也没有重犯……在那儿，人们谈"爱"的时候，显得毫无热情，刻板生硬。而在圣路易雷传教士团，我们大家却在吉他伴奏下唱圣芳济派圣徒的祈祷文，弹吉他的年轻姑娘们则是用西班牙语唱的。

但我们也不轻视教会附设的路得派新教夏季学校，孩子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圣经——这也是奥莉加喜欢的。只要有一伙孩子就好。我的一位邻居找上门来为她登记入学。奥莉加从来不曾长久地有过坏情绪，对于委屈和苦恼也从无印象。这种轻松愉快的情绪来自她的父亲——他年轻时曾经是个朝气蓬勃的人。奥莉加在这里功课也很繁重。

在蒙台梭利小学，正常上课时间之后，我常常带奥莉加去游泳，这对她大有裨益。然后去上舞蹈课，她在那里学会了按

节拍动作,甚至能穿上专门的掌鞋在地上踏出切乔特卡舞步。之后,再按日本雅马哈教学法上音乐课。这个课程要求父母也参加:我们同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参加识乐谱。在孩子们能熟记音符之后,他们便开始学习使用小型电子琴。这全是些饶有兴趣的课程,它们使这孩子感到非常快乐。到了晚上,在度过漫长的一天之后,我们还要看电视——看新闻和故事片。最后才洗澡睡觉。

现在我很少独自一人枯坐到深夜,通常都是和奥莉加一起去睡觉。我们在漫长的10 年中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无论在普林斯顿还是在加利福尼亚都是这样。(只有到了英国,一切才变了样:奥莉加住进了寄宿学校,只剩我一个人。)

来自东海岸甚至欧洲的地方报纸或中央报纸的记者,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这时,我们平静的日子才会被打断……这真是无处可以躲藏,叫我大为烦恼和气愤。尽管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从不登入电话簿,可总是有人把我的家门直接告诉那帮记者。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不保障私生活的权利?因为所有其他的权利,特别是所有权,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不能对记者太粗鲁,叫他们滚蛋,然而他们却很粗鲁。他们闯入我家,提一堆很不得体的问题,甚至向邻居的孩子打听我们的情况!邻居们对此大感气愤。

1967 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想像中把美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理想化了。我的想像主要来源于过去所看的老电影……我很不能容忍美国人的粗鲁和不得体行为。我常常恼怒得失去控制,可过后又想到,在杰奎琳·肯尼迪嫁给希腊船王的时候,报刊也曾对她表示过毫不留情的蔑视。报刊掀起的

反这位前第一夫人的狂潮有多愚蠢、多笨拙、多粗鲁啊！尽管新闻已经完全降温，纽约大街上的人们仍然不让她安宁。这还是在她自己的国家，记者们的行为犹如一群白痴，追逐她、窥探她，向被解雇的侍女打听种种细节……他们对这位妇女没有任何尊敬——然而，她在她丈夫遇刺的汽车上却表现得如此勇敢，将四周被打得粉碎的她丈夫的颅骨和脑浆收集起来……人们对待她的这种粗暴和残忍态度，这种野蛮行径——可不是对待某位初来乍到的外国女人——不，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某种普遍的麻木——我找不到别的字眼了。而杰奎琳对他们的回答，仅仅是报以电影明星那种风雅的微笑，从不与之理论。我那时真想向她这种耐性、这种良好的风范和明智的态度表示敬意。当时我对自己说道："冷静点吧，归根到底，你是什么人哪?！眼下人家暂时还没写你什么太坏的东西呢！你在这个地方遭受的打击，可能会厉害得多的。"

* * *

奥莉加出生后，我们立刻收到许多贺信，全是不认识的美国人写来的。这已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但我仍然继续保持着同其中一些人的通信——实际上迄今仍在通信。这是圣迭戈的两位退休女教师——洛娜和洛伊丝，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学高年级教拉丁语。她们对我女儿的事情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盎然的兴趣，使我们的通信简直不能中断。可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自己就是在我的教师的极大关怀下长大的，他们比父母还要关怀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这两位女教师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从未在美国文化的环境

下养育过孩子！洛娜和洛伊丝这对孪生姐妹，一直关心奥莉加在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在学校里的成绩。我把女儿的生活情况详细地写信告诉她们，把女儿画的画、写的信、在学校的作文也寄给她们。她们认为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或许，也确实是如此吧。

她在很小的时候，画儿画得不错，色感和形式感很好；可是9 岁以后，画画的兴趣低落了，更吸引她的倒是音乐。开始是学钢琴，10 岁时又学吉他，而且进步很快。不过，她非常喜欢的那位老师走了，她又不愿去找别的老师。奥莉加在学校的写作是满不错的，尤其喜欢幻想的形象和故事；而且受到赞扬。她的舞跳得很好，浑身都有节奏感，或许，在这方面她也会是很出色的。很难说她在哪方面表现得最好，因为她在各个方面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如果她喜欢那位教师的话。有一位女教师因某种原因不合她的味口，她就无法同这位教师配合……结果，这终于把我们弄得很不愉快。

我女儿一直在私立学校上学，其中只有一两年除外；那时我决定让她去试试 公立学校”——即公共的免费学校。我那对孪生姐妹朋友一再说：“只有进公立学校，孩子才能不受压抑地自由发展。”我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个说法。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我根据经验是了如指掌的——把人变成毫无创造精神、毫无个人意见的机器人，把他们变成社会的奴隶。社会主义总是首先消除人的个性，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欧洲的、古巴的、亚洲的、印度的、埃塞俄比亚的，等等……对此，我的这两位女教师作不出任何回答。她们只不过认为美国的公立学校比别的任何学校都好

而已。或许，这是由于她们很少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天主教学校特别使她们气愤，但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不谈的好，因为我认为天主教教育是十分卓越的。在天主教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天主教徒办的中小学、大学和专科学校，而不是教会本身。献身教育的男女修士僧团，在我眼中是基督教对他人仁爱的最好标志。我非常希望奥莉加学完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天主教教育的整个体系。这并不是说，她应当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我们终于专程到圣迭戈去，会见我们那两位孪生姊妹朋友。奥莉加那时8 岁，我们通信的时间也就是8 年。在机场上，我们一下子互相认出来了。这对孪生姐妹尽管外貌并不太相像，却都穿着连裤衫。这种衣服在美国所有退休年龄的妇女都穿，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她们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笑意盈盈，同她们少年般匀称的身材形成对比。她俩个子都不高。她们在靠海边的饭店为我们订下房间，带一个小小的厨房，有冰箱，里面装满了许多食品。我们在美妙无比的圣迭戈度过了好些天。城里有一座巴波亚公园，有一个港湾，在波因特·洛马有一座灯塔。我们去了一趟西班牙老城，在那里一些用石灰刷得雪白的房子里，收藏有墨西哥艺术的样品。我非常喜欢“拉丁”圣迭戈，正如我永远喜欢加利福尼亚一样……唉，我真害怕作第二次失败的加利福尼亚之行，因为我的财力已不允许我再作试验，如果我想继续让奥莉加在普林斯顿上私立学校，想有一幢自己的住房的话。

两位姐妹每人都有一套很小但很整洁的房子，离圣迭戈海滨浴场不远——这对苏联的每个教师来说都只是一种理想……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我发觉，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都

住在“希尔顿”或“喜来登”饭店,从来看不见另一个世界是怎么生活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在美国所拥有的财富常常无法作出评价,反倒常发牢骚,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太少。对全世界来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在美国,当别人对你说:“我只有一套很小的住房,非常小,但是自己的”,好像请别人原谅其简陋时,欧洲人却会发现,这住房压根儿就不算“小”,也不算“简陋”。来自亚洲或其他国家的客人就更不必说了。就连我——一个在苏联享有足够特权的条件下生活了40年的人,也常常忍俊不禁,以免得罪我的两位女主人。而她们在圣迭戈那“小小的住房”给我的印象,却是我晚年个人独居的最高理想……

我们这两位孪生姐妹朋友是学识渊博、颇有文化素养的教育家,同她们交谈,听她们讲话,都是令人愉快的。她们是如此亲切,如此坦诚,当我要在教育问题上作出选择,作出决定的时候,她们常常尽力帮助我。她们同时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

* * *

我喜欢住在加利福尼亚,住在这里确实轻松、便宜。奥莉加本来可以继续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然后上加利福尼亚的大学。不过人们总要卷入我们的生活,给我们提建议——一个新来乍到美国的人总以为“那些人更了解情况”。此外,叫我惊奇的是,奥莉加的亲戚早川一家只是在口头上希望同她更亲近;现在我们离他们并不远,他们却过分地忙于政治,对奥

莉加却根本不关心。堂到华盛顿去了, 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 以便步行去参议院”) , 马吉则在他和旧金山之间忙于奔波, 并不想迁到首都去住——然而, 那却是她直接应尽的责任。他们根本顾不上我们。

但是一些熟人开始劝导我, 说卡尔斯巴德可是个“ 穷乡僻壤”, 必须尽快搬走,“ 至少得搬到拉霍亚去”; 那里有一所大学, 还有一切可以称得上文化的东西。至少有一些文化的表象。他们甚至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为我们找了一套住房, 说起来这似乎确实更合理……于是我听从了。

但是, 当我们离开宁静而古老的卡尔斯巴德, 搬到拉霍亚的新建筑区, 在这个到处都是沥青, 令人十分讨厌的标准公寓房间里安顿下来时, 当我们永远失去了那座比这些新的“ 豪华公寓房间”便宜得多的日本式小房子(卖啦!) 时, 我才明白, 我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奥莉加, 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称心如意的。拉霍亚是上流社会的疗养区, 主要街道上的铺子物价很昂贵, 这是一个富人的城市。劝我搬来这里的正是这样一位阔太太……跟普林斯顿完全一样, 一所大学在城市附近某地孑然独处, 而城里则到处是游来逛去大把花钱的人。我们周围的邻居对人也不太友善。可这里倒声名赫赫! 同普林斯顿一样, 拉霍亚认为自己是加利福尼亚南方的一颗“ 明珠”, 不过我们却完全顾不上什么明珠。学校也不是人们向我们讲的那么美好, 比我们在卡尔斯巴德知道的学校要差多了。不过美国人通常宁愿找一座昂贵的宅邸, 而不愿花钱去上一所好的学校: 住在我们这座“ 公寓”里的父母要支付很高的房租, 却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念书。我也尝试着这么干, 不久便确信, 这对我们不适合。“ 体面的公寓住

房”我们实际上是绝对不需要的。再说，我们的房东也是个讨厌的爱挑剔的人，常常亲自跑来查看我女儿是不是划伤他的冰箱，我女儿是不是在墙上乱涂……美国孩子常常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既然我们“不是美国人”，他就该认为我们简直是野人了。

我们的老朋友堂·列文，自然从来也没建议我们走出这一步，他不能容忍加利福尼亚所有那些闹闹嚷嚷的名地，所以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为自己选择了宁静的卡尔斯巴德。但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他开始把我拉去参加他那些政治性的聚会——他认为，我“简直就不可能”这么呆着，而不积极参与反苏的宣传活动。我无法说服他，说这不是我要干的事，这不合乎我的天性，我只能为这类目的著书立说……但他还是把我拉入“致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这件愚不可及的事情里去了——我曾同意在这封信上签名，但须确认这是一封集体的信件。此信涉及从苏联叛逃到伊朗的人的命运。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报纸上突然登出《斯韦特兰娜致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而且报社开始不断有电话找我……打这以后，我再也没同堂·列文见过面。我完全无意再去接受记者采访，或者——更糟糕的是——给别国的执政者们写信……

结果我们到了拉霍亚这个古怪地方。这里根本没有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这一代人就爱这样做——习惯于“听从权威”，而不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作为小锡兵、作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非党的或党内的“苏维埃人”，现在都长大成人了，为了顺利地生存在世界上，必须重新学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享有自我的，而且自身也在寻求对他更好的东西。而在寻求的时候，要拼命地奔向目标，要有耐心，

还要坚定不移，不去理会别人的任何议论和劝阻；因为别人是根据自身的经验而不是您的经验提出建议的。这儿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列宁格勒，共同的标准是没有的。

总而言之，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富裕的城郊……在普林斯顿，我们至少认识许多人，了解许多学校；我们的圣心学校一直给我写信，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奥莉加送回他们那里……"她是我们的！"现在写信来的已是一位新校长，她以此表明学校对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

当然，在格格不入的拉霍亚住了几个月后，我们重新回到普林斯顿，现在是住进了一套租赁的小住宅；奥莉加也重返了圣心学校。我们恰好是感恩节前一天到达的，便前往诸圣教堂；我们那位老朋友校长亲吻了我们，甚至还流了泪。我们也亲吻了他。

我们又去找伍尔肯太太买几只污水桶，又作自我介绍。她当然非常高兴，表示愿为我们"尽力效劳"。只有我们的保护人和靠山——大家都这么认为——凯南大使，对我们的返回不满，因为我们到加利福尼亚去后，他便如释重负，轻松多了。

总之，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身边。这是第二次返回普林斯顿了！可现在，我们在威尔逊街的老房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房主对那房子非常满意，根本不打算将它卖掉。而且现在的价格，诚如房地产销售代理人所说，"涨得快冲破天花板啦"。

……于是，我们开始在这套租赁的房子里过起日子来，后来又买了些东西，然后又去租房子……

我试图租一套廉价些的房子，而让奥莉加去收费昂贵的

天主教学校念书：如果我买一幢房子，就只得把奥莉加就地送进免费的公立学校。我们对各种方式都作过尝试，因为同两年前我们去加利福尼亚时相比，我们的经济情况差多了……这城市我们很熟悉，这里的人们也认识我们，他们每次都帮助我们安顿和——搬迁。

不过我心中仍有一个奇怪的感觉：过去的"老"朋友们尽管表面上很高兴再见到我们，但只要我一开口谈起我们生活中非常实际的困难，谈起普林斯顿昂贵的生活费用，谈起我如何更好地安排上学问题、住房问题……他们便不愿意再听下去。仿佛他们都认为，我自己的"困难"全是臆想出来的……不过我的银行很清楚，这全是些现实问题，我们的税务检查员对此也了然于心。

在此之前，我的钱已不再存入普林斯顿银行，而我所有的富人朋友、熟人和保护人都在这家银行存款。爱莉丝·布雷夫曼，一个难忘的（已故的）、聪慧而实际的妇女，我多年来的纳税负责人，建议我转入特伦顿一家小一些的银行；在那里工作的人有许多是妇女。她说：收入不高的单身母亲，能"在最理解您的处境的妇女们的维护下获益"。

亲爱的爱莉丝啊！这当然是不错的！特伦顿的银行和那里讨人喜欢的年轻职员们，在后来几年中一直同我打交道；对客户态度上的差异使我十分惊讶，这种差异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了。1967 年我把大笔款项存入普林斯顿银行，现在这家银行对我已没有任何兴趣。除了这个考虑之外，工作一辈子也没有个家的爱莉丝·布雷夫曼还十分理解，什么地方对离过婚的单身母亲态度更好：啊，那当然不会是普林斯顿的总行！我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这境况她是完全理解的。她

为人诚恳,办事能干,她的帮助总是很合乎实际需要。“至关重要的是您有一段时间曾经付过很高的税金。这也就会提高您的退休金,这对您的晚年是很有用的。”她这么教我,似乎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似的,如伍尔肯太太、特伦顿银行的吉姆、卡尔斯巴德的詹西拉库兹等等。在我的生活道路上,爱莉丝堪称是一位善良的天使。若干年前,某一位天使把我带到她这儿,“交”到了她手中。周围有许多好人,他们午餐吃夹肉面包时,经常顺便向我提出好建议。还有一些很有耐性、不太出名的好律师,帮助我“弄明白”并理解我在瑞士签订的旧合同。但这件事容我后面再谈。

然而,人们仍然认为我是百万富翁——报刊的力量就有这么大。不断有人前来提出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我甚至试图为纽约的俄侨报纸举行一次专门的记者招待会,以便永远摆脱有关我的这些虚假的表象。可他们老是写信来说,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是自己喜欢过豪华生活而把钱花得精光的呀!”于是我决定干脆保持沉默,任何时候也不再对任何人举行任何记者招待会。

当然,由“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事务所的律师们创建的阿利卢耶娃福利基金会就设在这里的新泽西州,并仍然在给印度那家医院以及某些美国组织寄去支票。当这种慈善姿态仍在继续的时候,人们怎么会不把我看成富翁呢……关闭慈善基金会,把我的钱转而用于奥莉加的教育之需是不可能的,因为律师们已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并将这可能性彻底杜绝了。这就是在不明白其意义的情况下签署文件的又一后果!1968 年,我曾签署一份“修正件”,废除了基金会的原始状态;按这个文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基金会,收回我出

版第一本书所得的稿酬……那时，又让我签署了一份什么文件，并且没有解释这个变更会产生的全部后果……除了掌握我引起轰动地来到美国的头几个月里全部档案的事务所，谁还会更清楚地把这些详情细节讲给我听呢？

格林鲍姆"将军"已不在人世。艾伦·施瓦茨离开了事务所，同纽约的妻子离婚后去了加利福尼亚。在所有人中，唯有一位税务律师莫里斯·格林鲍姆和他可爱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仍然有时打电话来，甚至邀请奥莉加去剧院看那几年颇为出名的百老汇音乐片《安妮》。但就连莫里斯·格林鲍姆也不愿听我讲述眼下的困难……可突然又有一个意外的成功！

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地方报纸的广告上，发现一幢房屋以极低的价格出租，那房屋在一条静僻的小巷里，却处于城市正中心。这是城里一个古老的、非上流社会区，离从纽约来的退休大使和部长以及豪商巨贾居住的街道很远。我按附带的号码拨通电话，并立即说明：我有个10岁的女儿、一只猫和一条狗。在获知这种情况后，房东通常会说："请原谅，不成"。在笃信基督教的美国，当孩子、老人、动物会给财产带来威胁的时候，人们便不喜欢他们。我不久前在加利福尼亚就遇到过这种现象。

不过——奇迹出现啦！这位房东却说：他没有异议，既不反对带孩子，也不反对带动物，"想带多少猫、多少狗，就带多少来吧，我们喜欢动物！"他作了这么个奇怪的回答。于是我又小心翼翼地问道：为什么普林斯顿市中心的房屋，租金却较为便宜？"您不妨来瞧瞧吧！"他说，"房子没有车库，厨房也很陈旧，没有衣柜，只有几个架子，没有洗碗机，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价格就上不去啦。其他方面这房子都好，还是沃伦

1914 年修建的呢!”

我便去看看,不相信我们能在普林斯顿找到什么中意的、确实可以接受的东西……但这的确是个奇迹。

沃伦的名字在普林斯顿是响当当的——他是建筑师,这座大学城里一大半房子都是他建筑的;他早在1900 年那些年代便开始干了。那时,他还不是什么杰出的建筑师,无疑只能迎合客户的趣味——那些人常常是些大学里的教授。不过,他的房屋合乎当时的时尚,也符合这个城市的宗旨,而且比那些新建的"豪华公寓"更体现他的个性。那些"豪华公寓"像一群下流女人,在这座古老的、也曾是最可爱的城市周围四处林立起来。这种老房子(“竟没有洗碗机,可怕!”)的价格在现代的普林斯顿应当低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座城市正在竭力把有钱的买主从华盛顿和纽约吸引过来。

我们在艾肯大街的新居,对我们来说真是再好没有了。它不大,但一切设施应有尽有,还带一座小花园,一座老公园也在这里。到纽约的汽车就在那拐角后面发车,粮店也不远,散散步就可以到达。从西边的"豪华大街"来到这个比较普通的地方,我们对这次变迁极感满意。我可以继续让奥莉加在圣心学校学习,让她去上法语课、吉他课、甚至她的骑马课。上骑马课就在离此不远的一座农场里,而不是在必须穿专门的骑服和收费昂贵的地方。那里的人骑马都穿牛仔裤,而且大多是孩子。那些马看上去很老,显得精疲力竭;四周也是一片污泥。但是奥莉加学会了骑马,对马很有热情,跟她的姐姐卡佳一样……奥莉加到哪儿都成绩斐然,她学的所有功课只能燃起她的好奇心,使她去作更新更新的尝试和追求。这段时间我们频繁的搬迁一点也没有使她感到烦恼,相反,她对新

地方，新环境倒是越来越兴趣盎然。

我们将我们的"蓝鸟"，也就是那辆福特汽车，换成了小巧经济的达特桑车，尽管那车是在人心惶惶的日子到来之前才放弃的。电视和广播中不时传来消息："汽油即将告罄"。于是人们一个劲将自己大型舒适的汽车卖掉，而去买日本的"罐头盒"。我也受到这普遍情绪的影响。这样更节省一些。我总感到这很滑稽：亨利·福特的王国突然屈服于日本的廉价汽车，而且这些汽车又完全不适用于美国的道路！日本汽车适合于小日本，由此决定了它们的大小。但节省燃料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我们便服从了时代的需要。

身处这种种操劳，为奥莉加开车及其他乏味的事务之中，我真想躲到一个安宁的地方去，静静地考虑一下生活，"观察"一番四周的自然界——去某家修道院，或某个离群索居者修身养性的地方……新泽西州独具的高速运转的疯狂的生活节奏，跟加利福尼亚一样，被公认为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我身边那些歇斯底里的妇女没完没了地东奔西跑，去寻求"活动"——打网球、看花展、搞拍卖、到慈善市场做买卖，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只需让这种活力来证明她们"仍然年轻"就行。所有这些装模作样的愉快啦、活力啦，使我感到实质上是极大的悲哀：人们多么害怕衰老，怕脸上的皱纹啊！仿佛这是一种罪恶。像我这样的50多岁的妇女，却在尽力追赶自己年轻的女儿或儿媳。好在她们不生活在大家庭里，不需要照看孙子——而我却认为照看孩子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身心都有益。

一段时期，我很感兴趣于所谓对"第三年龄者"的教育，特别在加利福尼亚，我仔细翻阅过由大学推荐的夜校教学大纲。

其中包罗万象, 从酿酒、编筐到织毛衣、研究文化史。但我受过高等教育, 不想去听那些没什么价值的、肤浅的课程。再说, 他们总是晚上上课, 而我们晚上总是呆在家里。对我和奥莉加来说, 不论住在那里, 家都是神圣的地方。电视的晚间新闻、晚餐、谈论一天的事情:“家中炉火悄然的胜利”。[①] 不论我和奥莉加住在哪里, 我们总是把家里布置得就像要永远住下去似的。家园之情对她来说应该是神圣的, 我在我自己飘泊无定的生涯中也不想丧失这种感情。

在艾肯大街的家充满了“良好的空气”, 这气氛就如同我们在可爱的威尔逊街50 号的家, 温暖而祥和。这里也曾长期居住过一些好人, 在四周留下了他们看不见的“痕迹”。每天晚上同女儿在一起, 我总会有一种幸福感。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求一个“新家”——这种事在美国也是有组织地在作的。

回到普林斯顿不久, 我遇见了我的医生的前妻——现在她看上去比他们离婚前漂亮愉快得多。她邀请我参加单身者协会的鸡尾酒会, 说这个组织拥有众多的单身男女, 他们聚在一起, 共同打发时光, 常常喜结新的良缘。

出于好奇我去了——再说, 我对这位家庭妇女相当熟悉, 我觉得她倒不是那种低级庸俗的女人。但有一些端着酒杯的男人开始接近我, 向我提出一些带启示性的问题, 以断定我的

---

① 正如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早年所写的诗那样:“饭后的烟斗——一天劳动的终结; 家中炉火悄然的胜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俄国的诗歌。但正在彻底忘记用俄语讲话, 这时我已完全不再用俄语思考。

“价值”。我有自己的房子吗？我的星座是什么？(这是为相信占星术的人打听的。) 我出生于何处？这一切叫我讨厌极了，便扬长而去，永远再不见那位太太。难道必须一直同什么人在一起吗？难道一个人同孩子一起就会如此“寂寞”？

我的外祖母曾经说过：“宁肯过独身生活，也比同另一个人在一起而感到孤孤单单好。”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她的格言一直对我具有魅力。当她在世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理解她，拒绝她的关怀和温情，而醉心于各种虚假的“积极表现”……奥莉加——给她取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外祖母——继续是我的生活，我真真实实的家庭生活的中心。

*　　*　　*

我远在苏联的儿子和女儿，显然被禁止同我通信、通电话。长期以来，我一直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都写信告诉儿子，总把信写到他担任医生的诊所。我已经9 年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只是有一次，我试着给他打电话，我们只来得及说了个“喂！”电话便被截断了。接着，莫斯科话务员告诉美国话务员说“线路不通”。我也不想再打电话了，因为我明白，我们是“不允许”通过电话交谈的。我女儿卡捷琳娜那儿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只在1967—1968 年间收到过儿子几封信。

后来他突然来了封信，是通过一位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转交的，但这位记者并没有直接把信交给我，而是先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看过之后，费了一番脑筋，把信转寄给在普林斯顿的凯南大使：他既然是我的“保护人”，就让他去决定该怎么办吧。所有人都为这封写于1975 年6 月的信而惶惶不安。

终于，在8月份，我被邀请去凯南家"喝茶"，他当面把信交到我手中。这封信已被拆读，看得出曾在许多部门研讨过……儿子那时已经离婚（他妻子带上我的孙子离他而去），他在信中诉苦说，他万分孤独，请求我将他办理到美国来，在这儿永远留在我身边。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凯南大使向我讲得非常确切、非常明白："我们会帮助他到这里来看望您。但您得向我们保证他返回苏联。否则将很麻烦。"

我真是六神无主了，因为许多年来，我从未得到过儿子的只言片语，他却突然提出这么个请求！应该记住，在70年代初，许多犹太人及非犹太人离开了苏联。或许他指望在这种情况下将他办理到美国来是可能的。可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力。我现在已被明确告知："请您保证他返回莫斯科。"

我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因为，如果我儿子到美国来了，我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让他坐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他也直言不讳地讲了："要留在你身边！"我什么诺言也没许下，干脆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别到这里来。"

凯南的冷酷无情真叫我惊讶。很久以来他一直在所有人面前扮演一个很亲近我、很理解我的朋友的角色，他怎能对我玩这样的把戏？……提出这样的"协议"？

一切联系都中断了。直至我迁往英国之前，我再没听到儿子的任何消息。我曾将我的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他，那时我住在剑桥，他突然打电话来……不过这件事情我以后还要谈。

我离开共产主义逃到了敌对的阵营，苏维埃因此而惩罚我，不准母亲同她的儿子联系。也就是说，在苏联，我被看做

是政治犯了。而在反苏情绪越来越强烈的美国,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人们却开始将我视为"苏联的代表"。甚至我的女儿,学校里从来没有任何人向她打听过她的先辈,大家对她都满不错——现在连她也突然感到人们在疏远自己。女孩们突然不再邀她作客,某些老师(不是修士,而是一些聘用的世俗教师)也一下子在她身上找出许多缺点!我去找儿童心理学家,她也建议我干脆让孩子退学——退出我曾经满怀幸福地将她送去的那所学校……现在,人们说奥莉加是一个"有问题的儿童"。学校里来了一位新校长,也来了一批新教师,她们都有自己宠爱的学生;于是奥莉加开始向我抱怨,说同学们对她很不好。这倒是件新鲜事……

当然,普林斯顿仍然有许多人对我们抱有同情。前面已提到过的我的税务律师爱莉丝·布雷夫曼对我们就一如既往,在11年中从无任何变化,这期间一直由她办理我的纳税手续。她是普林斯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由于她忘我地工作,人们都尊敬她。当"不幸的"纳税日期到来的时候,她仿佛从不休息……

《爱莉丝,我希望全部留在自己口袋里!》这么一幅招贴画挂在她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就在这儿看杂志等她。某位典型的纳税人表达出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但爱莉丝却很敏锐地注意使她的客户不致因那位山姆大叔而过分恼火。关于山姆大叔,我在加利福尼亚看到过完全不同的另一张招贴画:《上帝赐予,山姆大叔收取》。

爱莉丝个子很小,完全是个矮子,有一张十分慈祥的面孔,医院里上了年纪的护士常常就是这个模样。她喜欢上等珠宝,将这些珠宝心满意足地戴在身上。她可以陪每一位客

户坐很久,“您需要多久就多久”。别的客户可以等着。我从她手上拿到第一批美国纳税条例,但是为时已晚。格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把我弄到美国来生活、出书、显然还要纳税,他们就应该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我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爱莉丝不得不在很晚的时候才把种种规矩告诉我。我们大家都非常尊崇她,当然,要是没有她,我们是绝对孤立无援的!

……我们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爱莉丝患了胃癌,要做手术。我们于是才想起,最近一段时间她确实奇怪地变得相当消瘦。但她仍然对我们母亲般地微笑着(她并没有家),坐下来同我们每个人长谈。啊,不,她不能死!没有她,没有她在1号宅的办事处,在帕梅尔街心花园那边,连普林斯顿也将不复存在!但手术后不久她便溘然去世了。她是虚弱的、知识分子型的妇女,工作和过度疲劳使她精力衰竭。尽管她的精神是坚强的,但身体已失去了抗争的力气。

有几个人邀我一道到犹太教堂去,那里正在为她作安魂祈祷。许多人都去了,我是平生第一次去犹太教堂。看见如此众多的人来为一个不曾成家的妇女作安魂祈祷,我真感到高兴——她简直就没有时间去安家啊!她曾为我们大家操劳了一辈子。

如此谙熟的旧约和赞美诗,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座教堂里诵读起来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或许是人们诵出了它们原有的美和力量。仪式是简单的,充满自尊,没有任何伤感。在这里,所有祈祷者的同心一致是毋庸怀疑的、深厚的、古朴的……我那些从未上过任何一家教堂的朋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种力量与团结的印象,也是令我永远难忘的。

但爱莉丝并非这么简单就走了。她放不下那些成年依靠她的客户。她挑选了一家应当可以代替她的公司，并亲自为她的每位客户选定了一位律师。我们发现时候一到，我们的一切仍旧正常如故，已经有爱莉丝亲自指定的人在为我们的纳税事务操劳了。她做得比我们可以预料的还要多！这样的人是不会被忘记的，我早就离开了普林斯顿，但仍然经常想起那位面孔慈祥的小个子妇女。

*　　　*　　　*

那个初秋的早晨，雾气蒙蒙，树叶啦、灌丛啦、青草啦、还挂着许多花蕾的玫瑰丛啦，都蒙上了细细的水珠。空气暖烘烘的，但呼吸起来有些窒闷——这在新泽西州是常有的。空气湿度很大，对车辆、楼房和人的健康都不利；不过植物却喜欢这种天气。我送女儿去上学，学校坐落在森林和巨大的花岗岩砾石之间，显得非常美丽。我把车往森林里开进不远一段路，干脆欣赏欣赏秋天的美景。

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所学校我已经了解多年了，我还知道这一带的所有公路，熟悉这座城市以及它四周的森林。我一直感到这儿适得其所，正如奥莉加在这座美丽的学校里也是适得其所一样。

我观看大自然犹如观看上帝的庙宇，总觉得那是远离人、远离思想、报纸、技术设备的地方叫人心旷神怡。人们还没有发明比这些树木、小溪、森林更好的东西。“假如人类在面对宇宙，面对大自然时能更温和一些，那么，或许是能够拯救我们这个星球的，”我想。今天早上广播的一些不愉快的消息，

已经使人一整天都感到扫兴。从一大早起,人们便互相破坏生活。但是,大自然总是让我们感到慰藉,使我们的心情复归平静。

道路穿过一片老橡树林,那儿的树又高又细,低处是一层层山杨和山茱萸。有5 年时间,我每天送奥莉加上学都是走这条路,并观察这座林子一年四季的景色。

春天里橡树树梢还光秃秃的时候,这里的山茱萸像一片雪白的泡沫。现在,山茱萸的叶片已变得鲜红,纷纷凋落。高高的橡树也荣耀地闪着金光。森林里笼罩着一片薄雾,将一切变得虚幻,犹如虚实相间的中国山水画。

这年的11 月真是非同一般的暖和。连翘也搞错时间竟然开了花;在这个季节,它那黄灿灿的花朵看上去真有些古怪。一些樱桃树也盖满了羞涩的白花,完全不像春季里开放的那种花朵。这些花看上去很脆弱,随时可能凋谢。也的确如此,寒潮很快就来了,把这些开得不是时候的花朵一扫而光。

现在,冷空气清新而透明。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野草一片碧绿,在这样的季节,它显得实在太葱翠了。强劲的寒流尚未到来,但不久它就会扼杀青草,使其枯萎;葱翠的野草将变得褐黄。眼下这些日子倒是清爽的、艳阳高照。

四周一片静谧,让人感到大自然即将进入常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满意足的气氛,这从树木上看得出来——它们在漫漫炎夏之后正享受着这份清凉。

我有时候在傍晚时分出城去看看日落。今天,西边天际呈现出一派金黄,这是一次灿烂而欢腾的日落。天空渐渐变得越来越红,预示着将有一个凛冽的寒夜。高天之上,云朵绵

绵,像一片片修长的羽毛,微微泛红;往下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天空变成青绿。在这黄绿的背景上,光秃秃的树木枝柯交错的黑影纹丝不动,清晰可辨。空气宁静,确切地预示着冬季正在到来。

天气从高空降临我们的大地,然而在这一年,空中有什么东西被搞得一团混乱……晚秋时节那些不同寻常的暖和日子非常奇怪,正像那个乱了套的春天。令人惊讶的现象向四处扩散,奇怪的新鲜气息使我们的心充满了对春天的企盼,对发生意外事件的激动。四周洋溢着深藏不露的喜悦,这是一种毫无缘由的喜悦,一种存在的喜悦。

* * *

真是奇怪,住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所谓野蛮的西部,我们却从未遇见过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他们谈某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陶斯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他们的艺术品,精美无比,令我们神往。我们甚至在普埃勃洛的印第安人居留区看见过他们——他们看上去已完全现代化了——穿着蓝色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跟美国的所有人没有区别。他们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已丧失了特殊的外貌。纳瓦霍人美丽惊人的织被,祖尼人的银器,以及各种陶土制品、编筐,在许多展览会上看上去毫无生气,也不知制造者是谁——就像在伦敦展出的埃及石棺……

犹他州居住区的印第安人在计算机工厂干活,表现出熟练的技能。那些地方为他们建造了缺乏风格和建筑思想的标

准住房；那些房子看上去毫无魅力，显露出那里的贫困。弗朗克·洛·赖特要是看见美国建筑师为激励他的灵感的人们造出的房屋，那真是要气得像炸弹一样爆炸！“标准设计”总是低劣丑陋、建得粗糙不堪。

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终于在普林斯顿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他原来是我过去在老街上租那座老房子附近的邻居，是个木匠，也干油漆活，修理房顶。他从阿巴拉契来到这里时还非常年轻。在老家，他有个哥哥是易洛魁人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在这儿找到了工作，娶了妻，有几个孩子。他不能再回到他的北卡罗来纳州。他妻子是普林斯顿人，一个白人妇女，不想离开此地。卡罗来纳有他的母亲和一个兄弟，跟他一样，都是易洛魁人。他已50 出头，看上去也像个部落首领。

他个子高挑，腰板挺直，气度威严，头型漂亮，鼻梁高隆；行动不快，但步态轻盈，保持着一种镇定和自尊。我看他用软水管浇西红柿，站在脚手架上为邻家油漆房屋。尽管他动作缓慢，但不一会就将活儿干完。他回自己家吃午饭，步子踏得很轻，仿佛仍然穿着印第安人那种软皮鞋，而不是旧旅游鞋。为了干活，他穿白工作服，白衬衣，并且总是像士兵那样腰板挺得笔直。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见他驾着一辆旧得生了锈的老爷车去干活，车上塞满了油漆罐、车顶上绑着一架梯子。他一早出发，回家吃饭，跨出汽车便直奔家门；除了庄重的鄙夷，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奥莉加怕他，我却挺欣赏他那独具一格的气度。他从不与我们交谈，只向我们举手致意。我们也照此行事k k 可不能不向首领致意啊！ 但是有一次，他却对我俩表

现了人的极大善心。

那时奥莉加10 岁,多少已开始长成不安分的少女(电视看得太多,需要同大伙儿玩,而不仅仅只同我呆在一起,并且因为我不喜欢让许多人来家中聚会而常常抱怨我)。有一次她决定我行我素了。

我像通常一样很早起身,到厨房给她做早饭。当我来叫她时,却没有人回答。大门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张小纸条。“亲爱的妈妈,我出去了。请星期三在公共汽车站旁边接我。请原谅我,但我必须走。”

我跑进她的寝室——她不在!该死的电视,多少次把如何从家里出逃的详情演给孩子看!(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是公共汽车站啊!要是她去纽约——汽车可就停在我家对面拐角那边——到了纽约,就别想再找到她了,那可是大得出奇而又到处是犯罪的城市啊,大街小巷全是小偷、吸毒者、杀人犯哪……或许,她还没离开!

我顾不上换下暖和的晨衣,一下子冲出家门,可在我们这条僻静的小巷里,任何时候都阒无人迹。或许我还在厨房忙碌的时候,奥莉加已经准备妥当,并且出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敲响了邻居的门——没有,她不在家。我敲了一家,又去敲第二家。门开了,门后站着那位首领,像一座大铁塔。他目光向下,瞧着我。

“我女儿跑啦!”我大声叫道,可他仍然瞪着我,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您瞧!她给我留下一张字条,要我星期三到汽车站接她。可我怎么找得到她呀!”

他什么也没回答,眼里却闪过一道亮光。他飞快跑到他的老爷车那儿,向我做了个肯定的手势,便驾车走了……他的

车很快消失在拐角处。他打算干什么呢? ……

我飞快奔回家去打电话报警,说:“我女儿从家中跑掉了。”他们一点也不奇怪,记下了女儿的特征,但没流露出任何情绪。孩子离家出走是常有的事。他们会把她的照片往邮报上一登,就再也不去理会。我穿好衣服。给朋友们打个电话?到大街上去瞧瞧?我的心狂乱地跳个不停,就像往常突然发生休克那样。要不要给学校打个电话?或者,最好别再制造惊慌? ……

我不记得在这种充满焦虑的状态中过了多少时间。我服了些镇静剂,喝了些冷水;可在我的想像中却出现了那些可恶的电视节目中的恐怖画面——被拐骗的小女孩,流落在大城市的街头……我咒骂自己,当自己的女儿需要泄放她的精力时,我却懒得活动,追求平静。啊,她干么要这样做呢?最近,我们连拌嘴的事也没有发生过啊!

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首先看到的便是那位首领。他站在那儿,满脸笑容。我女儿站在他的大腿后面,一脸惊骇和歉疚。

我们母女俩抱头痛哭,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不住地你亲我我亲你。她手里攥着一小束春天的水仙花。“这是我给你买的,”她说。我禁不住失声大哭起来,完全不知所措。

这时候首领已经往自己家里走去。“您怎么找到她的?”我朝他大声问道,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她会讲的,”他顺口说道,一边走着,一边回头向我挥手致意。他不能把时间花在闲谈上。

当我们都擦干眼泪,恢复平静以后,奥莉加向我说,她一个人往前走哇、走哇,后来走上了大街。那里的几家店铺吸引

了她,——她平时就喜欢各种商店——而且她有钱,是"从存钱罐里拿的"(电视就正好教唆人这样做)。她给自己买了个笔记本……和这些"给亲爱的妈妈"的花。然后,她突然看见正跨进商店的首领向她走来。她吓呆了。首领满脸生气地望着她,皱了皱眉头,然后点头向她示意,叫她跟他走……他们出了商店,首领打开他那老爷车的车门,把她带回家里。他一句话也没对她讲。

"可是,妈妈,他看上去可生气啦,只要你瞧瞧他那张脸!我真吓坏了!我以后再也不跑出家门了,妈妈,永远不,永远不跑了!"

这样的尝试再也没出现过,而且这次事件甚至使我们相互之间更加亲切。不过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有必要让这女孩同更多的人在一起,给她以比我和这静悄悄的家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她生活在大家庭中才是幸福的,同爷爷奶奶在一起,同兄弟姊妹在一起——正如我过去生长的环境那样。可是在现在的世界上,家庭遭到破坏倒被人认为是"进步"的一个基础,于是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结果……

在普林斯顿也有一些大家庭,他们喜欢奥莉加,总是热情地接待她。我的熟人安妮的家便是这样。她家中有5个儿子和他们的女友。他们总是邀请奥莉加去过节。我们喜欢在他们那宽敞热闹的家中度过感恩节和复活节。孩子们当然并没有同父母住在一起,但每逢这种节日总会回来。不过这仅仅是过节而已。上一所条件很好的欧洲寄宿学校的念头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当然,我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安宁的瑞士。那里有许多英语学校,教师都来自牛津和剑桥。我在纽约发现了这些学校

的一名代理人在招收学生，便前去找他。

在美国，人们不喜欢送孩子上寄宿学校，觉得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传统。在美国，只有大一些的孩子能进很有特权、很昂贵的新英格兰寄宿学校。当然，也有一些专为孤儿、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为各种在心理和生理上有问题的“困难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

欧洲传统相信，寄宿学校对儿童心理有十分良好的影响，可以发展他们的自主能力，让他们摆脱父母经常是专横的照管，这种照管对年轻的心灵是一种压制。那些富有而具慈爱之心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寄宿学校，认为这么作对孩子更有好处。在美国，这却被看做是对孩子的某种惩罚，或是一种逃避为孩子操心的懒主意。甚至我们的朋友，一位主教派牧师，也持这样一种看法。但我却与此相反，坚信奥莉加的整个心理结构都要求得到“集体的环境”——在这一点上她很像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如此醉心于塔里辛公司的公共生活方式。我继续研究寄宿学校的情况，收集资料，同纽约的代理人谈话，但我却觉得作这种变迁的时机尚未到来。欧洲寄宿学校招收11 岁的孩子，这就是说，还得过一学年。

这期间我曾到英国去过一次——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我答应了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参加 ООП 的一个节目，暗自希望在那里多了解一些学校的情况。可马格里奇和他妻子却异口同声地对我大声嚷道：“现在人们都从英国往加拿大、往澳大利亚跑，随便往哪儿跑，谁也不到这里来！您女儿将会对英国寄宿学校感到憎恶！我们认识一个美国女孩，她父母将她送到英国学校上学，这对她简直是个不幸！”但他们的结论不能使我信服。有人认为，我的想法是满不错的，同时对于像奥

莉加这样一个富于活力又有主动精神的孩子, 这是再好不过了。寄宿学校并不适合一切孩子。可是对于某些孩子, 它是最好的生活学校。

*　　*　　*

由于我重新住在了东海岸, 常常回忆我刚到美国住在这一带地方的头几个月, 现在我想将这一切都让我女儿看看。于是我带她到住在罗德岛州布里斯托尔的鲁菲·布里格丝上校那儿去。1967 年我曾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那时, 布里格丝上校向我介绍了感恩节——那是美国的家庭节日, 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现在, 她邀请我同女儿一道, 去过7 月4 日的独立日。在她的那座小城, 这个节日每年都过得郑重其事、颇具新意, 同时也有传统意味。

我们高高兴兴地到她那里去了。上校没有多大变化, 只是她的肺气肿更严重了, 但她不想戒烟。奥莉加马上向 家里人"——一只很大的硬毛犬和两只猫奔去。其中一只猫已是我17 年前的老相识了, 可仍然保持着那种令人愉快的绅士风度, 打着呼噜表示亲热。另一只猫和那只狗, 则和早已死去的老朋友如出一辙。

在大学城普林斯顿,7 月4 日独立日从未引起人们特别关注; 在那里, 每年6 月的大学毕业生庆典才是更为重要的事件。在这里, 在布里斯托尔, 独立日是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传统事件。庆祝游行经过主要大街, 可以直接从上校家的阳台上观看。她也为客人安放了椅子——就安在树下的草地上。

上校端着食品跑来跑去, 跟通常一样, 穿一双高跟鞋, 嘴

里叼着一支永不变化的长雪茄，为一大群人准备酒食。在这一天，她总是邀请那些美国革命的女儿——几位当地的太太，以及其他一些熟人到自己家的阳台上去。我们在树荫下的花园小凳上坐下来。

游行队伍中乐队高奏、旗帜如林、鼓声咚咚。游行刚开始便下起雨来，庆典继续了两个小时，雨却一刻也没停过。我给奥莉加穿上雨衣，又在她头上撑起一把伞，但我们毫不动摇地忍耐着。我自小喜欢各种庆典，那都是些像杂技一样的令人快乐的表演，很适合儿童，很称他们的童心。奥莉加也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这里的庆典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参加的人包括居民、中小学生、自行车手、本地海员，以及各界市民、各教堂和共济会分会代表。人们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音乐缭绕，鼓声喧天；游行者被雨水淋得湿透，却没有丝毫沮丧，相反，他们的脸上一直挂着兴奋的神情。毫无疑问，他们一边在大街两侧的人群面前大步前进，一边想着美国的伟大，想着美国的民主，想着美国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来，是多么出类拔萃。

过后，我们在上校家又住了几天，同那只大狗一起散步；我讲了我们的事情。上校对这个10 岁的女孩表现出她非同一般的友爱之情 —— 无需怀疑，这是因为奥莉加对动物十分友善。但我关于寄宿学校的想法却遭到上校的彻底否定 —— 主要是因为我讲的寄宿学校在欧洲。她自己的大半生就是在英国，过后又在欧洲战场度过的，她怀着美国人特有的爱国精神认为，“ 美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中也包括学校。

*　　　　*　　　　*

把女儿介绍给我的老友,介绍给我到美国之初便结识的熟人,我总觉得是很大的乐事。我的一位瑞士老朋友安东尼诺·杨讷尔又邀请我。他是外交官、现在是任驻罗马大使的最后一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去罗马,到他和亚得里安娜那儿去,并答应带我们去参观罗马及其郊区。“我们是最后一年有这种机会了。我快退休了。”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您几乎没有看到过罗马!”他开玩笑说,提醒我1967 年在罗马秘密地逗留了3 天。

我真是想去极了,便开始作准备。可是,去英国参加同马格里奇一起举行的电视节目使我的计划全盘打乱:在晚些时候的7 月,罗马已经太热。我想,杨讷尔和亚得里安娜肯定生气了;而且经过许多年后,现在又带着奥莉加,与他们的会面却未能如愿,我自己也很不痛快。对瑞士的英国寄宿学校,杨讷尔无疑是大加赞赏的,而且跟我一样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少年国际教育了。我们本来应当抛弃同OOП的一切计划,到罗马杨讷尔那里去的,……可是,同马格里奇相会的计划早就定好,不幸的是日期与杨讷尔的邀请重合了,我便不得不去了英国。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个愚蠢的作法。再说,比起有些古怪和浅薄的马格里奇来,作为人,杨讷尔和亚得里安娜对我的意义要大得多:果然不出所料,同马格里奇一起作的节目差极了。可马格里奇非常固执,厚颜无耻地要我去,不容我考虑一下,而杨讷尔却一直很有绅士风度,非常彬彬有礼,“一切……以您方便吧。”我最后只得去了英国,后来就什么事也

办不成了。

不久，杨讷尔告老退休，并且得了重病。我们还在一个短时期里互相通信，后来他便音信渺无……不久，——那时我已到了英国——便得知他已去世。无论他妻子还是儿子马科——过去的"小孩"已长大成人，现在是医生——都没有给我写过信。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就此惨淡结束。我对这友情曾抱着极大的希望——要是1981年6月的罗马之行得以实现就好了。我多想把我一直引以自豪的女儿奥莉加介绍给他啊！只有心怀成见的人才不会被这个可爱、聪慧而活泼的小女孩迷住；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被她征服。

早些时候，我曾带上她一起去见另一位早年的朋友。这正是那位美国驻德里大使馆秘书，1967年3月，我因拒绝返回苏联曾求助于他。那时候我同他一起，经历了从德里经罗马到日内瓦的难忘"旅行"。鲍勃·瑞尔和他的妻子现在邀请我和奥莉加到北卡罗来纳州同他们一起度假——他们在那儿的沙滩浴场租了一套夏令住房。我们把自己的达特桑装得满满的，收集了一些必要的旅行地图，便往南方出发。

8月里，正是所有美国人坐上汽车漫无目的外出旅行的时候，公路上的交通惊人地拥挤。但我能根据地图和旅行手册找路。现在，我完全从过去带着奥莉加驾车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次旅行相当称心如意，我俩总是回忆起它。

对于休息而言，再没有比在美国公路上驾车旅行更好的了。我深信，旅游者驾车出行，在这里也是最方便的。新鲜事可多了——可以观赏这个国家，了解它的历史。一路上我们参观诺福克港口，港口的泊位上停泊着库斯托的快艇。而奥莉加却对马里兰州的野生矮马驯养场大感兴趣。矮马在这里

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森林里转悠，在海湾里游水。我们沿着公路疾驰，直至眼前出现麦当劳快餐店或肯塔基炸鸡这些所有带着孩子的美国人必须停车的地方。这时，奥莉加会觉得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跟我们周围那些孩子完全一样：她的举止丝毫也不露她的“籍贯”和她那些大名鼎鼎的前辈们。再说，她那时连一个俄语词也不懂。

每次见到鲍勃和他的妻子，我们必定要回忆起在美国驻德里大使馆的初次会面，回忆起我“叛逃”的整个经历，包括我们一起坐堪达斯航线从德里飞往日内瓦……我们每次回忆这些细节，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过去忽略的东西。有朝一日，保存在华盛顿档案馆里我的整个“叛逃”历程，将会在公诸于众的文件之中。但这样的事情尚未发生之时，我们便靠回忆来享受一番。现在我女儿也可以听听了！

我们总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回忆：鲍勃·瑞尔被从他在德里的家中（已下班）叫到大使馆，接见一名苏联的女叛逃者，那人已在一个房间里等着，旁边有一位准尉军官值勤。鲍勃接过我的护照，读了一遍我的姓名——斯韦特兰娜·约瑟夫芙娜·阿利卢耶娃，又打量了我一眼。然后，我们向楼上的房间走去，按级别那儿有一名领事。我在那里写了一份简历兼声明，他们请我在上面写明来大使馆的原因。那时候我不知道美国人最初的反应——这一点，鲍勃后来倒是给我讲了不少。原来，许多人都曾认为，这无非是克格勃玩的一个狡猾的把戏。另一些人则认为，我确实在冒充那位阿利卢耶娃，不过，我或许并不真正明白我干了什么事。对于事实，谁都不抱完全认真的态度。他们通知了患感冒卧病在床的美国大使，大使决定立即把这个叛逃者带出印度，因为印度当局可能会依法要

求将我引渡回国。我的身份刚刚被确定，消息便立即通过国务院透露给了新闻界……

就在那时候，我们乘坐经德黑兰、罗马到伦敦、华盛顿的飞机从德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快到罗马的时候，所有报纸上都排满了报导，而且还点出了德里大使馆二秘罗伯特·瑞尔的名字。

当我们终于在达·芬奇机场着陆时，美国驻罗马大使馆非常紧张的工作人员前来接我，并马上将鲍勃唤到一边。我当然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相信在飞往华盛顿——这是鲍勃向我保证的。那时候我真想“稍许瞧瞧意大利”，便向四下张望。当有人告诉我，我们“必须在罗马稍事停留”时，我没提出任何异议。

有关报纸的报导，以及允许我“只能在机场逗留两小时”的意大利政府的愤怒，当然没有任何人向我透露半点风声。我不明白，我来这里对意大利为什么如此危险，不过，看来这地方怎么也不希望我到来。鲍勃眼看着变得越来越阴郁，因为我们在此地很短的时间内，必须再找到一个允许我入境的国家——问题在于华盛顿改变了主意并作出决定：认为我此刻抵达是不合适的。（想必已同苏联进行了谈判，跟通常一样，这种时候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任何非常事件，不希望事情有任何复杂化。）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协助下，鲍勃得为我找到另一个去处，但由于不允许我逗留在意大利，一切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

向新闻界提供消息之后，谁也没想过，鲍勃现在要办事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种“消息流失”总是对苏联有帮助，因为这是在向它通报事情的进展情况。过早披露地点和姓名的

轰动性报导，是 自由报刊”的典型表现。鲍勃·瑞尔和罗马大使馆遇上了极为复杂的局面。

那时候，我呆在罗马的一套小房间里有3 天闭门不出，甚至连这个房间在哪条街也全然不知。窗外，除按意大利方式在二楼高度上用绳子晾晒的衣物外，什么也看不见。小房间包括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我坐在卧室里，而所有其他人——看得出他们是使馆人员——都坐在客厅里。那儿的电话响个不停。脸色苍白、心绪不宁的的鲍勃终于通知我说：“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径直前往美国，而应当停留在什么地方，以便弄清 势态如何发展”。成天都有电话找他，叫他去大使馆，他接到大量互相矛盾的指示。

我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没有因遭到拒绝而大发雷霆，也压根儿不过问事件的进程，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我只为 冲出牢笼”而极感幸运，而且最为满意的是，显然谁也不打算再把我送回莫斯科。既然什么也没向我说明，发生在周围的一切细节便对我没有意义。我活了41 年，从来没有作过什么决定：这些事总有人为我代劳。需要的仅仅是有耐心，要等待，而主要是应当彬彬有礼、心情愉快、保持良好的风度。这后者看来在目前状况下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苏联已通过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发表声明，说 阿利卢耶娃是位病人，对她的话不可认真”。因此，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莫斯科，都等着瞧我是否有精神失常的举动。但是，既然我不抽烟，不服用安眠镇静药丸，不大哭大闹，大家就明白了，这显然是莫斯科在故意散布谎言。

那时，人们给我带来一些书籍杂志，于是我便全神贯注地读起了世界闻名而在苏联我们却完全读不到的小说——鲍利

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我直接来自印度,心里充满了使印度闻名于世那种精神平衡。在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平静,从未如此相信一切都将变得美好。这是同印度人,当然也是同辛格本人3 年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而且我感到多么高兴,因为我给了苏联政府一记耳光!——正如美国人所说,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对人们私生活的干涉,他们迫害、监视、禁锢、支配人们的整个官僚体系……在我同辛格的交往历程中已暴露无余,那就叫他们去恶有恶报吧!愚蠢必当受到惩罚。

华盛顿同样十分清楚:一,我在声明中丝毫没有请求在美国避难;二,我准备前往"任何英语国家,只要这个国家不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我签署了一系列文件,表明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这都是我在罗马逗留期间作的。我从未请求允许我进入美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提出这种要求需要具备的一切手续。但是我决不希望再返回苏联,这一点,我曾经讲得非常具体。我在几个文件上签字,表明我愿意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到哪里我都无所谓,只要这个国家讲英语,并且不受共产党人及同情其制度和政党的人压制……很遗憾,我现在才明白,印度曾意欲将我送返莫斯科——当时,苏联在印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们呆在罗马期间,美国人成功地说服了瑞士,发给我临时入境签证。我答应了这样一个条件:"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根据我的理解,这也是指不同新闻界见面。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瑞士的问题。除了一般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之外——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我怎么也不曾想像蓦然之间能够来

到瑞士！这一转变令我感到奇怪，但我仍然什么也没问，只接受别人的安排，接受可能发生的事情。

于是报刊上出现了轰动性的新标题：《她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她决定前往瑞士休息》和《她不再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所》。在瑞士休息的说法特别可笑，因为我感到在印度住了两个月之后，我的气色极好。我的自我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报刊总是对一切进行曲解。所幸的是我对这些新标题、对于最初掀起的那场风暴一无所知。我看见和了解到这一切已是后来在美国的事了……我也并没有"改变决定"——那是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它最先的意见。我的护照上是已经有了美国签证的，那是美国驻德里大使馆为我签发的。

现在，回忆起当时那些日子，鲍勃和我总会没完没了地讨论一切细节。当然，鲍勃能在这些回忆中加进越来越叫人感到新鲜的事实，那都是我当时和后来所不知道的。不过我只喜欢对那些日子进行回忆：那时，我丝毫也不曾怀疑我的作法是正确的，一切事情反正会"妥善解决"。当时我只是坐在罗马的那套小房间里，盼望有个较好的结局。

这时候，报纸又向公众推出一条"新闻"，说我到瑞士去是为了"从瑞士的银行提取我父亲存进去的钱款"。敛财的作法对欧洲任何一位独裁者来说都完全不足为奇，但在这个问题上怀疑我父亲就简直太可笑。他压根儿就没考虑过钱财，完全靠国家生活，从没给任何人"留下"任何东西。他没有私产，所有的工资、奖金和讲学金多年来一直存放在他的办公室，装在纸袋里；他去世后，马上就由国家拿走了。然而，报上刊登的消息却使公众感到确凿可信。过了很久，我都还遇到有人问起那些钱的事，问起我从瑞士银行取回的"遗产"。而且无

论我如何要他们相信,这全是些谎言,但人们仍然相信报纸而不相信我……我没办法向他们解释,说1967 年那时候报纸是在向读者大撒其谎,根本没对事实进行过核对,也不知道这些谎言是什么人提供的。然而,“白纸黑字,利斧也砍不掉啊!”

……而且,由于我不能在罗马街头露面,食物便从一家小饭馆给我们送来。有肉丸子、通心粉等。我和鲍勃闲聊,开玩笑;由于我俩都颇具幽默感,一切事情看来都完全不紧张。我的情绪很乐观,同时鲍勃也向他的上司报告,说我行为合理,表现得甚至很快乐。(在最终允许我前往美国时,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并没有坚持要他们允许,而是干脆毫无争议地静心等待……)

来了一位大使馆的妇女,问我是否需要在商店买点什么。她为我买了一个新皮箱和一件大衣,要我把原来的东西留在罗马,也就是说,改变一下外貌就好。他还给我拿来几条头巾和一副墨镜,这是为了彻底不让人认出我来,但这却使我忍俊不禁。“伪装”的想法使我想起侦探小说和侦探影片——不行,我不能搞这种把戏!难道我在干什么秘密勾当吗?一切都是严肃认真的,所以,最好不要这些可笑的玩意儿。不过,顺便说一句,那皮箱是红色的,我一直将它保留至今——奥莉加很喜欢它。

这只皮箱放着我《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手稿,还装着从莫斯科带来的衣物。它已提前送往机场,我和鲍勃则要在最后一刻赶往这个机场。我们是以瑞尔先生及其太太的名义买的机票。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我们禁不住放声高唱起《再见,罗马!》。那兴奋劲就好像最终被允许出教室的小学生。

我们来到机场准备飞往日内瓦之际,鲍勃先走了,要我等

一等。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计划: 因为意大利电视台的摄像机已准备妥当, 要录下我们登机的镜头(行动保密也是枉然!) ; 于是决定让我通过驾驶员入口登机, 邮件和军需品也是由这里通过。因此我们驾车驶往机库, 并在那里等候一辆小轮摩托车。摩托很小, 我坐在大感惊恐的意大利驾驶员身后——他一句英语也不懂。后来, 在已是茫茫夜色中, 在远处射来的耀眼灯光下, 摩托开始向飞机驶去。当然, 我完全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场故弄玄虚吧! 但我认定, 怎么好就怎么做。谁也没向我作任何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令人不解的方式登机。我干脆认定这一切都犹如侦探小说……

我们来到离飞机不远处时, 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冲着我们打手势:“ 停下, 停下, 赶快回去! 离开这里!”我这位可怜的意大利人, 早已被这古怪的游戏吓住, 此刻变得目瞪口呆; 马达也熄火了。他满头大汗用尽全力发动马达, 但高个子仍然一个劲挥手, 要我们从这里滚蛋。马达终于发动, 我们向机库那边猛然倒回去。这时意大利人向我暗示, 要我下车; 我一下车, 他立刻把摩托开走了, 把我一个人留在一群建筑物和几个仓库棚之间。四周漆黑, 我提着手提包站在那里, 什么也搞不懂。

在一座像大仓库的房屋里亮着灯光, 我便向房门走去。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向楼梯上走了几级便坐下来, 因为我的双腿简直支持不住了。我不知道在这石砌的台阶上就这样坐了多久, 但我觉得仿佛坐了一辈子。(实际上, 从与鲍勃分手算起, 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干脆坐着等待, 看往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不会就这么把我扔掉——总会有人来的。

正在这个时候, 鲍勃在飞机机门旁边同机组人员争吵不

休，不让他们关门；电视记者也等在那里。他搞不清我怎么还没经过另一道门进来，可是，没有"瑞尔太太"他不能飞走，所以不让机组人员关上机门，要求等等"已持有机票的瑞尔太太"！他不知道，我们已被调转方向，送到远离飞机的另一个地方。最后，他不得不下了飞机。飞机门关上了，飞机飞走了——机上载着我的皮箱呢……鲍勃心里真是大惑不解，我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他作了各种各样的假设，甚至想到我是失踪了，或被别人绑架了。现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他在机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送我们来这里的任何人，也无法向任何人打听到我的下落。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人，便驱车在飞机库旁边寻找我，也并不准确地知道什么情况。当我终于看见他时，我们竟扑在一起紧紧抱住彼此的脖颈：我也担心永远再见不到他了！……

已是深夜时分，我们被带到另一个意大利式套房。在小客厅的圈椅上，大家都困乏得呼呼入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坐一架包租的小型飞机离开意大利。现在，这件事已弄得十分糟糕！

微明时分，我们被送到机场。汽车直接驶入机库，那里有一架小型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等着。我们坐上飞机，飞机迅速驶出机库，立刻腾空而起。

这是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美妙飞行。从舷窗往外望，只见白雪皑皑的山峰被霞光染成一派淡红，那可真是大饱眼福。几天的等候和最后发生的事情，使鲍勃脸色发白，疲惫不堪。他开始向我解释下一步的安排，因为到日内瓦我们就得分手，他得返回德里的大使馆去。在日内瓦会有瑞士外交部代表克里斯蒂诺先生前来接我。他要作自我介绍，我必须随

他尽快离开，因为那里可能已有记者等待着。美国大使馆将会同我接触。“我们不会使您的命运任人摆布。只是我们需要一段时间，不能马上……我曾想让您瞧瞧华盛顿，参观林肯纪念碑，所有其他的……我相信这些事情我还办得到！”他这些话，我的印象已不太深了。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在此地也可能碰上记者。“您不要回答任何问题。只需赶快上车就行！一声别吭。”鲍勃也会碰上记者，但我们应当各走一方。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不仅感到忧郁，而且很可怜鲍勃。在所有这些一波三折的经历中，他同我一起吃尽了苦头；实际上，我们已成了终生的朋友。“别担心，”我说，“一切都会好的。”“您就是太引人注目了，”他回答道。（后来他承认，他那时简直不相信我哪一天到得了华盛顿。）而我呢，对我的出逃引起的种种担忧毫无所知，只感到一阵高兴：我给了克里姆林宫里那帮家伙一记耳光……

于是，鲍勃向一辆美国使馆的车跑去，我也跟着克里斯蒂诺先生上了另一辆车。四周已挤满记者；他们拍照，向我大声提问。鲍勃的汽车被他们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穿过法国边界；到了傍晚时分，他又累又饿，好不容易才抵达巴黎。“在巴黎，我多想吃点可口的东西呀！可是，由于时间已经太晚，送来的只是些美式热狗”，他后来对我讲起。然后，他便返回了德里。

现在我们重温往事，特别谈到可笑之处，都不禁捧腹大笑。可对于鲍勃来说，在当时这一切却完全不是可笑的。“把这‘罗马的假期’留给您的回忆录吧，鲍勃！”过了许多年，我仍然对他重复这句话，因为在那本写出逃的《仅仅一年》中，我对这件事并未提及。

不过在过了20年后，趁我还没有完全忘记细节和印象

时，最好在这里讲讲那些事。

*　　*　　*

70 年代中期，普林斯顿的一位阔太太，我昔日的朋友，曾问我：为什么我不再版我过去的“畅销书”，那两本书几年前需求可大着呢。此前人们就已知道，我在经济上受过损失。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再版这个想法都是合理的，不足为奇的。但我那两本书的情况，比她以为的复杂得多。我不想再去找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事务所，而去找了普林斯顿一位熟谙著述事务的年轻律师。他着手浏览我过去的所有文件和合同。

最后发现，要是我的第二本书《仅仅一年》已经售完，我确实是可以再版的。结果，却如出版商所说，不行。那么，为什么当时我在哈珀－罗商店的书架上从来没见到过我的书呢？那么未售出的书是存放在哪些库房里的呢？哈科特·布雷斯出版社的书店里一直有我的书卖……我的出版商对自己的产品为什么持这种奇怪的态度呢？我第二本书的再版权直到 1982 年之后，我们去了英国，才归还给我。幸而，就这本书我同出版商有一份完全合法、完全合乎常规的合同，那还是 1968 年签订的。

我那世界闻名的第一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情况要复杂得多，正如普林斯顿那位年轻律师现在对我讲的。

1967 年3 月，我在瑞士同一个我不了解的科贝克斯公司（在列支敦士登某地）签署协议，并收到一笔我认为是“出版者的定金”之后，实际上已把自己的所有著作权卖掉了。神秘的

科贝克斯付给我150 万美元，将所有权利买断。他们当时就把装在小提箱里的一捆捆钞票给我看（犹如侦探电影里的作法），然后，很快将钱以公司的名义，当然不是以我的名义存入银行。我当时可真满意——我认为我终于找到了出版商，我对我不理解的种种事物和一切细节统统没有细问。然而这些“细节”后来竟造成我极大的不幸。

这份（有关各种权利的）协议书[①]，连同两份给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书都得到我的认定并按他们坚持的意见签署了，这两份文件剥夺了我过问那本书出版和再版过程中的一切权利。我失去了我第一本如此著名的书的一切权利。这事已经无可挽回。

后来，在1972 年，科贝克斯的所有权利又转给了（通过什么形式我不得而知）设在纽约的阿利卢耶娃慈善基金会，即从科贝克斯的瑞士律师之手现在全部转入了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事务所之手，因为他们是这个基金会的监护人。从那时起，我第一本书的一切权利便永远被慈善基金会锁闭了，我无权将这个基金会解散……当然，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本书，我再也不能作主了——尽管我本人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而且投入的是我写书的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几年过去，阿利卢耶娃基金会的监护人换了。但将书的版权归还作者的可能性丝毫没有。一切先就决定好了，要叫我两手空空。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道德，不合情理的。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律师，为解开这个死结都试图有所作为，他们都同我商

---

① 见本书的附录。

量过。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事务所创办于本世纪初,到1982 年关闭,关闭的原因不明。但是它为我签订的所有协议却仍然有效。阿利卢耶娃基金会过去的监护人,现已退离这一职位而又健在的,有凯南、施瓦茨和莫利斯·格林鲍姆,但以往的事情他们连听都不愿听。我的畅销书都不掌握在我的手里;录入每月书目这一权威俱乐部的我这两本书,再版已毫无希望;两本书现在只给它们的作者制造麻烦。

我的写作活动就是如此一幅可悲的图景,70 年代末,一位客观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律师就向我说得很明白。我作为书的著作者,可能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在法律上我好像已经不存在了。我认为,凯南作为在欧美出版了大量著作的作家,在另一个作家来到美国的头几个月里,他对这位作家的命运曾多有操劳;因此,试图帮助这位作家,从他那一方面来看,只是自然而友善的举动。但是,我每次试图同他谈这些话题,他都称不愿意"旧事重提",可他本人却又曾如此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旧事"。他甚至装出一副"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了解"的样子,尽管他对自己出书毫不含糊:他的所有权利无疑都牢牢抓在他手里。所以,在我住在普林斯顿的最后几年里,我再没有同他愉快地见过面。

*　　*　　*

真高兴很多年后我又去了一趟长岛,像1967 年一样,在那儿追寻春天临近的脚步。老斯图尔特·约翰先生早已去世,而当时我曾是他的客人。我曾到洛库斯特维利他的坟茔,为他作过安魂祈祷。打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去过那地方——那

是当年使我对美国留下第一印象的地方。

现在，一位普林斯顿的友人建议我到长岛的北端去，过去我在布里奇汉普顿附近的埃莉诺·弗丽达家呆过。在普林斯顿我住房边一棵小小的李子树开花了。我们一路把车开得很慢，希望什么都不放过，能仔细瞧瞧四周的景色，观察一番，思考一番。我们从南边绕纽约一圈。现在，大海展现在我们右边，一片蔚蓝，还带着寒意。我们快到布里奇汉普顿的田野和牧场了。我在荒凉的海滨浴场认出了埃莉诺·弗丽达那幢小房子。

在1967 年，在那个永远难忘的年头，在报刊的一切喧嚣平静之后，在一次复一次的电视采访结束之后，在我第一本书的片断发表之后，我曾在这儿度过了夏季。那些预先发表的章节，绝对地歪曲了我的事实、我的思想和我的经历——压缩的 摘要”是我的译者在未同我商量的情况下搞出来的，是对我的凌辱，使我不寒而栗。我明白，我作为著作者再也不复存在了：我的文稿别人可以拿去为所欲为……而在这里，在海边，则可以将这一切统统忘却。应当忘却，以免气疯了。

现在，我在这海滨浴场上来回徜徉，收集被大海冲得光滑圆润的小石子，拣碎木片，看海鸥。四周空空荡荡，吹着清新的风。回顾最初那些日子，我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就，心里还存有高兴而天真的企盼，我能说什么呢？

我已经老了15 岁，我有了一个美国女儿，她是我的支柱和根基，现在一切都靠她了。不然，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曾对许多人感到失望——这是个人的失望。我感到苦恼的是，金钱总是居于首位。整个生活，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在其次……我不能原谅我的丈夫和他的公司——他们也贪图着我的

钱。我爱过我的丈夫，并不惜为一切出资付款，使我从而破产，使女儿无力接受教育，而他——却接受了我的所有捐资，对女儿，对女儿的前途则从来不闻不问。在我这个新的国度，我对家庭的憧憬破灭了，我曾感到痛苦。叫我最伤心的就是希望破灭，而不是丧失金钱。

……沙滩上，两只比利牛斯白色大牧羊犬跑来跑去，快活地跳跃着，同拍岸的波浪嬉戏、互相追逐着。一位穿黄灿灿上衣的妇女在同狗逗趣，她手里握着两根长绳，绳子拴在狗的颈套上。一个蓄灰色头发、面孔很年轻的人完全被两只狗吸引住了，兴奋地盯着它们。他穿一件沙土色上衣，坐在沙子里一床陈旧的被子上。海风拂弄着他的一头白发，吹在两只狗毛茸茸的长尾巴上，刮走海浪上的泡沫。这一幅图景在凝重而又和谐的色调中显得多么完美，我不禁用我的袖珍照相机将它们全拍了下来。

刚到美国那时候，我本来可以为自己选择任何活动方式（或者我是这么看的），我很想认真地拍些照片，制作一本美国人像摄影集……然后学会拍电影，制作一部风光片，表现大自然在它的沉默中，在它无言的寄语中向我们所诉说的事情。但这从来没有实现。代之而来的，是人们不断建议我去"教俄语"或从事"苏联问题"研究——一件我憎恶不已的活动！不过这是一个老套子了：所有叛逃者最终都落得要么搞语言教学，要么当"苏联问题专家"。我一样也不需要干，我有我自己的理想。不过我从来未能如愿以偿。我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却作了一个孤苦无援的小女孩的离婚母亲，我得把这孩子养育成人，教会她在这个严酷的世界生活。

我女儿多半会在欧洲的寄宿学校毕业；由于这些学校具

有优秀的传统，她将被培养得比她作侨民的母亲更会独立生活。她将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曾很难为了某种更实际的目的而放弃我的理想主义。我一直相信好的学校、相信教师——教师在生活中比父母、基因、遗传、民族和所有其他无稽之谈重要得多。在私立学校和独立的宗教学校之间，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教你如何生活的学校。然而，为幼兽开办的标准国立学校——这些未来的"动物饲养场"——已在到处竭力排挤私立学校和寄宿学校，这两种学校正在度过自己的没日。

……强劲的海风将浪尖的白沫撕得粉碎，在两只大狗雪白的长毛上揉搓；回忆那遥远的第一个春天我感到困难。自那时以来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已忘记了对那个春天的感受……

我回到普林斯顿家中已是深夜，我拍摄的沙滩、大海、两只白狗和岸边那灰发人的照片也随身带回来了。在家里，我发现临时保姆和她那位年轻人正在孩子房间里舒舒服服地看电视。灯光亮着，电视机声音开到最大，而奥莉加就在这儿的沙发上睡着，连衣服也没脱。这时已是凌晨3 点左右，我给他们付了账，把女儿抱上楼，为她脱下衣服，把她放到床上。她甚至没有醒来。谢天谢地——她不是爱哭的孩子，也不是纤弱的小花。

* * *

作为外国侨民，只有在美国生活10 年之后，我才终于有了申请归化和加入美国国籍的权利。许多人认为，我结婚只

是为了以这种方式获得美国国籍。但美国的法律往往连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用婚姻这种方式"帮忙",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

从1969 年起我成了无国籍人士,那时候,苏联政府盛怒之下取消了我的苏联国籍。说实话,我倒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 然而,既然我已有了一个美国女儿,她的命运又将同美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感到我也应当属于美国,便终于递交了申请。

我已习惯了美国生活方式,我有许多好朋友,我喜欢许多我们曾去过或居住过的地方,同时,也难以想像,我还会到其他什么地方去生活。这已是1978 年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考虑我女儿到欧洲上寄宿学校的事。

考试那天,3 名来自普林斯顿和新泽西州的证人陪我同去。那两个州都是我在美国住得比较久的地方。我的证人一个是教师,一个是邻居,一个是朋友。过后,去新泽西州纽瓦克归化事务法院的日子又到了。

大厅里聚集着90 名像我一样提出申请的人。法院大厅无法容纳所有的陪伴者,便请他们留在门外。我开始观察我周围那些人的面孔——他们大多是西班牙人或东方人,根据叫到的名字也可以对他们作出判断。叫了一个波兰人的名字,有一个人来自阿富汗。我的名字"拉娜·彼得斯"此前早就在使用了,没有令任何人感到奇怪。对于这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英语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那是11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11 月20 日),那些人都穿得很暖和。衣服是整洁的,但却是廉价货。人们看上去神情严肃,许多人都带着孩子——看来是家里没有人照看他们。孩

子们显得很安静,也穿着很好的节假日服装。这群人叫我想起大弥撒时加利福尼亚圣路易雷使团中的人群:它的民族构成也是如此。他们也是这样的劳工,这个时刻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入籍就意味着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能够永久居留而结束漂泊无定的处境。所以,他们那神情,犹如在大弥撒时领取圣餐一样。对他们来说,取得美国国籍是一辈子的大事。这里也没有知识分子非常喜欢的那些动感情的话语。

我们一个个被叫到法官的桌子跟前,在一份文件上签名,然后将根据这文件按我们的居住地发给我们美国护照。我签完文件回原位时,看见一双双关切专注的眼睛在打量我,就像打量每个人一样。真走运,这里没有记者!一切都办得很简单,很自然,很有尊严,没有连篇的废话。法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讲了几句向大家道贺的话,希望我们在美国生活得好。他号召我们"不要在自己之间和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人发生纷争"。他知道在场的人没有时间也并不打算听滔滔不绝的演讲。

我们每人都得到一面小旗——就是节日里孩子们拿在手上那种星条旗——然后就四散回家了。我的朋友在纽瓦克圣心大教堂旁为我拍了一张拿着这面小旗的照片。她就是奥莉加在圣心学校的第一位老师。

1967 年我刚来美国时,有人向国会作了一个提案,要求立即给我美国国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提案下文如何。我是完全根据美国法律,经过11 年之后才获得国籍的。

侨民一般在5 年之后可以申请国籍,许多从苏联来的人也是这么作的。然而,对于所有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本身

就曾经是共产党员的人，法律却禁止如此迅速地让其入籍。我属于要作10 年 检疫”的一类人。我虽然参加过苏联共产党，但是在政治上从不积极；而美国当局对这一事实实际上并未考虑。我这个党员其实徒有虚名——犹如苏联的许多人一样。我完全能够请求某一位对我友善的国会议员让我很快入籍。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生了一个美国女儿，我可以等待。我没有地方急着要去。

只有一道手续使我不安：对美国国旗宣誓时有一句誓词——保证 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我们大家都齐声颂读了誓词，我也这样做了。不过我知道我不是战士，永远也不会为任何目的而 拿起武器”。我周围所有的人看起来也不像武装战士的样子。我想，我们大家应当宣誓忠于和平，而不是保卫共和国。我在这里有一个美国女儿啊，我在苏联还有孩子和孙子啊——我不考虑和平还能考虑什么？我希望永远再不发生战争，我希望我对美国国旗发出的誓言，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宣言。

*　　　*　　　*

多年来，在给予我温暖和信任的众多美国朋友中，有一个人的形象于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她对我无疑扮演着一位圣母的角色。我希望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并掩卷将它置于一旁时，这个人的形象仍然浮现在大家眼前。

她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依阿华州一个英国人家庭里，是家里的第九个孩子。这个英国人在当地的事业干得很顺利。在那座小城镇里，各方面的生活都显得闭塞。这个家庭并不贫

困，但所有人都得干相当多的活计，以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她顺从着性格刚毅的母亲，遵循着长老会的教规，渐渐长大成人。

在这个家庭的许多规矩中，有一条是雇年轻的外国侨民干活，培训他们，直至他们最终学会能够独立谋生。关心他人，在各方面帮助他们，是她的家庭的最重要待人准则。这也体现着对上帝的虔信，对他人需求的尊重。人类伦理学这一课，她从童年时代起便学过了；她有着天生的对他人的同情心，也许最后能成为一位大人道主义者——要是她不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倾注于家庭，特别是孩子们的话。她结婚很早，有6 个孩子。她就喜欢作母亲，并把这件事看得非常认真。

但是，由于一次不幸的事件，她喜爱的小女儿丧了命，另一个女儿也不得不送去终生医治。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情。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一位热情洋溢的年轻神甫。丈夫在长老会和对人的态度中探寻新道；而她，却是一位诚恳实在的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赞同丈夫。她丈夫站在大自然、生命与一切天成之物的九霄高度，很快便醉心于风行一时的裸体主义。他在这条道路上不停顿地走下去，认定这是精神的潜力和待人态度的意义所在，不久便成了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许多年来，她都曾试图屈从于丈夫这个作法，尽力去适应他的需要；然而她心里明白，她不能撒谎。现在，她丈夫大半时间都在裸体主义者的群居地度过，那地方离家很远。她终于同他离了婚，尽管那时候离婚还是很少有的事情。不过她应当按照自己的准则，而不是遵从他的信念去生活。

后来，他们各自找到了伴侣，但她很快又寡居了。她这短

暂的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给她留下一段珍贵而美好的回忆。第一次婚姻生下的4 个孩子已长大成人,都同她很亲近,总是很听她的话。此后,她独自一人生活了很多年,就住在普林斯顿卡内基湖畔的一幢小房子里。

1967 年我来到普林斯顿不久,便通过她儿子见到了她。那时候,她儿子是我的邻居。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我的心:她是一位温柔而安详的妇女,母亲味十足,睿智而又充满自尊,具有我所喜爱的女性的一切优点。她从不搬弄是非,总是尽力理解别人的观点。很快我便开始向她表白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向她倾诉了我不幸的婚姻,倾诉了同留在苏联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后来的孙子人各一方的痛苦。这一切她全能理解,她的心肠非常好。

我向她吐露了我的困难:人已不年轻了,又得在这陌生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女儿。她的现实态度、镇定精神和真正坦荡求是作风一直支持着我。她不是一个爱感伤的人,不是那种总爱悲伤落泪的 老奶奶”。不,她总是既刚强又温存,甚至在她90 高龄时也是如此。

庆贺她在90 岁生日的时候,全家大小30 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似乎都是 突然而至”,租下当地一家俱乐部以作隆重庆祝之用。她现在可以充分享受她漫长的一生,她对后辈的爱所获得的果实了——现在,关怀的热浪又从孩子们那儿返回给了她。她知道这个爱的轮回过程,并以此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中间包含着她生活的哲理。她喜爱这一群喧喧嚷嚷、形形色色、各有成就的人,从不去干预他们的独立性,但也不允许他们去 主宰她的生活”。因此,当有人将一个典型的美国式想法——送她去养老院——提出来的时候,遭到了

她的断然拒绝。“ 在保育院里安度晚年”对她并不合适。

她生活的最后几年，通常是长时间坐在靠大窗户的圈椅上度过的；窗户有宽阔的视野，可以望见湖泊。从窗里欣赏那一片湖水，那映在水中的树影；欣赏小鸟和草木并把它们记录于心，成了她非作不可的事情：她善于观察，善于把自己融汇在四周的美景之中。这对她是一种极大的需求。也可能这是她的视力渐渐减退了，美丽的湖景和熟悉的树木在她眼中渐渐变得飘渺模糊，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了。

当她再也无法阅读的时候，便开始用录音机听新书的录音，她发现这甚至比把书捧在手里读更好……邻人们常来为她大声朗读信件。给她写信的人很广，就像电影明星的情形一样；世界各地都有人给她写信，因为她爱人，爱大家。一些孩子和少年常到她家去，家庭生活不和睦的年轻夫妇也去；她总是很认真地倾听别人生活的经历。

她坐在窗边圈椅上读书的那个客厅堆满了书报杂志，客厅四周全是盆盆罐罐，里面种着花草。在她的房间里从来没有住着一个“ 老妇人”的气氛。她甚至不是一位“ 老太太”，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亮亮光光，将白发盘成老式的发髻。她腰板挺直地坐着，高扬着头——这是一种行为恣肆的现代妇女所没有的极美的姿态。她就在这个客厅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的30 年。

她总是把许多时间花在长老会教堂里，不过她向我承认，她儿子尽管是公谊会教徒，在宗教信仰上却同她非常相近。她容忍别人的意见，投身于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多种活动，慷慨支援慈善事业，以一切办法“ 搭桥”，促进现代人类相互了解。

她享受着在高龄获得宁静的优越，喜欢对年轻的来访者讲述这个话题——那些人在40岁、30岁便害怕“衰老”。“我喜欢回首往事，对过去的生活很满足。这有什么好怕的?”她十分认真地说。对于死，她一点也不害怕。

“我随时准备死去，随时准备着，”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还没召唤我，我的活早就干完了。我想到死，就像想到一种新的体念，既有趣又重要。当然，这决不是路的尽头，我满怀好奇心等待着死亡到来……”在她的生活中，既没有感伤的情绪，也没有空洞的说教。

我们住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常常到她家去，每次去，都是因为需要从她那儿获得力量，获得日常生活的智慧，获得她那种恬淡的信仰和对他人意见的极度宽容。她是我的一座救命礁，同这座礁石接触就能永远叫人得到慰藉。她完全理解寄宿学校对我女儿的必要性，并对我们去英国表示祝福。她本人就一直热爱着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年，我在新的国家开创，经历了希望与热情、痛苦与失望、损失与成熟，她始终是我在现代世界这个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一座救命礁——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便贸然投身于这个大海。当我想到她，想到她的全部生活时①，我总是很明白地感觉到，无论如何，我是多么深挚地热爱着美国，热爱着她的美国啊!

① 伊迪丝·张伯伦于1985年96岁时在普林斯顿去世，死在湖边她那幢小房子里。

遥远的乐声

这是后记，但并不是尾声。

现在我住在英国，我女儿在这里的公谊会教徒寄宿学校念书。我又成了外国侨民，不过现在手里拿的是美国护照。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生活在国外，可没有任何人认为他们是"叛逃者"。英国的生活并不轻松，完全不像某些很富有的熟人向我描述的那样。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是对的，他说"现在许多人正从英国迁往别的国家，而不是相反。"我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感到不快。

我希望写一本新书并在此地出版，不过眼下暂时只能写出有关伊迪丝·张伯伦生活的故事发表，起名叫《第九十个生日》；这篇文章收入了为慈善目的出版的《人们》这本集子。在集子里，我的名字同英国的

优秀作家和著名人士的名字并列一起,他们每人都为这本书写了一个短篇。所有人都认为我仍然很富有。这简直是愚蠢的玩笑!生活一直在同我开玩笑——好像我逃离了俄国的共产主义,又一头栽到美国赖特的公社里……但我并未丧失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获得平静生活的希望,并未丧失在美国或英国出版新书,并且不断地写作下去的希望。我是作家,而非家庭主妇。

人们以为我是一个富婆,写过一本《谈斯大林》的书,将它卖了100 万。或者——说是有人为我代笔。富人和影星倒是常常雇请作家写作并出版自己的传记。很少有人相信我是一名作家,写作之于我乃是一种生存。

不出我之所料,我女儿在寄宿学校是很幸福的。那儿有一大群孩子——这正是她的天性所需。遗憾的是她没有按我的选择,进入天主教学校或英国圣公会学校;不过她也很喜欢公谊会教徒,这对她是一种新的尝试。不久我就无法再代她作选择了——我明白,这种时候已经临近。她虽然还是个少女,但今天的社会总是对孩子们说:他们已经同成年人一样了,他们应当而且有责任自己作出决定,要同父母抗争。这是现代社会,她们要在这个社会中成长和生活。我们曾生活和成长在另一个时代。我预见我们的未来将充满斗争!她不是那种娴静腼腆的人。她的毅力和倔强劲令人惊讶,与她那些五花八门的才能一样。不过,她心里也保存着深厚纯洁的爱。

按照我的意愿,如果我有钱,我肯定会安排她到瑞士去上学,人们已给她在那儿提供了一个位置;但我没有取得外国侨民的地位。瑞士只允许最富有、最显贵的侨民入境,例如钢琴家弗拉基米尔·阿什克纳济或艺术大师科尔契诺依。但这仍

然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国际化的国家。我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小共和国一直赞不绝口。我多么希望将我的女儿培养成一名有良好教养的国际主义者啊！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我的生活完全不是什么荒唐的妄举；就本质而言，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是具有象征性的。但我出生得实在太早。下几代人将不会产生如“叛逃者”这样的概念——人们可以在全球自由自在地旅游，可以适其所好地在任何地方定居。我漂泊无定的祖先的生活，正好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

差不多在150 年前，我外祖母的日耳曼祖先便从他们的符藤堡，迁移到俄国的一个德国人村落，这种村落在沙俄时代曾经为数不少。他们选择了高加索山外气候温暖、盛产酒类、当时十分富庶的格鲁吉亚。俄国历代沙皇早就大量引入德国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德国人工作勤恳、生活方式道德和有责任心。在这些“俄籍德国人”中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俄国艺术家和科学家。

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乌克兰、格鲁吉亚的德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边仍然种田，一边从事酿酒业。艾赫戈尔茨家族在路边开了一家小饭馆。在这个家庭中，德国血统同乌克兰、格鲁吉亚血统混杂起来，后来又增加了俄国血统。

艾赫戈尔茨一家是信仰路德派新教的。我的外祖母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原来叫奥莉加，但她在家中讲德语，在外边却讲格鲁吉亚语。她的俄语一直不大好，讲得不地道，我记得一直到她年老也是如此。她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南方人，很热爱格鲁吉亚，把它视为祖国。她从不希望返回德国——有这种想法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她一点也没忘记德语，经常为

我唱《静夜》这支歌。今天苏联共有好几百万"俄籍德国人",得以返回德国的却为数不多,许多人希望回去却难以如愿……但这是苏联社会制度造成的。我外祖母那一代人,革命前在俄国过得挺幸福。在他们梯弗里斯附近的德国移民区,曾经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奥莉加外祖母嫁给了一位来自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年轻工人,那人是到格鲁吉亚寻找工作的。除此之外,他那半个茨冈人的血统也使他养成不断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习惯。他姓阿利卢耶夫,他让外祖母也姓这个俄国姓:阿利卢耶娃。这个姓来源于"阿利路亚"——一个"赞美上帝"的词语。这意味着在他家中有人出身低级神职人员,在等级上不高于助祭,可能是圣堂工友或教堂鸣钟人一类。我家的所有祖辈,包括父亲那一系普通农民的一代人,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

就这样,我那半个德国血统的外祖母和半个茨冈血统的外祖父都把格鲁吉亚看作自己的家。他们在那里相识并结了婚,他们的孩子也在那里出生。同所有典型的格鲁吉亚人一样,在他们看来,莫斯科啦、俄罗斯啦,都是遥远而寒冷的北方,对他们毫无吸引力。在梯弗里斯,他们成了国际主义者,因为这个城市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曾经是世界主义者的首都,是科学、艺术、商业和宗教教育的中心,同欧洲、近东、波斯、土耳其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久,外祖父阿利卢耶夫参加了社会民主运动——这是一种新的、颇为流行的欧洲舶来品,吸引了当时俄罗斯的各界人士。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过也根据自己的性格,外祖父自然而然地很快投身于左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一边。从那

时起，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整个家庭，就再也不属于他了。他开始不断地迁移，最初迁到巴统，过后是巴库，接着又到了北方的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时候外祖父常常蹲监狱，而他年轻的妻子乃至他的孩子也都得参与党的地下工作。就在这时候，阿利卢耶夫一家遇上了年轻的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即后来我的父亲。然而那时候就连我妈妈也还未出生，她生于1901年。

尽管我父亲的祖辈举家迁移到了格鲁吉亚贫苦农民的土地上，他们未必了解其他的国家，也未必懂得其他的语言，但我父亲却很早就割断了同祖国格鲁吉亚的联系。他的母亲，一位笃信宗教的普通妇女，希望他成为格鲁吉亚东正教教会的神甫，然而他很快便醉心于另一种"宗教"——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此，他完全失去了同自己的母语、同自己的故土的一切联系。俄罗斯成了他所钟爱的国家，令他心醉神迷。他喜欢上了那些俄国革命者，乃至喜欢上了严寒的西伯利亚。他所从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久就将他送去了那个地方。

20年代我和哥哥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国际主义风靡一时，所以，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教我们格鲁吉亚语。俄语才是文明语言。早年人们也教我们学德语，一来，这也是当时的时尚(法语作为贵族语言已不时髦)，再说，妈妈从未忘记过她的日耳曼家系。

在我的奥莉加的祖辈中(正如读者能够猜到的，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外祖母)，从她父亲的血统方面看，也有丹麦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彼得斯一家都是旅居美国的卫斯理派教徒和共济会会员。奥莉加的曾祖父是印第安那州的一位卫

斯理派传教士。去英国寄宿学校上学对奥莉加来说，实际上完全不是一次"远行"，而更近于一次回归。她很快便掌握了英国口音，也喜欢上了英国东部的埃塞克斯和剑桥一带地方。

在她就读的国际公谊会学校里，她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大英帝国过去所有的殖民地——的孩子，并且一辈子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但奥莉加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在当今世界，是美国人便意味着是国际主义者。至少，在今天，美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是持这样一种看法的。

在普林斯顿我认识一个家庭，它三代人——祖辈、父辈和孙辈都从事联合国工作，最早是开始于国联。他们的祖辈是法兰西-捷克人，后来家庭里增加了美国人和近东国家的人。我很钦佩这个家庭，自忖：要是我也能够为联合国作点什么工作，那该有多好！唉，可惜我父亲大名鼎鼎，把我的道道大门都关上了。

但是，或许将来有一天人们会认为，我的生活是试图打破"铁幕"，为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在我们星球上一起生活的一个榜样。或许人们确实会这样看待我的！于是这就会成为我对联合国作出的贡献……

当然，我没有为了成为另一种极端政治的鼓吹者，而将共产主义世界抛在一边。真理不在于各种极端，而在于适当的民主进程。民主进程既不允许左的也不允许右的极端，它禁绝独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独裁还是其他什么独裁——不允许任何人篡夺人民的权利，把整个世界抓在自己手中。自1966年我离开苏联直至今天，世界各大国领导人也罢，各国普通老百姓也罢，一直在讨论着和平主动权的问题。人们

都担心军国主义，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都憎恶它。但美国一如既往地是民主传统的支柱，允许人们自主选择其生活道路，而不让国家将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一口吞没。在20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革命已使人们的思想备受奴役，尽管最初时那些理想主义革命家并没有这个意思。但结果是将早年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彻底铲除了……

事情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大受损伤，它已经不再像一百多年前那样，为今天的理想主义者服务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得以推行，只是借助于苏联的武器、军队、金钱和他们慷慨地许给亚洲、非洲、南美洲最贫穷、最受歧视的人民群众的虚伪诺言k k 那些地方缺乏教育，人们因为无法分享美国的财富而憎恨美国……仇恨和嫉妒心理在滋养着全世界贫困群众的反美主义情绪，然而全世界的青年却在向往着美国及其理想。但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我多么希望世界上有和平。我多么希望军国主义不再威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我希望我的所有孙辈——无论是已出生的还是或尚未出生的——都互相拥抱，没有某种 政治上的罪过”感，没有因为有谁移居它国而产生的负疚感……然而我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事情，却使人心情沉重；除了期望和健全的思想，我也开不出拯救它的药方。

期望和健全的思想到处都存在着，尤其在那些没有统治世界野心的小国家中。欧洲、亚洲，基督教、佛教和印度的非暴力传统，都存有大量古代的和平智慧……印度在这个传统方面历来享有美名。不过，说实话，“ 拯救”药方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存在于人类的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和行为中已经成了如此的仇恨者，成了如此的强暴者，成

了如此具有侵略性的人。我们每一分钟破坏的东西，比我们一生中创造的东西多得多。这也并非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或美国人，德国人或日本人。不，这是因为人类忘记了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忘记了在我们地球的这一边造成破坏，就会在另一边引起破坏性的反应，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血肉相连的。

生活在英国即等于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能得知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操英语的世界在代表所有人讲话。但是，亲爱的读者，如果明天你们在欧洲或亚洲的什么地方找到我们，请不要惊奇……我向往着印度南方，那里还保存着古老的传统，但同样能听到现代国际主义者的声音，那些人竭力在思维和实践上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联合起来。只要我们大家没有在核灾难中同归于尽，我们的行星安然无恙，这就一定会成功。因为在未来战争中，谁也不可能 取胜”，不可能幸免于难。

正如所有信奉上帝的人一样，我相信造物主不会让他的创造物发生此类事情。但我常常有一种想法：要是人们长期对上帝和他的权力失去信仰，上帝将会与他的创造物断绝往来，并遗弃我们大家。上帝及其智慧所创造的人类，那时候将会互相残杀，并借助自己引以为豪的高科技发明消灭周围的一切。这种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所有哲学观念为转移的。

在这种紧迫的时刻，能提出现实的和平主动权的，只能是那些头脑冷静、行为审慎的人，只能是那些能健全地，而不是冲动地进行思考的人，只能是那些能充分运用外交手段，站立在两条恶斗的凶龙之间，冷静地建议他们相互接近几步的人。惟有如此，才可能缓和全世界的紧张局势，才可能哪怕是暂时

地停止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才可能想到我们人类的共同责任，最终想到我们到底是谁……

谁知道呢？或许，印度会重新向世界推荐它那古老的非暴力哲理；或许，世界基督教能向人类指示迷津；或许，全世界宗教共同努力达成某种新的联合，将为人类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时候，不要自相残杀的声音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但是，假如这些话再也没有意义，那么，无论是生活，还是笔者所写的这些书，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983 年于英国剑桥
1986 年二稿于美国威斯康星州
斯普林- 格林市

附　　录

一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967 年 3 月 6 日

在德里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表的声明

(原文用英语写成)

我 1926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莫斯科。我父亲是约·维·斯大林,我母亲是纳·谢·阿利卢耶娃。我母亲死于 1932 年 11 月,我直到 16 岁才知道她是自杀的。她比我父亲小 22 岁,我父亲早在 19 世纪 90 年

代就同她的父母相熟——她的父母也曾卷入过社会民主运动。我父亲和母亲是在十月革命后结婚的。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她是格鲁吉亚人,在生下他们的儿子雅科夫之后就去世了。雅科夫虽然比我年龄大得多,却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的同母哥哥瓦西里还要亲密。

1943 年,我在莫斯科10 年制中学毕业,考入莫斯科大学。1949 年,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现代史专业。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同一个学生格里戈里·莫罗佐夫结了婚。1945 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约瑟夫。我丈夫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们于1947 年分手,儿子留给了我。格·莫罗佐夫教授现在从事国际法方面的工作,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有关联合国的书。他经常出国与加拿大、巴黎、华沙的同行会晤。我父亲不赞同我们的婚姻,一次也没有会见过我丈夫,因为格·莫罗佐夫是犹太人。不过父亲从来没有坚持要我们离婚。

1949 年我第二次结婚,嫁给安·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我父亲希望这次联姻,因为他喜欢日丹诺夫一家。不过这却是一次不幸的婚姻,我虽然在1950 年生下了我们的女儿卡嘉,我们还是很快离了婚。

从此以后我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我从事俄国文学史的研究,后来又为出版社作翻译。我的一些译作曾在莫斯科出版: Ξ. 罗特施泰因(伦敦)所著《慕尼黑阴谋》一书中的一章,约翰·路易斯(伦敦)所著《人与进化》一书中的一章。我还为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写一些对英译俄译文的内部评论。

我父亲1953 年3 月的去世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我早就离开他单独生活了,而且我的日子从来就过得十分简朴,在他死后也一样。我父亲的最后20 年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他的别墅里度过的。

我哥哥雅科夫在白俄罗斯作战部队服役时,于1941 年8 月被俘。我父亲1945 年在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时,有人告诉他,雅科夫是在美国军队解放集中营的前夕才被德国人枪杀的。有一个比利时军官写信给我父亲,说他曾目睹了雅科夫的牺牲。后来,过了好几年,有一个苏格兰军官在一份英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谈到这一事实。但是雅科夫家里最终也没有收到他的部队发来的正式死亡通知,因此,他的遗孀、女儿和我都经常在想,也许他还在什么地方活着——有许多苏联的战俘就这样仍留在世界上各个国家。

我哥哥瓦西里是飞行员,战后他当上了将军和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我们的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开部队,不久就被捕了。他曾对所有人说,"父亲是被政敌杀死的",因此政府决定将他隔离起来。他在监狱里呆到1961 年,直到赫鲁晓夫把他放出来。那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没过多久就死了。他的死因是酗酒,这使他的身体完全垮了,当然,还有7 年的监禁。但是许多人到现在还不相信他死了,经常问我:"他是在中国,对吧? ……"

除了我的孩子约瑟夫和叶卡捷琳娜以外,我现在事实上没有任何关系密切的亲戚。

现在谈谈印度。

1963 年在孔策沃医院住院的时候,我遇上了印度共产党人布拉杰什·辛格,他是应苏联共产党的邀请来莫斯科治病

的。每年都要向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发出这样的邀请。

辛格属于印度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侄子迪内什·辛格是现任外交部长。布拉杰什·辛格于30 年代初在欧洲加入共产党。当时他长期生活在英国、德国、法国,并成了马·纳·罗易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他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对古典印度也极为熟知。

1963 年,在我们相遇之后,他去了印度,1965 年又作为“ 进步”出版社的翻译回到莫斯科。从那以后,他就住在我们家里;我们打算结婚,还准备3 年过后,等他同“ 进步”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期满,就一起去印度旅行。

但是苏联政府和柯西金总理本人反对这桩婚姻。虽然苏联的法律现在不禁止同外国人结婚,但却不能允许我这样做。他们不准我们登记结婚,因为政府认为那样我就会离开苏联,一去不复返。

布拉杰什·辛格在莫斯科呆了一年半,住在我们家里。包括我的两个孩子,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但是所有这些禁令和阻挠使他极感震惊。他的身体不好(多年来患有哮喘) ,在莫斯科更是每况愈下。1966 年10 月31 日,他去世了。我认为我有义务将他的骨灰送去印度,撒在恒河之中。

为了完成这个令人悲哀的使命,我需要得到柯西金总理的特许。他同意了,但是只给了两个礼拜的期限。不过,我仍然设法在印度逗留了更长的时间,因为我在印度见到了辛格的一些朋友和亲戚,并开始考虑留在印度的事情。但是我却受到了阻挠:无论是苏联政府还是印度政府都不会准许我这样做。我应当说,为什么我不愿意返回苏联,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从小时候起，我那一代的所有人都是受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也相信共产主义。然而，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渐增加，我的思想有了变化。赫鲁晓夫自由主义的年代，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我们大家公开了不少事情。我们开始独立思考、讨论、争论，不再像麻木人一样忠于向我们灌输的一切思想。

除此而外，对宗教的皈依在我生活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出生在一个从来不谈上帝的家庭里。但是长大之后，我明白了，人心里没有上帝就不能生活。我是自己得出这个结论的，没有任何人帮助我或者向我布道。但这是我的一个巨大转折，因为从那一刻起，共产主义的所有基本教条对我都失去了力量。

我相信世界上无处不有、各国皆存的理智的力量。我相信四海都可以为家。世界太小，在宇宙中，人类只是沧海一粟。人类要为共同的进步一起工作，而不应当去搞斗争，去无谓地流血。对我来说，唯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教师、科学家、有修养的神甫、医生和律师所从事的工作——他们那不以国家和国界、不以政党和思想意识为转移的全球性的工作。对我来说，不存在资本家和共产党人，只有好人和坏人，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而且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世上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最大的需要和要求，就同他们的基本道德一样，也是相同的。我父亲是格鲁吉亚人，母亲的血统很混杂；我虽然在莫斯科长大，但我相信四海都可以为家。是的，我从年轻时代起就爱上了印度，这或许是因为圣雄甘地的学说比共产主义更符合我的见解。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来印度，并永远居留在这里。

我的儿子和女儿还留在莫斯科，我也明白有可能许多年

都见不到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理解我的。他们也属于我们国家新的一代,这一代人是用旧思想愚弄不了的。他们会对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

但愿上帝帮助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抛弃我,我们相聚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我将等待这一天。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967 年3 月6 日于德里[①]

① 经切斯特·鲍尔斯大使的许可,首次刊载于《仅仅一年》一书: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著,1969 年,纽约。

二

给律师的委托书[1]

兹将此委托书及其转让和代理权一并和分别移交给我的律师爱德华·格林鲍姆和艾伦·施瓦茨，授权他们每人在一切涉及移民入境的场合遵照世界各地所有国家的移民入境法律、规定和调节政策、在面对任何一个政府或行政机构，所有可能涉及上述情况的代办处及机关时，代表我办理一切事宜。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967 年3 月29 日

[1] 本附录中引用的1967 年文件原件曾在《遥远的乐声》英文本印度版(1984 年，德里)发表。直到1979 年，经我当时的律师反复索要，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律师事务所才将这些文件交给我。我当时的律师希望了解我那些书出版方面的情况。这些文件在本书，即附录二至七。

三

给律师的委托书

兹将此委托书及其转让和代理权一并和分别移交给我的律师爱德华·格林鲍姆和艾伦·施瓦茨，授权他们每人代表我进行谈判，在一切事务中达成或改变协议。这些事务涉及我已经写成或将来写成的书、文章和其他文学材料在全世界著作权的出售、转让、办理许可证或其他使用形式，包括，但并不限于发表书、杂志或报纸文章，在电台、电视台使用我的文学作品，由这些作品改编成剧本或电影。受托人还有权追索、保存、在银行储蓄及向我支付由于上述活动而获得的所有钱款。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967 年3 月29 日

四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向科贝克斯公司的权利转让书

(列支敦士登,瓦杜兹市,1967 年4 月20 日)

由于阿利卢耶娃女士系尚未发表的名为《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稿的作者及该稿一切权利的拥有者,又

由于科贝克斯公司希望出版并拥有这一手稿,

阿利卢耶娃女士也注意到1,500,000 美元(壹佰伍拾万美元)的款项,因此将其一切权利和上述手稿的收入,包括一切法定著作权及一切在全世界恢复和扩大此类权利的一切权利,转让给科贝克斯公司。

1,500,000 美元款项将以下列方式支付:

——73,875 美元保证金今日即付。

——1,426,125 美元结存以现钞支付,今日送交阿利卢耶娃女士。[①]

科贝克斯　　　　　　　　斯·阿利卢耶娃

① 没有任何人"付"给我任何东西,我也不明白那些曾(装在皮箱里)给我过目并即拿走的钞票去了什么地方。到1967 年5 月之前,我已到了美国长岛时,我仍然一文不名。从来没有人向我提交过任何开支报告。什么人"以我的名义"花钱,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我都一无所知。但我没有花过这笔钱,也没有见过这笔钱。根据委托书,所有的钱都掌握在律师们手里(见附录二)。

五

帕先齐亚代办所同哈珀-罗出版社关于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手稿的协议

哈珀-罗出版社
纽约,10016,
49 东33 街

1967 年4 月14 日

先生们:

下述文件由双方签署之后,即成为哈珀-罗出版社与瓦杜兹市帕先齐亚代办所之间就出版社购买上述手稿著作权所达成协议的备忘录;该手稿的俄文原本目前由出版社持有。我们理解并同意更为详尽的发表协议将在近期通过,但在此之前,双方必须履行此信各条的规定:

1、帕先齐亚代办所拥有《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手稿在全世界的一切权利,现将此稿在美国及加拿大出英文本的权利出售给出版社,并保证按下列顺序转让:

Ξ、出精装本的权利。

O、出平装本及再版的权利。

П、让图书合作社获得此书的权利。

帕先齐亚代办所应同意出版社使用O和П条载明的权利, 对此, 没有极其重要的理由不得拖延。

2、根据出售给出版社的权利, 出版社同意以下各条:

Ξ、免费为帕先齐亚代办所雇请能满足其要求的翻译, 以将手稿译成英语; 译文应得到帕先齐亚代办所的认可。

O、翻译一结束, 立即发表。

П、支付帕先齐亚代办所或其代表人:

(1) 25 万美元, 支付方式如下:

ξ、12 .5 万美元在本协议签署时付给; 款项的领取应得到确认。

o、12 .5 万美元在1967 年6 月5 日前付给。

(2) 出售价如有追加, 出版社应根据Ξ条向帕先齐亚代办所付款。

3、鉴于要分配该书英文本书摘在北美的发表权, 帕先齐亚代办所指定出版社为唯一代理人。但出版社须同意在未经帕先齐亚代办所事先允许时, 不同任何人谈判这些权利, 而只能同帕先齐亚代办所批准的方面和以帕先齐亚代办所认可的条件进行谈判。作为交换, 出版社应收取帕先齐亚代办所分配这些权利时所得总额百分之十(10 %) 的手续费。剩余的百分之九十(90 %) 应在出版社获得百分之十后7 天内付与帕先齐亚代办所, 但属于第二次发表书摘的情况除外, 这种情况属Ξ条解决。

4、出版社同意未经帕先齐亚代办所允许不公布本协议、本著作及其作者。

5、未出售或转让给出版社的一切其他权利,仍由帕先齐亚代办所保留。在出售发表该著作的保留权利之前,帕先齐亚代办所无疑将同出版社商量,但最后决定权属于帕先齐亚代办所。

顺致敬意

接受和赞同:　　　　　　帕先齐亚代办所律师
哈珀-罗出版社　　　　　　爱德华·格林鲍姆

1967年4月14日

于列支敦士登瓦杜兹市

六

律师事务所就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致哈珀-罗出版社、《纽约时报》及《生活》杂志信

哈珀-罗出版社, 纽约,10016
《纽约时报》, 纽约,10036
《生活》杂志, 纽约,10020

1967 年8 月

尊敬的先生们:

由于不久前有关各方的争论, 并鉴于在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①], 我们希望作出如下确认:

1、本书定于1967 年10 月2 日在哈珀-罗出版社出版。

2、《纽约时报》将从9 月10 日星期版起, 在近两周内发表本书3 万字经作者认可的缩写概要。

3、《生活》杂志分两期(9 月12 日和19 日) 发表3 万字经

① 莫斯科通过维克多·路易发出本书"自己的"版本, 并企图在欧洲印行, 以阻止我们在美国出版。

作者认可的缩写本[①]。

4、在《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上发表这些书摘应有一个副标题:“哈珀-罗出版社10月2日出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的片段”,同时应刊登出版权标记。

5、只允许美国境外的首批预发权购买者在9月1日或根据他们的选择在晚些时候开始发表。

6、全书在美国境外发表,只准在9月21日后的任何一天。

除发表日期略微提前之外,协议其余各条款仍然有效。

劳驾派人送还此信业经签字的复印件,以使我们有一个各方同意新发表日程表的文件。

您诚挚的莫里斯·格林鲍姆

① 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生活》杂志发表的东西,我作为作者都未曾作过任何认可,我甚至不知道发表的并非本书"片段",而是由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她以第一人称对我的书所作的缩写,也就是说公众以为这是我写的。内容则被发表者粗暴歪曲。

七

哈珀- 罗出版社与科贝克斯公司的协议[①]

哈珀- 罗出版社同由施泰赫林与希森达勒事务所代表的科贝克斯公司于1967 年9 月29 日在列支敦士登瓦杜兹市签署的协议

(地址:39 阿尔弗雷德·埃舍尔·施特拉塞,8027 苏黎世, 瑞士,“ 科贝克斯”)

鉴于哈珀- 罗出版社于1967 年4 月14 日同作为科贝克斯公司购买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手稿权代理人的帕先齐亚代办所达成协议, 并鉴于双方现在都希望在上述权利方面对该协议进行补充,

双方同意以下各条:

1 、科贝克斯公司向出版社出售、移交、保证、出资并出让

① 由此可见, 代办者与出版者之间的正式协议早在已经翻译好的书实际面世之前就已签署。实际上, 早在1967 年3 月, 手稿就已经交给了哈珀- 罗出版社和那位女翻译。正式手续是过了很久, 大概是在科贝克斯公司的代表(瑞士的律师) 的一再要求下才办理的。格林鲍姆、沃尔夫与恩斯特干脆将手稿转交给了他们的客户哈珀- 罗出版社。科贝克斯公司则成了某个仅在公文中存在的神秘 人物”。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表英文版的权利，以便为自己及后继者和继承权享有者永远拥有和保留这些权利。

被出售和保证的权利，是出版精、平装书的全权和特权，也是拥有重印权和通过美国图书合作社的发行权的权利。无论是哈珀-罗出版社还是其受托人，在该书版权整个有效期内，以及该版权效力的附加时间或延长期内，都可以使用这些权利。

2、出版平装书、重印及图书合作社发行权的任何拟议中的许可书，哈珀-罗出版社应在其产生之前转告科贝克斯公司，以得到该公司的书面同意；公司则不得拒绝同意或无重要原因拖延同意该许可书。

3、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即将共有4页的协议备忘录[①]和共有3页的发表日程表，作为一个部分完全加进本协议。变更之处仅是帕先齐亚代办所在一切场合下由科贝克斯公司取代。

4、哈珀-罗出版社同意以科贝克斯公司的名义，在美国注册该作品的版权(著作权)，并根据美国版权法，根据世界版权公约及伯尔尼公约，将有利于科贝克斯公司的版权信息列入该书所有版本之中。英译文的版权将署译者的名字。

5、哈珀-罗出版社同意根据该书英文版在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发表书摘的权利分配，以科贝克斯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办理一切事务。发表书摘的篇幅将由科贝克斯公司指定。不管哈珀-罗出版社为科贝克斯公司完成的篇幅有多少，它

① 帕先齐亚代办所同哈珀-罗出版社之间的协议(见附录五)。

都将从该分配中获取10％的利润。科贝克斯公司同意把自己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发表书摘的协议，或关于任何别的能预告按本协议规定出版本书的任何形式的发表协议，通知哈珀-罗出版社，以使哈珀-罗出版社能完全与美国著作权法的要求相适应。

如果在哈珀-罗出版社出版该书精装本前，该书或其部分的注册版权未以科贝克斯公司的名字标注，科贝克斯公司同意在书问世之前，向哈珀-罗出版社提出这些版权的注册转让①。但这一条不涉及该书译自俄语的译本②。

6、科贝克斯公司继而同意把此书在美国境外出版精装本的出版社通知哈珀-罗出版社，以及一旦获得这些出版日期时，即告知哈珀-罗出版社。

7、科贝克斯公司向哈珀-罗出版社保证，它是此书的唯一拥有者，保证此书是原本，不侵犯任何人的版权或普通权，不侵犯任何人的所有权或其他任何权利；保证此书不含丑闻、淫秽、诽谤材料或侵犯某些私生活权，不与第一条(1)所指地区的法律有任何程度的冲突；保证科贝克斯公司是转让给哈珀-罗出版社的权利的唯一绝对拥有者；保证这些权利没有事先向任何其他人提供或作过允诺；保证科贝克斯公司拥有全权加入这个协议，以便进行销售，履行本协议中载明的其他

① 对我的大量问题 什么是 科贝克斯’?”，我的律师回答说：“‘科贝克斯’就是你。”这个回答使整个手续令我更莫名其妙。

② 这些预防措施显然与当年夏天通过维克多·路易在欧洲销售、甚至刊登在各杂志上的似乎是我那本书的各种 异文”有关。

担保。

科贝克斯公司同意免予哈珀-罗出版社的物质责任，使其免受物质损失(包括应付给律师的酬金)，以及由于违反前述保证被法院最终裁定赔偿而可能造成的亏损。如果审理的索赔顺利实施，即通知哈珀-罗出版社，科贝克斯公司的赔偿费将限于总诉讼费的百分之五十(50%)。

8、在哈珀-罗出版社提出理由充足的意见时，如果出现对第三者明显的责任风险，或者发生美国或加拿大政府对此书采取反对行动的危险，如果科贝克斯公司由于消除或减轻上述风险而拒绝同哈珀-罗出版社按后者的要求分担出版社蒙受的所有损失(包括应付给律师的费用)；或者如果科贝克斯公司同意分担类似损失，却拒绝同意出版社或其代表提出的对手稿的修改和编辑，则哈珀-罗出版社作为发表权的拥有者，可以对科贝克斯公司无任何进一步责任地推迟或完全终止发表[①]。

哈珀-罗出版社应尽快向科贝克斯公司通报有关任何要求、索赔或诉讼的消息，科贝克斯公司则将在保护方面同出版

① 这种冲突的反应，只是由于艾伦·施瓦茨转交的乔治·凯南致我的律师的一封信的复印件才传到我这里。乔·凯南在信中请他们"说服"我推迟发表。施瓦茨指出，没有一家出版社同意推迟，因为这简直就等于出版泡汤。当时苏联政府竭尽全力要推迟或禁止我的书在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出版，认为这样做是"反苏的宣传攻击"。正是由于有这一政府禁止出版的危险，我的书的出版加快了，定于10月2日。《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面世之后，哈里逊·索尔兹伯里著文说，……"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不会由于这本书的出版而坍塌。"

社完全合作。如遇索赔、要求或诉讼, 哈珀- 罗出版社有权停止向科贝克斯公司支付根据本协议应付的款项, 以保留本协议中载明的科贝克斯公司的义务。

哈珀- 罗出版社保留权利, 将代表机构和本协议所述科贝克斯公司的各种担保扩大至出版社在此条件下同其签有协议的第三者(比如, 同确保出版社享有本书附加著作权的购买者) , 科贝克斯公司也将在这样的代表机构和保证首次赋予这些第三者时, 在同样程度上承担责任。如果本协议将要废除, 本协议所载损失的保证和赔偿仍要保留。哈珀- 罗出版社将以书面形式把这些第三者和有可能同他们签订的合同通知科贝克斯公司。

9 、科贝克斯公司同意, 尽管本款同协议备忘录和附加日程表相矛盾, 对按由哈珀- 罗出版社最初确定价格的50 % 或50 % 以上降价出售的精装书, 科贝克斯公司将获取哈珀- 罗出版社实际所得的百分之十(10 %) 。协议备忘录及其日程表里的任何内容, 都不成为降低通过普通发行渠道出售的其余书册销售价的理由。

10 、科贝克斯公司同意不对哈珀- 罗出版社用于广告或按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的该书收取利润。

11 、如哈珀- 罗出版社将通过邮购代理商或在报纸杂志上刊登补充广告销售此书, 科贝克斯公司同意不按协议备忘录和日程表规定的价格, 而按在这种销售中规定的零售价收取百分之五(5 %) 。

12 、哈珀- 罗出版社同意邮寄《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到每年6 月30 日和12 月31 日前的销售半年报表; 报表将于10 月1 日和4 月1 日连同在该期限应支付的款额寄出。这

些报表中要表明销售价及销售该书和分配次要权利应有的款额。如果科贝克斯公司按已出售但后来又退还的书的销售价获得多付的款项,则要同意让出版社要么从未来的付款中扣除这个多付的款项,要么要求立即返还多付的款项,而且这种返还要在收到出版社的要求后立即作出。如果哈珀-罗出版社认为存在书店退还大量未售出去的书的危险,它可以从科贝克斯公司应得的款项中扣除适当的准备金。这种准备金只能在精装本发行之后头3个半年报表时期扣除。

13、科贝克斯公司向哈珀-罗出版社提供了完整的俄文手稿,该稿后来由普·约·麦克-米伦女士译出。科贝克斯公司和哈珀-罗出版社均对译者的选择和译文本身未持异议。哈珀-罗出版社同意该书已发表或被允许发表的所有版本仍用该译文,不作任何变更、删削或修改[①]。继而,双方同意在书出版之后,科贝克斯公司尽力[②]从译者手里取得英译本的版权,以使哈珀-罗出版社能从这个版权的使用中获得自己那一部分收入。

14、在发生对该书著作权(版权)的蓄意侵权行为时,出版社可以自行斟酌提起诉讼或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如科贝克斯公司同意这种作法,则其费用由双方平摊,胜诉所得亦

① 不久,在1968年准备出平装本时,我不得不对一些最不能容忍的错误作了修改。没有任何人坚持要与精装本保持"一致",因为已经众所周知,那个译文是不准确的,照爱德蒙·威尔逊的说法,就是"粗俗的"。

② 英译本版权至今仍为普·约·麦克-米伦所有,这意味着书再版时只能使用这个译本。

由双方平均分享;如版权是以科贝克斯公司的名义注册的,则哈珀-罗出版社应同意此类诉讼由出版社以科贝克斯公司的名义立案。如果科贝克斯公司拒绝参与侵权起诉,则虽然版权属于科贝克斯公司,胜诉所获款项仍将归于出版社。

15、哈珀-罗出版社同意向科贝克斯公司免费提供拾(10)本样书。其余所需则可由科贝克斯公司按该书销售价6折购买。

16、本协议可由任何一方不经另一方同意转移给别的公司,其条件应既对双方,也对其权利继承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必须而有效的。

17、双方同意如果在1967年后一个日历年度内,科贝克斯公司由于出售此书应得的款额超过叁万五仟(35,000)美元,则哈珀-罗出版社将分配超额利润,使1967年后科贝克斯公司的年收入不超过35,000美元;

18、本协议应作为完全的权利出售,而不是作为出版社的许可证加以解释和实施。

19、协议中或预备协议备忘录中未特别对哈珀-罗出版社确保的权利,均保留在科贝克斯公司。

20、本文件是双方的完全协议,其中任何一条非经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均不得更改。

21、本协议将以纽约州法律的观点进行解释,不以其签署或履行地点为转移。

科贝克斯公司　　　　　　　　　　哈珀-罗出版社